目　录

1 陈独秀是怎样接受马克主义的……横山宏章
唐宝林译　孟　克校

16 共产国际对研究制定中共
工运策略所起的作用……阿卡托娃
林　海译

35 严酷的事实
——鲍罗廷在武汉……雅各布斯
朱雪平　林　海译　林　海校

59 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罗　易
温冬暖译　林　海校

80 史沫特莱在上海
——《中国的战歌》选译……史沫特莱
江　枫译

116 清末的振兴实业……仓桥正直
赵成材译

125 1861—1894年德国对华商业渗透……斯丢克尔
李荣昌　李必樟校

138 日、英等国干涉交收东三省谈判……格林斯基
姚宝珠译　邹　宁校

146 宋子文与上海银行界，1931—1933……科布尔
杨希孟译　一　叶校

201 国民党政权与英国和解，1927—1931……冯兆基
袁鸿林　陈怡均译　范　琪校

228 奉系军阀与帝俄白卫军的勾结……曼朱列茨
吴永清译
231 艾奇逊及其顾问与中国……科　恩
曾学白译　江　枫校
264 “艾奇逊及其顾问与中国”讨论小结……海因里希斯
江　枫译
270 孙中山与日本……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丁如筠译
276 戊戌变法与日本——
甲午战后的日本报刊舆论……志村寿子
王晓秋译　陈　选校
306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中两国的现代化……依田熹家
李秀石译
335 台儿庄战役前后的日军战略……秦郁彦
吕万和译
342 田中奏折的真伪……宋绍柏
344 中国对国民党史的研究——
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重新探讨……山田辰雄
齐福霖译
360 苏联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尼基福罗夫
曾宪权译　林荫成校
371 香港孔安道图书馆所藏香港史料介绍……杨国雄
元　明译　杨诗浩校　而　已重校

陈独秀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横山宏章

本文试图通过叙述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当时中国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阐明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以及后来被毛泽东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那些因素是怎样从陈独秀的思想局限性和片面性中产生的。

（一）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仍被禁锢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和军阀的军事统治的桎梏之中。这种统治养成了中国民族的奴隶劣根性，使人们的精神颓废堕落和停滞不前。因而，中国革命带有恢复中国民族的自豪感，即“把绝望变成希望的革命”的性质，它要从根本上一扫民众的“奴隶习性”，夺回“人的尊严”。

然而，应该说中国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不是从辛亥革命的成功开始的，而是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开始的。由于军阀割据，民众实现民主国家的希望被出卖，满怀悲愤的民众处于深深的绝望之中。其原因在于，辛亥革命仍然不能推翻中国社会传统的官僚的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政治统治。

那么，这种“把绝望变成希望的革命”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革命呢？从当时知识分子试图把辛亥革命当作根本的革命所进行的

① 本文原题为《从陈独秀看中国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译者

10973

探索中，可以找到这个答案。那就是应该从辛亥革命根本没有触及到人们自身的革命，即变革者浸透了传统的精神这一点出发。陈独秀认识到，没有用新思想新精神武装起来的革命主体，即使能推翻旧的政治统治，也会由于当政者篡改其内容而使黑暗的日子再次到来，①因此陈独秀就着手进行思想革命，即在政治革命之前，先进行革命主体的变革。他说："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②

（二）

根据以上的认识，陈独秀把"否定中国传统思想"定为思想革命的中心内容。具体工作是从1915年开始发行启蒙杂志——《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努力介绍西欧思想的同时，开始用西欧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思想。为此，首先必须揭露和正视充满中国民众头脑中的绝望感、厌世感、虚无感等等。所以，陈通过把西欧思想和中国思想，乃至西洋民族和东洋民族进行比较，极端地强调它们的不同并赞美西欧，开始为中国人的精神颓废敲响警钟。

首先，陈认为中国所以落后，是由于它具有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习性；为了使中国进步，必须使它具有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西洋民族取得了今天这样的繁荣。③他接着明确阐明了东洋民族与西洋民族的不同。西洋民族好战，具有力克艰难困苦的骨气，立足于个人主义，拥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还有，法治观念深入到社会和家庭中，是极讲究实利的。然而，东洋民族却处在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的状态。再加

① 陈曾参加辛亥革命，任安徽省教育厅长。1913年革命转向反动后辞职。

② 《宪法与孔教》（1916，11，《独秀文存》卷一，第103页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以下陈的论文凡引自《独秀文存》的，不再一一注明。）

③ 《敬告青年》（1915.9）

上宗法社会和家族主义剥夺个人权利，使他们重感情，以虚文为满足，等等。①

正如以上对比表明的那样，把西洋和东洋，严格地说西欧和中国，这两种完全异质的事物进行比较，从而既宣扬了西欧文明的优越性，又鲜明地暴露了中国民族的缺点。他通过上述比较指出，东洋文明尚未从古代文明的惯性中挣脱出来；要使它实现近代文明，必须舍去旧的传统。由此，他得出结论：必须接受在西欧得到发展的人权论、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的思想。②

那么应该怎样接受呢？还有，接受过来的西欧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关系应该怎样呢？他认为从欧洲输入的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根本性质完全相反。他根本没有试图使两者在中国融合。这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承认两者在中国能够融合，就会很容易地粉饰难以挽救的中国现状。对于陈，只有一种选择，即依靠西欧思想来全面排斥中国传统思想。

用西欧思想攻击中国的传统思想，首当其冲的就是支配中国社会的孔教。他用来批判孔教的武器，自然是从西欧输入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概念。他认为不仅是孔教国教化违反信仰自由，孔教的三纲说所规定的尊卑贵贱的概念违反平等，而且它们也与宪法的民主主义相矛盾。③他还认为，作为孔教核心的礼教所宣扬的孝悌说，是阻碍个人人格独立、个人财产独立和妇女解放的根源。④于是，陈就成了“打倒孔家店”的先锋。他认为要是不彻底推翻孔教世界，即使形式主义地制定宪法和采用议会制也是毫无意义的。⑤

那么，他通过否定中国传统思想的运动所追求的思想革命，是要造就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思想革命由谁来承担呢？

---

①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12.)
② 《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2.)
③ 《宪法与孔教》(1916.11)
④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12)
⑤ 《宪法与孔教》(1916.11)

他并不是把一切都寄托在青年身上，他认为从混乱的社会中产生预见未来的新思想，只能依靠朝气蓬勃的青年们的觉醒。所以他要求青年恢复和发挥人性的良知，不妄自菲薄，舍去忧柔寡断的态度，敢于向腐朽势力斗争。①他要求于青年的决不是过急的革命运动，而是自觉和奋斗。可以说他不主张从反抗强权政治着手，而是根据以新鲜活泼反对腐败堕落、以良知反对无知、以新反对旧的指导思想，开始进行青年的思想革命的。

此外，还要求青年有健全的精神和强壮的身体。他把青年腐败堕落的根源归结于“升官发财”四个字，指出人生的幸福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强壮的身体、正当的职业和称实的名誉。②他主张青年要象青年，必须具有真正纯洁强壮活泼的精神和身体。这是一个极端抽象而平凡的主张。但是，从他不能不坚持的这种平凡的主张中，人们应该看到当时中国的精神颓废之严重。

关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他要求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和造就有自觉性的个人。他认为社会的幸福是个人创造的，应该为个人所享受。个人的意志和快乐虽处于社会之中，但应该得到尊重。他认为个人生存的理由是为了实现意志和满足欲望，因此，人生的幸福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创造。③他还指出个人意志的重要，这种意志是指对目标采取行动的意志，即积极性。他多次强调要抛弃隐居者的“田园式的幸福”，赞赏以奋斗克服痛苦的“英雄式的幸福”，为了争取英雄式的幸福而百折不挠地努力奋斗。作为实现这种幸福的唯一道路，他强调劳动的重要性。④

重视个人自觉的倾向，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中。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呢？是那些敢于反抗压迫民众的独夫（利用自己的统治为所欲为的当权者）的烈士吗？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中国的危机固然是来自独夫和外敌的压迫，但是，招

① 《敬告青年》(1915.9)
② 《新青年》(1916.9)
③ 《人生真义》(1916.2)
④ 《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1916.9)

致这种压迫的是由于民众的堕落。他提倡，要救亡，首先需要改善国民的行为和性质。①他的爱国主义不是追求社会的变革，而是追求个人的变革。

（三）

陈独秀追求西欧思想的精髓——科学和民主，但是，在他的心目中，西欧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要从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设想中去探讨。

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是从受到西欧强烈冲击的痛苦中开始的。对于由“西欧冲击”引起的西欧和中国的关系，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是“外压与抵抗”，一是“进步与颓废”。“外压与抵抗”论者认为西欧与中国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即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进行抵抗的关系。这种立场具有通过民众的反抗，使中国向着现代化方向前进的性质。

但是他提出了与这种立场不同的“进步与颓废”的说法。如上所述，他认为西欧与中国的关系是由于实行民主主义而进步的西欧与由于传统束缚而颓废的中国关系。这是明显受了进化论的影响。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使他提出全面否定造成中国颓废的旧传统的任务成为可能。

那么传统怎样才能否定呢？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停滞的旧制度、旧思想是极其强固的。这就需要有能够瓦解这种强固的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强有力的武器，需要有一种思想能使人们认识中国传统多么陈腐多么非人道。也就是说寻求一种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不同的、能够暴露腐朽的中国旧制度旧思想的思想。适应这种需要，作为西欧思想象征的民主和科学承担了这个任务。可以说在他看来，西欧思想是瓦解和否定中国传统的武器和手段，而不是要使中国实现西欧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和手段。正因

① 《我的爱国主义》(1916.10)

为如此，他把东洋和西洋的不同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那就是使科学和民主成为变革思想的工具，以期实现意识形态对于现存秩序的破坏作用。总之，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呼吁进行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而是试图从使民众理解和认识革命的必要性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家，而不是革命家。

那么，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这种说服和宣传的效果呢？要打破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需要有说服力的通俗的新思想。在考虑意识形态的破坏作用时，为了提高它的破坏力，尽可能地把它理想化抽象化是可以提高效果的。由此出发，他在试图利用西欧思想打破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思想革命的时候，想要通过把西欧思想单纯化、理想化即美化成为科学和民主，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腐朽性。为此，他甚至脱离西欧的实际情况，肆意把科学和民主作为西欧的化身加以理想化。①

他在把西欧思想理想化，以使中国民族容易理解的同时，也把中国思想单纯化，以便与西欧思想进行对照。可以说，这种对比是脱离现实情况的一种单纯化，就西欧思想来说，是把它极端理想化了。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单纯化理想化，才使他具有对中国传统挑战和破坏的"彻底性"。可以说他对封建中国攻击的坚定不移的决心，由于在思想上把西欧绝对化而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做法使他成为二元论者，使他不可能进行辩证的思考，同时，也使他的决心在实践过程中暴露了许多局限性。

（四）

陈独秀的"进步与颓废"的公式，从俄国革命到五四运动一直没有变化。对于被说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出发点的俄国革

① 对陈的这种理想化进行较多批判的有：B.I.许华兹：《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第9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新岛淳良：《五四时代陈独秀的思想》，《思想》第380号第40页，岩波书店出版，1956年。宇野重昭：《中国民族主义和俄国革命》，《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第137页，东大出版，1967年。

命，陈独秀也把它纳入他自己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式中进行解释。俄国二月革命发生以后，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协约国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德意志君主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战争，俄国革命也同样是对于俄国沙皇君主主义和侵略主义的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①单从“进步与颓废”的公式来看，他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解释当然是对的。然而他对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简单化的概括，被历史推翻了。标榜如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克伦斯基的政权，被十月革命打倒了。本来应该与侵略主义的德国作战的新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了。当时还没有阶级观点的陈独秀，不能理解俄国革命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由于没有改变其一贯的想法，他不能理解那种变化，终于对十月革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

而且，在激烈动荡的政治局势中，他的思想变革先于政治变革的基本思想并没有改变。其代表作就是对庆祝战胜德国的民众破坏德国公使克林德碑一事的评论。②这个纪念碑是纪念被义和团打死的克林德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民族的屈辱。但是，他劝阻这种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行动。他主张对义和团中包含的道教、佛教和孔教都一起作为传统思想的根源进行批判。③同时，他认为必须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拥护民主和科学。④直到这时，他仍然无视民众的民族主义，依然主张民众的思想变革，深信以民主和科学来打动民众的心，凭借这种力量能够变革社会。民众的民族主义超越了单纯的思想变革阶段，向更高的阶段自然地发展。但是他还是未能从中吸取教益，所以他未能投入在其后发生的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中去。

他把西欧思想极端理想化，又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

①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1917.4)
② 《克林德碑》(1918.10)
③ 同上。
④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1)

“十四条和平纲领”看作是这种理想的化身。而且他在因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而在中国流行的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中找到了这种理想。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高举公理（平等、自由）而战的协约国战胜强权（凭自己的强权而侵犯他人的平等、自由）的德意志的过程，①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现实世界验证了自己提倡的主张的正确性。

陈独秀认为，这个原理也应该贯彻到战后问题的处理中去。而且要求以威尔逊的十四条作保证。为此，他对威尔逊十四条的精髓作了理想化的解释，将其归纳为两条：（1）不许各国凭借强权侵犯他国的公理，（2）不许各国政府凭借强权侵犯人民的公理。②结果，他把威尔逊大总统吹捧为“世界最高人物”；③给威尔逊大总统的理想主义以最大的赞颂，从而使他对西欧思想的理想化也达到了顶点。

（五）

但是，这种理想化脱离现实是何等的远啊！它不仅使他的西欧思想理想化破绽百出，而且把西欧思想作为破坏中国传统的批判原理，其效果也是很低的。

这个悲剧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处理第一次大战善后的凡尔赛和会，使他的理想破灭了。这个会议上暴露出来的现实，是大国滥用自己的强权，排斥民主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公理、对殖民地进行再分割的现实。威尔逊十四条的精神在大国的经济政治欲望面前被摧毁了。他在这个和会上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公理。

凡尔赛和会从1919年1月开到6月。他早在2月就产生了会不会按国力强弱来分配权利的疑问。④然后，会议被五大强国秘密

① 《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12）
② 同上
③ 同上。陈的原文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译注
④ 《公理战胜强权》（1919.2）

包办，根本没有涉及弱小国家的权利问题和民族自决问题。他问："公理到底在哪里？"①这样，被他当作中国民族思想变革借鉴的西欧思想中最理想的部分破灭了。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于是，他停止了对西欧思想毫无批判的理想化。凡尔赛会议成了大国只重视本国的权利和分配战利品的会议。他痛斥所谓"公理"、"持久和平"，威尔逊的十四条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②仅在半年前，对于威尔逊的民主主义精神寄于很大希望的陈独秀，与凡尔赛会议后的陈独秀之间，差距是多么的大啊！

对公理的信仰破灭以后，该怎么办呢？他开始明显地改变想法。这个变化就是从主张公理转移到主张暴力的立场。他一方面哀叹还不是公理能够对抗强权的时代，另一方面表示为了民族自卫，甚至不反对发动黑暗的非人道的战争。③这样，他就同试图依靠理想化的西欧思想进行思想革命的路线决裂了，吸收暴力的理论，开辟了由思想革命向社会革命转变的道路。

他鲜明地站到新的立场上来了。他认为凡尔赛会议只讲强权不讲公理。已经不能单纯地依赖公理；单靠公理不能发挥它自己的威力，要有拥护强力的自觉性。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不得不用强力拥护公理，用强力去抵抗压迫。④

他因凡尔赛会议而动摇了对公理的信仰，从无条件地信仰公理，转变为依靠强力拥护公理的立场。这就意味着把这种社会强制力的理论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中去，放弃他的理论背景中具有的性善论，而加强了性恶论。他认为必须对人的性恶面进行社会的制裁。

由此，他又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不能听任少数人的独裁政权

---

① 《揭开假面》(1919.2)
② 《两个和会都无用》(1919.5)
③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1919.5)
④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1919.5)

来支配中国的将来。他认为根本的办法是平民征服政府。①这表明他开始萌生革命思想，意味着他的关心开始转向国家问题。

从他的爱国观中也可以看到这一变化。以前他讲爱国时，如上所述，是针对招致国家灭亡的国民的堕落。他认为爱国首先是每人本身要有坚强的人格。但是，1919年不同了。这时他讲爱国的对象已经不是个人而是国家了。他说我们爱的国家，是人民自觉抵抗压迫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②以前他所关心的是通过个人来考虑爱国，即所谓“值得爱国的个人是怎样的”；现在他所关心的是通过国家来考虑爱国，即所谓“值得爱的国家是怎样的。”这种不同，可以说表明了他的思想变化。

陈独秀看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体系中强权蹂躏公理的形势。他从凡尔赛会议中学到的教训是，实现任何理想都必须有具体的方法和依靠的力量。这样，他由提倡公理向前迈进了一步，承认了实现社会革命所依靠的力量——暴力。那就不能停留在期待作为批判原理即意识形态的破坏效果上，而应根据社会内外的变动，摸索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实践原理。这样，他就从拥护民主破坏顽固传统、具有浓厚启蒙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向依靠有组织的力量来打倒旧政权的革命家。

（六）

对于从凡尔赛会议的绝望中开始追求革命的实践原理的陈独秀来说，马克思主义就在眼前了。当他认识到了对抗强权，单单提倡公理不够，还必须依靠强力时，他对于过去保持沉默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始评价了。他认为法兰西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二者都是掌握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的革命。③

①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1919.5）
②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1919.6）
③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1918.4）

他还谴责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们，是去不掉军国侵略主义的—阶级的—国家的利己思想的人。①这样的评价是消极的，不是站在阶级观点上的。与已经对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给予高度评价的李大钊相比，②他对俄国革命的认识仍然是比较迟的。

然而，虽然迟了，但在承认暴力对于实现公理的作用时，他已经认识到被理想化了的西欧思想——民主是依靠社会阶级的力量而发展的。这样，被他作为依靠对象的，不再仅仅是过去那样有自觉性的知识分子，而是社会阶级本身了。他曾提出，由于资本家的压榨而造成的欧洲贫富差别，今天已成为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重大问题。但是在这里，他并没有一下子就承认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甚至说过：由于中国工厂少，如果工业发达，穷人能有工厂去忍受种种折磨来糊口还算是福气。③他认为进行社会革命是为了发展产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初次发表了包括具体变革计划的政治论文。④这里，他受到了杜威的影响，提出为使中国社会发展成为民主主义社会，应以英美为榜样组成直接的自治组织的联邦体。但是，重要的不是那个结论，而是与政治相比，他更加重视社会经济的变动。他认为提高社会生活水平是目的，政治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同时，民主主义也必须看做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而且他宣称社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⑤这样，他就完成了接受新思想的准备。

（七）

1920年，陈独秀成为宣传暴力必要性和提倡阶级斗争、无产

①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1919.12)

②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7)；《布尔什维克的胜利》(1918.10)；《庶民的胜利》(1918.10，均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③ 《贫民的哭声》(1919.4)

④ 《实行民治的基础》(1919.11)

⑤ 同上

阶级专政合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由于他吸收了暴力的理论，从以西欧思想作为批判原理进行启蒙活动，变为探索社会变革的实践原理，即探索他所缺少的把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连系起来的方法论。他对于西欧思想极端乐观的信仰，妨碍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形式。但是，由于凡尔赛会议使他认识到民主和科学不能作为挣脱中国传统束缚的武器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他除了探索这个方法论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

他由提倡“用强力拥护公理”，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但是所谓强力，具体说，就是如五四运动表现的那种组织起来的力量。能够有效地实现大众的组织化，并且包括进行具体改革的实践方法的理论，就是这种方法论。它必须是把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的方法论，同时又是以组织起来的力量作为实现公理的具体手段的理论。

这就是陈找到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上面的要求。贯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组织论，能够组织大众的力量；贯穿在阶级斗争中的运动论，能够给组织以现实的战斗力。它使他原来不具备的进行革命的具体步骤，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同时又提供了依靠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具体的战术。

还有，历史唯物论非但没有否定他的进化论，而且说明由于民主观点中加入了阶级斗争观点，可以实现更高度的民主。革命的哲学要求确立现代的自我。② 他所缺少的经济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可以由他的发展了的新陈代谢的理论来说明；从外部向民众运动灌输目的意识的列宁的先锋党论，重视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满足了陈对自觉心的追求。

这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他历来的思

① 《谈政治》(1920.9)

② “自我”，哲学名词，即“自身”，又指创造“客体世界”的主观意识。古代的“自我”是唯心主义的概念，近代的“自我”，则被赋予唯物论的新意。——译注

想，而且填补了他所欠缺的部分。因此，对他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没有阻力的，顺利的。

（八）

以上概括地叙述了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里面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有关否定中国传统本质的问题。他把中国的传统归结为"恶"，所以否定它。但是，他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单纯的新旧交替论，因而他期待作为旧事物的中国传统被新事物所取代。就这样，中国社会的旧事物——传统思想，尤其是孔教、家族主义，还有军阀和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政治等，都作为"恶"被一概否定了。另一方面，他把人类正在追求的新事物——民主、科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等，都归结为"善"，要用它来取代旧事物。而且，这个否定具有以新事物否定旧事物而告终的性质。

在这个单纯的否定程式中，他认为从中国传统社会中找不到任何新事物；他不是从中国内部寻找作为否定中国传统的新事物，而是求助于外部的、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欧的概念。这样做对于让中国大众看清传统的弊端有很大的贡献；但是，那是依靠外在的逻辑来否定，极而言之，是要用西洋来否定排斥中国，即用不同质的事物相互替换。他的认识未能达到依靠中国自身进行内在的否定。这样，这种否定就未能与中国内在的独特的发展逻辑相结合。他没有以旧事物制约旧事物，即用传统否定传统的眼光。所谓从本质上进行否定，就是在中国吸收西欧思想的时候，应该承认既要摆脱中国比西欧落后的状况，又要使中国的传统适应现代的需要。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和旧的矛盾，旧等于恶，新等于善的概念已经固定化了。由于他停留在以新否定旧和对传

统思想的一般否定上，因而，始终没有把握住对于所谓新事物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内在的矛盾和纠葛进行自我革新的契机，也没有改革存在于改革者内部的旧传统同自身的关系，即没有改革改革者自身。这样，他只是以新的否定旧的，没有进行新的自我否定和旧的自我否定；就是说，他只是以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中国现状，而看不到中国自身产生的革新思想，不能从中国传统中引出新的中国来。

第二，与第一点很有关系，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问题。对西欧民主主义的幻想破灭之后，他迅速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转变不是在思想上总结过去信仰民主和科学的西欧思想基础上的转变，也不是对迄今为止的他自我否定后的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从思想上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接受的。

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把它作为能够最合理地说明暴力逻辑的一种意识形态来接受的。因此，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极其偏重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其组织论和运动论。可以说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是作为革命的方法论接受的。因此，他并没有变革自己的思想。为了使他能够革新自己的思想，同时也革新马克思主义，从而制定出适合中国的革命理论，他是应该吸取他所缺少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的。而且，为了清除他自己始终热衷于思想革命的倾向，他是应该走向马克思的异化论的。

（九）

陈独秀尽管有以上那样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国民革命中领导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与共产国际的争执中，于1927年遭到了政治上的失败。后来，在实践中克服了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是毛泽东。假如我们批判陈独秀，

不应扣“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分子”这类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帽子，而应从根源上进行批判。从现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到批林批孔运动，陈独秀成了反复批判的对象，这与片面地否定上述的历史是有关的。

译自《一桥研究》第29号，1975年7月

唐宝林译　孟克校

共产国际对研究制定中共工运策略所起的作用

T·阿卡托娃

在共产国际倡议和直接帮助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6—7月），在中国革命、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这次代表大会面临着革命、国家生活和中共在国民党统治下活动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大会的任务是制止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在1927年反帝统一战线分裂之后，在民主力量遭受严重失败的情况下，支配了全党。左倾分子由于把当时的形势错误地估计为革命的形势，由于错误地认为革命将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企图立即发动工农进行一场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起义。党的领导低估了反革命的力量，低估了国民党夺取政权后中共在客观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过高地估计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以及他们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列宁认为这种冒险主义与急性病的特点和根源是，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没有能力估量各种力量的互相关系，在斗争方式已经改变的情况下，没有能力以最小的损失组织革命力量的退却。②

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政治上成熟程度的过高估计，是因它在

① 有关中共六大的召集与开会的各种情况，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苏联历史学家已写了文章（见格里高里耶夫：《中共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载《远东事务》1973年第3期）。本文集中讨论的是大会仔细研究工人阶级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及共产国际在贯彻大会通过的有关加强中共与工人群众联系的各项决议时所给予的合作。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页。

1925—1927年革命中的英勇斗争而产生的。这是因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些年月里，工人们是为反对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而战，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缺乏基础，而且这种斗争也还处于工人保卫自己经济要求的初级阶段。如果认为工人会以反帝斗争时所表现的热情去反对不久前还是盟友的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多年来一直领导解放斗争而且还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反帝口号的国民党，那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根据的。低估革命力量失败的程度，主要是由于过高估计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确信国民党无法将工人群众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然而反动派终于使城市中党的干部，以及与中共有联系的工人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都遭受了重大损失。统一战线破裂后国民党所实行的白色恐怖，确实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只要与中共或革命工会有关系，就有足够的理由被处以死刑。中国报纸充满了各城市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据瞿秋白称，到1928年年中，在中国工业中心，革命工会的活动分子被杀、被捕、被解雇的，不下于百分之八十。① 许多党组织的活动瘫痪了。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共产党继续想法复兴革命，但又不考虑真正的力量对比。中共中央1927年 8 月和11月会议不设法退却和荫蔽革命力量，反而采取了发动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武装起义的方针。

在这种条件下，中共领袖希望以无产阶级的暴动对付国民党，是没有根据的。这不仅因为推行白色恐怖的反动势力占有绝对优势，还因为有其他原因。中心问题是革命后在工人运动中有一种消沉情绪，影响产业工人极深；中共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薄弱；国民党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具有灵活性。在地下活动极为严酷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中和1927年以后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存在着沮丧情绪的情况下，党在革命前的年月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活动

① 见斯特拉霍夫（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问题》，载《中国问题》1930年第2期，第43页。

的一切弱点，就显得十分明显了。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指出，中共在革命高潮期间，未能把自己与工人群众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在他们中灌输一种思想，使他们坚信，党是他们的先锋队，是保卫他们自身利益的。①来自各地的代表指出，革命时期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上，没有给工人一个明确的概念，因此他们看不清1927年政变的反革命实质。②

国民党所实行的白色恐怖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无产阶级活动分子的薄弱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中共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中共领导的工会，只有很少数因为转入地下荫蔽很深才设法得到恢复的。如前所述，中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就是它一开始就与反帝斗争有着有机的联系。现在中共领导却把为数不多而又基础薄弱的赤色工会看做是以最高形式（无产阶级起义）进行阶级斗争的唯一工具。这种情况还表现在党和赤色工会漠视日常经济斗争上，这种斗争对于革命失败后因大批解雇而处于困境的工人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国民党，则把“安抚”工人阶级看作是它的社会改良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政策的成功又因与民族主义有密切联系而得到助益。按国民党的说法，正是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感到十分亲切和能够理解的这种民族解放和复兴国家力量的目标，才适应它实现“阶级和解”，劳资合作，以及在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进行控制的需要。国民党在摧毁“共产党的”工会和屠杀工会领袖的同时，建立起新的、合法的工会，用以保证劳资合作和政府当局对工人一切活动的控制。

合法的工会一建立，国民党就表现出它的劳工政策的某些特点：立即严厉镇压任何反政府的政治行动，同时又表示注意工人群众必不可少的利益，使他们平静下来，并把他们争取过去。当然，国民党维护的是雇主的利益，但这种颇为狡猾的做法却宣告

① 见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卷，莫斯科1930年版，第46—47页。

② 同上，第2卷，第100—101页，106页，128—129页；第3卷，第9、19、26页。

它的政权的超阶级性质，据说这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又对工人阶级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国民党组织在裁决劳资冲突时的义务调解有时确实使工人的基本要求得到了满足。即使在充满严重劳工风波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一旦被国民党宣传机构广为宣扬，也会使工人的斗争精神消沉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当局为达到“阶级和解”的目的，在要求雇主对工人做出让步时，通常都抬出共产党人“煽动阶级斗争”活动的危险性。国民党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弹性劳工政策是对共产党在工人中活动的极端不利的因素。

中共领导关于革命在高涨的论断，以及它所采取的武装起义的方针，给被毁掉大半而又在艰苦条件下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增加了过重的负担。极端夸大主观因素常常是左倾幻想的特点，这种夸张造成一种局面，试图以个人勇敢精神和对敌人的藐视激励群众，使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违反秘密工作的基本守则。在这种情况下，党在城市的力量日渐衰落了。

日益恶化的劳动条件和解雇，引起了工人为卫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日常自发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大部分合法工会都在起作用，它成了解决劳资冲突的必要的工具。工人群众并不注意中共的口号。武装起义的方针与工人的斗争水平不相适应，它只能在党的队伍中增长急性病，促使党员进行工人不愿参加的无准备的行动。中共企图正式组织无产阶级的暴动，指望把经济上的行动发展成为普遍的政治起义。所提出的口号是“变一切小斗争为大斗争！”①在日常经济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在没有应有的准备，甚至与工人没有联系，而且在与他们的心情相反的情况下，就企图“确定”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日期。如在武汉，一次罢工（从未举行）“定”于1927年8月2日，想以此支援8月1日开始的南昌起义。武汉的共产党人相信，只要宣布反国民党的口

① 瞿秋白编：《中国职工运动资料集》，1927——1928年》莫斯科1931年版，第41——42页。

号，就足以使工人武装起来。① 以后他们不顾失败，又做了第二次冒险，把武汉工人的武装起义定于1927年10月13日，这时武汉的军阀们正在互相争夺权力。由于毫无准备，这次起义被“取消”，代之以“定”于同一天的一次总罢工，但也无法实现，因而也未举行。武汉共产党人的这些行动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都被用来作为盲动主义和“拿起义当儿戏”的事例。②

在上海，共产党人想借浦东区纱厂工人的一次经济罢工发动一场总起义，但徒劳无益。因为当时在上海附近农民骚动正在酝酿，共产党人希望在他们的号召下，一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工农起义就会发动起来。③浦东区的罢工失败了，农民的行动立即遭到镇压。群众并不追随起义的口号。这种口号只能使国民党当局加强戒备，只能使上海的中共力量遭到进攻和围捕，造成严重损失。④

1927年12月，由于想在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工人中组织一次总罢工，共产党员甚至以对工贼的报复行动，威胁不愿参加罢工的工人。有的工人被罢工工人纠察队所杀，或被打伤。⑤这虽然是个别事件，而且罢工还在进行，上海总工会就命令停止对持观望态度的工人实行“赤色恐怖”，但这种事总是有损于中共在工人中的威信的。参加中共六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分析了这些事件之后，认为这是有害于党与群众联系的最危险的“制造革命”的企图，而不是用说服的方法赢得群众信任的做法。⑥

1927年底，中共聚集力量，在广州组织了一次起义。共产党人希望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地区性的革命基地，并使它成为全国普遍起义的中心。广州的形势比其他城市更有利于中共。但是构成

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第5卷，第92页。
② 同上，第2卷，第70——71页；第5卷，第41页。
③ 见《布尔塞维克》1927年第7期，第178—187页；前引瞿秋白所编资料集，第41—43页。
④ 见《中国问题资料》第10期，第201页。
⑤ 见《布尔塞维克》1927年第10期，第286页；前引瞿秋白所编资料，第56—58页。
⑥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卷，第42页。

这种“革命形势”的因素也被大为夸大了。中共作了英勇的努力，设法使地下赤色工会的两万会员起来暴动，他们勇猛战斗，自我牺牲，展现出奇迹。但这只是广州三十万工人中的一小部分。

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广州公社的命运，它被空前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这次失败后，各城市蒙受了甚至比以前更加残酷的白色恐怖，并使中共确实处于严酷条件之下。

中共的左倾指导方针和它与工人群众联系的薄弱所造成的危机，在1928年春季工人阶级反日斗争（这是日本新的侵略行动——1928年5月3日在济南枪杀平民所引起的）高潮时变得特别明显。遭到大批屠杀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没有利用这一高潮加强与工人的联系。这种悲剧还夹杂着这样的事实：被共产党人认为不代表工人、背叛工人的合法工会，表现非常积极，走在反日斗争的最前列，而过去总是处于反帝斗争先锋地位的中共却感到自己孤立了。①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处于混乱状态中。1928年夏季，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一次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谈到在重要工业中心和主要工业部门中一切党的基层组织几乎都已消逝的问题，他说，党已丧失了作为它的基础的工人，很难说真正存在着非合法的工会。②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帮助就有巨大的重要意义了。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极为严肃地强调了中共改变其战略指导方针与革命作风的迫切必要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整个决议，充满了对中国革命命运和中共本身的深切关怀。这个起了历史作用的文件生动地证明，共产国际彻底研究了中国的形势，试图以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帮助中共从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后卫战的失败中寻求出路，摆脱困境。

共产国际坚决拒绝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处于高潮阶段的观点，

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注意到，工人阶级的一切反日组织原来都在国民党工会的领导之下。——见中共六大记录，第2卷，第122页；第3卷，第115页；第6卷，第11页。

② 中共六大记录第4卷，第5—11页。

阐明了民主力量普遍遭到“最严重”失败后形势的特点：“……虽然在许多省份，农民运动在向前发展，但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遭到了白色恐怖空前的血腥镇压，正处于某种低潮阶段”。①决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仍处于未完成阶段，仍在继续进行，因而指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极端错误的，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如强迫工人罢工、盲动主义和拿起义当儿戏一类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其结果就出现了中共脱离群众的真正的危险。②共产国际执委会强调：“当前全党工作的重心，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③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任务被规定为“从阶级敌人那里争取工人”。④这一规定指出了城镇中的地下党组织由于国民党对工人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合法工会的发展而面临的特殊困难。

共产国际强调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和中共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活动的客观困难，强调了国际无产阶级全面支援中共的迫切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其所属一切支部尽一切可能援助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所有工人，首先是共产党员，履行其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援助英勇的中国无产阶级。”⑤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之后举行的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表明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这次代表大会因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袭击，在中国举行是不可能的。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是对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下状态的中共的一种国际援助行动。第六次代表大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范例，彪炳于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和联共（布）在会前对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莫斯科1934年版，第208页。
② 同上，第208—209页。
③ 同上，第208页。
④ 同上，第209页。
⑤ 同上，第211页。

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大会在莫斯科的组织和举行，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代表在极为关键的问题上的演说，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热烈同情，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重视——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表明了一种革命的团结。在大会上，高尚而勇敢的自我批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为使党成为工农群众真正的先锋队而探索可行办法的欲望，以及为中国革命不惜任何努力的热忱，支配了一切。

首先，大会分析了中国革命当前现状的特点，估计了政治形势。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代表作了许多说明。大会采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当前形势特点的论断，①特别强调在革命遭受重大失败、中共及其与群众的联系都已削弱的时期内，号召立即进行武装起义是没有根据的。大会宣布党的总策略路线是“为争取群众而斗争”。②这是大会的伟大成就。为争取群众而斗争的路线不仅是这一危急时期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也是将来工作的唯一正确方针。

代表大会总的指导方针和一切具体决定，目的都在加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协调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革命斗争。这是一位工会国际代表在代表大会之前的一次讲话中所强调的，当时他说，中国革命只有依靠工人和农民才能顺利发展和取得胜利。③

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问题上所做的重大而富有成果的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会对1925—1927年革命期间和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作了分析，创造性地探讨了中国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首先提出了“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代表们严肃而大胆地讲述了城市地下工作失败与挫折的惨痛教训。他们的发言再现了共产党人对工人群众的左倾行动所造成的凄惨景象。由于发号施

① 同上页注⑤。

② 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载《东方共产党纲领性文件》，莫斯科1934年版，第15—16页。

③ 中共六大会议记录，第1卷，第64页。

令、径直采取强迫手段、直到以人身报复威胁持消极态度的工人，使党失去了与群众的接触。来自上海、武汉、南昌、安源和其他城市的代表，谈论了共产党员组织武装起义（结果成了盲动主义）的徒劳无益的尝试，谈论了那些无谓的牺牲，谈论了那些行动的冒险主义性质，以及对工人经济要求的漠视，这种漠视使城市中尚存的党的基层组织与群众的关系更加疏远了。①周恩来、苏兆征和其他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指出，赤色工会实际上没有群众性，而相当于中共在企业中的支部。这些赤色工会不做任何具体的工会工作，不收会费，不召开会议，不举行集会。在城市中，赤色工会和党的支部一样多。此外，共产党员联系的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工人中的某些落后阶层。②

大会讨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工人成份及其与工人群众、主要是与产业工人联系的可能性。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所提的建议十分重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赞扬在城市白色恐怖下工作的党的干部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行动，强调要正确估计敌人的力量。他指出，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战斗精神并不要求每分钟都力求战斗，而是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要时还要推迟战斗。企图使情绪消沉的工人群众罢工，甚至使他们违反自己的意愿，在他们不理解的口号下举行起义的做法，都受到了指责，认为是对革命和党本身最危险的行为。③正是因为与工人群众没有深厚的联系，才采取绝望的行动，因而发生了“赤色恐怖”和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强迫命令。执委会代表最后说，中共在工人运动中最根本的任务是进行日常工作，集中注意群众的经济要求，加强反帝斗争。④工会国际代表又指出了克服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破裂后感到孤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能建立在反帝斗

① 中共六大会议记录，第2卷，第41—44页，49—58页，69—71页；第3卷，第21页，56页，59页；第5卷，第41—42页，126—127页。

② 同上，第3卷，第18页；第4卷，第10、11页。

③ 同上，第1卷，第37—42页。

④ 同上，第1卷，第24页，46页，47页。

争的基础之上。并提出建议，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要团结一个“小资产阶级阶层”。①

代表大会从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建议出发，从斗争的全部经验出发，制定了一项决议：《中共当前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它的主要之点是：停止在工人运动中的强迫命令，巩固赤色工会，同时渗入一切合法的工人组织，全面加强对经济斗争的领导，使群众从国民党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建立苏区与城市工人运动的联系，在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中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②

代表大会强调了在白色恐怖下和改良主义合法工会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达到这些目的困难，指出，在1925—1927年革命期间，发动工人群众使之团结在中共及其工会周围的任务并未解决，现在必须在困难许多倍的情况下加以解决。③与会者一致的意见是，全面加强中共与本阶级的联系，必须同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团结的方针有机地结合起来。④

六大宣布的为争取群众而斗争的路线对中共在工业中心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不再给自己确定一定阶段不易实现的任务，党开始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工人运动的客观情况了。中共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开始探索与工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策略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方法这种主观因素的作用也变得明显了。正如共产国际所指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即中共指导的成功，直接取决于共产党人对客观情况和客观规律的了解和认识。

1929年2日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审查了中共在六大之后半年的活动，并给中共中央发去一信。信中指出，中共的某些党员正在犯右倾和左倾性质的错误。右倾动摇导致取消赤色工会和中

① 中共六大会议记录，第一卷，第64页。
② 同上，第6卷，第14—16页。
③ 同上，第6卷，第4页。
④ 同上，第6卷，第3页。

共本身的倾向，左倾情绪产生对“小”经济斗争的漠视，否定在合法组织中进行的活动，认为是“不革命的”。共产国际再三说明“肃清使党脱离广大阶层劳动人民”的倾向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建议。①

1929年夏，中共六大之后一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制定了一项关于中共在工会工作中的决议。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共六届二中全会（1929年6—7月）正确地采取了同时在赤色工会和合法工会中工作的方针，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下采取不同态度的必要性。在中共党员渗入合法工会时，要考虑工会的人数，只有包括相当数量工人的工会才必须加入。有一项把六大决议具体化了的重要新建议，涉及赤色工会。赤色工会一定不要根据“越多越好”的原则，而是只有将它转变成群众组织的条件存在时才去建立。在合法工会占绝对优势的地方，建立赤色工会不仅没有意义，而且那些“由上而下”建立的有名无实的赤色工会也必须予以解散。②执委会再次建议，在赤色工会的秘密领导下，建立工厂委员会，团结企业所有的工人；各种同乡会、兄弟团以及其他合法存在的旧团体，都必须用来掩护地下工会。决议还包括关于如何进行工会工作的若干具体建议。执委会强调，要放弃“用命令”和“由上而下”建立工会的习惯做法，建议派党员到企业中去，在那里工作，在群众中组织工厂作坊的工会基层组织。③

共产国际的许多建议都成了致力于将六大决议付诸实践的中共所召开的党和工会会议议事日程上的议题。1929年2月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决议将“群众路线”的意义在工人运动中具体化了。根据共产国际的一再建议，中共试图纠正1925—1927年革命时期就已扎了根的工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2月）》，载《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第229页，230页。

②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共在工会中工作的决议（1929年）》，载《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第248—250页。

③ 同上，第250页，

会组织工作上的错误，那时工会就是“由上而下”建立的。他们决定从上海开始，在“到工厂、作坊中去”的口号下，根据“从基层群众开始由下而上”的原则，建立“真正的群众性工会基础”①。这种工作的困难性可从以下事实来判断：此后党和工会会议的一切决议都一再指明赤色工会组织上的薄弱，以及他们渗入产业工人群众的不足。这也是共产国际说过的。表明这种特点的是，上海根据地下党指示的方针训练了仅仅三十个工会干部，就被说成是一次巨大的胜利。②

曾对工会运动制定过广泛决议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集中注意解决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全会总结了六大之后一年的工作，肯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所作的各项重要决定。二中全会的决议强调克服“官僚主义，由‘上面’委派代替选举，以命令行事代替说服群众”等类工会工作缺点的必要性。③全会的各项具体决定对改进中共的实际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工人出版报刊的工作开始了。《中国工人》发行三千份，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月刊。在上海，有插图的《上海报》颇受欢迎，其他城市也出版了地方报刊。④共产党人精简了全国总工会和各地分会的活动。工作人员被减到最低限度，许多共产党员被派到企业中去了。在上海，组织起职工学校和读书班，以便“启发其阶级意识”。⑤所有这些当然还只是第一步，但在那种条件下，就连这些也是不易做到的。

至于六大以后中共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一份文件很有意思，这是中共关于河南省工运发展的指示文件，1929年秋被截获，保存在国民党档案中。⑥该地的主要工人团体有二万名京汉

①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1957年版，第25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1页。
④ 同上，第256—257页。
⑤ 同上，第257页。
⑥ 《现代中国政治史资料集》，第2版，第43卷，1958年，文件4513—1号。

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工人，中共就想在这些工人中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计划是具体而又周到的。计划与六大的精神相一致，指出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起义，而是取得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接到了如下指示："从经济斗争开始，集中注意工人最急迫的要求，并使这种要求成为斗争的主要口号，要求须是易于得到的。至关重要的是至少要取得小的胜利，这将激励工人，使他们摆脱消沉和惧怕情绪。"与经济斗争一起，还建议进行反日宣传，强调日本受中国富人纵容这种思想。上述指示还设想了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和取得他们信任的各种方法："街头演讲"，张贴有吸引力的标语，演出爱国反日戏剧，等等。

这一文件在这个时期具有典型性。正是对工作的这种指导，才使中共在逐步恢复它在工会运动和领导罢工中的地位的时候，保证了党在各个不同地区所取得的初步胜利。

1929年11月7日，中国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力量还不太大，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团体。但在中共六大表明赤色工会几乎被彻底摧毁之后的这一时期里，共产党人设法改进了局势。在中共工作中心的上海，地下工会约有二万七千工人。①在其他工作刚开始的各城市，会员不超过三千人。②这次全国劳动大会再一次将"群众路线"具体化了，特别强调了与苏维埃运动建立直接联系和加强工农联盟的必要性。③

这次劳动大会是第一次在地下状态下召开的大会，是中共的一个重要成就。它具有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特点。继苏兆征之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项英所做的报告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论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国际联系的，它是工会国际和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的成员。大会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形

① 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63页。

② 在地下状态中，中共党员和工会会员都没有登记，所有数字都是约计，可能多说了。

③ 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309—312页，339—944页。

势下，但并不是孤立的。根据工会国际的决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派代表参加的有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农民国际，国际工人援助会，援助革命者国际组织，“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以及其他组织。该委员会在1928年7月在苏联、英国、美国、德国、奥地利、法国和瑞士，组织了一次为时两周的援助中国运动。象通常一样，资金大部分是由苏联劳动人民提供的。全苏工会理事会将十万卢布转来帮助中国工人。①在那些日子里，苏联报纸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这样忠实详尽地报道过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工会国际于1928年2月和10月帮助组织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定期的秘密会议，参加者有全苏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美国革命工会的代表，以及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朝鲜、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②1929年8月，太平洋劳动会议第二次大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③这些国际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以及国际无产阶级对它进行援助的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努力以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精神教育中国工人。1929年国民党军队在中东路挑衅期间，它号召工人发动保卫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民党阴谋的运动。④1929年8月1日国际反军国主义日，中国共产党人以相应的口号在各城市发起了集会和游行。⑤

当时共产党人正在非常可怕的情况下加紧他们在工人中的工作。中共的目的在于取得对产业无产阶级主要团体的领导权。但客观条件阻碍他们走上这种加强无产阶级阵地的道路。国民党也加紧了他们对这种起先锋作用的工人团体的工作。国民党在“和平

① 见《红色工会国际》，1928年第10期，第304页。
② 同上，1928年第3期，第7—8页；第7期，第43—45页。
③ 同上，1929年第8期，第659—676页。
④ 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61—262页。
⑤ 见屈维它（瞿秋白），《在中华苏维埃的旗帜下》，载《共产国际》，1929年第52期，第13—16页。

解决”劳资冲突方面所作的努力，使这种工人只有一小部分发生罢工。①不过这就使由党的地下工作者发起、由合法工会正式领头的若干重要罢工的发动工作显得更有意义。共产党人的参加使工人的斗争增加了决定性的因素。例如1928年10月上海邮务工人的总罢工就是很持久的。国民党只是作了特别的努力，才阻止了罢工在一切较大城市的蔓延。（蒋介石亲自对罢工者“谈话”，要他们顾全民族利益，牺牲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共在它的地下刊物（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列宁青年》，为工人办的报纸杂志，以及特刊《工人宝鉴》）中，详细分析了这次罢工的过程，揭露了使罢工遭受失败的合法工会改良主义的领导。②

共产党地下刊物也详细报道了1928年12月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工人的罢工。合法的罢工委员会中就有来自地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共产党员。③

中共也在其他城市加紧进行工作。1928年秋在江西景德镇磁器厂组织了一次大罢工。参加者数万人。工人们与警察搏斗，坚定不移，终于取得了胜利。④具有同样战斗性的是同年秋季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但这次罢工被武力镇压了。⑤

1929年，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反日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工人运动又得到了复兴。共产党员都想法走在许多工人重要行动的前列。1921年1月，在汉口爆发了一次反日总罢工。这是因一名日本水兵杀害了一个中国人力车夫而引起的。企业中的罢工委员会包括共产党员，他们的行动当时是非法的。许多城市举行了集会，

① 例如见《第二次中国劳工年鉴》，中册，北京，1932年版，第107—114页，125—126页。

② 见《布尔塞维克》1928年第1期，第46—49日；《列宁青年》，1928年第1期，第29—31页；《工人宝鉴》第1期，第5—41页。

③ 见《工人宝鉴》特刊第2期；《列宁青年》，1928年第1期，1—3页。

④ 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54页。

⑤ 见《红色工会国际》1929年第4期，第312页。

并为罢工工人进行了募捐。①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和日共向两国工人和农民发表了联合呼吁书，吸吁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国民政府展开斗争。②罢工取得了胜利，凶手受到惩罚，答应给牺牲者家属以定期付款的赔偿。

国民党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大意是在1929—1930年青岛工人的反日斗争中，共产党员有频繁的活动。在青岛的日本企业中，非法的中共组织建立了强大的赤色工会。国民党当局用镇压的办法来消除中共的影响。1930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命令，由蒋介石亲自签署，取缔青岛的一切工会。③有意思的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女党员陈少敏的事迹。1930年她在青岛烟草公司女工中建立了一个富于战斗精神的赤色工会。她在一家工厂中谋得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这使她有很多时间赢得与她一起工作的工人的信任。④在上海，共产党人不顾一切迫害，在1929年和1930年初继续积极活动。1929年初，共产党人自己在美商爱迪生灯泡厂领导了一次罢工，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和承认工人俱乐部（赤色工会的掩护机构）。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打死二人，打伤多人，中共散发传单，号召支援这场罢工，并组织了支援性的游行示威。美商公司不得不屈服，出钱处理死伤人员的问题。⑤1930年4—5月，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二十二天，那里已建立了一个赤色工会，以合法的工人俱乐部作掩护。罢工的结果是罢工工人提高了工资。⑥1930年6月2日至8月14日在法商水电公司举行的为时五十七天的罢工，是中

① 见《中国劳动年鉴》中册，第141页；《布尔塞维克》，1929年第5期，第46—48页。
② 见《布尔塞维克》，1929年第5期，第1—8页。
③ 见《现代中国政治史资料集》，第二版，第43卷，文件5405，5503—1—4号，5548—5549号。
④ 见《山东工厂史》，济南，1959年版，第1—13页。
⑤ 见《上海报》，1930年1月3日。
⑥ 见金应熙：《从"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第74—94页。

共在上海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工人徐阿梅的领导下，中共的一个地下支部以较多的时间进行了罢工的准备工作，罢工的目的是提高工资。罢工者不顾国民党当局所下的命令，以及逮捕、开枪和工贼的破坏，立场坚定。工人们的顽强斗争唤起了十五个合法工会的支援，他们建立了后援会，募集了相当数量的捐款。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了罢工工人与苏区的直接联系。从鄂西苏区给罢工工人秘密送去了专款。①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提高了工资，被捕工人被释放，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②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共在天津的活动，1929年春季中共在天津打入了一个比商电车公司的合法工会。共产党员郑作民取得了这个工会的领导权，该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就非常积极起来。解雇郑作民引起了1929年6月的抗议罢工，这次罢工还提出了十项经济要求。罢工者组织了一个反帝宣传队，揭露比商公司对工人的压迫。天津市居民为罢工基金筹款二万元。经过十二天，罢工工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③

192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共产党员到英国人办的开滦煤矿。由于共产党员所展开的广泛工作，1929年春有一万八千矿工向英国当局提出了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他们还起来反对改良主义工会领导者的背叛政策。在一些矿中，合法工会的领导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地下共产党员手中，地下党不顾罢工失败，继续在矿工中进行活动。④在香港，1929建立了十一个赤色工会和一个工代会，这个工代会将这些赤色工会团结起来，共产党员在那里发动了几次罢工。⑤1929他们还设法在满洲开展工作，那里有许多日本企业。在抚顺一家日本船厂的罢工取得了胜利，于是矿工、

① 见《中国研究所简报》，1930年第3期，第21页。

② 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1953年版，第14—16页。

③ 这一罢工的史实是根据天津南开大学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向作者提供的资料写的。

④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54页，258页，265页。

⑤ 同上，第259页，264—265页。

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都开始组织起来。①1929年，四川一些盐矿的赤色工会组织了一次反对解雇的罢工。②在武汉、长沙和其他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赤色工会在这一时期都被国民党当局摧毁了。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很顺利，1930年，在上海的三十个纺织厂，以及在发电厂、电话局、电车和公共汽车公司、苦力和人力车工人中，都建立了赤色工会。③

到1930年初，与六大前夕的形势相比，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有所巩固。不过这种成就如果用以检验"群众路线"的正确性，那末就全国来说，成绩并不算大。在其他地区和城市，中共在工人中的活动远远落在上海之后。在一些工业中心，中共的活动并未恢复起来，或者又被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去了。国民党政权的普遍加强伴随着合法工会制度的发展。④大部分劳资冲突都象以前一样，由于国民党组织的调解，未发展成为罢工，而以"和平方法"解决了。1929年工人运动的复兴只波及上海和北方地区，而且也不意味着工人消沉情绪的完全消散。工人的斗争依然是守势的，主要口号是抗议解雇和因物价上涨而要求所谓粮价补贴，总之，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斗争。

注意工人的重大利益，有可能使党密切与群众的关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使党能够领导他们的斗争，并使斗争活跃起来。但党在组织上的发展和稳固的群众性工会的建立，却是首要的问题。党在城市的工作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代价才完成的，不过这在党的成分方面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变化。据报道，到1929年底，工人只占中国共产党人数的大约百分之二。⑤因此，中共在领导工

① 同上页注⑧所列文件，第265页。
② 同上，第265页；《红旗》1929年7月3日。
③ 《共产国际》1930年第13—14期，第91页。
④ 国民党档案的资料记载，到1930年，合法工会包括五十七万六千工人。见《现代中国政治史资料集》，第2版，第43卷，文件5290号，5291号。
⑤ 见《布尔塞维克》，1931年第3期，第20页。

人运动方面的成就归结起来就是：正确地选择了方针，取得了初步成果。这种成果证明，沉重的牺牲并不是徒劳无益的，由于遵循这一方针，他们密切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1929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强调了中共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巨大重要性，强调不容许“再犯过去盲动主义的错误……”。①共产国际执委会极为重视中国的工人运动，警告不要过高估计中共所取得的成就，并坚持要改进城市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反帝统一战线的破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所遭受的严重失败，国民党对革命果实的攫取——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共和共产国际面临着一些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正在逐步解决。

中共六大所作的“党的总路线就是为争取群众而斗争”这一决定，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为在国民党统治的严酷条件下推进革命斗争而共同研讨成功的。

译自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远东事务》
(Far Eastern Affairs)1983年第3期。
林　海译

① 《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第257页。

严酷的事实①

——鲍罗廷在武汉

雅各布斯

4月12月上海工人运动遭到大破坏的消息，使武汉政府的成员中渐漫着一种阴郁、愤怒和忧虑的情绪。对于警惕地注视着最近局势发展的鲍罗廷和其他一些人来说，这次事件是一次震动，但并不感到意外。因为除事前有表明蒋介石企图的一切迹象外，还有三个所谓重要人物的亲身经历足以说明问题，这三个人是美国的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英国的汤姆·曼(Tom Mann)和法国的雅克·多里奥 (Jacques Doriot)。这几个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是莫斯科派来表明全世界都支持中国革命的，他们在从广州到武汉的路上，屡次碰到反革命活动。三月份他们途经南昌时，希望见到蒋介石，但人家告诉他们，蒋太忙，无暇会见；然后他们被护送去参加一次宴会，会上人们对他们粗声粗气地说，中国革命并不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前国民党的纲领需要修改，以适应现实；目前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即蒋介石。

鲍罗廷对“四·一二”事件最初的解释是，这次在上海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他们要求本国政府给予帮助）共同的不快。要使武汉避免这类干涉，就需要立即限制使他们不快的那些因素。4月20月，他告诉在武汉的朋友们：“为了应付这种逆转的局势，我们只能暂时采取退却的战

① 这是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在中国的使者》一书的第十六章。——译者

略……由于我们战略的转变，帝国主义或许会停止向我们进攻……如果退却的战略能够消除某些人在湘鄂两省所造成的误解，这种战略就应当实行；如果这种战略能保证帝国主义国家留居中国的公民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安全营业，这种战略也应当贯彻。"①于是鲍罗廷提出了在工人中加强纪律性的五点计划，就是说，使工人处于控制之下，创造一种有利于在武汉营业的气氛，并向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普遍保证，他们在武汉是受欢迎的。

在3月和4月初试图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武汉曾经装出一付世界革命首都的样子。有一个激进派的国际小团体聚集在这个城市，他们与广州或莫斯科培训出来的中国人（通常是共产党人）一起，使这个城市充满了口号、标语、集会和游行示威，促使已经过激的武汉无产者提出了许多更加苛刻的要求：要求预支二至三年的工资，要求每年发给十五个月的工资，要求每年四周假期，工资照发，外加阴历年两周休假，阳历年三天休假和一切革命节日休假。家有婚丧大事，付给六个月的额外津贴。工人无故被解雇，付给相当于三年的工资。人力车夫索价尤高，客人一到江岸码头，他们便涌来围住，不许客人自拿行李，然后每件提包索取五元，车价高出正常要价的许多倍。当然，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或者更多，而只得到二角五分或三角钱工资的工人们提出抗议，是合理合法的。但寇主未必这样看。许多富有的中国人和三分之二的外国人都离开了武汉。留下来的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多数都住到停泊在长江的船上，不愿在夜间冒险到这个城市。

鲍罗廷很清楚，要使武汉工人遵守纪律并不容易，即使是稍有反对他们的表示，也是危险的。他们可能转而把矛头指向他和国民党。然而现在他已看到了从右的方面来的更大的威胁。4月初，甚至在上海镇压工人运动之前，他就提议将行动激烈的人力车夫与行动克制得多的警务人员组织合并起来，好使前者处于控制之下，防止引起进一步的激烈行动。但是4月12月发生了上海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1968年版，第313页。

事件，随后在13日，武汉的日本各工厂关闭，使七万多工人失业，这些事件加剧了早已恶化的经济形势，增长了工人暴徒使用暴力的趋势。与此同时，长江上的外国军舰摆了一英里多长，而且舰数还在与日俱增。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使海军陆战队投入战斗，使武汉政府垮台。

4月17日，在受鲍罗廷支配的武汉国民党官方报纸上刊载了一篇重要文章，引用一位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工人部长的谈话，告诉工人领袖们，要尽一切力量帮助政府，"尤要避免工人可能卷入的任何事件"。①文章特别指出，这样做是为了使上海所发生的事件不在"这里"重演。文章继续说，政府要避免劳工事件的意图，已特别向日本有关当局明确表明——他们在江上的船只最多，在武汉的投资最大，最容易在他们那里爆发事件。文章最后说，"如果外国人不在武汉复工，那就不能指责有组织的工人"。

在同一个星期稍晚，政府正式宣布保护一切国外人的一切建筑物，不经主人许可，不得没收。4月24日《国民新报》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工人加强纪律即对政府之帮助"。另一篇文章报道说，政府正在与外国公司直接谈判，解决争端，工会已同意接受已达成的协议，凡破坏协议者就是反革命。②两天以后，政府宣布说外交部长陈友仁已安排了日本工厂开工和从日租界撤走军队及工人纠察队的问题。同时又解决了银行职员罢工的问题，银行重新开业的问题，以及英文《自由西报》重新出版的问题，该报因有反政府言论曾于三月底被关闭。鲍罗廷和他在武汉的同事尽了最大的努力，防止经济崩溃和外国的干涉。

尽管鲍罗廷的策略是消除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恐惧，但很少有与蒋介石缓和的趋向。自1926年12月以来，鲍罗廷就主张，与蒋和解是枉费心机，"四·一二"事件似乎证实了他的判断。但与蒋介石之间的渠道一直是畅开着的，莫斯科本身就未放弃与

① 《国民新报》，1927年4月17日。

② 《国民新报》，1927年4月24日。

蒋的和睦亲善关系；确实，与蒋的关系似乎依然是和好的。但现在莫斯科终于决定与蒋破裂了。它谴责蒋介石是叛徒和“帝国主义强盗的盟友”，至于鲍罗廷，他威胁要“打击”蒋介石。①

不过这纯粹是恐吓。鲍罗廷是无法打击蒋介石的，这一点他也知道。一个日本记者曾经问他，武汉政府是否打算反蒋，鲍罗廷回答说：“没有什么必要，（蒋介石阵营的）分崩离析的过程已经开始……让他们有一段时间完成这一过程，他们就会从内部完蛋。”②鲍罗廷又在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他能做的，就是装作勇敢的样子，发动一场群众性的反蒋攻势。把蒋介石叫做叛徒和帝国主义的朋友，市内贴满了“惩处蒋介石”的标语，失业者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抨击蒋介石。

但并不是所有在武汉的人都有反蒋情绪。在“四·一二”政变之前，那些反对暴徒激烈行动的人不是离开了这座城市，就是保持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表示反对武汉政权。鲍罗廷的一些左倾的同志向他建议，他应当以“莫斯科方式”处理这些异端分子。③尽管为维护安全而进行的逮捕显然在为数不多的场合是实行了，但鲍罗廷知道，反对情绪在国民党内相当强烈，而且已蔓延到中产阶级。如果打击他们，就会进一步危及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他最后的保护伞。而且莫斯科虽然与蒋破裂，但并未放弃统一战线。

上海的大屠杀及其在武汉引起的失望情绪，是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的背景。虽然这次会议是有象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些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大会，但两个主要角色却是一个印度贵族罗易和一个美国化的俄国人鲍罗廷。

罗易于1926年下半年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他自1920年作为鲍罗廷的门徒到莫斯科以来，就是党内的一个刺儿头。他才华横

①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590页。
② 引自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502页。
③ 尤金·皮克：《中国在赤色分子的掌握中》，第28页。

溢，但独立不羁，固执己见。现在他仍象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一样，坚持不能相信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而且从一开始就错了。在不发达的国家，只有以工农为基础的运动才能取得胜利。罗易认为，工人和中产阶级组成的阵线不论看来多么有前途，到头来后者总要反过来反对革命。在1920年，列宁由于不愿疏远一个具有出色领导才能的人，让罗易的观点与他的观点同时并存，但在实际工作中所遵循的还是列宁的办法。到1926年下半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时，斯大林仍遵循着和过去一样的方针。在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中，他允许由他的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夫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他的观点，与罗易的观点结合起来。声明说，正如罗易所提倡的那样，革命是要转到农民和工人群众手中的，不过只有资产阶级同意才行。斯大林明白，国民党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在这次全会上，罗易被选进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中国问题委员会。全会一结束，罗易就由参加这次全会的一位中共领导人谭平山陪同，乘上了从莫斯科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快车。罗易急于要去中国实现他的想法，这种想法他确信无疑，共产国际也采纳了。罗易与谭平山先到广州，然后来到武汉这个新首都。1927年4月3日他们到达武汉时，对于罗易来说，运动的向右转显然已迫在眉睫。他在北上时，也象白劳德、汤姆·曼和多里奥一样，沿途看到了这种向右转的迹象。一到武汉，他就开始提出他那反对资产阶级的老主张。“四·一二”事件只不过是坚定了他认为自己正确的信念。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鲍罗廷与罗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但争论并不是在大会发言中进行。鲍罗廷和罗易都不想出现这样的局面，似乎是他们在支配一个中国的秘密会议。而且鲍罗廷还建议，值此危急关头，家丑不可外扬。因此，中共五大的决定性的会议都在鲍罗廷的寓所举行，政治局委员参加。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其他领导人，国民党的领导人如汪精卫、孙科，斯

大林手下的米夫，以及先前孙中山所邀请的苏联客人维经斯基，“四·一二”政变时他在上海，以后顺利地逃到了武汉。如今，人们在鲍罗廷的寓所就衰退的中国革命的命运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罗易从他长期坚持的原则出发，主张：农民必须成为革命的中坚；必须用没收土地的办法把他们争取过来；武汉基地（在罗易看来，还包括湘鄂两省的偏僻地区）必须在受到任何进一步军事进犯之前巩固起来。他以湘鄂两省农民已造了地主的反并已驱逐了地主这种无可否认的事实来支持他的主张。加入新建立的革命农民协会的农民约有一千五百万之多，只要武汉政府不再因循，毫不含糊地支持农民革命，湘鄂两省所办到的，其他地方也能办到。

鲍罗廷反驳说，此种决策意味着统一战线的结束，而统一战线对他和斯大林来说，依然是唯一的希望所在，尽管国民党已经分裂。为了保持统一战线，重要的不是鼓励农民和工人，而是制止他们的过火行为。但鲍罗廷又不能无视农民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声明以及管起草声明的米夫都指明，他至少也要在口头上支持农民革命。因此他要求没收一切地主所占有的土地，但国民革命军军官和国民党官员，他们的亲友，以及小地主的土地除外——这意味着，实际上一切土地都免于没收。至于军事行动问题，与罗易按兵不动的主张相反，鲍罗廷宣布他赞成继续北伐。但在其他场合，他似乎又支持向西北转移，这将使武汉政府接近冯玉祥将军，那里靠苏联也近，如果需要逃走的话。

由于罗易与鲍罗廷之间有这样的分歧，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的意见也是各种各样，有的接近其中的一方，有的处于二者之间，有的超出二者之外。拥护鲍罗廷的有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最早讲俄语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的瞿秋白。谭平山支持罗易，自罗易离开莫斯科以来，他就常与罗易为伴。但在个别有争论的问题上，这两个人又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得到支持，或者以前的支持者放弃对他

们的支持，因为在自由发表意见进行论战时，每个参加者都感到不得不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明革命在何处出了问题，怎样做才能使它重新走上正轨。

大会结束时，罗易看到自己输了，遂向莫斯科发去电报，希望批准他的革命应当“深入”的主张，以反对鲍罗廷的革命要“扩大”的主张。斯大林因受蒋介石上海政变消息的震动，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断然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电报，既赞成加深革命又赞成扩大革命。中共五大文件的最后文稿也的确写明二者都需要。但实质上是鲍罗廷胜利了，因为后来贯彻的是他的决策。除了他偶而提出的“向西北转移的战略”被作为失败主义的战略遭到否决外，其他方面如保持现状和继续北伐等主张，都得到了批准。

显然，鲍罗廷在代表大会上的权威是无可争辩的。他不能阻止罗易说话——罗易所采取的姿态是决心赢得支持。但在受到大屠杀震动陷于混乱的中国共产党人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上海大屠杀时都在当地，而且每天都还在收到反革命到处蔓延的消息），鲍罗廷却是信心的象征。尽管罗易是出席了会议，但鲍罗廷在他们心目中却是革命故乡莫斯科的代表，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向莫斯科寻求援助。而且，构成中共最高层领导的中产阶级出身的中国人对罗易并不感兴趣，认为他是一个妄自尊大的生手。此外，他还是一个印度人。

因此，鲍罗廷在第五次大会上获胜了，但以后的事如何了结？为使革命的这条船暂时不沉，极希望有一件什么事或一个什么人（冯玉祥将军？）前来救助。同时，武汉政权正在日益脆弱。该政权的财政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稳的。它的商业的主要部分即使在4月12日以前也已被破坏，12日以后，帝国主义的舰队对武汉三镇的联合封锁更加加强了。外国银行业已关闭。上海的银行拒不接受武汉的通货，或不承兑武汉账户的支票。中共五大结束时，武汉正处在可怕的窘境中。构成武汉政府收入重要部分的鸦片贸易财

源被与蒋介石沆瀣一气的军队攫去以后，局势就变得更加危险了。

在经济的重压使武汉透不过气来的同时，武汉政府经济上的需求却在不断地增加。每月需要有一千五百万至一千七百万美元来供养它的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都属于军阀系统，原本是贪财的雇拥军。现在武汉政府正在筹划一次重要的军事战役，要求大大增加开支，而此时又适逢外国人在武汉经营的工厂商店纷纷关闭，失业人数至少达到二十万。

鲍罗廷和他手下的苏联顾问以异乎寻常的努力设法应付这种财政危机。鲍罗廷于1926年12月抵达武汉的三天之内，就命令没收和变卖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但是有金银的人——这些金银很多都已运走，或正在顺流而下，送往他处——都不想从一个他们希望随时都会消逝的政府那里购买土地、房产和旧汽车等。商业税和财产税所得无几；没有很多的商业，财产也已消散。按照传统方式，政府下一步就是发行大量纸币，以应付开支。1927年5月，武汉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大量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失业。武汉政府还苦于粮食和燃料的严重短缺，以及迅速蔓延的霍乱传染病，已有几千人因此而死亡。

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困扰这个城市的近似无政府的状态。4月12日以后，工会所提出的要求降低了。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工作条件的人已经不多。但工会领袖的约束对工人纠察队、罢工者和失业者作用不大，他们继续在武汉街头列队游行，高呼反对一切的口号。他们仿佛已失去了控制。使局势更加不稳的是，现在又要曾经帮助制止暴徒的军队继续进行北伐。

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日益增长的社会混乱和政府管理上的混乱。政府发布了指令，但很少有人听从。在鲍罗廷看来，这样支撑下去，等待冯玉祥，简直无法忍受。有消息说，以前在北京苏联大使馆被捕的二十个中共党员已于4月28日被张作霖绞杀。法尼亚也被张作霖的部下所拘捕。她会不会也被绞死，或者此事已经发生？同时，有消息传到武汉，说张作霖军正在向武汉挺进。

鲍罗廷会不会不久也遭到法尼亚那样的危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鲍罗廷的广阔天地正在崩溃的重要时刻，他的国际声誉却达到了顶点。1927年的4月下旬和5月，当全世界都认为赤色革命的胜利正在席卷全国的时候，鲍罗廷却正在销毁文件，准备让他手下的苏联顾问，他们的家属，以及他自己，离开中国。将中国这场革命作了如此错误判断的，几乎完全是由于那些外国记者的报道，他们在1927年春天曾经冒险溯江而上，要看看在“红色首都”所发生的事情。

直到北伐取得胜利以前，新闻记者也象当时的列强一样，很少注意南方的这场革命。他们了解孙中山，虽然他偶尔也成为新闻报道的好素材，但很难说值得跑到广州去采访他。当革命推进到长江流域时，报纸编辑们精神抖擞了。但是在他们的纽约、伦敦和苏黎世的编辑室里，也如他们派出采访的记者一样，所有中国的革命者在他们见来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蒋介石和武汉的任何人一样，都是赤色分子。在他们能够呆在舒适的、欧化的上海利用上游来的消息进行报道时，何必要跑到上游去？只有在武汉激烈革命的可怕消息开始流传时（大部分是从上海的酒吧间里传出来的），编辑们才想到从武汉当地的报道材料。特别是在“四·一二”以后，显然蒋介石与武汉有分歧，并不是所有的中国革命者都是一个豆荚里的豌豆，这时他们更需要当地的报道。

在上海，关于武汉的革命发展情况，每天都有新的谣言。许多人关心财产的没收问题，另一些人思索着武汉政权何时告终的问题：它的经济的破产，政治上的垮台，以及时刻盼望着的布尔什维克们逃回苏联的问题。但是最引起上海和全世界兴趣的传闻，是布尔什维克在武汉推广的性习俗。一方面，据说对妻子的处理方式很可恶，象共产一样，他们也共妻。任何年满十六岁的无主妇女，或六个月“未被使用”的妇女均被农民协会充公，重新分配。而另外的报道则描绘解放了的中国妇女跑进澡堂，要丈夫替他们搓背。最重要的是反复报道的裸体游行。据《华北正报》的

一篇文章说，有一次这样的列队游行，其特色是有三百名漂亮而兴奋热情的裸体者，全都是“高大强壮的女战士”。参加者的资格由国民革命军军官审定，他们亲自审查每个申请者，看她的“身体是否适宜”。这类谣言信的人很多，政府不得不出面正式予以否认（谣言全是愚昧的虚构）。但这些否认并不能使外国记者打消念头，如今他们聚集在武汉，吸引他们的是象事实一样多的虚构的幻想。

尽管鲍罗廷对于促使新闻记者来到武汉的那些谣言感到恼火，但他并未因他们的到来而不愉快。他常常派车去接上岸的记者。有时他亲自欢迎新来者。在鲍罗廷看来，新闻记者的到来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能带来外界的消息。由于受到外界世界的围困，他的早已不可靠的通讯渠道都已遭到破坏。他极感消息闭塞。在南京、上海和西北的陕西，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反革命的蔓延有多快？帝国主义还想直接干涉吗？冯玉祥在哪里？有法尼亚的消息没有？

如果说他想得到消息的话，他也想传播消息。他想让列强知道，在武汉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激烈行动正在受到控制。他想纠正关于这座城市的虚假的印象，纠正那些会造成各种灾难的印象。鲍罗廷欢迎这些记者还有一个奇妙之处，他们能向他提供安全措施。在混乱的武汉，他们代表着一个稳固得多的世界。与他们交往就是与纽约、芝加哥和巴黎接触。他们使他感到不太孤立，不太陷于困境。

1926年晚冬和1927年春季在武汉向鲍罗廷采访的记者，包括这样一些新闻界的名人，如合众社的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Henry Francis Misselwit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威廉·亨利·张伯伦（William Henry Chamberlain），美国新闻联合会的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曼彻斯特卫报》的阿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民族》杂志的保罗·布兰查德（Paul Blanchard），《纽约时报》的兰达尔·古尔德（Randall

Gould)(鲍罗廷1926年曾在北京会见过他)，以及受人尊敬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美国优秀记者，与莫斯科关系极好，以前鲍罗廷就认识她。这些人鲍罗廷全都接见，并接见日本、德国、法国、瑞典和瑞士各报的记者。

鲍罗廷是引人注目的报道题材。他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上海租界居民视他为“赤色首都”的“赤色猛兽”。人们给他加了许多头衔、称号，推测了他的许多关系，给他编造了许多故事。鲍罗廷并不怎么消除他身上的神秘气氛。他很少谈到他的过去。问到时，他就这样回答，如“我生在雪地里……生活在阳光下——你说是不是？这有什么用处？”①记者们到鲍罗廷的总部访问他，那是座落在以前德租界汉中路末端的一座灰色大建筑物。一楼是国民党宣传机构，政府的官方文件，英文的《国民新报》，与它相对应的中文报纸《民国日报》，以及一些中文的、英文的，偶而也有其他文种的出版物，都在这里出版。二楼是鲍罗廷和他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那里居住着大都分苏联顾问的妻子。鲍罗廷住在三楼。

鲍罗廷屡次躺在床上接见记者。1927年春季，他因以前在广州得了疟疾，经常有病在身。最近他还曾因从马上跌下左臂骨折而痛苦。但不管他在卧室或者办公室（那里的列宁像换成了孙中山像）接见记者，他都能以宽阔的胸怀，透彻的理解力和他那有名的“长远的观点”引人入胜，发挥出魅力。在报刊用大字标题报道武汉动向的那些日子里，来到武汉的记者们都在寻求耸人听闻的新闻题材，使他们遐迩闻名。他们要将鲍罗廷拔高成赫尔克里士②式的人物，乃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在他们所发表的文章中，尽管鲍罗廷有病在身，而且为他的妻子和那些落入残忍凶恶的中国军阀魔掌的人的命运忧虑重重，但他每天仍为革命工作不下十八小时。他还抽空骑马，读书，下棋，而在下棋方面，他又是

① 文森特·希恩，《从广州来的几个人》，亚细亚出版社，1927年10月版，第812页。

② 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事绩。——译者

“击不败的”。他对艺术、文学、历史都感兴趣。他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问题。他能以“列宁的超越一切的眼光”，观察每一件事，对待每一种思想，分析每一次形势的变化，并把这些都看成是革命命运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象。他是一位哲学家，声如洪钟，具有非凡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只要他一出场，他就算驾驭了一切集会。——记者们这样写道。

在武汉，鲍罗廷领导着一群中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和印度支那人，他们都崇拜他。诚然，也有恶意批评他的人，而且这种人还在增多。例如布留亥尔（加伦——译者）就有一种不同的气质，他曾与鲍罗廷发生冲突，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才与鲍罗廷一起相处共事。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只是因为鲍罗廷机敏圆通，才使得彼此有所克制。①有些理论家——中国人俄国人都有——反对他的战略，但在“鲍罗廷主义”鼎盛时期，他们对他的警告和指责很难损害他正在形成的英雄形象。在武汉的鲍罗廷集团中名列前茅的是拉依娜·普罗梅。拉依娜是个红头发、火爆性子的人，被人描绘成“该市最狂暴的布尔什维克”。②由于她在武汉扮演的角色和不久就死在莫斯科，她赢得了标准悲剧性女英雄的名声，流传了几十年。

拉依娜·普罗梅于1894年1月23日出生在芝加哥一个富裕的西班牙犹太人家庭。1917年在伊利诺斯大学获得了植物学方面的学位，第二年，她同一个叫萨姆森·拉斐尔森的同学结了婚，这位同学后来成了有名的剧作家。不久他们的关系破裂，他俩便离了婚，拉依娜便开始在世界各地漫游。二十年代初期她在中国，然后又返回美国，同比尔·普罗梅（Bill Prohme）结了婚。比尔当时是赫斯特系《旧金山考察者报》的社论撰写者和副主编。他俩一起回到中国后，比尔作了新闻记者。拉依娜得了肺病，但这并没有使她停止积极活动。她开始对新闻工作发生了兴趣，

① 卡扎宁：《在加伦总部》，第127页。

② 文森特·希恩：《传记》，纽约，1934年版，第231页。

并于1926年在陈友仁那里找到了一个工作，陈友仁当时正在北京主办《国民新报》。由于陈友仁的影响，由于她在《国民新报》的工作，加上北伐的胜利，使她变成了一名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者。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于1927年1月查封了《国民新报》，陈友仁便把该报转移到武汉。为陈友仁工作的普罗梅夫妇也一同撤离，而且不久他们便不仅投入新闻工作，而且还卷入了发生在这个红色首府的一切事情之中。

拉依娜长时间地为《国民新报》工作，在武汉的各处，不论在集会上，还是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或是在检阅中，她到处可见。在中国人的人群里，她那长长的红发比她在西方时显得更加显眼。普罗梅一家在武汉的公寓成了聚会地，任何会讲英语的人，不管思想如何，都可以到那里去。晚上，人们会在他们家看到几个年轻的苏联顾问，也可能看到一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来这里的人有：湖北堤防委员会的顾问托德(A·J·Todd)，1927年洪水威胁武汉时，鲍罗廷曾和他紧密合作，进行抗洪斗争；主管这一地区卫生工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格兰特(J·B·Grant)；拉依娜在报界的相识米切尔来自美国西海岸，现在也在为《国民新报》工作；人们也许还会发现刚从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大街来的邓肯(Irma Duncan)，他来中国是为中国革命效力的；以及那位武汉政府外交部长、编辑、谈话滔滔不绝的陈友仁。

在普罗梅的客厅里，他们常常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除饮酒外，他们还讨论现代文学的风格，如纽约戏剧界风行一时的《爵士音乐歌手》，这部作品不久将改编成第一部有声电影。(拉依娜的前夫萨姆森·拉斐尔森已把电影剧本的稿子送来请她读)。有时，这些人便听听古典音乐，唱唱象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你死后天空中将出现喜鹊”这样的革命歌曲。许多年以后，一位1927年曾在武汉采访过的记者写道，这些人“并不象满腔热血的真正革命者，而象是一群刚步入大学而且易于激动的大学生”。①然而

① 兰达尔·古尔德：《中国在阳光下》，纽约，1946年版，第69页。

1927年人们所看到的情况并不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四月和五月，革命在进行着；群众已被唤醒，然而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大多数晚间聚集在普罗梅家里的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正在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的英雄就是鲍罗廷了。拉依娜·普罗梅虽然最崇拜鲍罗廷，但她却不是唯一的崇拜者。俄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对他那惊人的工作能力和高大的形象顶礼膜拜。在拉依娜看来，他是出类拔粹、无与伦比的。她那位易于激动的丈夫也同她一样，对鲍罗廷怀有景慕之情。他是这样描绘的：他看见鲍罗廷“站在一辆马车上，居高临下，周围是景仰趋奉的气氛。他粗壮，聪明，正直，庄严，威风凛凛，相形之下，在他身旁的中国官员和部长，就象是，而且也是一些温顺的木偶。”①1927年的鲍罗廷是一位“具有无上权威”和“魁梧”的人②（有人回忆说，他身高为五英尺十英寸）。他“习惯于从全局出发观察每一个具体问题”。③

外国记者被引进的就是这种无限趋奉的气氛。绝大多数西方记者通过会见另外一些西方人得到了他们所要采访的消息。这种情况在武汉也很普遍。记者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左派人物，其他的人这时都已离去了。鲍罗廷或拉依娜·普罗梅常常到车站迎接他们，他们白天由普罗梅夫妇陪伴照料，晚上由普罗梅夫妇款待。他们对鲍罗廷的看法，从他们敬慕的眼光中便可看出。记者很少有不受感动的。当一个记者具有从事激进事业之心或具有英雄崇拜倾向时，他就会象普罗梅夫妇一样，被弄得神魂颠倒。因此年青的文森特·希恩（芬尼安④起义者的高傲的孙子）、和希思一样年轻的兰达尔·古尔德（他带着新娘来武汉度蜜月），以及国际通讯报道中的牛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便为后人炮制了

① 卡孔宁：《在加伦总部》第125页。
② 同上。
③ 沙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135页。
④ 芬尼安会是1856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爱尔兰人策划爱尔兰独立的组织——译者

“鲍罗廷崇拜”，而且也为鲍罗廷在国际上的偶像化奠定了基础。（1927年挪威作家诺代尔·格里格在剧本《巴拉巴斯》中，把鲍罗廷刻划成新约中的“起义者”，便是一例。）但他所从事的事业还在无情地向前发展，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要走向崩溃，

假如说1927年在武汉的某些人夸大了鲍罗廷的形象，那么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倒真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没有鲍罗廷，武汉政府也许在几个月前就垮台了，如果这个政府确实存在过的话。这也便是蒋介石要鲍罗廷走开的原因。在由军阀、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武汉政府中，鲍罗廷给他们以力量，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在危机时期，唐生智、汪精卫、陈友仁和中国共产党都请他给予指导。全国从事民族解放事业的人都明白鲍罗廷有何成就，对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事业有多大的贡献。正如暂时拘留法尼亚的一个敌人——山东省长告诉她的那样：“我们非常敬重他那非凡的组织才能，他对中国的渊博知识，以及对我国人民心理上的明显接近。我们承认他把两亿中国人吸引到自己身旁的那种影响力。我知道，……他懂得如何吸引半个中国优秀人物的心。”①然而鲍罗廷也象喀奴特②一样，无法阻止正在汹涌向前的反革命潮流。

在4月的最后十天里，七万军队离开武汉向北方进军。每列火车在离开车站时，都有乐队送行，有人发表演说，有大批群众游行。鲍罗廷和武汉政府的领导人（汪精卫、孙夫人、孙科、陈友仁等）都到车站为士兵送行。还有象郭沫若这样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鼓动大家，发表热情奔放的讲话，他是刚从上海的一场灾难中逃脱出来的。郭沫若高喊：“打倒蒋介石！”“打倒北方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人群里反复爆发出这种口号声。武汉政府的其他官员和工农组织的代表也想法把群众和部队的热情鼓动起来。一位即将出发的将军高呼：“不完成使命，誓不回武汉！”火车的车

① 卡孔宁：《在加伦总部》，第125页。

② 喀奴特（995—1035）：英王，在位期间曾兼任丹麦和挪威国王。——译者

皮上贴着生动的反蒋、反帝的标语和漫画。当这位将军踏上火车时，人群中的鼓动者便带领大家重新高喊反蒋、反帝、打倒反革命和祝北伐成功的口号。火车在高过人群喧闹声的军号声中，徐徐驶出车站。

对武汉政府所有的人来说，这次重新开始的北伐十分重要。他们政治上的生存，或许还有肉体上的生存，都取决于这次北伐的胜利。为了争取北伐胜利的最大可能性，人们考虑要以尽可能多的人员和最好的部队投入战场。这就意味着将武汉的防御丢给一些新兵、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团，实际上武汉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在部队出发后的一个星期内，出现了武汉即将遭到进攻的谣言。传说蒋介石或他手下的将军们已在进攻途中。5月14日有消息证实说杨森的部队离武汉已不到一百英里。5月17日消息传来，曾与武汉政府联合、兵驻武汉长沙之间的夏斗寅已投靠蒋介石。这条消息特别使人感到沮丧。整个战线即将崩溃。对许多人来说，现在是考虑立即逃跑还是投降的时刻了。鲍罗廷已开始销毁文件，18日的消息说，夏斗寅的部队离武汉已不到二十英里，这一消息使武汉的人们增加了覆灭感。19日，所有反蒋的标语传单都被撕下。

这时罗易和其他一些人敦促（或者后来他们这样声称）武装工人，用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来抵抗夏斗寅，他只有一小股进攻部队。但是鲍罗廷象以往一样，拒绝武装群众。在他看来，武装一批暴徒可能会使苏联顾问和忠于他的中国人最终无法活着逃出中国。

即使在这种关键时刻，武汉政府的国民党领袖还坚决反对搞工人武装。可是他们并不反对对蒋介石的部下夏斗寅采取军事行动。由鲍罗廷组织的一支小部队在叶挺将军的率领下开赴前线，这支小部队的成员多数是武汉军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还有一部分新兵和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几百

农民。

但在这支小部队交战之前，5月19日传来了武汉部队在驻马店打胜仗的消息。捷报传到了那位年高德劭的英国工会领袖汤姆·曼手中，他正向聚集在德国足球场上欢迎泛太平洋劳动会议（定于第二天开幕）代表的三万人发表演说。汤姆·曼向听众高声报告了胜利消息，然后在热情的掌声中，在讲台上跳着模仿敌人后退的样子。北方的这一胜利，也如叶挺堵住夏斗寅的进攻道路一样，使武汉政府及其所属部队振作起来了。夏斗寅得知从武汉派出的援兵尚未到来，又听到武汉政府在北方取得了胜利，他便决定向陕西方向撤退。这样武汉就解围了。

但是武汉的忧虑远未完结。5月22日，消息传来，极端革命的湖南省会长沙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在1927年5月，湖南曾经是中国革命活动的中心。当时五百多万工人和农民参加了各种协会，而且每星期还有成千上万的新会员登记入会。在湖南，革命运动以“疾风暴雨之势”向前发展，而长沙便是这个运动的中枢。

5月初，当周游各地的共产党人汤姆·曼和厄尔·白劳德到长沙访问时，他们感到中国的群众运动“组织得非常好”。①尽管他们所乘坐的火车晚了十二个小时，在清晨四点才到达，仍然有十万人的游行队伍冒雨等待欢迎他们。革命蓬勃发展，群众彻底发动起来了。市镇人民委员会议取代了传统的地方行政官员；学校关闭了；古书遭到查禁；只许学习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搜查店铺，没收财产，逮捕资产阶级分子，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在长沙到处可见到这样的标语：“无土不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②犯人不得为自己辩护，也不允许请律师。法官是工会农会的领导人，陪审员由附近的人组成。

鲍罗廷指责湖南发生的激烈行动，因为唐生智手下在武汉部队中带兵的军官大部分是湖南人。没收地主土地并对他们进行侮

① 汤姆·曼：《中国见闻》伦敦，1927年版，第24页。

②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604页。

辱和伤害，只能破坏唐生智部下军官对革命的忠诚。即使在武汉的大多数中共人士也认为长沙发生的事件是犯了“左派幼稚病”。但是不管武汉方面的反应如何，湖南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革命基地中的一个。长沙反革命猖獗的消息对武汉方面的士气产生着致命的影响。人们的精神“愈益混乱不堪，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①逃跑大概是太晚了，武汉方面也加紧了最后一道防线的准备工作。

并非人人都感到悲观失望。有些在四五月份里深深卷入长沙激进运动的人，想利用湖南农村造反的农民来进行反击。攻占了长沙的许克祥据说只有七百人，最多不超过两千。在长沙周围，有好几百逃脱许克祥屠杀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员，如果几千武装农民参加进来，再加上即使不是几十万也是几万具有战斗精神的农民协会会员，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很可能夺回长沙。

起初鲍罗廷同意发出人们所期望的这种命令，可是他很快又做了重新考虑。武汉的北伐军进展迅速。《国民新报》上还显著刊登了冯玉祥接连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现在冯在洛阳即将取得一个重大胜利。如果把群众武装起来，放手让他们去干，就会防碍他和武汉政府完成共同的事业。尽管当时武汉的形势很严峻，莫斯科和鲍罗廷还是想继续完成过去的革命任务，而不是光荣地大闹一通，这会使过去的任务彻底告吹。斯大林和鲍罗廷都不信任湖南那些无法无天的群众。

从5月19日起，武汉当局的一切会议都在鲍罗廷的总部召开，气氛紧张，戒备森严。长沙反革命叛乱的消息传来之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究竟采取激进的办法和坚持统一战线哪种方针较为明智？鲍罗廷刚接到长沙陷落的消息时，曾有过暂时的动摇，现在依然赞成统一战线。一位5月26日来此工作的苏联顾问

①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卷第494页，引自詹姆斯P·哈里逊：《走向权力的长征》（纽约，1972年版），第109页。

报告说，鲍罗廷总部的房间里一片混乱，好象发生了激战。① 鲍罗廷照例取得了论战的胜利，统一战线保持住了；取消了对长沙的反击。但并不是每个湖南的激进分子都知道或遵循武汉的决定。5月31日数千农民向长沙进军，但由于训练和装备不充分，领导不当，很快就被击退，伤亡惨重。

鲍罗廷要对付的并非只是夏斗寅和许克祥这两个背叛者。到5月底，几乎每天都有消息传来，说有人投靠了蒋介石。武汉正在从各个方面被抛弃，鲍罗廷对此毫无办法。他和武汉政府只有期望武汉北伐部队和冯玉祥部队的胜利。鲍罗廷在中共党内的追随者公开支持他。鼓动农民起来斗争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他们并不怀疑，但他们又说，对农民的行动加以制止和控制，也是必要的。然而由于失败，使团结在武汉政府周围的人越来越少，鲍罗廷的反对派也就日益大胆了。罗易由于无法使鲍罗廷和中共确信群众革命行动的必要性，便决定再次向莫斯科发出呼吁。他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虽然斯大林在莫斯科牢牢地掌握着实权，但反对派依然十分傲慢。他们企图把在上海的失败归咎于斯大林“完全虚伪的”论点；反对派虽未要求结束统一战线本身，但却要求在中国建立“群众苏维埃”，象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一样。

5月18日，当夏斗寅军向武汉挺进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正好在莫斯科开幕。“中国问题”并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面临的唯一重要问题，但它非常急迫。对斯大林来说，这一问题似乎是阻挡他巩固权力的一块巨石。对于以托洛茨基为首日益铤而走险的反对派来说，这是一块较小的石头，但如果打得准，仍可将歌利亚②这个巨人击毙。

面对一大堆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斯大林，煞费苦心，使这次全会在秘密状态下召开。他没有使用过去共产国际开会的沙皇觐见室安德列也夫大厅，而是指定通常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开会用

① 维什尼亚—阿基莫娃：《在起义中国的两年》，第354页。

② 圣经中所记载的非利士勇士，为大卫所杀。—译者

的一个小厅作为会议场所。这样一来，由于地方不够，不是代表的人（特别是俄国人）就无法参加会议了。大会要讨论的文件是在最后一刻才发给大家的，这样人们就无法研究文件。会议结束时，所有的会议文件，包括代表自己的发言记录，都要收回，并直接了当地告诉与会代表，凡不上交文件者，一律不准离开苏联。一次全会如何进行，在苏联或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还是第一次。第二年，有关第八次全会的文献，只公布了一些最低限度的决议和拥护斯大林的材料。

正如斯大林所担心的那样，大会开得十分激烈，而且要求承担罪责。他想躲在共产国际以前所发表的含糊其词的声明后面，从上海“四·一二”政变灾难的责任中挣脱出来。他曾经宣布说，所有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完全而且充分地”证明了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性。①然而在克里姆林宫小厅的这个秘密会议上，事情就不能那么简单地处理了。虽然反对派近来才对中国问题感兴趣，而且他们的立场也一直不明朗，但他们却企图利用斯大林的弱点。斯大林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之后就曾经抱住统一战线策略不放，至今依然如故。无论现实多么严酷，他也不能让步，承认这个策略是错误的。这个统一战线不触犯列强，而且还等待着冯玉祥参加进来——现在这就是避免发生灾难的唯一希望了。但这条路走下去，就要同资产阶级和军阀合作，而使工人农民的激进思想遭到挫折。一个布尔什维克怎么能反对人民群众而赞成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为了回击这一论点，斯大林在政策声明中指出，虽然武汉政权现在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但它有一切可能发展成为这样一种机关。②鼓励工农运动和建立苏维埃，是很好的革命战略，但时机不是现在。想法倒好，时间不对。

---

①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85页。

② 斯大林：《中国的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46年版）第9卷300页。

但是反对派是不会轻易让斯大林摆脱困境的，尤其是消息传来，说长沙城陷落之后，湖南农民准备发起进攻夺回该城时，更是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小组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出席这个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布哈林，后来的意共领袖陶里亚蒂，以及法国的艾伯特·特兰等。布哈林认为农民应当约束。特兰的主张则相反。陶里亚蒂未发表什么意见。在这个重要时刻，布哈林也许是怕在争论中失败，便要求听取斯大林的意见。他给斯大林打了电话，斯大林来到这个小厅，争辩说，特兰“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当前如不采取反对农民暴动的立场，资产阶级左翼就会反对我们……，他们仍旧是强大的，他们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就解散。到时候我们就会在内战中被击败。”①斯大林为了强调这一论点，便读了几封鲍罗廷发来的电报。电报强调指出，国民党领导已决定“与农民革命进行斗争，即使与（第三）国际分裂，也在所不惜。”斯大林说，现在的问题是，按照特兰和其他同志所说，进行作战呢，还是运用策略？他认为，要作战，就一定会失败；运用策略，就会赢得时间，自己就会逐渐加强起来，将来有希望取得胜利时再和他们作战。既然斯大林是这么说了，那就运用策略吧。

6月1日，鲍罗廷和罗易接到斯大林发来的密电。这封电报实际上是对罗易要求澄清问题的答复。斯大林5月31日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5月31日结束）要求没收土地，但不没收国民革命军军官及其亲属的土地；进而命令制止农民的过火行为；消灭不可靠的将领；武装起二万名共产党员；在湘鄂两省工人农民中建立一支五万人的部队；选派工人（共产党员）农民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国民党“知名”人士领头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

如果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些指示必须照办，那他就是脱离实际了。但这并不是发出这些指示的目的。斯大林的指示并不是给鲍

① 艾伯特·特兰：《新斗士》，1936年2月8日。

罗廷照办的，而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对莫斯科策略的一切批评意见和可能出现的批评意见在电报中都考虑到了。这些“指示”显然无法实现。按照当时的形势，电报中的各项指示是完全互相矛盾的。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斯大林都能够——而且也会——拿他5月31日的指示来证明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性”，而把失败归咎于这些指示执行不当。

第二天斯大林的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读，大家都哭笑不得。①鲍罗廷，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中共领袖陈独秀和罗易都一致认为这是“海外奇谈”，无法执行。②迷惑不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③进一步研究这个指示之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给斯大林发去了一封态度不明朗的回电：“训令已收到，一旦可能，即遵照执行。”④

莫斯科5月31日电报的含糊不清为斯大林的将来提供了一种保护，同时实际上也为在武汉正在考虑的各种策略提供了支持。电报肯定加强了煽动暴动的分子的地位。对于鲍罗廷来说，这意味着他应当按以前的办法去做，对罗易来说，这表明莫斯科在政治上对他的支持。⑤莫斯科终于要求加深革命了，罗易便试图使鲍罗廷相信这一点。但更愿按斯大林的调子办事的鲍罗廷懂得，电报的意思并非如此——而且鲍罗廷掌握着权力。后来罗易感叹说：鲍罗廷的“所做所为就象是个共产党的独裁者。由于中共上层领导人大部分是鲍罗廷的门徒，思想相近，因而他们都追随他，一再无视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不把在场的国际代表（罗易）放在眼里。”⑥

罗易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也是一位热心的革命家。但是随

①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637页。
② 同上，第638页。
③ 原文为国民党政治局。——译者
④ 休斯顿（Jay Calvin Huston）：《孙中山，国民党及中俄政治经济联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第187页。
⑤ 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加尔各答，1946年版，第55页注2。
⑥ 同上，第552—553页注。

着时间的推移，并没能提高他判断事物的能力，或使他更容易接受党的纪律。罗易再次遭到挫折之后，便试图动员加伦，并寻找其他同盟者，反对鲍罗廷。他确信汪精卫倾向于群众革命的道路，或者说可以以此去影响他。他回想起汪精卫曾在1927年初途经莫斯科，而且还同莫斯科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可是现在在罗易看来，汪精卫感到苏联并未把这个意思传达下来。由于鲍罗廷依靠高级将领而不依靠工农群众，他已被抛弃了，因此他变得与苏联疏远起来。罗易自忖，斯大林的电报可以用来重新向汪精卫保证，他并没有被莫斯科所抛弃，①而且还可以通过给他领导工农革命的机会来赢得他的支持。②

究竟是因为上述原因呢，还是因为象罗易所说的那样，其它一切办法都失败了，或者这封电报就是“明显地意味着”要给汪精卫看的？不管怎样，罗易还是决定发挥一下他的才能。③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把斯大林要求没收土地、逮捕将领、建立新的工农军队，以及由激进分子接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密电给汪精卫看了。不用说，汪精卫看了电报“非常吃惊。”④这封电报远没有使汪精卫放心，它违反了汪精卫基本的政治前提。这似乎就是一种明显的证据，说明莫斯科的意思是要破裂统一战线，破坏孙越协议，最糟糕的是，还要篡夺国民党。当汪精卫于6月1日或2日在鲍罗廷办公室里见到鲍罗廷时，便大发雷霆。汪精卫叫嚷说，鲍罗廷没有把他当做知心人，在他的背后活动，搞欺骗。在过去数月里，苦于疾病并被紧张局势弄得头昏脑胀的鲍罗廷对罗易的这种行动感到极为震惊。他竭尽全力使汪精卫平静下来，答应汪精卫断然停止农民的各种活动，说没有没收土地的想法，不会发动农民，不会改组国民党政府。鲍罗廷进而要求莫斯科立即召回罗易。当然罗易并没有象斯大林的电报那样，使汪精

① 同上页注⑤，第520页注。
② 罗易：《我在中国的经历》，加尔各答，1945年版，第49页。
③ 同上，第51、53页。
④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81页。

卫如此失去常态——而且电报也是召不回去的。

罗易还把斯大林的电报让孙夫人、陈友仁和其他在武汉的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看了，他们感到沮丧和不快。其结果，罗易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陪太子读书代人挨打的孩子。人们指责他鲁莽妄动，倔强不驯，"把一切都搞乱了"。无论是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人指责罗易破坏了统一战线。更糟的是使苏联在中国遭到了失败。这当然是很荒谬的。统一战线的命运早在罗易来华以前就已注定了。当6月1日罗易把斯大林的电报交给汪精卫的时候，统一战线已经摇摇欲坠了，这时汪精卫和多数在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一样，便想跳离这条船和蒋介石合流。罗易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只是推动汪精卫及其一伙更快地转向右派而已。如果他们曾经犹豫过，那是因为希望鲍罗廷还能来挽救他们，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如果说他们一直是忠于孙中山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可以免罪了；因为破坏孙越协议的不是他们，而是斯大林。如果过去由于迟钝而耽误了，那么现在他们已经知道，同右派友好亲善乃是当务之急。

林　海　朱雪平译　林　海校

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

编者按：这是罗易在1938年出版的《我在中国的经历》(My Expeirences In China)一书的部分内容，标题是译者加的。大革命失败时，罗易正在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大革命失败后，罗易受到指责。罗易的回忆很多地方是评论性的，是对当时以及以后中国革命形势和决策的分析，有些地方是因自己遭到指责而进行的辩解。书中有不少错误观点，但由于罗易是当时的决策者之一，因此他的意见，他回忆的事实，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国民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使农村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了，把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土地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另一方面加重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达到了危及其生存的程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涉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农村问题，采取了非常迟疑的态度，而对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却十分关心。即使是对于这个在革命形势下出现的尖锐问题，他们也是从错误的观点出发处理的。

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着两种对抗状态：一种趋向是按照资产阶级各个团体所代表的互相抵触的阶级利益进行横的分裂。另一种趋向是按派系利益进行竖的分裂。促使第一种分裂激化，显然本应成为共产党的策略。国民党中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要求继续发展革命，直到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势力，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领导集团代表的不仅是资产阶级（银行家、实业家、大商人）而且还有地主和乡绅。勇

敢地坚持实施民主革命的纲领，特别是解决土地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包括粮食垄断、苛捐杂税、强制劳役，国内贸易税等）必将使国民党的领导集团与普通党员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阶级关系便会因此而在反帝的民主革命中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将在斗争中夺取领导权。大资产阶级必将从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集团中被排出去。革命的社会基础将减缩成一个具有相应的阶级性质的群众的联盟，即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仍旧可以活动在民族民主革命的舞台上，而且还是在民众所接受的国民党旗帜之下活动，但实际领导权将转到共产党手中。

然而，中共领导人仍在疑神疑鬼，害怕与国民党关系破裂。他们处于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的支配之下，根本看不出形势发展的前景。他们顽固地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提出的新决策，在原来的机会主义老路上继续追随着鲍罗廷，在这种一切都取决于迅速果断的行动的紧要关头，共产国际也未能进行有力而又有效的干涉，使它的决定能够贯彻下去。它委任的代表没有足够的权力完成赋予他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接受了新的路线，但却是半心半意的，在鲍罗廷的领导下，这种新的路线只能遭到破坏。鲍罗廷是苏联政府的代表，掌握着各种资料，控制着通讯机构，因此，有关形势的真实情报就可能及时地送往莫斯科。我就是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站在这个由鲍罗廷操纵的中共领导集团的对立面，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①但由于这些领导人决心破坏这些决议，因此这些决议，特别是提倡土地改革的决议，只能成为纸上谈兵，并未实施。党的领导人的行动不仅背叛了农民阶级，甚至也背叛了无产阶级。由于得不到中共领导人的合作，我也毫无办法。除非通过他们做媒介，不然我就无法行动。那些显然是大家同意要采取的紧急行动计划，都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被弃置不顾。

① 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有必要采取一条真正的革命路线，并派遣罗易作为特别代表到汉口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在机会主义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他们受的教育就是要迷信与国民党的联盟。他们受的是这种理论的熏陶：民族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两年来，他们就是在那些看来是共产国际信任的代表的直接指导下，按这种共产国际认可的路线行事的。机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传统，他们在那些看来是要体现俄国革命的伟大经验和随意引用列宁语录的“布尔什维克”们的教导下，已经染上了这种习气。

因此，中共领导人自然无法掌握新的决策。这种新决策意味着立即抛弃他们迄今为止所遵循的路线。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异端邪说。他们从来没有受过现在提出的要进行革命群众运动的训练。他们惯于进行鼓动、宣传乃至组织工作，但这种行动的垄断权属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凡国民党领导当局未批准的事就不能做也不应当去做，做了就是损害联盟。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比如，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必须在农村发起进攻，必须领导农民打击封建势力，大地产必须由农民协会予以没收，农民协会要立即承担起农村政权的职责。即使这种决议已经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通过，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还是在鲍罗廷的指示下向莫斯科发了反对这个决议的电报。他的论点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都是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反对土地革命的纲领；如果在农村开展进攻，军队就会起来反对国民政府。这种对军官的态度的偏袒，忽略了那些来自于农民的士兵，他们肯定是拥护土地革命的。另外，军官们并没有犹豫不决，他们已经开始进攻，残酷地镇压农民运动，而且准备用暴乱来反对武汉国民政府，除非它公开打击共产党。

在1926年11月到1927年7月这段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完全依据这种设想来决定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国民党激进左翼的代表。这个设想的根据又是武汉国民政府能站出来反对蒋介石这一事实。在反蒋斗争中，为了赢得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国民党广大党员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集团装出一副激进的假姿态，窃取了

“国民党左派”的头衔。他们宣称自己是孙中山主义忠实的旗手。为了使他们所要求的这种权利得到大家的公认，武汉集团承认了汪精卫的合法领导，并把流亡在国外的汪精卫请回国。

但是从社会阶级构成情况来看，武汉集团与南京的竞争对手蒋介石一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武汉集团的实际领导权已交给了封建将领唐生智，唐生智只是在不久前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才从事国民革命事业的。当时在武汉集团的领导阶层中有谭延闿、孙科、徐谦、陈友仁和其他人。谭延闿自满清时代起就曾是一省的都督，属于国民党最保守派的元老。孙科是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儿子，一贯属于党的右翼，曾反对过他父亲的激进倾向。徐谦原来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军队的教士，是教会中的一个显要的保守派人物，是第一个升为主教的中国基督教徒。活泼机智的陈友仁是一个陈腐的自由派，如果他有什么政治倾向的话。他在鲍罗廷的授意下起草词藻华丽的外交文件，但却坚持不能在外国人开的工厂里举行罢工，因为这会妨碍他在外交上进行交易。

共产党承认这一派人为国民党的“左翼”，还把革命的前途寄托在这个十分不可靠的集团身上。武汉集团干的唯一好事是表面上和共产党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也只限于许可两名共产党人参加他们的政府。

实际上，武汉集团并不是国民党左翼的代表，但是可以把它转变成为小资产阶级左翼的组织，使它成为一种团结国民党广大党员，对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对蒋介石的拿破伦主义进行决战的工具。只有使国民党内部的阶级对抗尖锐化，迫使它根据互相低触的阶级利益进行横的分裂，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只要由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即老官僚、封建军阀和大资产阶级控制武汉集团，国民党就会按照派系的利益进行竖的分裂。因此，要把武汉集团转化成一种革命斗争工具，首先就要将那些还处在领导地位的反动派驱逐出去。当武汉集团的生存有

赖于广大群众的支持时，从一开始就应当强迫它接受条件，批准执行民主革命的纲领。那时，共产党还处于有利的地位。在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江流域以前，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小商人、手工业者、职员等）的革命就已经把那个地区的敌人赶了出去。武汉本身也是工人阶级冒着江面上帝国主义炮艇的威胁勇敢地打下来的。工人们把胜利交给了唐生智。长江南岸的古城武昌是被“铁军”收复的，这个军队的大部分军官是共产党员。把胜利交给唐生智，为的是使这个狼狈的、名誉扫地的封建军阀的党羽成为国民党假左派。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本来是很容易讲条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是根据中共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报告，才于1926年11月提出支持武汉政府的政策，并要中国共产党加入武汉政府。但是优势被抛弃了，共产党并没有讲条件；相反，它限制了土地革命，这就使武汉政府得以争取这个封建军阀的党羽来参与他们对蒋介石的派系斗争。也就是说，共产党帮助反动派在武汉集团中壮大了他们的地位，并使他们获得了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不久就掉转身来反对共产党人自己。

如果共产党继城市民众的初期胜利之后，立即在农村发动一场总进攻，就可以防止打着武汉政府旗帜的反革命军队的反革命计划具体化，而且武汉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可能已采纳了激进的纲领。当然反动派是不会认可这个纲领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会使那些想利用国民党广大党员的支持来和蒋介石进行派系斗争的反动派与国民党广大党员相互斗争起来，其结果就是他们或者退出或者被驱逐出武汉集团，而武汉集团就能成为革命群众向反动派斗争的先锋。由于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将因自己队伍中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分裂，重新组成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各阶级的战斗联盟将会更加和睦。武汉政府将成为一个民主专政机构——一个在资本主义衰落时代用殖民地民主革命的方式创立的国家组织形式。

当我低达中国时，这盘棋几乎已成败局。只有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才能挽回局势。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些一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人的支持下，整个党的领导都反对采取革命行动。他们形式上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但在执行时进行低制和破坏。在反革命正在进攻，我们要分秒必争的时候，这简直是灾难性的。

1927年初我到达广州时，发现共产党还是不敢反对蒋介石，尽管他的反革命用心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在蒋介石的军队占据的江西省，到处都在向农民和工人进攻。很明显，他不仅与上海的资本家，而且还与北洋军阀，甚至与帝国主义进行秘密会谈。日本特使已经秘密地访问过他。当上海的无产阶级作为国民革命军英勇的先锋，冲锋陷阵，无视国际帝国主义调集的强大军队，起来向占据上海的北洋军阀的军队展开进攻时，在上海近郊的蒋介石军队却按兵不动。他眼看着反帝斗争的精华，上海无产阶级，遭受反革命的屠杀，却不给一兵一卒的援助。他那种对共产党人的人所共知的仇视再也掩饰不住了。他开始在国民党内发起了清洗共产党人的运动。他发誓要摧毁武汉，除非国民党的这个对立阵营起来向共产党宣战，并镇压工农运动。

我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广州的共产党人，以全市各群众组织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要求对蒋介石的所做所为做出说明，并提出了“请回汪精卫”的口号。这个口号的目的是团结广大国民党员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拿破伦主义。共产党对发出这个口号很勉强，因为这就是向蒋介石宣战的信号。很明显，反革命已经进攻了，而共产党人还不准备反击。

在从广东到武汉的路上，我发现请汪精卫回国的口号已经发出了一段时间，每个村子的群众大会都提出了要求。在湖南省，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已经全面展开。

湖南是唐生智的地盘，他当时已经是武汉军队的总指挥。这个人加入国民革命运动只是为了混水摸鱼。他的权势和他对华中关键地区的占领，激怒了蒋介石。唐生智希望取代蒋而一举成为整

个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就是他首先在他自己的湖南省暗中发起反蒋运动，后来又迫使武汉政府动手的。但由于正适合政治上的需要，他搞的这场私仇之争居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强大支持。但是个人的因素超越了政治因素，扰乱了整个运动，最后使这场运动失败了。潜意识的阶级对抗使这场运动发展得非常普遍，而运动的实质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共产党人的责任是按照阶级对抗的路线来推动这场运动，但他们并没有发动这场运动，也没有在运动掀起后，沿着正确的道路引导它。相反，他们只是在运动中充当了配角，从而成了两个反革命军阀派系斗争的一部分。

对蒋介石的斗争决不是对某个个人的斗争。他是反革命阵营的首脑，是民族资产阶级企图扼杀民主革命的代表。因为这场革命将冲破狭隘的政治界限并提出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就需要给民众的大多数以福利。因此蒋介石就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对大多数人实行镇压。他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军事独裁，使之成为封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工具。蒋介石所主张的一切都是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的，也是与正在觉醒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相对立的，这就使得反蒋运动更加广泛。这场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派系斗争一直掩盖了它的社会性质。两派对立的军阀集团展开决战，必然以强者的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一方是强大的。因为他从上海获得经济援助，从海外获得物资援助。蒋介石当初北伐就有一个目的，要进入这个可以得到这种两重支持的地区。如果是在一个革命集团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就会丢下上海，在占领长江中游各省之后，向北京挺进，彻底摧毁北方军阀。这样就会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然后形成一个从四面八方包围这个国际帝国主义基地的圈子，不必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只需将上海与内地切断，就能制服这个城市。但是要想处于这种有利的战略地位，国民革命军就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要完全依靠苏联的供应。这样一来就会把他们自己置于国内和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蒋介石预见了这一切，而且他把军队径直开向他如要进攻必遭失败的那个方向。上海是不经国际帝国主义认可任何中国军队都无法攻占或接近的，蒋介石只是在表现了反革命的诚意之后，才被允许进入这座城市的。蒋介石达到这个他垂涎三尺的目的地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屠杀共产党人和残酷镇压革命民主运动。他以上海为基地，依靠中国资产阶级的金钱资助和国际帝国主义慷慨的物质供应，能够击败一切对手，除非这个对手是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旗手。

二

唐生智并不急于与他的强大的对手进行一次实际力量的较量。他只是利用群众潜意识的革命冲动力来扩大他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在武汉建立他的独裁。当蒋介石拼命地在长江下游各省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武汉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武汉政府的确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它有本地区革命群众的支持，得到国民党全国广大党员的同情。

由于缺乏革命的领导，武汉是无法长久保持它作为中国革命中心的这种光荣地位的。这种革命的领导在一定条件下，只能来自共产党。上海对蒋介石的欢迎，对立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建立，给武汉笼罩了一层阴云。武汉集团感到自己的威信在下降，而又不敢冒险与对手一决雌雄，于是只能在军事上谋求廉价的荣誉。

蒋介石在准备向北京进军。武汉集团决定抢在他的前头。他们认为夺取北京要比占领上海光荣得多。所谓第二次北伐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要争取冯玉祥，此人正在狡猾地等着把他的支援力量卖给强大的和出价最高的一方。但隐藏在武汉政府这次军事冒险背后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逃避革命赋予他们的社会职责。这个行动计划是为了转移群众的注意力，使他们在军事行动期间不再提

出自身的要求。

这个计划的施行要依靠唐生智，他根本不愿离开他的基地去寻求那个代价极大的胜利。他尤其不愿实现与冯玉祥军队合并的那种愿望，因为万一合并，他的武汉政府军队总指挥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冯玉祥本人不会屈就于他的指挥。为了把冯玉祥的强大军队置于自己的旗帜之下，武汉政府很可能任命冯玉祥为总指挥。一方面，唐生智知道冯玉祥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如果武汉政府在向他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方面太拖延，冯玉祥就会加入蒋方，冯蒋联合将威胁到武汉政府的生存。唐生智要想保住广大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就不能一味坐待良机。因此，在矛盾重重的心情下他同意第二次北伐。但他也很油滑，不让自己的军队去冒险，而把广东部队放在北伐的最前方。

这场新的军事冒险对革命来说显然是危险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壮大武汉政府的军事力量，使它能够摆脱群众的影响。那时，武汉政府必然会以战争为借口要求后方保持安定，就象它后来所做的那样。这就会使反革命势力有时间去恢复失去的地位，然后向革命发动进攻。

由于这种理由，我反对这个新的军事行动，并劝说共产党采用另一种行动计划，这就是在武汉政府所控制的各省开展土地革命，以巩固武汉政府的社会基础。我所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一）彻底消灭地主、高利贷者和土豪劣绅这些农村的反动派；（二）向南方的广东（原国民党的基地）和江西扩大武汉政府的势力；（三）由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革命军队南下，帮助实现这些目的。

在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向长江一带进军时，在四个省（人口总数差不多有一亿）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组织起来的工人约一百万人，农民是这个数字的五倍。他们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武汉政府要是能在这些省份扎根，那就是坚不可摧的。据有这种战略地位，它就可以从内陆包围上海，击败蒋介石和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同时，如果蒋介石沿津浦路向北京进军，武

汉政府就可以要求冯玉祥向东出兵，威胁蒋军侧翼。由于控制着陇海铁路（它连结北京至长江流域的两条铁路）作为他的基地，冯玉祥也可以向北京挺进。这种做法对冯玉祥有诱惑力，会促使他脱离蒋介石。

但中共领导人不愿接受这一行动计划。他们认为不支持第二次北伐，就会导致与国民党“左派”的分裂。鲍罗廷提出了一个失败主义的理论，他争辩说，因为革命力量太薄弱，武汉无法保持。于是他提议，必须把残存的力量安全地撤退到西北的一个新基地。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主张，充分暴露了他对群众缺乏信心，可悲的是中共领导全都赞同这个主张。他的另一个令人吃惊的建议是调动各种军事力量建立一种混合体，希望能在混乱中发现什么积极的东西。这种宿命论的根源还是机会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被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又是这样无可救药的笨伯，如果那种几乎是肯定无疑的灾难避免了的话，是会有一个真正的奇迹的。

如果共产党领导人在最后一刻表明他们还懂得一点革命策略的话，即使是这种奇迹也是可以创造的。如果能使武汉政府明白共产党不主张军事冒险，这项计划就有可能放弃；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施行这种计划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党仍处于关键的地位。在他们还可以提出条件时，他们不提，反而投降了。他们号召群众去支持有意识的反革命军事冒险，而且又为先扩大革命的老论调进行辩解，认为如果坚持在国民党区域解决土地问题，就意味着向国民党开战。

我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答复却是模棱两可的。莫斯科赞成两件事都做：既要执行军事计划，又要在武汉政府所辖区域发展革命。这是不可能的，不久前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军事行动一开始，国民政府就要求终止后方的阶级斗争。罢工被禁止了，理由是：任何对工业、贸易和交通运输的干扰都会

影响军队的供给，因此都是反革命的。甚至连反帝活动也被禁止了，其借口是当军队在前线作战时，国民政府不能冒在外交上面临困难的风险。

为了满足军费开支，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并强行借款，物价随之暴涨；因为商人立即将税收和借款的负担转嫁到广大群众身上。另一方面，又不许工人提出任何增加工资的要求，以免引起工业罢工。于是老板们便乘机以战时需要爱国节约为借口，降低工资，并要求工人加班加点，以示对革命的责任心。农民不能贮存粮食，因为军队需要粮食。强行大量征购粮食，压低了粮价。农民蒙受损失，粮商却填满了腰包。以革命军队需要有后方的社会安定为借口，他们抑制了农民运动的斗争精神。所谓的社会安定，使地主和土豪劣绅赢得了时间，准备向农民发起进攻。

在前方，武汉政府并没有走运，冯玉祥并不是一个十分惬意的同盟者。他封锁了通往北京的道路，自己不急于行动。他傲慢地劝说武汉集团与蒋介石讲和，并以镇压共产党和赶走俄国顾问为条件。冯玉祥的态度使唐生智找到了将他的军队撤回基地的机会。这些军队毫无损失，而广州军队孤军作战，几乎全军覆没。

当战争还在进行，到处在以爱国为理由宣扬社会安定的时候，湖南唐生智的军队却公开叛乱，反对武汉政府了。叛军向首府进军时竟然没有受到阻截。最后是一支由武昌的共产党指挥官匆匆组织起来的志愿部队，在武昌附近阻止并击败了叛军。毫无疑问，叛乱是经这位湖南籍的总指挥批准后发动的。当时还发现反动军官们与南京有勾结。武汉政府在消极地等待被反革命叛军推翻的同时，还亲自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说是农民的“过火”行为逼使军官们发动了暴乱，因为他们全都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政府要求共产党制止农民的“过火”行为。这个要求并未被充耳不闻，鲍罗廷就对农民的“破坏”大发雷霆，并命令他的信徒们帮助反动派制止斗志昂扬的农民运动。他指出了与国民党“左派”破裂的那个吓人的恶魔，这个恶魔至今还在中共领导人身上留有机会主

义的伤痕。在那革命的危急关头，这种机会主义就是对群众的严重背叛。

反革命势力发展迅速。叛军在武昌城下遭到失败后几天，在湖南首府长沙又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这次政变使共产党人惊慌失措，似乎失去了判断事物的能力。在鲍罗廷的指示下，共产党人任内政和农民部长的谭平山自愿前往湖南，“纠正”农会的“过火行为”，我坚决反对共产党人为安抚反革命军官而承担制止农民革命行动的任务。我指出，借口军队作战时不得扰乱后方而压制土地革命的发展的这种自我毁灭的政策，已经使反动军队发动了进攻，再压制下去，就会瓦解农民运动，并为反革命在农村进行血醒屠杀鼓气。但我的反对意见无人理睬。

于是我又建议，谭平山可以带着这样的指示到湖南去：在当地，他的任务不是制止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而是建立农村自治，授予农会以必要的政治权力。这样做，即使不是在名义上，也是在事际上建立了苏维埃。农会是团结农村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阵地。谭平山以他内政部长的资格，是负有管理地方自治和治安问题的责任的。因此，我建议的这种行动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正确地，积极地引导农会，容易把它变成革命政权的基层组织。解除由地主雇用的地痞流氓的武装，并建立民兵，使之成为真正革命军队的核心。

在农村工作的广大党员是渴望有这样一个行动路线的，但他们受到党中央命令的压制。他们中间许多人失去了耐心，在群众的压力下已独立行动起来。于是军官和国民党的反动领袖就大嚷大叫地反对这种“过火行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反对这种“过火行为”，认为“纠正这种过火行为”是他们的革命职责。尽管如此，谭平山的“和平使命”并未实现，因为长沙的反革命叛军不让他通行。

很明显，不仅唐生智支持了长沙的叛乱，就是武汉政府的“左派”也默许了这场表面上似乎是反对他们自己的行动，因为他们

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镇压叛军。叛军只控制了少量的军队，只需由可靠的军官率领几千人的正规军去讨伐一下便能一举歼灭他们。但叛军却没有遭到一点打击，这就使他们明目张胆地纠集力量，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组织进行血醒镇压。长沙城的全部共产党领导人，包括两个女孩子，都被残杀了。工会被镇压了。农民的政治学校被关闭了。叛军扬言要进攻武汉并推翻武汉政府，除非武汉政府同意镇压工农运动和惩治共产党人。

武汉政府面对这种形势一筹莫展，软弱无力，但因感到事情有了转机而松了一口气。他们虚张声势地责成他们的总指挥去控制他的部下，并在长沙保持原来的状态。唐生智虽然接受了指示，却迟迟不见行动。

共产党再也不可能扮演配角了。再这样做就不仅是机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十足的背叛革命的罪行。我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一封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公开揭露它玩忽职守而又积极作恶的反革命罪行。这封公开信应该是一封最后通谍，并成为在中共独立领导下发动革命总进攻的信号。

我建议的具体行动是：（一）领导农民攻打长沙，并紧急组织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革命派率领的非正规部队配合支援；（二）在汉阳兵工厂举行罢工，要求将所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武器弹药交给工会，以便成立一支工人纠察队，以保证能对付反革命；（三）发动群众示威，支持兵工厂工人的要求，赞同共产党的公开信，要求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立即号召农民起来消灭长沙的叛军，摧毁农村的反动派；（四）举行总罢工，坚持示威中提出的要求。最后，举行武装起义，并开始占领兵工厂。

在那些一贯被机会主义熏陶的共产党领导人看来，这个行动计划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尖锐的革命危机使他们灰心丧气。他们为惊慌失措和失败主义的情绪所支配，不听取我所提出的坚决进攻是摆脱困境可靠出路的意见，反而屈从于国民党"左派"的全部要求。工会解散了所有志愿组织的纠察队；就连童子团（无产阶级

子弟的训练组织）也被解除了木棒；禁止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投降主义的最高表现是工会成立了革命法庭，执行可耻的所谓"革命纪律"。法庭惩罚那些鼓动罢工的工人，惩罚抗议外国人少付车费并无理侮辱中国人的车夫，惩罚拒绝为外国士兵干活的船工，以及嘲弄反动商人的人，等等。

在失望中，我还是试图去做共产党政治局（最高领导机构）首脑的工作。我提议召开有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全会。但是他们借口非常时期党的领导人无法离开岗位，拒绝了我的要求。上层领导人反对召开全会，是因为地方工作人员急于要求决定性的行动，他们肯定会赞同我的计划。作为最后的手段，我只好寻求与个别中国和俄国同志的联合。加伦① 是完全赞成我的计划的。当时许多其他俄国同志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一切权力都集中在鲍罗廷手中。尽管莫斯科在政治上支持我反对鲍罗廷的机会主义，但在其它方面，他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在共产党内起着独裁者的作用。中共最高领导大部分是他的信徒，思想上也和他相似。因此他们一味追随他，根本不顾共产国际反复发出的指出，也蔑视共产国际在场的代表。

在一支由农民自愿参加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之前，有可能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非正规军，暂时对付长沙的叛军。为了能使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有战斗力，必须给士兵预发一个月的薪饷。当时鲍罗廷控制着财权，起初他答应供给这笔钱，当一切工作在不顾中共领导不予合作的情况下安排就绪，而且已经命令农民围攻长沙时，他又言而无信，拒绝拨款，结果这项计划只得放弃。这时已无法组织对其他反革命的军事进攻，但并不是一切都没有希望了。在当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革命派的领导下，农民对长沙进行了半圆形的包围。二万多人的部队开到这座城市几英

① 加伦是国民政府首席军事顾问。他是国民革命军干部队伍的缔造者。作为参谋长，他制定了整个北伐的计划，实际上指挥了所有重大的战役。经过江西到达长江边上以后，他不同意蒋介石向上游进攻的想法。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他离开了蒋的司令部，当我在武汉时，他也正在武汉。

里的地方，并未遇到抵抗。这座城市本身的反革命势力是微小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都在准备迎接农民军。因此攻占这个反革命中心的胜利就在眼前。突然，农民军开始退缩了。反革命军队突围出击，驱逐被突如其来的退却命令弄得十分混乱的农民军，屠杀了几千农民。这是反革命在这个农民运动最强大的省份全面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

农民军的这种突然退却，葬送了夺取长沙的胜利，这种损失是中共领导人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出的一道命令造成的。我抑制自己，不去描绘这种行为的特点，因为遇到这种事，人们总不免要使用非常伤人的语言。

在武汉举行了一场示威，但不是要达到原来的目的，即发出已经计划的起义的信号。原来的计划是：在国民政府代表同冯玉祥谈判后从前线回到武汉时宣布总罢工一天。所有武汉三镇的工人都要汇集在一起听国民政府领导人演讲。共产党代表在讲台上按照党的决议要求采取行动，国民党领袖不认可这种要求，于是拘留他们，并以此作为举行起义的信号，附近汉阳兵工厂的一万工人已做好准备，根据信号占领兵工厂。但最后这场示威游行却变成了欢迎“凯旋”而归的将领和国民政府成员的欢迎会。

多么可悲的嘲弄呵。那些“凯旋而归”的将领们吃了那个老奸巨滑的基督将军的亏，现在却反过来在这帮愚蠢的共产党人身上出气。由于和冯玉祥交涉不顺利，使得大多数武汉政府领导人相信，要征服在长江下游已经站稳脚跟的蒋介石已是徒劳无益的事。

三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汪精卫的处境是左右为难的。他是一个悲剧的角色，正站在快要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船上。共产党所采纳的鲍罗廷把军队联合在唐生智领导之下的愚蠢策略，把汪精卫推到了反革命集团的怀抱。不过他也很难马上彻底叛变。他

既不处在指挥军队的地位，也不能采用宗派斗争的诡计来获得声誉。他是被挑选的孙中山的继承人，从来都是以民主激进派著称。他可以拿他所继承的孙中山的信念作儿戏，不过那就要以他的政治生命去冒险。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断然违背自己的宗旨，国民党最高领导阶层里的对手蒋介石就不会给他一块容身之地。如果他和蒋介石妥协，就会加快自己在政治上的完蛋。

在应当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防止看来是迫在眉睫的灾难时，这样一个人物是不容忽视的。整个形势都对共产党很不利，他们曾经使劲地解除自己的武装。另外，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共产党人，整个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都遭到了反对。因此，客观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也要遭到打击。实际上，许多国民党普通党员正在招致反动领导集团的不满，由于亲近共产党人，他们也成了反革命血腥镇压的受害者。武汉的反动派也喊出了蒋介石的口号：把共产党和他们的盟友从国民党内清洗出去。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该竭尽全力与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组成一个紧密的战斗联盟，反抗反革命的进攻。因为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尚未完成，所以这种联盟在客观上还是必要的。如果这一努力成功的话，反革命即可被阻止，局势也可以得到挽救。

为此，我提出了与汪精卫建立友好关系的策略，目的是把他从反革命统治集团中分离出来。鲍罗廷的"唐生智方向"疏远了汪精卫。在私下交谈时，他强烈埋怨：虽然俄国人劝他回到中国并使他成为武汉政府的首脑，但现在共产党人却在和军阀一起密谋来推翻他。他讲的是事实。

他的不满是无可非议的。他从外国返回中国时，路过莫斯科。在那里，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都答应给他以全力支持。因此，他希望中共领袖和鲍罗廷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但他发现自己在中国的地位是很暧昧的。他是"左派"国民政府徒有虚名的首脑，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处于不久前才加入国民党的反动封建军阀唐生智的控制之下。处在这种不值得羡慕的地位上，他自

然会埋怨动摇。不过他依然是民主革命群众所崇拜的偶像。要想组织一个激进的反对派，不仅要推翻蒋介石阵营的反动分子，而且要推翻武汉政府自己内部的反动分子，没有汪精卫出面做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使汪精卫恢复信心，并再次向他保证他在莫斯科时答应给他的支持，显然是十分重要的。我设法向莫斯科发报，要求这种保证。另一方面，我向汪精卫提示了一个使他能在武汉政府内重新建立有效领导权的具体行动计划。他同意进行这个计划，条件是这种必要的援助不久即可得到。

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是：召开地方会议来制定国民革命的纲领；召开由地方会议所选代表参加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在紧急代表大会上认可国民革命纲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把一切不愿无条件坚持国民革命纲领的人从新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出去。国民革命纲领的要点是：没收超过最大限量的土地财产；授权农会没收土地并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真正耕作者；除统一的地税外，取消对农民的所有苛捐杂税；废除厘金（内地关税）；解除农村反动派的军事武装；由农会成员组成农村民兵；授予农会以农村自治职权；使矿山和铁路国有化；在产业工人中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限度的工资；在工厂中建立工人委员会；建立工人纠察队；创建一支革命的军队，直接由国民政府领导；向南京的叛徒们发起斗争；有力地开展反帝斗争。

当十分紧迫需要的莫斯科的保证到来时，已为时太晚了。这时汪精卫认为共产党已出卖了自己；便着手与右翼谈判，后者强调必须以共产党人的鲜血作为对蒋介石的进见礼。汪精卫的背叛意味着武汉政府的瓦解，而对反动派来讲，无论他们是蒋介石的盟友或是对头，这都是一个完全的胜利。唐生智自己也在秘密地与他的对手联系。但是为了愚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欺骗广大群众，他故意派了一支队伍开赴长江下游以示讨伐南京政府。这明明是诡计，但鲍罗廷却感到满意。这个诡计的真正目的是把剩余的广东军队调开，因为他们可能反抗“左派”武汉政府中的反动分子

所策划的反革命计划。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做出最后的努力，重新获得汪精卫的信任。于是，我把莫斯科的信息告诉了他。虽然莫斯科没有直接给他发电，但电报显然是为他发的，因为内容是重申他在莫斯科时对他本人许诺的保证。在一定的条件下，乞求莫斯科给予支持的这一行动计划，如果没有汪精卫的合作是无法执行的。汪精卫由于以往痛苦的经历产生了不信任感，他要求看一下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在那种非常需要他的信任的危急时刻，我不能冒丧失他的信任的风险而拒绝他的要求。再则，他也早已知道这个计划，并表示过同意。如果我能明确证实莫斯科必要的支持即将到来的话，他是愿意遵守诺言的。不能指望任何人都可以作出重大的决策，除非给予他最起码的信任。我没有时间取得莫斯科的赞同，而且我认为也没有这个必要。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应该有权主动采取行动，只要他执行的是以前已经认可的总路线。我把电报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里面就有要向他转达的信息。

据报告，他把这份电报给他的同僚们看了，而这些人已经和南京发生联系。这个情况是确实的。因而在汪精卫为他倒向反动派进行辩护的宣言中提到这份电报，作为共产党阴谋诡计的一个证据。但是，要象我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认为这份电报是形势急转直下的决定因素，那就是纯粹的胡说。在这份电报发到中国以前好几天，反革命分子就在武汉公开发动进攻了。汪精卫的同僚，有的是反动分子如孙科、陈友仁、谭延闿，都是鲍罗廷和中共领袖信任的左派，他们已经偷偷地和蒋介石达成协议，只等待着汪精卫和他们一起加入反革命阵营。武汉政府军队的反革命叛乱一直都是在武汉政府自己的批准下发生的。在武汉，工人被解除了武装，他们的组织在中共领导的帮助和赞同下被搞得软弱无力，由于鲍罗廷的机会主义路线支持封建军阀唐生智，而不支持民主革命群众公认的领袖；由于中共领导人在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展现在他们眼前时，还一味愚昧地追随鲍罗廷，遂使汪精卫倒向他

的反动同僚的怀抱。我只不过是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防止这场灾难的发生，这场灾难的来临是由于一些人的机会主义和愚蠢，也是由于莫斯科的那些决策人未能速下决心发出我所要求的明确指示。①

这样，挽救革命的这种最后的保证就被他们自己丢弃了。于是，国民党"左派"驱逐共产党人，国民政府也宣布他们为非法。唐生智手下的那帮杀气腾腾的军官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干这种杀人的勾当是十分认真的。仅仅四个月之后，蒋介石在上海进行的大屠杀事件就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内重演了，所有的俄国顾问，包括伟大的鲍罗廷，都被命令离开这个国家。

在这一个月前，中共中央领导人拒绝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我所提出的尚有可能挽救时局的进攻。但在反革命已经开始进攻，党被迫转入地下时，会议却召开了。当时我还在汉口，心情忧郁，准备离开中国。由于一周前，中共领导破坏了一个很有希望的起义，我已决定不再承担代表共产国际的责任。我没有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因为，当时任何办法都无济于事了。

---

① 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有人传说，我"在中国的背叛行为应对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遭受屠杀负责"。这种指责太轻浮太恶毒了，根本不值得重视。没有任何负责当局这样指责过我。相反，我从中国带走的大量证据说明，应该受到这种指责的是中共领导人，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真正代表鲍罗廷。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发生屠杀工农群众的事件。我抵达中国时，机会主义已经涣散了革命力量，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从那些指望承担革命领导的人的叛卖中拯救革命。中国工农群众遭受屠杀是由于中共领导人拒绝执行我本人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向他们提出的采取决定性革命行动的路线。这个决定也是共产国际按照我的提议通过的。一场革命被出卖的悲剧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但是，我当时已不在中国，没有看到这场革命所得到的流血的后果。最后，为了揭露在中国攻击我的流言蜚语，我请那些造谣者从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中拿出哪怕是一句话，来证明他们对我的指责。我离开中国后，在莫斯科呆了将近一年，依然受到信任，担负重要职务。那正是中国的反革命势力猖獗一时的时候。如果我有任何一点背叛的行为，就不会活着离开莫斯科。实际上，我一回到莫斯科，就有一个由共产国际主席团和苏联共产党政治局联合组成的委员会听取了我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汇报，并做出决议，这个决议不仅没有指责我做过任何有害于革命的事，反而表彰了我。斯大林本人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且也是这个结论的起草者。

他们也没有邀请我去参加会议。这是颇为出人意料的。因为我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而且没有接到共产国际总部要我离开中国的命令。但是，中央委员会会议进行的报道说明了我未能参加会议的奇妙之处。原来会议是根据鲍罗廷的意见召开的，要批准"撤退计划"。正是胜利在望时，这个党连一枪都不发就要撤退了。这个计划是一份丢人的文件，它号召停止全部国内斗争，为的是只动员群众加入反帝阵营。为了进行民族斗争，就要停止阶级斗争。然而这个计划却是一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计划，如果执行了就会导致更加灾难性的后果。这是要激起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干涉，只要能使反革命的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受严重失败即可。现在我手头没有这份可耻的文件，这份文件收在我回到莫斯科后所写的一本书里，并由苏联国家出版局以俄文发表过。不久，这本书被收回停止发行，还要我不要用其它任何文种出版。当时我住在柏林，收到这个通知后，我立即把英文原文手稿寄回苏联，其中包括"撤退计划"的副本和我在中国期间中共政治局会议的速记记录。

当中共领导在计划退却（这是一种可耻的溃退）时，因胜利而狂欢的反革命势力却在进军。

唐生智已把"铁军"的余部派到长江下游去攻打南京。因此对国民党"左派"凶猛的反革命进攻就毫无力量进行反击。群众的反抗力量由于他们的组织不断遭到瓦解而被破坏了。中共领导本身应对这种瓦解承担责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急于抚慰反动的国民党政客和他们的"左派"军阀盟友。长时间地抑制自己而不斗争，结果使自己陷入了混乱。仅有的一点工人武装也被共产党的领导人下令交出了。当地主处于农民摆布之下的时候，党的领导人却不许农民采取果断行动。农民被禁止在农村夺取权力，因而让反动派不受触动，一抓住机会就向农民发起进攻。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当北伐军从广州向长江一带挺进时，共产党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工农武装起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结果，当反革命的打击降临到头上时，事实证明，是一种毁

灭性的打击。群众运动使国民党获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但当群众运动本身遭受打击时，却显得没有抵抗能力。群众运动没有巩固。革命是扩大了，但没有深入。这场革命的根基太浅，而且有意如此，因此垮台时简直是兵败如山倒。这是一场大悲剧。

温冬暖译
林　海校

史沫特莱在上海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美国女记者、作家，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她自1928年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报》的特派记者来到中国，直到1941年日军袭击香港的威胁迫在眉睫，才因健康不佳返回美国。所著《中国的战歌》（1943年）就是有关此行的回忆录。由于她目击和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各次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她和中国各方面各阶层人士有深入广泛的接触，而且确实如她自己所说，在中国，曾给予共产党人以积极的支持，此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也是我们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不朽痕迹的史沫特莱本人的第一手资料。

这里选译的，是她对于在上海的经历和见闻所作的记述，涉及到她本人最初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情况，对鲁迅五十寿辰的详细报道，民权保障同盟的失败，丁玲、潘梓年的被捕和应修人之死，都是独一无二的实录。

上海的恐怖

——在革命的需要面前，见义勇为①

在基督教青年会图书室里，我问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是'混饭基督徒'——也就是说，仅仅是为了吃饱肚子才信教的。"他对我扮出一副苦相。

"这是无法知道的"，他回答。"我们的干事们似乎一个个全都

① 副题为译者所拟。下同。——译者

跳到政府的立场上去了。昨天，我们的一位干事蹑手蹑脚地四处通知大家都到礼堂里去祈祷，因为蒋介石将军加入了监理公会。他似乎感到吃惊。”

“许多中国人都教我吃惊”，我几乎是对他喊叫，“不管是不是监理公会教徒！当一个中国商人在他的资产之外再加上基督教徒的身份，就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合成体。虔诚、微笑、握手再加上商业头脑，就成了——”

有两个年青人进门来打听有关借书的手续，那位图书管理员立刻合上了我带来请他翻译的一本小册子，书名是《圣约翰福音书》，但是翻过几页，福音书就变成了《伟大的中国革命》。那两位年青人离开后，这位图书馆员就重新打开那本小册子，替我翻译各章的标题。这是一本“禁书”，也许是共产党人出版的，但用的却是并不存在的一个基督教出版社的名义。这位年青图书馆员已经有许多这样的书，全都有基督教或儒家经典的书名。

这位图书馆员是个消息的活水源泉。他到处搜集禁止公开发布的新闻，从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官场上的朋友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口中，也从茶楼酒肆的闲言碎语中，搜集那类新闻。他不是共产党员，只不过是个关心人民疾苦的青年。如果是政府发的，只要有点价值，他就读；如果是共产党人出版的，有益于人民，他也读。

有一天，这位图书馆员找到我，问我：“你想不想到杨树浦工厂区去看看工人们的住宅？明天我可以带你去。有许多工人住宅是天主教会的产业”。

我正求之不得。第二天傍晚，我到他家里去和他会齐。他住在那些损害了上海形象的无数“中西合璧”式房屋中的一座里。那些是干线街道两侧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弄堂楼房。底层总是一间起居室，带一间既小又黑的厨房和一间完全不透光、不通风的盥洗室。如果住在这里的是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小职员，就很可能会有一本翻烂了的美国家庭流行歌曲集，一本赞美诗集，一本电影

杂志，几幅彩色挂图——印着约纽铁路总站或是印着个妙龄女郎坐在泉水边上听一个穿短裤的情人谈心，半空中有一个挟弓持箭的丘比特。

在上海这里没有一点古老北平那种开阔恢宏、悠闲自在的魅力，也没有那些彩色屋顶、气势雄伟的壮丽的建筑物。对于多数华人来说，上海是一座寒酸、简陋、贫瘠而枯燥乏味的城市。

我在那个傍晚敲响那位图书馆员家门时，被楼上窗户里发出的拉长了的“嘘——”声吓了一跳。我一抬头，看见了那位图书馆员的脸。隔了几秒钟，他把门打开，小心翼翼地让我进去。

他一句话不说，把我带到楼上，从可以俯瞰另一排中西式小楼的后窗户看下去，我看见一伙华、洋混杂的警探在擂鼓似地捶打一座门。许多人的面孔在弄堂里所有的窗口出现了片刻，接着就都缩回到了暗处。我们正对面的一座门被一个穿长衫的细高个男人打开了。两名警探立刻向他扑去，其余的随后跟进大门。随着一声恐怖的喊叫声，我们看见正对面楼上房间里，有几名包探跟着一个女人。她狂乱地跑着，然后把手臂靠在墙上，把头埋在臂弯里，紧贴着墙。包探撕破了被褥和枕头，接着又搜查房间的其它地方。那间可怜的小屋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可翻找的，几分钟内，他们就搜查完毕。这家的大门又一次打开，几名包探带着一个细高个男人和那女人出现在门口，他们俩都戴着手铐。女人脸色灰白；男人嘴上有血。他们向远处走去时，布衫下显现出嶙峋瘦骨的轮廓。

图书馆员的嫂子在楼下那间几乎没有什么陈设的起居室里激动地惊叫道，“还有几个包打听留在房子里，等那对夫妇的朋友上门，我有个女朋友常上他们家去，可是我不敢去给她报信，叫她不要去。我去了就很可能被抓起来。”

“我去”，我自告奋勇，“他们不能因为看望一个姑娘而把一个美国人抓起来。”

这女人才算放下心来。我记下了她告诉我的姓名和住址。

“她英语讲得很好”，她提醒我，“如果有包打听出来开门，就说你是来找一个英语教员的。等我看看弄堂里有人没有。”

她跑上楼去，过了一阵才低声对着楼下通知我，可以出去了。

我一走上大街，就一路闲逛起来，张望着一家家店铺橱窗，直到我断定没有人跟踪，才招呼一辆出租汽车坐上，在市中心的一个地方把它打发掉；步行一段，再要一辆，然后在离目的地不远时再把它打发掉。当我从另一条由中西式小楼构成的弄堂穿过时，我想着会不会有警探来开那姑娘家的门。我急促地敲门，心怦怦直跳。没有人应门。这时有人小心地打开了我头顶上的一扇窗户。我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很漂亮的姑娘的脸：大大的黑眼睛短短的黑头发。

“快下来！”我压低嗓音召唤。

一阵奔跑的脚步声过后，门开了，我跨进门去，向她报警。她那对闪闪发光的眼睛变得更大，她瞥了一眼书橱，最温和的社会问题小说都可能陷人于囹圄，有无数这样的青年正在监牢里消磨他们的全部青春。

“把什么东西交给我都可以”，我催促她，“你可以通过派我来的朋友找到我。”

她立刻跑到书橱前，往外搬书，其中有一本高尔基的《母亲》。她又跑上楼去，拿来了包成一包的一些杂志。

我回去时，步行穿过这座人口稠密而繁华的城市。这里的密探和暴徒在搜索一切思想观点与官方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半个小时之内，那位姑娘就要搬出她的住所，把警报传遍她所有的朋友。因为，家庭、朋友或同志之间情谊的纽带无论多么坚强，都有可能在酷刑下崩溃。有些把革命看成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冒险的人，有些蜕变成为贪财好利之徒的共产党官员，有时，甚至无需酷刑，就会出卖同志。有几个重要的共产党叛徒，甚至加入了国民党内后来叫作“蓝衣社”的秘密组织，当上了特务，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走动，在茶楼酒肆中徘徊，或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指

认他们先前的同志。还有一些，以发表“悔过书”来赎买他们的性命。一旦有谁被捕后回到以往经常出没的场所，怀疑就会落到他们身上。这种疑团常常历经多年而难以消散。有一次我对一个共产党人说：

“你们似乎只相信那些死去的！”

“如果我们能被轻易出卖，中国就完了！”这是他的答复。

“你们的怀疑也可能造成叛徒。如果你们关上大门，他们也许就会终于跨进蓝衣社的大门。”

“我们会有办法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逃出来的。”他的目光越过我，凝视着远方，补充道：“国民党并不相信参加过共产党的任何人，因为既已出卖我们，也就可能出卖他们。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一旦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生根，就永远也不会被完全剷除干净。”

“一种勉强的臣服，是么？”

“是的，政府里有不少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其中有一些总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属于我们，他们需要一种人寿保险。但是特务机构已经杀了不少投降他们的人，在榨尽了所有的情报之后，就把他们象挤干了的橙子一样干掉。”

有一个名叫冯达的中国青年，担任我的秘书兼翻译。他帮我阅读和剪贴中文报纸并把新闻译成英语，建立起我的文件档案。单是有关中国红军的卷宗，就装满了好几箱，但大部分都是官方报道。在为期六个月的一个阶段结束时，我整理官方的统计数字时发现，据报道，有五十万红军士兵已被消灭，而官方新闻仍然声称，仅仅由“残匪”构成的红军还在追剿下逃窜。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共产党总书记毛泽东① 已经被击毙十几次，而在他们毙过十几

① 诸如此类的文字，一概按原文照译。因为这已经是历史文献，译者无权更动。——译者

次之后的一个月，又为猎取他们的首级标出了新的赏额。

我对共产党人也就是当局指称的共产党人在各城市被处决的消息作过类似的研究。直到1932年为止，中国报纸发表了不少有关集体处决的详情，并且常常配有照片。有一则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报道发自重庆，省主席为抓住或杀死任何一名共产党人悬赏五十元。顿时，大中院校遭到军警袭击，不少学生被枪杀在街头，然后凶手们纷纷报功邀赏。有一次我把这类报道的一个摘要交给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直到1927年为止的陈友仁。他对这时的政府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如果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将设法制止这种恐怖行动。1931年，他在广州担任要职，我去看他，请求他不要处决八名作为工会组织者在广州被捕的海员。他说，这些人明知从事这类非法活动会招致什么后果，他爱莫能助。

我还有过类似的经历。1931年春天，我去找外国侨民青年会的美国干事，请他设法制止把两名在上海被捕的外国工会负责人员引渡给华方警察。他拒绝帮助，说我从不曾为中国人来找过他，他说他关心的是中国人，中国最贫穷的苦力的权利在他看来和外国人的一样神圣。我接受了他驳斥我的理由。几个月以后，我为五个中国人去找他，其中三个是工会组织者，他们已经被捕，很有可能被杀，他回答道：

“这些人知法犯法。我无能为力。”

象其他外国记者一样，我也必须尽可能多地和各种类型的华人和洋人建立友谊联系，以开辟我自己的消息来源。我喜欢学者型精神贵族的聪明才智和几位新闻从业人员的观点和胸襟；但是特别钦佩和尊敬那些后来被称作救国派以及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我看来，他们体现了法国、美国和俄国三大革命革命家所特有的坚定信念和无畏胆识。

除此以外，在我和多数外国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障碍，我难得会见我的同行。然而《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编辑约翰·鲍威尔

(John Powell)在我的印象中，却是一个颇为正直的人。由于他不喜欢共产党人并且相信国民党，我们时有争执，但他是一个美国民主主义者，他一贯维护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思考和写作的权利。我们都为英国和日本的远东政策而感到忧虑和憎恶，日本入侵使我们站到了同一条阵线上，从此，他发表我送去的任何东西。

几年以后，日本人开始暗杀中国的新闻工作人员。鲍威尔先生组织起他的同事体面而隆重地安葬他们，只是在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以后，他维护中国的无畏行动才告终止。他早就是日本黑名单上的人物，不久，就和另一名美国记者维克多·基恩（Victor Keen)一道被捕。

在我别的朋友中，有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驾驶员，此人神经过敏，常爱想入非非，我和他保持接触，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可贵的消息来源，每从内地城市飞行归来，他总会给我带来一批他拍摄的照片和许多消息。

他一而再地宣称，活着没有意思。一天下午，他从汉口飞行归来，进了我的房间就倒在一把椅子里，面色苍白，嘴唇抽搐。我给他倒了一杯法国科涅克白兰地，等着听他再一次为活着无聊而大发牢骚，他把一包胶卷和印好的照片扔在我的膝上。有几张照片照的是十几名中国共产党人——也就是被指称为参加了共产党的人——在汉口江汉关大楼前一块空场上被斩首的各个步骤，有几张照的是被斩首后横卧街心的工人尸体，有一张是一个握着手枪的中国军官，他背后是外国工厂的高大围墙，脚下躺着许多显然是刚被枪杀的工人尸体。

“所有这些都是我拍的，只有那张有带枪军官的除外”，库特说。“那是一个英国厂主给我的，那些集体斩首的照片是我从海关大楼窗口拍的。那十二个人上身一丝不挂，双手绑在背后。脖颈上勒着绳索，有些人嘴角流血，警察和士兵干得都很起劲。他们从囚徒的膝弯处把他们踢倒，再用绳子把他们的头向前拉，让一个彪形大汉刽子手用大刀斩下他们的头。喷出来的血，有些溅到

了伸长脖颈看热闹的中国人身上，他们有气无力地垂下双手站在周围。”

“你抗议了吗？”

他不理睬我，继续往下说：“有一个囚徒不等斩首就倒下死去了，有几个以高亢的嗓音唱歌，他们唱的是《国际歌》，全都砍死以后，警察用笤帚醮了他们的血向围观的人群洒去，这些人才象兔子一样逃走。”

他感到恶心，站起身来向洗澡间走去，他回来时，面无血色。

“看看这现代化城市吧，库特”，我开始激动起来，“无论是你或是我都应该把我们所见到的告诉人们——把这些照片拿去给他们看，给那些传教士，商人，新闻记者和青年会的干事们看看，这城市——看看它，看看这座有整齐的街道，有电灯照明，有许多高楼大厦的城市——”

“至于我，我不打算为了一群中国佬去受酷刑！我就要离开这个血腥的国家，到澳大利亚去。”

“在你看来中国人是一群牲口，是么？”

那天晚上，他后来告诉我，他还带回来一些照片，那些是在空中拍摄的。政府禁止，但他还是拍了。

“我用这些照片挣到的钱，足够我在澳大利亚活得象个人样，直到我找到新的工作，”他向我解释。

我疑惑不解地瞪着他，问他，“你们的老板为什么要中国领土的照片？”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你在充当危害中国的间谍？”

“中国？你怎么会对中国有感情？只要想想我带给你的那些照片！”

“可是这国家仍然属于中国人民，你在帮助他们的敌人。”

“你是一个梦想家！”他这样回答我，然后坐下去，无精打采

地凝视着前方。

上海游击战

——应付流氓、特务的斗争

1931年暮春一个下午，我展开一份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我发现在一个版面的正中位置上有一篇攻击我的双栏文章。作者是英国侨民协会的主席、远东最反动的英国笔杆子之一，伍德海先生。①

这篇文章之所以有趣，并不因为牵涉到我，而因为是"洋场才子"绝妙的代表作，甚至在人们即使只是提到象人权这类温和的概念就会遭到残忍的反动势力无情蹂躏的城市和国家，也算得是下流报刊上的无耻之尤：既攻击我的政治信念，又攻击我的个人生活。

我原可以置之不理，如果不是由于官方的调查和攻击已使我陷于困境。几个月以前，我曾被广州的中国警方拘捕过一次，他们采取行动的依据，是上海英国警方发来的一份密件。密件指控我是使用伪造美国护照旅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他们用我一句也不懂的俄语对我讲话，然后没收了我的护照。德国总领事出面干预时，警察局长出示过那份密件。美国总领事也见到过那份密件。但是当我问起，他却支吾其词。在我等候华盛顿就我的国籍问题作出答复的那一段时间内，我国总领事要我把我认识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列出名单交给他。我回答他，这样做是违背新闻道德的，而且我认为，一个领事官员象警察局密探一样行事也不道德。他勃然大怒。

我被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带枪的宪兵随意出入我的寓所。如果我出门，他们就跟在背后，同时，还有一群窃窃私议的人尾随

① 伍德海(Henry George Wandesforde Woodhead, 1883—1959)，自1902年来华，从事新闻工作约40年，著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多种。——译者

着，显然是想要等着瞧我出丑。到华盛顿证实了我的国籍，我也病倒了，我的那位爱尔兰船长朋友救了我，他把我带回上海。在我准备好重新战斗以前，我不得不在菲律宾休整了三个月。

这起广州事件是伍德海向我发动攻击的真实背景。在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翻出了一家中国人有十二口被共产党人杀害后埋在院子里的案件，据说是为了报复他们的家长，因为他曾是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在投靠蓝衣社后出卖了数十名先前的同志。

这种故事在我看来毫无意义。谋杀，在当时的中国是正常秩序。任何人都有可能由于刺客为了一笔赏金而被杀。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就由于这类勾当而聚敛了大笔家产——更不必说鸦片交易和华人商家所付的“保护费”。杜先生是上海的鸦片大王和法租界一霸。他和另外两个帮会头子① 是盟兄弟，人称“三大亨”。青帮绑架不顺从的富有华人以勒索赎金。和这个帮会有勾结的公共租界华人警探都发了财。有一次，他们在宴席上用毒药毒害法国官员，有几名因而死去，报纸上说是出了“天花”。

对我个人私生活的攻击，我也毫不在乎。英国巡捕头目多年来就和一家只接待付得起“五十块钱一炮”的白人嫖客的高级妓院老鸨姘居，他们曾合拍一张照片，周围簇拥着英国捕房的全体英国巡捕。顺便提一句，那个老鸨有个女儿正在加利福尼亚一家专收上流社会大家闺秀的精修学校，为进入社交界而接受专门教育。

我还记得玛格丽特·山额夫人② 访问上海时，她那一头金棕色的美发曾在一家茶社使得一位衣着高雅的女人走近她身边，问她是否愿意挣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外加一件皮大衣和其他一些精緻漂亮的服装。玛格丽特假装很感兴趣。那位高雅的女人便告诉她，英国舰队就要靠岸了，她这样的女人正配得上舰队司令。

我的罪过可能不小，但我既不是青帮分子，也不是上海巡捕房的巡捕，更不曾为英国舰队效劳服务。我拒绝回答除我的朋友

① 指黄金荣和王晓籁。——译者

② 山额(Margaret Sanger, 1883—1966)夫人，美国节制生育倡导者。—译者

以外任何人提出的有关我个人生活的任何问题。我只用我对伍德海的攻击所作的政治性答复为那些不受欢迎的观点辩护。对我的另一起恶毒攻击迫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军官提出了抗议，那家报纸才宣布争论告一段落。

几天以后，我的秘书冯达给我带来一个神秘的警告，大意是，有个名叫卡尔·斯特劳斯(Karl Strauss)的波罗的海滨德国人要来拜访我。此人和英国的、法国的巡捕以及白俄分子都有联系，他自称是总部设在柏林的一个共产党劳工防护组织国际赤色济难会(International Red Aid)所派的代表。据他说还带来了负责人威利·门曾贝尔格 (Willi Muenzenberg)的两封信。我连济难会的会员都不是，更不必说是职员。对于有关两封信的说法我深为怀疑。许多人都知道卡尔·斯特劳斯是个国际间谍，而这样的伎俩又显得过份幼稚。

然而几天以后，斯特劳斯果真登门来访。他矮而瘦，三十五六岁，头发红里带黄，蓝灰色的眼睛象蛇眼一样冷酷阴森。他递给我两封信，大意是委托他募集赤色济难基金，名义是救济水灾——十分幼稚，我当即告诉他，我和赤色济难会或门曾贝尔格都毫无关系。斯特劳斯说：

“请把我介绍给你在知识界的朋友。听说你认识不少。他们能对我们的运动有所帮助。”

在斯特劳斯的身背后，靠墙放着一根外包皮革，一端灌铅的手杖，这是我这一时期带着防身的武器。我并不回答，迳自朝它走去。他一转身看见了那件东西，二话不说，就一阵风似地溜走了。我一边跑着追赶，一边野声叫骂。

他在一小团落叶和灰尘中失去了踪影。

那天夜晚，我注意到我房前那盏不算小的路灯熄灭了，却有一个男人，显然是个外国人，站在路灯杆下。我发现，和我所在这条马路直接相通的一幢大楼底层，新开了一家“美术商店”，有几个白俄在几堆画纸、颜料、画笔一旁懒洋洋地闲呆着。后来我

还看见，两个中国人在我的住房前走来走去。我凭经验能够辨认，他们是青帮中人物。尽管在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所有的中国大人小孩面貌全都相同”，但是中国的各色人等当然也象其他民族一样各有特征。中国的职业凶手属于特征非常鲜明的一类。

一天早晨，我的仆人从厨房跑来叫我：“小姐！有个中国巡捕在厨房里。他要你的信件，说要把我们关进监牢。”

我大步跨进厨房，这是三家共用的一间厨房；我发现所有的中国仆人都站在那里，有一个穿西服的男人一见我进来就不说话了。我命令他出去。他僵硬、冷酷的面部表情纹丝不变，但他还是过转身，走了出去。我的仆人提出辞工后就立刻离开了。一连两个星期，我有两个朋友，两个男子汉，轮流住在我的寓所。没有他们两人或任何一个的陪伴，我绝不出门。青帮流氓慢步尾随着我们，而从不看一下我们的方向。

当我开始明白那些白俄和青帮流氓要久留在这里，我就到美国法院①去把情况告诉了特别地方检察官萨赛德博士(Dr. George Sellett)。谈到卡尔·斯特劳斯时，他笑得浑身颤抖。他告诉我，上海警察当局曾经三次试图逮捕我而未能成功。由于我住在法租界，他建议我把有关青帮流氓和密探的情况写信告诉法国总领事。

我写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第二天一早，一个可爱的家伙找上门来，他一身雪白，金色的胡髭上涂了腊，手里握着一杆精致的手杖。他用唱歌的高腔自我介绍，说他代表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这天仙似的宝贝往椅背上一靠，唱道：

“夫人，我特来拜访是要奉告：对于您称之为密探和流氓的那些人，我们一无所知！我要推荐一位干练的法国警探给您，无论您去到哪里都可以陪伴在你身边，我们关心的只是您的舒适和安全。”

“我不需要靠你们的密探来防备你们的奸细和刺客！”我发作

① 当时的正式汉语名称是：大美国按察使衙门。——译者

了。“请恢复我房前的路灯照明，请把你们的狗全都叫走。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的丑事，让这个法租界臭得比现在更加臭不可闻！”

“夫人！！那些人不是我们的人，法租界也并非臭不可闻！”

“先生！！那些人是你们的人，法租界里流氓和鸦片和卖淫和白俄刺客和妓女臭气熏天！”

这奇特的怪物用后腿站起身来，鞠躬施礼，高声道别：“再见！夫人，再见！”

他一只手按在屁股上，一摇一摆，风度翩翩地走了。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路灯当晚就亮了，“美术商店”从此关门，那些流氓也不再露面。我又一次明白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多少还能得到一点保障，而中国人却仍然是丝毫也得不到。

过了一阵，上海的日文报纸《日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有关我的文章，真是惊人奇文。据说，我生在密执安州，在安亚伯受过教育，精通多种语言，包括日语、汉语、俄语；我是一名“格柏鸟”①分子，专门和军人睡觉，以刺探机密情报。文章说，这并不难做到，因为我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我在新加坡刺探英国人，在爪哇刺探荷兰人，在菲律宾刺探美国人，目前在上海，刺探所有各种各样的人！

不几天，汪精卫的英文宣传刊物《公论周报》（China Tribune）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爱撒谎！他们所引的证据是我在自传②中就提到，我五岁时揍过妈妈一顿打，原因是我告诉她，风的背上驮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家樱桃树上的红羽毛小鸟也讲故事给我听。

这些故事墨迹未干，一个名叫伯纳德的德国小密探，显然是缺钱花了，竟伏案杜撰，编造了一份“日记”，说他曾到江西苏区走了一遭，并且出席了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天津一家外国报纸

①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的前身。——译者

② 指《大地的女儿》。——译者

开始加以连载。据日记中的一则"揭露",我曾和"一群中国学生"同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我随身带了一整箱威斯忌,到了苏区的首都,便和那些学生同住在一起,夜夜狂饮到酩酊大醉,接下去,这"日记"竟然放肆地说,代表大会开幕时,我一丝不挂地站在主席台上,只戴一顶小红帽,大唱《国际歌》。

诸如此类,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里的人们可能是难以置信的,但在中国,却司空见惯。中国和外国的"合法当局"全都认可。有些报纸为了存活下去的生财之道是,掌握一批有关高级官员私生活的材料,然后扬言,如果有关人士不愿出钱贿赂,就要公之于众。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如数照付。

中国的法律在字面上倒也冠冕堂皇,其价值不过是索贿的砝码。对于分文不名的中国人,毫无公道可言。上海充满了寻求外国法律保护的中国人——然而那种法律所保护的也只是少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外国法律曾经保护过新闻自由,自从蓝衣社在公共租界设置了新闻检查机构,连那样一点保护也荡然无存

许多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为在中国实行"法治"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其中包括林语堂博士和胡适博士,虽然胡博士和我常常意见分歧,但我始终承认,他是竭力主张把人权的观念引进中国的第一批中国带头人物之一。

鲁　迅

——鲁迅五十寿辰祝贺纪实

1930年中,一个炎热的下午,有一对教书的夫妇① 来找我,要我帮忙办两件事,一件是,撰写几篇有关印度的文章并捐一笔钱给新创刊的《大道》,这是一份专门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的杂志②;另一件,租一家外国人开的小餐馆,以备举行招待会和

① 为萧绍明(即萧秋斯)和龚咏裳。译者

② 上海地下党领导出版之刊物,萧绍明任该刊编辑;史沫特莱与印度被人民解运动因缘极深,见"往事一瞥"。译者

设宴庆祝鲁迅五十岁诞辰。鲁迅，伟大的作家，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高尔基”，而我以为，他实在是中国的伏尔泰。①

第一件，我爽快地答应了，但是，第二件却充满了危险，因为要邀请上百名代表“危险思想”界的男女出席。我的朋友要我放心，所有的来宾都将只以口头通知邀请，而且誓必守口如瓶，在通往餐馆的各条路口，还会派人“放哨”。

祝寿那天下午，②我和我的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人餐馆的花园门口。从我们的位置上可以把客人们必经的那条长街看得一清二楚。我看见前方路口有一个穿长衫的男人表面上象在等候公共汽车，还有一个则坐在近旁一家门口的台阶上。

鲁迅，由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陪同，来得很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③，而他竟成了我在中国那些年月生活中对我最有影响的因素之一。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和一双中国软底布鞋。头上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头发象一把刷子。面部轮廓和一般中国人相似，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的表情最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不谙英语，却颇能说几句德语。我们是用德语交谈的。他的风度、谈吐和每一举手投足，都散发出绝对完整人格的和谐与魅力，我突然发觉我象个傻瓜一样笨拙而粗鲁。

宾客的人流几乎随即来到。鲁迅已向花园里面走去。我一再回过头去看他，被他那双以某种姿势举起的瘦削的手所深深吸引。

随着客人们通过，我的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中间有作家，美术家、教授、大学生、演员、记者、研究工作者，甚至还有两名精神贵族圈内的人物。这两位的来到，并不是因为和鲁迅在信念上志同道合，而是由于尊敬他的正直和勇气，以及学术上的成就。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作家。——译者

② 鲁迅生日是阴历八月初三，应为阳历9月25日。这次祝寿是在9月17日。——译者

③ 实际上的初次会见应为1929年12月27日，见《鲁迅日记》。——译者

这是一次色彩缤纷、令人兴奋的聚会——集合了一场文化革命的各路先驱人物。一群，衣着寒酸，显然处于半饥饿状态，据他们介绍，是一个新成立的现代艺术剧团的代表，①他们试图在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迈尔夫人的扇子》（当时译为《少奶奶的扇子》——译者）之间塞进一些社会问题剧去。一群，显得比较阔绰，是洪深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学生②。他们已经上演过易卜生的几个剧本和那位教授自己写的一两个剧本。这位教授还是中国最早几家电影制片公司之一的导演。戏剧界的第三一群③，有年轻的左翼演员、作家、翻译家，他们演出过罗曼·罗兰、厄普顿·辛克莱、高尔基和雷马克的一些剧本。后来他们上演《卡门》，演过第三场就遭到了警察袭击，有些人被捕，戏也被迫停演。观众席中的密探不喜欢唐·何塞刺死卡门的最后一幕；卡门在把指环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所说的台词，使他们想起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

从我在门口所站的位置，我又看见几个人在走过来。一个瘦削的高个子青年，走得很快，不断向背后张望着；他显然是个学生，当他从我身边走过以后，我的朋友悄声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地下报纸《上海报》的编辑，④这张报纸正在这座城市里进行着一种新闻游击战。不久，又来了一个人，一身西服满是皱纹，头发蓬松杂乱。他关了几个月，刚从监狱里出来。他曾被怀疑为中国赤色济难会的代表；指控属实，但是到头来钱能通神。他家里人花了一大笔家产买通了逮捕他的官员。

花园已经挤满，已不见客人继续到来，但是我的朋友和我继续站岗。夜幕开始降临，有一半客人纷纷离去。这时有人来接替

① 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曾上演田汉译的《莎乐美》和下文提到的《卡门》。——译者

② 复旦大学的复旦剧社曾上演《娜拉》。——译者

③ 上海艺术剧社，社长为郑伯奇，其他领导人有夏衍、叶沉（沈西苓）、许幸之等。——译者

④ 这位编辑是李伟森（即李求实），他于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在龙华遇害。——译者

我们放哨，我们走进了餐馆，来到别的客人一起。

宴会过后，演说开始，我的一个朋友翻译给我听。餐馆的荷兰店主不懂中国话，倒并不使我们担心，但是中国侍者却站在一旁聚精汇神地听着。当那一头乱发的人报告狱中状况时，我们注视着那些仆役的每一点动静，继他之后发言的是那位《上海报》编辑，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有关中国红军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的真实报道：那些起义农民在和地主进行斗争之后便涌入红军，象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

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妇女①接着谈起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必要。她在结束谈话时，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文化总同盟的发起组织——的保护人和“导师”。

自始至终，鲁迅仔细地听着，及时把注意力转向每一个新的发言人，他的食指则一直沿着茶杯边缘移动。当所有的发言完毕，他站起来，安详地讲话，叙述他所经历的长达半世纪之久的一段思想动乱的历史——中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历史。

他出生在满清农村一个贫穷的书香门第，在辛亥革命前那种早期新思潮的渗入非常缓慢的封建环境中长大。由于太穷，无法到西方国家留学，他只得前往当时同情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日本。他曾学习现代医学，同时，阅读托尔斯泰著作的最初一批日文译本。托尔斯泰引导他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使他认识到现代文学的力量。

他回国后曾经行医②，但是，象许多西方国家医务人员一样，不久就意识到多数疾患和病痛的根源都在于贫困和与贫困相伴随的愚昧。唯独有钱人才能治得起病。在俄罗斯古典作家影响下，他转而以文学为武器搏击封建思想，开始写一些俄罗斯古典

① 女作家冯铿，1931年2月7日与李伟森和柔石等人同时被杀害。——译者

② 鲁迅回国后即投身于教育界，最初教过生理、化学、生物学，但从未行医。——译者

风格的短篇小说，渐而完全放弃了医务。中国文化复兴时期①，他正在新思潮发祥地北京担任文学教授。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他学习了德语和俄语，翻译了不少俄罗斯的小说和文章。他说，他的目的是要把现代社会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他同时还搜集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绘画以及版画样品，并且为年轻美术家们出版了好几种这一类画册。

他说，现在有人请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轻朋友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可是要他自封为无产阶级作家是幼稚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的生活中。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写出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阅历，而不是理论。

尽管如此，他仍将继续把西方优秀的文学和美术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也就是象他们所请求的那样，充当他们的导师。至于保护，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问题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权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作为"导师"，他奉劝受过教育的青年要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从生活中撷取素材，学习西方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以借鉴其形式。

聚会结束时，一个青年俯身向我摇摇头，愁眉苦脸地说：

"令人失望，不是么？我是指鲁迅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真教青年人泄气。"

我终生难移的对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厌恶又油然而生。中国知识分子从不接触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脱离实际经验的一种专业。照他们理解，甚至"青年"一词也仅指学生，他们对工人和农民所持的是一种有优越感的、虽也是同情的态度。他们创作的"无产阶级文学"，到那时为止，显得矫揉造作，是俄国小说的拙劣模仿。

对这位年轻的批评者，我说，我完全同意鲁迅。

① 指"五四"运动。——译者

我的生活和鲁迅及其最亲密的同行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的生活紧密地联结到了一起。我们三人一道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的版画集；我们一道为西方国家报刊撰写了大多数抗议反动派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告。茅盾和我常在某条街的拐角处会合，在对鲁迅所住那条街仔细观察后，再到他家里去和他一同消磨一个夜晚。我们常从饭店订一桌晚餐，作几个小时的交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但都认为“能够帮助和支持那些为了解放穷苦人民”而战斗和牺牲的人们是我们的荣幸。

鲁迅享有自古以来就受人尊敬的荣誉地位，他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师表”，也就是“导师”。他们中间存在着许多小集团，每一个小集团都力图把他争取到自己一边或自己的“路线”上来。但是他态度超然，在他们经常变动的排列组合中拒不为一方或另一方所用。他兼听不同的意见，一视同仁地讨论他们的问题、评论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以鼓励。他的名字在他们所办为各种刊物上总是高居首位。

他常同我谈起要根据他自身的经历写一部历史小说的计划。但是他的国家深陷其中并为之动荡的社会反动看来使他无暇顾及。他对“屠杀无辜”和侵犯人权的暴行深恶痛绝，以至不久就把他的笔仅仅用作政治批判的武器——使它成了一柄真正的匕首。

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似乎是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最为复杂难解的一个。他的有些政治性“杂文”要译为英语几乎不可能，因为，在不能公开批判反动势力的条件下，他的这类文章常引用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而成了隐喻和典故的镶嵌艺术品。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懂得，他是在把现今的暴政比作古代的暴政。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他把一种又一种文学杂志介绍给公众，却只能眼看着它们逐一遭到查封。这类介绍文章质朴而凝练，象一幅幅壮丽的旗帜迎风飘

扬。他认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人类能够有所成就的要素。他的文风迥然独异，繁多的化名也未能给他以荫蔽，检查官开始把他的文章删削得支离破碎，以至常常不知所云。和他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和编辑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他的年龄和声望保护着他，使他免于被捕。不少年，只有日本的左翼知识界能够出版他未经删削的作品。在日本知识界，他是最著名、最受尊敬的中国作家。

他那些追随者的失踪和处死，象腐蚀性的毒气摧残着鲁迅的身心。他开始生病了，有时严重得不能起床。他觉得他有心力衰竭的趋势，因而同意接受上海最好的外国医师的诊治。那位医师作过检查之后，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将死于肺病，只有在凉爽、干燥的气候中长期休养才能制止病情恶化。这位医师又加上一句："但是，他当然不会接受我的劝告。这种古板守旧、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是不相信现代医学的！"

鲁迅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倒不是因为古板守旧、愚昧无知。"你们要我在别人战斗和牺牲的时候躺上一年？"他以责难的口吻发问。我们答复了他的反对意见之后，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的贫困。但是当我们表示愿意募集所需费用时，他仍然拒绝！高尔基邀请他作为他的客人到苏联去休养一年，但他不愿。他说国民党会对全中国叫嚣他接受"莫斯科的卢布。"

"不去也照样能说！"我争辩道。

"他们不敢，"他高声嚷道，"谁都知道他们说谎！何况，中国需要我，我不能走。"

我们恳求而终于无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走了之的！"他说，"总得有人坚持战斗。"

1930年年底，我到菲律宾去休息了一个时期。成行前夕，鲁迅和三名青年作家来看我，一同消磨了一个晚上。有一位是教师出身的柔石，他也许算得是鲁迅那些学生和朋友中最有才华也最为他喜爱的一个。1931年3月我返回上海时，我的秘书冯达接

我时告诉我，有二十四名年轻作家、演员、美术家被捕并已被杀①。他们于2月21日被提出监狱，被迫挖好了各自的坟坑之后便被枪杀，有些人是被活埋的。其中就有柔石。

我急忙赶到鲁迅的寓所，发现他正在书房里，面色阴沉，没有刮胡子，头发蓬乱，两颊深陷，眼睛里闪射着灼灼逼人的光焰。他的语声充满骇人的仇恨。

“这是我那天夜里写成的一篇东西”，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份以他那种碑刻似的笔体写成的稿件，“我叫它《写于深夜里》，请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②

他说明大意之后，我提醒他，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他就会被杀害。

“有关系么？”他激奋地回答，“总得有人说话吧！”

我离开之前，他和我一同就作家、美术家惨遭屠杀事件草拟了一份告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宣言书。③我把它带到茅盾处，他修改后帮助我译成了英文。结果是，五十多名美国一流作家发表了第一份外国人谴责杀害中国作家的抗议书。国民党得知西方世界有所非议，颇为吃惊。

鲁迅的文章《写于深夜里》甚至在国外也从未能够发表，此刻尚在我的手里。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一篇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是充满激情的呐喊，写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黑夜里。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

① 现已查明，为二十三名。——译者

② 这里的篇名记错，《写于深夜里》一文作于1936年4月7日。——译者

③ 当为《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译文见《新群众》第七卷第一期（1936年6月）。——译者

更猛烈。

所谓“荒野里的成堆纸灰”，指的是中国人埋葬死者时为亡灵烧纸的习俗。他接下去写到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画面是一位憔悴的母亲，双手托着一个垂死的婴儿——普通人民献给死神的祭品——他把那婴儿看成是二十四名死者的象征。他继续写道：

>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来还传述开去。在我青年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现在看来，以往的帝王许可这样做〕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量放死囚开口……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

然后，他把匕首的锋芒直指自鸣得意的铁堂，此人在林语堂博士编的杂志《宇宙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②竟然厚颜无耻地声称，对死囚喝采或同情可能是一种崇高的理想，然而对社会无益，因为这意味着不承认成功的英雄。鲁迅以辛辣的讽刺对此作出回答后，在谈到这次屠杀的残酷时，他写道：

> 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

① 〔 〕号内文字与原作不同，据译文译出。——译者

② 铁堂：《不以成败论英雄》，见《宇宙风》第十三期(1936年3月)。——译者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文章结尾处，他附了一封来信。这封信很象是对《地狱》篇的抄袭之作，却出自一名十八岁囚徒的手笔。他是和另外两名学生一道从上海一所大学里被拖走的，罪名是从事赤化活动，因为他们都属于鲁迅所创办的一个木刻研究团体。①罪证是一幅卢纳察尔斯基的木刻像。根据一种异想天开的离奇推论，木刻被强加上了共产党的标记。政府不敢逮捕鲁迅，就逮捕了他的学生。

这孩子的狱中来信，以“敬爱的先生”开头，叙述了他从被捕那一天起直到他买通一名看守把这封信带给鲁迅那一天止的他的客西马尼故事②。信中特别提到对一个被指控为红军军长的农民所用的酷刑：他的手指甲被钉进了钉子，他一声不响地跪着，面色如土，每一只手指鲜血淋漓。

“我敬爱的先生，当我想到他时，我的心渐渐地冰凉了起来，”这封信在哭诉。

“确实是深夜，”我说。

人 的 权 利

——民权保障同盟的故事

中国知识界名流有时对我谈起向中国引进自由观念，至少是引进一些基本自由观念的迫切必要性。不少是我们不能指望实现的；但是如果能够争取到某种程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对政治犯

① 囚徒是版画家曹白，团体是：木铃木刻研究社。——译者

② 据《圣经》，客西马尼在耶路撒冷附近，耶稣被出卖而被捕的地方。“客西马尼的故事”，即被出卖和被捕的经历。——译者

的公开审讯，或是停止严刑逼供和秘密杀人，改善一下监狱条件，收获也就颇为可贵了。

中国每一个名实相符的一流学者，都喜欢议论这类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这种文章，是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博士于1930年在上海一家文学刊物《新月》上发表的一篇。《新月》是文学界一个精神贵族集团主办的一份杂志，那篇文章为实现尊重人权的"法治"提出了有节制、有道理的论据。

另一位比较活泼而尖刻的自由派学者是上海的林语堂博士。他为鼓吹一种足以改变不法之徒横行无忌状况的法律制度而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由于不能为公开争取改革挺身战斗而不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林博士成了官僚政治的辛辣讽刺文章作者，这种特点在他为上海一家杂志所主持的"小评论"栏内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一次，我对他说，他使我想起薄伽丘①，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作家，由于不能直接抨击教皇的教权统治，而对个别神父和僧侣的道德败坏丑恶行径加以讽刺。林在学术界的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处于胡适博士和革命的鲁迅之间。鲁迅批评林博士的方法和态度对青年人产生不良影响，因为会使他们把应该严肃对待的政治问题当作幽默资料。而他们，由于缺乏林博士的幽默才华，会写出一些苍白而平庸的文章，把凶残的血腥镇压化为一笑。

杨铨先生，虽然更确切地说，是一位组织者、行政官员——兼政治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但是，也属于这一集团。他和别人不同，尽管也崇尚自由主义，却是个国民党党员。他在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胡适博士、林语堂博士和其他数十名学者都是这个研究机构的成员。院长蔡元培博士是一位年长的学者，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而且，也许还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声望的教育家。1932年中，在这些学者协助下，中国第一个民权保障同盟成立

①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作家，其名著为《十日谈》。——译者

了。蔡元培博士和杨铨先生虽然都是国民党党员，却分别担任了同盟的付会长和总干事。孙逸仙夫人当选为会长；林语堂博士和鲁迅都是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两名外国人，就是伊罗生(Harold Issacs)先生——一位年轻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我本人。林博士、伊罗生和我负责全部英语出版、通讯事宜。

我们的同盟参与了三次争取民权的重大活动。第一次是为了一名中国新闻工作者在离上海不远的镇江被捕和秘密折磨致死。省主席顾祝同将军就住在镇江。这位新闻工作者揭露了据说是和顾将军有牵连的鸦片交易和其他腐败行为。他被暗中杀害的事件激怒了上海新闻界，我们的同盟和他们一道展开了一场英勇的斗争。我们要求公开调查这一案件，并撤销顾将军的省主席职务。

顾将军发表了一项声明，指控这位报人是共产党人；"证据"是，五年前，即1927年，此人曾试图组织镇江的人力车夫。没有一份租界外的中国报纸敢于提到这起案件，但是上海的中国报刊和我们的同盟坚持不懈。

顾将军邀请我们的会长和总干事赴宴，"磋商"，而在遭到拒绝之后，南京的蓝衣社分子就发出了恐吓信，警告他们不得继续活动。国民党的一个委员会秘密调查了这一案件，甚至对死者作了开棺验尸，但是调查结果却秘而不宣。杨先生是一名国民党要员，他告诉我，调查时发现，死者的一条腿已经完全粉碎。

由于诡秘莫测的鬼蜮伎俩，这一起案件被压了下去，不久，只剩下一段辛酸的回忆。我们一事无成，顾将军照旧当省主席。

我们同盟的又一次行动，是试图为五名被控为共产党分子的工会组织者公开辩护。我们甚至没有要求实行陪审制审讯，因为在中国，尚不知陪审团为何物，要求实行陪审就无异于要求得到天上的月亮。有两名律师曾自愿出庭辩护，其中一名第一次出庭后就由于接到警告而宣布退出，另一名则在蓝衣社分子扬言要砸烂他的事务所并把他杀死时仓惶逃走。我们又一次失败，完全而且

彻底。五名囚徒，只有一名得救，他母亲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国民党员，设法使他获得了释放。①

第三次，涉及到1933年春有关女作家丁玲的一起案件。丁玲是我的朋友，她和另一名作家潘[梓]年一道被蓝衣社人绑架后偷偷押送到了南京。我们的总干事杨铨对这起案件极为认真，他向公众发表了一项文告。

几天以后，四个蓝衣社分子把他枪杀在中央研究院的台阶上。

我们的民权保障同盟就此落得了一个极不光彩的下场——为恐怖所征服。

但是，一个自由派名流杨铨惨遭暗杀和一个著名女作家丁玲之被劫持，却形成了举世瞩目的问题。美国作家、妇女团体和知识界人士纷纷抗议，总算救了丁玲一命，而杨先生是回生无术了。

杨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中国的革命历史和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加上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受的教育，使他成了一个信念明确的民主派爱国人士。他并不喜欢共产党内的那些人，但是他反对进行反共的恐怖活动和内战。我对中国古老社会的许多知识是他给了我的，曾经是他和抒情诗人徐志摩常常带我去看旧式的京剧。我们三人常常一同访友或是到茶馆、寺庙去，在友好的交谈中度过一个个夜晚。杨先生轻松而有风趣的谈话，是我生活中少有的欢快的少有的源泉。我这两位朋友，以惊人的无拘无束态度谈论他们自己和朋友们的桃色事件，使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们兴致勃勃的谈话还不断由于有声有色地描绘一些文化名流为了爱情和爱吃醋的婚姻伴侣不胜苦恼的情景而显得更为活泼。杨先生曾把我那本《大地的女儿》译成中文，② 并且写文章、发表演说，把他介绍给公众。但是我有时发现，他更感兴趣的是我那本书里背离传统道德规范的描写，而不是它所传达的有关社会问题的

① 这一名，是廖承志，母亲是何香凝。——译者

② 译者为林宝生，杨铨为译本写了序，但是那个译本只译出了原作的五分之三。——译者

见解。

徐先生，那位抒情诗人，已经由于一次飞机失事死去。杨铨，为了争取公民自由权利而成了献出生命的烈士。我的朋友一个个倒下去，我却依旧安然无恙；我有时觉得，我似乎是在依靠别人付出的代价活着。

如果说我也付出了代价，和中国人所付出的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聘用我的那家德国报纸终止了我们之间的合约以后，我不得不仗着有限一点积蓄维持生活。我又着手写一本新书。美国领事馆似乎了解到我经济支绌：有一次，一位领事官员邀请我共进午餐，他要我就共产党的人员、活动和计划写一份秘密报告给他。他不顾我的拒绝而继续指点我：可以每天打点小报告，也可以掌握了充分的材料之后再写。他出于礼貌的考虑而未能直率地建议我当间谍；只是说，我们的国务院应该对真相心中有数。我不禁怀疑，目的究竟是什么。有一位驻华领事官员曾经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编写了一份不带偏见的研究报告而因此已被叫作“赤色分子”，并被召回华盛顿去接受讯问。我看到了另一种领事报告则在提到中国共产党人时总是称之为“歹徒”。

那位领事官员和我离开餐馆后，在街上遇到了他的上司。我的东道主就直接当着我的面对那另一位说：“她说，她一无所知！”

他们放声大笑。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我搜集到的任何一点有关于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都向美国大众公布。这类材料可能不完整，也可能被认为片面，那是不用说的。但是写另一个片面的人已经够多，却还有许多人继续在写。我要写普通人民、写士兵和知识分子——写那些为了从任何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奋斗的人。

汽车：NO. 1469

——丁玲、潘梓年被捕和应修人牺牲目击记

1933年春的一天，一位姓李的中国工程师告诉我，他要到北

平去会见正在满洲对日本人作战的东北义勇军的代表。他准备随他们回满洲去。而在北平期间，他需要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他要我帮忙。我给一位外国朋友写了一封信，要他在某一家外国旅馆和李见面。

十天过后，我的外国朋友来信说，他曾一再到那个约定的见面地点去，但是李并没有出现。我立刻断定，李已被捕。我通知了他的妻子。她和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及时搬了家。我的住处就成了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熟人地址。

我正准备离开中国到苏联一家疗养院去医治心脏病，登船前夕，我的电话铃响了，我听到了那位工程师的声音，紧张而激动。他告诉我，他刚出"医院"，想要立刻和我见面。

我一边等着一边在想，他会不会已经是个特务，他提到"医院"，这意思是说他确实被捕过。很少有人能从逮捕他们的那些人手心里逃出来，即使逃出来了也很少能得到信任。但是我凭直觉意识到，即使他不曾是我亲密的朋友，我也能完全信任他。这种直觉常常指导我对一个中国人作出判断。正是这种直觉，使我解聘了我的私人秘书冯达，并使我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和女作家丁玲的密切关系。

李来到时，衣衫凌乱，焦急不安，脸上流露出极度紧张的神色。

"我知道，你可能会以为我已经是个特务"，他说，"但是，请听我先把我的经历说完。"

他隔着写字台在我对面坐下来，开始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

"我乘坐的火车接近北平时，有两个人上了车，他们抓住我，逼我跟他们走。他们说我被捕了，但是无论是当时或是过后，他们都没有向我出示任何正式凭据。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他原先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已经投靠了蓝衣社，正在帮助蓝衣社分子绑架他往日的同志。

"这两个人把我带进北平一座屋子，一定要我交代此行的目

的地，还要我说出我伙伴的姓名和住址。我一口咬定，我已经在几个月以前脱离了共产党，现在是到满洲去参加义勇军。当然，参加义勇军，在他们看来，象参加共产党一样坏。

“由于吃不准我的情况，他们又把我带回上海，而且要我交代我上海熟人的姓名和住址。到站时，有一个密探坐一辆汽车来接我们。我留心看了一眼汽车牌照，号码是：1469。这个密探也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成了蓝衣社的特务。

“我们的汽车开到南市和法租界交界处一家肮脏的小客栈，‘东恒记’。这是一个帮会巢穴。他们把男男女女带到这里来用刑逼供，直到这些人承认是共产党员才罢休。然后，再把这些人交给警察。”

“为什么他们不把那些人直接交给警察呢？”我问。

“我也不清楚，我想，也许是由于抓到一名共产党员就可以领取一笔奖金，所以他们才逼迫那些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看见许多帮会分子来来往往。有些房间里，他们在赌博、吵架、殴斗。我从他们的言谈中听出，他们是杜月笙的门徒。杜是青帮头子，也是一年前蒋总司令镇压共产党人时指定的上海地区代理人。自从那一事件往后，整个下流社会对我们就变得放肆起来了。

“后来，那几个特务给我松了绑，逼我去看他们用刑逼供。有一对看来象是穷知识分子的夫妻，被一群帮会歹徒围在中间。这一对男女不承认他们是共产党员。特务们让我走到能让他们看清楚我面孔的地方。他们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为了迫使他们招供，特务们就让他们坐飞机。

“坐飞机是一种残酷的刑罚。特务们把他们的双手反捆在背后，然后用一根绳子拴住捆在一起的手，把他们悬空吊在屋樑上。那女人几乎立刻就晕了过去。一个青帮歹徒拿一把木槌，敲打那个吊在半空来回幌动的男人胸部。一个人象那样吊起来，胸部就绷紧得象一面鼓。这男人发出听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开始从嘴里喷出鲜血，接着就不省人事了。歹徒们放下那一对男

女，把他们送出去，又带进来一个想要和他们厮拼的男人。他们把他摔倒在地，坐在他胸脯上，给他鼻孔里插上橡胶管，再通过管子灌一种闻起来象是粪便和汽油相混的污秽液体。他的腹部不久便膨胀起来。他们又坐在腹部，使得灌进去的东西喷射出来。然后再灌，再让他呕吐。到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了，他们就把他拖出门去。

“特务们强迫我看他，也强迫他看我。当然，他见到我和折磨他的人们站在一起，也许会认为我是他们的同伙。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叙述。“为什么你没有象那些人一样受刑？”

“蓝衣社对知识界人物采取了一种新的做法”，他沉痛地回答。“他们会杀死一个工人或农民，因为工人或农民除了革命别无出路。但是蓝衣社人知道知识分子有可能动摇，有可能投靠他们，指望在政府或是在蓝衣社内谋得一官半职。如果我们不叛变，他们再收拾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其他囚徒能够认出我们的地方去，使我们即使逃了出去也得不到任何一个同志的信任。有时，他们让被捕的知识分子陪他们到各个监狱去，让那些政治犯能够看见他们，而再也不相信他们。”

接下去，他又回过头去叙述自己的经历。

“特务们扬言，会象对待其他犯人一样对待我。以此作为威协，命令我写信要我的朋友到公共租界的大东饭店来和我会面。我希望能够找机会逃走，就假装着同意了。我写了两张使用假名、假地址的明信片，他们就带我到大东去，他们租了和我相邻的一间房间，锁上了我的房门。

“第一夜，他们对我监视得很严，我毫无办法。第二夜，听见了他们的鼾声之后，我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口，打算顺着排水管从三楼滑到街上去。正当我伸出一只脚去，就听到有些响动，往下一看，只见一个人正沿着排水管往上爬！他攀着我正下方的窗沿，鬼鬼祟祟撬窗户。我这才明白，他原来是个贼。他还没有

来得及爬进房间，就有一个女人叫喊起来。他只得立刻缩回身子，沿着排水管滑了下去。这就引起了很大一阵骚乱——那一夜我没有能够逃成。

“没有人照明信片上的要求来看我。但是我对那两个特务说，多半是我的熟人搬家了，也可能就是没有人愿来见我。他们非常恼火，又把我带回他们的巢穴，并且说，他们有办法使我服贴。正当我们进门，两个帮会分子带来一个衣着考究、眉清目秀的男人。我们紧跟着走了进去，我又被迫和他打了一个照面。我从不曾见过他。他吓成那样，以至当他们只是扬言要动刑，他就开始出卖他的同志了。

“这个可怜虫坐了下来，浑身发抖，说女作家丁玲那天晚上要在昆山路她的家里和帮助她同编一个文学杂志①的两个男作家会面。他断言丁玲不是共产党员，然而确实是个左翼分子。”

“等等！”我高叫了一声。“请把那个人的相貌描写一下。”

他描绘出来的是我先前的秘书，冯达。我深为激动，在室内来回踱步，然后才又听他说下去。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工程师继续说道，“那两个蓝衣社特务和一名司机把我推进那同一辆NO.1469号汽车，朝着那懦夫告诉他们的地址开去。在那个门牌的四层楼上一个门口，来开门的是一个女的，她一定就是丁玲。她一句话没有说，但是当那个司机抓住她用绳子捆住，又逼她下楼时，她的脸色煞白。

“与此同时，我被推进了房间，看见了两个男人。一个高而瘦，另一个矮些，此刻脸色苍白②。那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那高而瘦的男人，背向敞开的窗口站着，当一个特务向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开始搏斗。但是他体质羸弱，撕打到激烈时，他急转身跳出窗口，——坠下四层楼去。那特务惊叫了一声，就急忙跑了出去，去收拾那尸体——也许是为了免得又一起发生在租界里的

① “左联”的《北斗》。——译者

② 那高而瘦的是应修人（丁九），较矮的一个是潘梓年。——译者

绑架丑闻被人们张扬开去。

“房间里那较矮的一个男人也开始了搏斗。我提起一只凳子，砸在那剩下的一个特务头上。正当他身子打幌，立足不稳，我转身飞跑下楼，沿街跑去，混进了四川路上拥挤的人流。我从一家店铺打电话给我妻子，没有人接。我只好又打电话找你。”

稍停片刻，他又接着说，“这就是我的经历。当然，你不会相信。谁也不会。太离奇了。但是我可以起誓，这是真的。”

我们相对无言，默默坐了一会。最后，他又开了口，“请把我对你说的一切都告诉我的妻子。我暂时住在我熟悉的一家下等客栈里，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让同志们监视我的行动。”

“我对你的妻子和你的同志一无所知”，我回答他，“我收集各色各样的故事。你的故事很有趣。”

他疲惫地低下头去，一言不发地坐着。然而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我知道，就象一个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是否在撒谎。

“把你住的那家客栈的字号和地址给我写下来”，我说。

他写完，沉思片刻，说，“请这样告诉她：从今夜算起的一星期以后，也是这个时间，我会站在静安寺路的庙门前，左手拿一份西文报纸。如果同志们信得过我，就让一个同志在我朝着一个僻静的街道走过去的时候跟着我。他应该走近我的身边，问我是否看到了四匹唐马。我会回答，只看到三匹。”

“如果他们信不过呢？”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那就由着他们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吧。”

“我一点钱也没有了”，他接着说。

我给了几张钞票给他，他很快离开了我的寓所。

几个星期以后，苏联高加索一家疗养院，我的房间里。我打开一些来自上海的近期英文报纸。较早的几份报道了我的朋友杨铨被暗杀以及丁玲和一名男作家潘〔梓〕年失踪的详情，但是没有一个字提及从丁玲家窗口跳下楼去的那个男人。

由于杨铨地位显要，对他的被刺身亡有必要作出某种交代，于是法国捕房拘捕了行刺暴徒中的两名。这两名暴徒都在试图逃跑时受伤。其中一名临死前供出了实情。但是捕房宣布，他们不能披露应对这一凶杀案负责的主谋，因为这将牵涉到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官员。

此后不久，“又一起共党暴行”这样的惊人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指的是对一名中国特务的暗杀。他原先也是共产党员，“为了洗刷自己而追捕共党匪徒直到深入其巢穴”。正当他的汽车从公共租界一条弄堂内的“甜心”妓院门前驶过时，他和司机被同时击毙。捕房拒绝透露任何具体情况，只是说：疑为共党复仇之举。所乘汽车是大型的，据报道，牌照号码是NO.1469。

过了两年，我环游世界之后又回到上海，一天，我的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那位李工程师的幽灵倚在我的门框上。他面容枯槁毫无血色，用病恹恹的眼光盯着我。我把他领进我的客房时，他浑身颤抖，不停地摇幌着他的头。我帮他脱去外衣，让他躺在床上。他躺下后非常安静，好象就要死去。我请来一位医生。这位工程师患有疟疾，心脏扩大，扁桃腺发炎，龋齿，贫血，还有肠道寄生虫。

他卧床好几星期，常常凝视着天花板，默默无语。但是当他的健康有所好转时，他开始说话了。我首先问他两年前离开我的寓所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

“过了一星期”，他说，“我站在静安寺路那座庙门口，当我向别处走动时，有一个男人跟在我后面，他赶上来问我：

“‘你见到过四匹唐马吗’？

“‘不是四匹，是三匹’，我回答他。我们交谈起来，他为我前往江西苏维埃区作了安排，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迁到了那里。我坐轮船从海上到达南方的汕头，那里有一个人把我带上一条内河小船。船家对我毫不注意，送我到一个偏僻的村落后，把

我交给了另一个男人，这人又领我往北走，进入了福建山区。”

李从福建的汀州开始转向正西，就来到了苏维埃区域的首都瑞金。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审查，他被派去负责一个红军兵工厂。由于受过训练的技术人才奇缺，后来，从军火制造直到为红军医院开办肥皂和药品工厂，几乎什么事情都要找他。他的谈话涉及到苏维埃区各个活动领域——医务，教育，行政管理，开矿和植被，报纸和书籍。

谈话的一部分接触到国民党为消灭红军而发动的几次重大的战役，和使红军主力遭到粉碎性打击的广昌之战。第一仗就使红军损失了四千人，而当红军奉命集结准备长征时，不得不留下了两万名伤员。1934年9月，十万人出发，但是只有最高层的领导人才知道前进的行动计划，他是其中一个。他埋藏好他那兵工厂的机器，带着一批技术熟练的工人，依照命令集合，然后，秘密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国民党军队遵照一名德国国防军军官塞克特将军（General von Seekt）拟订的方案作战同时，另一个汉名为李德的德国人在为红军制定终于导致失败的阵地战计划。他的主张压倒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原文如此——译者）毛泽东的意见，而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游击战专家……

工程师的叙述把我带到了长征路上，经历了一场史册罕见的斗战——翻山、涉水，出入于战火，并且通过千百件琐碎而生动的细节描绘引导我深入普通人民的生活……

他还谈到了军阀的狡猾、残酷：

“我们的部队通过广西北部山区时，地方上当官的就派人到各村敲锣喊叫：土匪来了！农民逃走了。我们从一座座阒无一人的村落中走过，从不骚扰一户人家。我染上了疟疾，和许许多多伤员一道掉了队。我们有时会看见一些以为我们的部队已经过完了的官兵和警察回到村子里来焚烧或洗劫那些农民的家舍，而当农民回村时，又告诉他们说，这是红军作的孽，村民就因此而仇恨我们。”

他谈到他们的诡诈："有些士兵或警察会伏击我们的伤病员。他们的特务会穿上我们死去的同志身上的服装混在我们中间搜集情报，我就打死过这样一个人。"

他谈到农民的贫困："贵州的人民是多么穷！有一次，我走进一家农民的茅屋，发现一个老太太畏缩在一个角落里。她跑出去抓住她仅有的一只小鸡，胆战心惊地把它送给我。我付钱给她时，她流下了眼泪。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他谈到可怕的背叛："我们来到云南北部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学教员领着一群农民前来欢迎。这个教员当上了游击队长，因为我正患疟疾，部队就命令我留下来当他的政治指导员。我们的部队通过以后，国民党军队迫近了，这个教员又象欢迎红军一样去欢迎他们！我只得赶紧逃命。"

他还谈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两种极端现象："我再往北走，遇到了国民党士兵。他们把我剥得精光。我来到一座尼姑庵，尼姑们倒给了我一件长袍，还借给我七十块钱，让我做路费回上海。我本以为我会死在路上。要不是在电话薄上找到了你的名字，我想，我一定已经死了，因为我的朋友们全都四分五散在各个地方。"

有一次他说："从两年前离开你那一夜起，我就开始为你记日记，但是出发长征时，我把它和机器一道埋藏起来了。"

当他又有能力远行时，他就到苏联去了。他去继续治病，也是去学习。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有一位负伤的红军指挥官在我家里住了一个时期，所以我能有机会写下另一个中国人跨越将近半个世纪的史诗般经历。他就是红军草创时期第十军的军长周建屏。和他同时担任这个军政治领导人的，是这支队伍的组织者方志敏。

我从未见过方，然而在所有红军指挥官的死讯中，他于1933

年1月在南昌处决的消息使我感触最深，①也许是一个署名为“列克斯·德利斯柯”(Rex Driscoll)的外国记者报道那一事件所采取的令人憎恶的方式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德利斯柯其人，以后也没有再见到这个名字，很可能是某个传教士为了发表这几篇报道所使用的化名。方在终于导致他那一小支队伍覆灭的一次战斗中被俘的消息，曾经在统治阶级中——外国的和中国的全都一样——掀起一阵欣喜的热浪。一种幸灾乐祸、心满意足的情绪贯穿德利斯柯的全部报道。但是他所记述的事实本身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方被关在一只兽笼里在南昌游街示众，有人以“国王”这种称呼嘲弄他，因为他坐在笼内，高傲而庄严。当他被带到一个群众集会上示众时，他号召人民起来战斗，争取解放。当他被带去赴死时，他呼吁他的刽子手们参加革命。

周在谈到方的事迹时，不事渲染，平铺直叙。但是从那些实事中却升起了一个伟大组织者的形象。他的死是中国难以弥补的损失。方对于普通人民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因为他的每一行动都显然符合他们的利益。他创办了一批小学和医院，举行过为了改进农事的农业展览，设立了一所红军军事学校，和一批扫除成人文盲的平民夜校，两座较大的兵工厂和地雷制造所，以取代农民那些难以计数的军火土造作坊。

周建屏身材矮小，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他出身于广西（应为江西——译者）贫农家庭，五岁上就死了父亲，靠母亲洗衣维持生活。十岁，他参加军队当了个勤务兵，后来被擢升为营长，他是带着整营人参加革命的。

周离开我家以后，就到西北找红军去了。

江　枫译

① 方志敏于1934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作战被俘，同年7月被国民党秘密处死。这里所记述的，主要是在南昌豫章公园内，国民党举行“祝捷”会时的情景。——译者

清末的振兴实业

仑桥正直

在光绪年间，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新政，被称做光绪新政，内容包括振兴实业，加强军事和警察力量，实行现代化教育等措施。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社会，但清政府仍以振兴实业为名，企图保护本国工业。这种尝试，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可以想象会有许多困难。

农工商部的成立

振兴实业开始由清政府外务部，继而由商部负责。商部尚书为戴振，但实际上从1903年到1906年期间热心推动振兴实业的核心人物是唐文治和王清穆等人。商部由农务、工务、商务、矿务和路务五个部门组成，但特别重视铁路部门。结果以省为单位广泛开展了民办铁路运动，于是形成了全国收回国权运动的核心。商部实行的种种振兴实业政策和收回国权运动相互配合取得了相当成就。

这时商部与工部合并，成立农工商部，农工商部尔后负责振兴实业工作。这时农工商部由于铁路部门的划出和失去了王清穆、唐文治、戴振等有力成员，于是降为二流官衙。对这一点，史料叙述如下："该部成立时，振贝子为尚书。所定章程等皆出于侍郎唐蔚之（文治）一人之手，最初办事尚有生气，后来遂无起

色。……尚书溥颋系极和气的老好人，德优于才，人皆称溥尚书为溥婆婆。”接替戴振尚书的溥颋是皇族，但都无成就。当时清政府虽未完全放弃振兴实业政策，但至少是失去了以前那样的热情，在各种政策中振兴实业所占比重相对减少了。振兴实业本身当时已取得下列成就：有发行的商务官报、制订最初近代工业的农工商部统计表、建立公司、设置商会、奖励棉花和茶叶等商品作物，等等。农工商部由于经费不足，很难维持继承下来的事业。例如：不得不把作为直属事业之一在北京成立的农业试验场改为动物园。此外，农工商部统计表仅发行过两次。

这样，后期的振兴实业，名义上虽是农工商部领导，实际上则由督抚等地方官吏或集聚商会的士绅、商人单独进行。因而，振兴实业已失去了中央控制，由各省分散进行。这种分散倾向，当然有很多不利。地方督抚为了争取民心，不作长久打算，偏重于立竿见影的工作。另外，由于督抚调转，按当时的习惯，部下和政策也随之变更，前总督扶植的工业，后任往往停办，转而奖励其他事业。如“徐世昌接替赵尔巽做东三省总督，就中止赵总督的施政或进行压缩”，就是一例。

保护奖励政策和官办工业

农工商部由于经费不足，几乎无法建设耗资较大的事业，仅限办理批准手续而已。该部曾对开始发展工业有功者，给与奖励。1906、1907年连续公布各种“奖给商勋章程”，“奖给华商公司章程”和“实业赏爵章程”，对工业有发明创造者，对新建公司者授与官位、爵位和商勋。对以当时一百万元资本办企业者奖给四品卿衔，即享受与国子监祭酒、大理寺少卿等同等待遇……。然而对各部尚书、各省督抚却很少授爵，如对特别有功的李鸿章不过授与伯爵。在尊崇官爵勋位的中国，对位于士农工商之末的工商加以如此异常恩典，可以看出中国清政府对工商业发展是煞

费了一番苦心，同时也应看到工商业者对其事业之异常勤奋。

与奖励不同的还有专卖权和免税措施。专卖权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出现。有代表性的如对李鸿章成立的上海机械纺织局，就给与了直到1882年的几年专卖权。于是，附近的工厂被禁止进行同样的生产，该工厂可以长期垄断。这种措施对工业发展十分不利。振兴实业期间，虽使用同样的专利字样，但其内容有所变化。专利带有工业特许权性质。即对在工业上有发明创造者给与一定的恩典，以酬其劳。保护这些人利益是一国提高工业水平的措施。早在1905年10月，商部即对在工业上有发明创造者，承认在一定地方有三至五年的垄断营业权。例如：使用麦杆编织帽子的山东省商人吴金即获准专利五年；商人胡国珍制造石版成功，获准在宁波一府内有五年经营垄断权等等。

此外，到处征收商品流通税——厘金，这已成为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因而商人强烈希望废除。清政府并未触动厘金制度本身，但在这一时期，为了保护工业，仅限于对一部分商品采取免税措施。1908年10月，清政府“税务处”发布布告，特别是本国产品具有外国特色的工业品可以申请免税，获得许可的商品在运离原产地时只缴纳价格5％的税，以后不再课任何流通税。进口外国货物首先负担5％的进口税，另外运到开港地以外，再课以进口税一半的通货税。此外在内地的外国货物还以种种名义加重课税，使外国货物较之国内产品处于竞争不利地位。例如：火柴的木杆，药品等一切材料，都由日本进口，只在本地加工成火柴，付出劳力而已。这样，火柴制造业由于廉价劳力和免税就有充分条件与外国火柴竞争。

此外，这一时期，官办工业也具有很大作用。官办工业重视两个方面，一个是官办模范工厂。即北京的工艺官局、天津的实习工厂、成都的劝业厂、杭州的浙江工艺传习所，这些名称虽不统一，但都是政府投入相当多的资金建立起来的大工厂。例

如：袁世凯于1905年在天津创造的直隶实习工厂，建筑费为当时的20万元，拥有工人一千一百名，分为纺织、印染、窑业、刺绣、蜡烛、造纸、火柴、木工等九种。另外，在这些模范工厂里，对二十岁左右的工人，教给制造陶瓷、肥皂和纺织等两三种工业技术和初步知识。白天十余小时，从事专业工作，夜间两小时为学习时间。按照其技术高低给予一定报酬。这样的模范工厂，培养了大量掌握现代技术的中级技术人员。官办模范工厂设备齐全，有外国人担任技师，工人人数多，资金雄厚等特点。这是使中国工业现代化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另一个就是习艺所。习艺所是收容轻罪犯人和穷人，传授简单的手工业技术使之将来得以维持生计。当时，习艺所到处成立。开始，天津习艺所成立于1903年，建筑费为三万九千余两，占地面积为三万余平米，收容人数为五百五十名。游民习艺所是收容流浪在天津市内的乞丐和懒汉，由所辖警察局扣押，挑选其中有改造可能而且能从事工业劳动的人。游民室规模很大，有二百间，每室容纳六人。另外，在州、县也广泛设立习艺所。例如：据1906年河南省调查，有一百零七个州、县设立了习艺所。据1910年直隶省的调查，省内有这类习艺所五十二处。州、县习艺所规模较小，收容人员也少，直隶省平均一个所约收容十六人。习艺所一多，就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于是要求习艺所尽量独立核算。历来的习艺所把在所内生产的布、带、席等制品向外部出售，获利颇多。

习艺所的广泛设立，出现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当时由于社会动荡不安，许多人流浪街头。致使失业者大量产生，增加了社会不安，所以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以稳定社会秩序，习艺所的设立，使矛盾得到暂时缓和。据统计，1910年直隶省全部从事官办工业的人数已达八千四百人。因此，可以说官办工厂是中国工人早期成长的场所。

轻工业的兴起和商品作物的发展

当时工商业飞跃发展，主要是民间资本的民需企业。当时虽无精确统计，据农工商部不完全统计资料表明，从1903年到1909年在农工商部登记的就有二百九十六家。从下面几种行业可以看出当时的工业情况。当时上海、汉口、广东等地纺纱、织布业非常繁荣。1909年纺织厂有三十一家，约达九十四万锭，其中仅上海就达四十九万锭左右，几乎占总锭数的一半。由于国内棉纺工业的兴起使国产棉花消费量剧增，1909年棉花消费量为四十万担。这样，从国外进口棉纱相对减少，到1908年以上海为中心向各地销售的棉纱共达三十五万担，价值八百七十七万两，与前一年相比增加88%。另外，生丝是中国的重要产品，但在世界市场上被日本生丝所排挤。当时缫丝业也有所发展。上海、广东、芝罘（烟台）等地缫丝业较发达，仅上海就有二十六处，缫丝量高达一万二千担。1900年下半年，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有明显发展，在世界生丝市场上，也可以和日竞争。由于火柴、肥皂工业的兴起，自1906年以后，进口逐渐减少。营口和大连等东北各城市榨油业也很兴隆。榨油业一般最初使用畜力，后来改用机器。

这一时期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民间企业有所发展。这种发展，确实是与政府从上推行保护政策分不开的，当然也不能忽视当时掀起收回国权运动的影响。这就是这一时期民间企业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当时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了许多港口，外国资本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工厂。但列强并不满足于已开放的港口，进而企图向偏僻的内地投资。清政府慑于收回国权运动，不敢公开满足这种要求。

由于收回国权运动的影响，清政府不能无防备地接受外资。日本方面虽指责清政府拒绝外资为“有害无益”，但由于收回国权运动已深入人心，外资引进论者暂时也不敢公开提出。引进外资

本身并非坏事，如能有控制地引进外资，将会对工业发展有益。但在当时情况下，清政府对外资的引进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在那时提出外资亡国论和尽可能地拒绝外资，无疑是正确的。从长远观点来看，避免大量引进外资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

其次是使用本国产品。为了维护弱小的本国工业，制订使用本国产品的措施。它是收回国权运动的一个支柱，是得到国民一致拥护的。人们愿意以与外国货同等价格购买本国产品，即使本国产品质量低劣，也不使用外国货。例如：直隶总督在他当时所辖学校和兵营内一律禁止使用外国棉布。这表明使用本国产品运动已波及到总督这一层。

再者，湖北的汉阳炼铁厂是很早以前建立的，一向不很发达。随着收回国权运动的开展，民办铁路运动兴起后，这个企业就突然兴隆起来了。它把萍乡煤矿合并后，以一千万两银为资本，取大冶铁矿矿石，平均每天能制造三百根钢轨，另外还生产许多生铁。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是和收回国权运动密切结合的。

由于清政府实行保护政策和收回国权运动的影响，当时工商业确有某种程度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弱点。所建公司数目，同中国整个国土来比，还是微乎其微的，资本也微不足道。可以看出它是以轻工业为重点的。这些公司主要采取股份公司形式。这不仅是从中国自发经济发展中直接引申出来的，而且恐怕也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和收回国权运动所造成的。在那时民间企业的处境是很严峻的，经营也不顺利。这个时期中国各地每年接连不断地发生经济恐慌，使许多民间企业倒闭。尽管如此，当时适应中国经济能力的一部分轻工业却一直存在。

其次是振兴农业政策。如上所述，虽在北京设立的农业试验场变成了动物园，但在各省这时还相继成立了农业试验场。例如：仅直隶省到1910年就成立了三十二个农业试验场，多数情况下与农业学校联合。在振兴农业方面，其中心是奖励商品作物。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奖励商品作物的栽培。奖励商品作物虽然在过去也曾有过，但规模比较小，政府为了普及新品种，掌握农业技术，采取了向国外派遣人员，招聘外国技师，进口优良种子等措施。

在那之前，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品是茶叶，由于新兴的日本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的竞争，茶叶行业衰退了。因而，当时官方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振兴茶叶。例如：1905年根据两江总督的命令，由道台郑世璜带领外籍技师、有关人员以及茶工到印度、锡兰去考查，第二年设立了江南商务局种茶公所，在钟山等国有荒地种植茶树，以图振兴茶叶。当时官方也开始重视茶叶的海外市场情况，同时采取向种茶者发放贷款和建立培育茶叶组合等措施。由于大力保护茶叶，结果，大约从1905年起中国茶叶在制法和质量上都有所改进，出口量也有所增加。

同时，热心奖励种植棉花。1908年发出奖励全国棉业的诏书。由于禁止鸦片，原先各处种植罂粟之地今改种棉花。1911年初，农工商部颁布了棉花奖励章程，对栽培棉花成绩优异者进行奖励。各省也推行棉花奖励办法。例如，直隶省1911年春季在劝业道管辖下，设立了棉花研究总所，推动了棉花种植。这样一来，在华北主要普及种植美国棉花，从而使华北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少数棉花生产基地之一。

在商品作物中发展最快的是东北大豆。1900年生产猛增，东北大豆在出口比重中约占八成。大豆出口有三种形式，即大豆、豆油、豆饼（肥料）。东北大豆主要向日本出口。1908年日本三井物产向欧州市场销售东北大豆成功，于是大豆成了世界性商品。1909年，大豆出口所得达五千二百二十一万两，超出出口最多的茶叶而跃居第一位。东北农民于是从生产高粱等主要粮食作物改种大豆。同时也繁荣了营口和大连出口港。从此东北经济就迅速发展起来，因而与世界经济形成了息息相关的联系。

振兴实业的实质

为了弄清振兴实业的性质，现与洋务运动加以比较。洋务运动是以官办军事工业为主，而由民间企业组成的民需工业极少。推行洋务运动仅系极少一部分与政府有关的人员，几乎未见来自下面支持这一运动的民间活动。洋务运动的确具有最早引进现代化工业的积极性，但是具有代表军事工业的现代工业移花接木性质，从未想过移植现代工业和变革经济结构，它与光绪新政时期的振兴实业完全不同。当时，清政府采取保护工业的周密措施，即整顿振兴实业的行政机构。具体做法是在中央设立商务及农工商部、在地方设立劝业道，编纂商法、发行商务官报、成立商会、实行各种实业奖励制度、对部分产品免税、向专制性质的工业特许权过渡、设立官办模范工厂和习艺所、成立农会和农业试验场、奖励商品作物、普及实业教育、利用华侨资本、设立商品陈列馆、举办南洋劝业会等等。这一切措施对保护工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工业政策，在落后的半殖地中国，才有可能使工业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再加上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振兴实业政策和自下而上地开展收回国权运动，两者相互作用，因而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在光绪新政时期，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新兴工业正在兴起，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早期的资产阶级。所以说光绪新政时期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

与振兴实业有直接联系是戊戌变法。振兴实业的各种政策，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提出来过，那时清政府又把在几年前抛弃的变法主张再度恢复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说振兴实业也是变法派的变法运动。戊戌当时，变法派由于种种制约未能彻底推行其政策，其后由于振兴实业政策的实施，使工业政策得以贯彻。

振兴实业时期，清政府虽对工业实行保护，但仔细分析，回答又是否定的。振兴实业政策，对当时中国工业总的来说并未进

行任何变革。诸如以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以此为基础的一切封建秩序、外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关税自主权的丧失等为表现形式的半殖民地状况，错综复杂的厘金制度、度量衡的不统一、无现代通货制度等等，这些都大大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当时，清政府仅对通货制度和度量衡问题计划改革，但却不涉及其它问题，因此，清政府是不可能变革总的状况的，在这种意义上，把振兴实业称之为并非真正保护工业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振兴实业并非改变大框框的政策，而仅仅是在大框框里保护工业而已。

振兴实业又是一种对付革命运动的政策。1907年8月，清政府重新发布上谕提出振兴实业。这是由于农工商部的某高级官员朝见西太后等人时，奏请以“振兴实业泯革命”而发起的。当时的情况是革命派到处暗中活动，清政府则企图以振兴实业来分化革命。此一情况充分表明了振兴实业的性质。所以颁发这一上谕，是由于清政府认识到在革命运动的洪流中，振兴实业是反对革命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清政府认为有必要向人民表示，即使在清政府体制下，也可以实行振兴实业。然而，是表面上装出实现振兴实业的姿态，实际上是用以欺骗人民群众。

译自（日本）《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三卷》

赵成材摘译

1861—1894年德国对华的商业渗透

斯丢克尔

〔译者按〕：作者赫尔穆思·斯丢克尔（Helmuth Stoecker）现任柏林亨博尔特大学近代史教授，曾著《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等书。本文为作者近作，原标题是《德国与中国，1861——1894年》。

十八世纪末，当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以及各海上强国的航海法开始放松时，特别是1813年拿破仑的大陆体系结束以后，汉堡和不莱梅的商人和船主（常常是一身二任，商人兼船主）对拉丁美洲和近东的直按贸易，作了初步的尝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们的冒险事业从近东发展到东南亚和东亚沿海，他们能够逐渐和颇为随意地进入这些地区，多半是受了英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实行的自由贸易的吸引，同时也是受到当时流行的关于绝对的商业优势是世界秩序的永久特征这一资产阶级的看法的影响。随着自由贸易的扩张，德国航运业发展了起来：英国1822——1824年的航海条例允许部份外国船只进入其殖民地的口岸，183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以及1849——1854年取消对其殖民地航运和贸易的其余一切限制，这就使得来自德国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帆船，有可能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英国、荷兰甚至中国的商人所租用，尤其是在东南亚和东亚的沿海贸易中，从十九世纪中叶直至八十年代，这些船只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年代里，德国的一些中小洋行在孟买、加尔各答、新

加坡和香港设立了分行和支行，他们对德国的外贸并没有多大的促进，只是以极其有节制的方式加入了英国的海外贸易。同样可靠的是德国商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本来是英国在华商人的雇员，南京条约（1842）签订后才开始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做生意。英国洋行的统治地位和无懈可击的优势，常常迫使这些商人去经营小规模的旁支行业，或各种不正当的生意，包括“苦力贸易”；这种贸易为闻名的“商业巨头”如查顿（Jardine Matheson）和颠地（Dent）之类十分成功的鸦片贩子以道德纯洁性的观点所鄙视。

大部分在中国或其它亚洲国家的德国商人直至八、九十年代，仍很少从事与德国的贸易，他们销售英国纺织品或其它任何可获利的货物，而不考虑这些货物的产地，从而习惯于由英国银行家提供贸易贷款为其交易筹资，由英国保险公司为其运输保险，并用英国或其它非德国的船只装载他们的货物，除非他们自己是船主，如著名的美最时（Melcher & Co.）洋行。在那些年月里，德国对华的直接贸易几乎只限于茶叶和香料的进口及呢绒的出口，其数额直至七十年代仍是微不足道的。

德国洋行由于缺少各种关系，只得容忍被英国领事和其它英国当局作为“友好的异邦人”来对待，德商在与中国官员发生频繁的地方事务纠纷，或中国民众中爆发排外风潮时，一般总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这种依赖相当于汉萨同盟诸城邦的实际地位，它们都是英国的世界贸易和航运垄断中的小伙伴，由于这些城邦居于英国对中欧出口的入口处的重要地位，此种伙伴关系才为英国人勉强地承认下来。这毋宁说是一种优越的地位，因为它使汉堡和不莱梅的资产阶级既无须负担征服殖民地的任何开支，也不必卷入与其它欧亚国家的政治冲突，而又可坐享殖民地贸易的某些利益。

直至八十年代，英国对德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态度，可能还是受到德商未染指鸦片贸易的影响，到那时为止，鸦片仍是英国对

华输出的主要内容。

五十年代末，日本的“开放”和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引起了正遭受1857年危机影响的德国工业家向东亚大大增加出口的希望。“新时代”的普鲁士政府正希望通过与奥地利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加强自己的地位，于是乘机想充当除奥地利以外所有德意志诸邦扩张海外贸易的领袖。因此它在1859年派出了一支四艘军舰的远征军，陪同普鲁士公使艾林波（Friedrich Eulenburg）伯爵去远东。在那里他要为德意志诸邦获得日本和中国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给予英、法、俄、美的同样权利和优惠。实际上当时中、日政府几乎没有听说过普鲁士和德意志，这倒给艾林波造成了某种便利，他用哄骗、虚声恫吓和十足的讹诈成功地得到了他所希望的那种不平等条约。

1861年9月2日在天津签署的中普条约，只是英法与中国所订条约的翻版，它对关税同盟的其它成员和梅克伦堡—什米林、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大公国以及汉萨同盟城邦卢卑克、不莱梅和汉堡都同样有效。这使得各条约口岸人数日益增加的德国商人从此能正当地要求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有效的治外法权等许多优惠条件，以及西方列强的侨民早已享受的极低的关税。德意志诸邦早在普鲁士统一之前的十年，就在对中国的半殖民统治中，跻身于其它资本主义列强之列，对它们来说，这些权利和优惠造成了有利的局面。半殖民统治的实质在于，在不平等条件下，双方的贸易建立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与欧美的物价水平相比，欧洲商人卖给中国的货物要价偏高，而他们对中国土产支付的价格则偏低。这是应用于全世界殖民地贸易的原则，它大大地损害了被统治民族的经济。

“中华帝国”沦落到半殖民地的状态，经历了1842年以来延续半个世纪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一种特征是“欧洲的团结”，每当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利益可能受到威胁时，这种特征就尤其明显。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无疑会有助于资本

主义列强的某种程度的团结，因为该条款使得任何一个强国想撇开其它列强去取获特殊利益，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欧洲团结”更深的原因自然是所有列强在维持半殖民状态和特权方面的共同利益，如果他们各行其事，要获取这些权益就困难得多了。

普鲁士通过与软弱的满清政府于1861年签订的条约，为若干年后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开辟了道路。然而，当时对华的半殖民贸易的扩张，并未与征服或并吞领土的意图相联系；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政府的最大企图只是一个小小的军港，作为军舰在远东水域的基地。德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除了在四十年代曾短暂地喧嚷过在美洲各国建立移民区的完全不切实际的计划外，直到1878——1879年经济和国内政策改变前，对于在欧洲以外并吞殖民地的设想，一般说来不太感兴趣。往往是由于这种作法已经过时，化费过多，并且与自由贸易的原则不相容而立即抛弃这种打算。俾斯麦拒绝考虑在亚洲或世界其它地区建立殖民地。诚然，有些海军官员、探险家、旅行家、学者、政府高级官员和统治家族或前统治家族的成员，羡慕英国和荷兰的殖民财富和权力，提出并支持建立德国殖民地的种种建议。在六十年代，台湾尤其成了殖民愿望和计划的目标。但是这些建议在商业、工业和金融界几乎无人支持。1850——1878年间，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公开提出要普鲁士或德意志以兼并海外领地的形式进行殖民扩张。在那些年代里，殖民问题在德意志政治中作为一个问题还不存在。

拒绝殖民的政策，并不适用于对半殖民状态下海外国家贸易扩张。对此种贸易的支持，是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的恫吓，如果必要的话，武装干涉就成为年轻的普鲁士海军及以后的德意志海军的一项主要任务，北德意志联邦和其它德意志军舰自1869年以来就停泊在远东海域。海军领袖一开始就指出，需要某种海军基地以便作为给养和维修中心。对此，俾斯麦欣然表示同意，游弋在中国和日本海面的军舰舰长们，自1868年以来多次接

到寻找合适场所的命令。1870年4月俾斯麦指令北德意志联邦的驻北京公使，为此目的而就购买或租借中国沿海或离岸岛屿的某个据点一事提出谈判时，他补充道，德国无意将拟议中的据点置于德国主权之下或变为德国的保护地，因为他希望维持该据点名义上仍是中国领土的地位，以避免在日益迫近的普法战争中遭受法国进攻的危险。但是这一计划并未实现，李福斯（Rehfues）公使不得不推迟与肯定会极力反对这种计划的政府进行谈判。此后欧洲的战争终止了此事。

由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1871年与法国的和约的谈判，对于放弃建立德国殖民地的建议又多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迫切需要避免任何与英国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可能导致英法关系的改善，并加强法国的外交地位。俾斯麦所以坚决拒绝考虑某些报纸在色当胜利后提出的将西贡转让给德国作为媾和条件的一部分的建议，其决定性因素是担心英国可能作出反应。以后北德意志联邦议会也拒绝了该建议。在七十年代，主要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使他对建立德国殖民地的态度依旧不变。

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英国进攻了中国，其目的在于使广阔的内地更彻底地向英国贸易开放。于是1873年更深刻更广泛的危机，就引起了清除一切仍旧阻挡把中国全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障碍的又一尝试。“中华帝国”虽没有巨大的消费能力，但开始引起了急于寻找新市场的实业家们的兴趣。1858年和1860年缔结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以后，在依然妨碍欧洲对华输出的各种障碍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厘金——由省当局多少是任意征收的内地税——因此在整个七十年代，列强的外交使节在英国使节的领导下，越来越坚决地要求废除或至少减少这类捐税的征收。同时，他们要求有更多的口岸，特别是长江口岸，向外贸开放。

考虑到这些目的，新建的德意志帝国参与了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活动。然而从七十年代到1895年的对马关条约的外交干涉为

止，德国对“中华帝国”的政策还不足以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扩张的高压政策相提并论，但可视为向全面的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1875——1893年德国驻北京公使其父兄都是普鲁士权贵的巴兰德（Von Brandt）就是这一转变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用喋喋不休地标榜对中国的友谊，加上持久顽强的努力，来加强他所代表的国家在华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这方面，巴兰德从不放过最微小的机会。早在他驻北京的第一年，他就向其本国政府呼吁，创办并资助一家德国的远东轮船公司，并鼓励在该地设一家德国银行。他甚至与德国的实业家通信，以引起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这对一个当年的德国外交官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步。他对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各部尚书和当局所施用的威胁、恐吓和讹诈等花招，在驻北京的他的同僚中，几乎没有人比得上他。在上海的英国社团中，他很快成为知名的“铁血”公使。

巴兰德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争取北京政府同意修订1861年中普条约的计划。该计划已为其它列强，首先是英国所同意，因为北京对德国所作的让步，根据最惠国条约，它们也可要求一体均沾。德国的主要要求是：更多的长江口岸向欧洲贸易开放，宜昌以下的长江向欧洲航运业开放，在较重要的长江口岸允许欧洲人设租界，北京政府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废除厘金。由于只有英国的武装力量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巴兰德接到命令要利用英国的支持。

然而这种打算一开始就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爵士强烈地憎恶其德国同事，而喜欢单独行事。虽然巴兰德对这些情绪以眼还眼，但他却毫无疑虑地步威妥玛的后尘。英国公使曾利用一个英国翻译在中缅边境一次斗殴中致死一事为借口，榨取类似于上述的要求。不久以后，德国帆船“安娜”号上的中国船员暴动，杀死了德国船长和丹麦大副，巴兰德就象威妥玛所做的一样，在与中国官员谈判时虚声

恫吓。

根据德国外交部的建议，英德同意合作对付中国水域的海盗，但其真实意图与其说是对付显属罕见的海盗，不如说是对付不顺从的中国政府。当德国海军司令部在香港附近集结有一千三百八十名士兵的六艘军舰时，巴兰德向北京政府要求将沿海和长江的许多口岸向外国贸易开放，并就厘金举行谈判。与此同时——1876年夏——威妥玛出于同一目的而不断施加压力。最后以明白无误的战争威胁取得了成功：8月份，英、法、德、美各方将其远东海军的部分力量集结于烟台附近，设法威胁北京政府直到它决定让步。经过1876年9月13日的烟台条约，除了与厘金有关的要求外，北京政府答应了英、德方面较为重要的要求。对于这一结果，巴兰德在幕后的多次插手起了不小的作用。

由此而取得的条约在使中国降至附属国地位的过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该条约十分清楚地表明，满清政府极端软弱无能，它甚至不了解，由于东方危机，英国军队在多大程度上被牵制在欧洲。

随后在修改1861年条约的谈判中，巴兰德以不断的威胁和敲诈试图在厘金一事上取得某些成果，可是无效。这证明，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德国单枪匹马是没有能力打破北京政权的抵御的，因此1880年3月31日的中德续修条约仅仅规定开放上海附近的吴淞作为登陆地，而不是条约口岸，并在贸易和航运事务方面，对德国，从而也是对其它“条约列强”，作了某些并不重要的让步。对巴兰德寄予很大期望的在沪英商团体，毫不掩饰他们的失望。

1879——1880年以后，柏林外交部对其使节所用的恐吓手段，并不总是认可的，因为俾斯麦不希望德中关系有任何严重的恶化。他知道，虽然看来奇怪，北京的尚书们是希望从唯一未并吞过中国及其邻国领土的欧洲强国（除不重视远东的奥匈帝国以外）那里寻求政治援助的，因而他意欲利用这种不智，以便在中国获得新的市场，尤其是寻求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产品的市

场。俾斯麦还希望，如果欧洲发生战争，“中华帝国”能对一个盟友（指德国——译者）保持门户开放，因为其军队在远东即使不能与其它欧洲军队相匹敌，也能牵制某些敌对部队。

由于这些原因，巴兰德于1883年初被暂时召回柏林。他感到不得不对驻华德国公使两次用德国军舰送分遣队在华南口岸登陆，以强迫该地的地方当局在与德商的小小争端中让步一事，说明理由，并因此招致了俾斯麦的不悦。巴兰德虽未公开受斥，但接到严厉的指令，今后要谨慎从事，避免一切摩擦。

不久以后，柏林的两家大银行，贴现公司（Discon—Gesce-llsha）和德意志（Deutsche）银行就提供有关修建铁路的资本、材料和专家等事宜，向中国政府呈递了一份精心准备的意见书。虽然意见书指明是“中国的”铁路，但仍未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它深知“西方蛮夷”承建铁路的复杂性。但这些银行和诸如克虏伯等若干家重要的钢铁企业对此意图仍执意坚持，即使在英国银行和实业家就对华贷款及日后订货的分配达成协议以后的若干年里，他们仍孜孜不倦地钻营。（只有在1895年，其时德国的地位已大大加强，英国各银行才同意按较大比例将对华的生意分一份给一批德国银行。）俾斯麦给予一家1885年创办的经营东亚航线的轮船公司以国家津贴，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推进这些计划。航运补贴是德国经济政策上的一种新奇的诱饵，它对于推动向海外国家的出口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那位首相还暗中策动法国，随后又策动俄国（在远东这些大国并不是危险的贸易对手）在亚洲进行殖民扩张，以便将它们的军队从德国边境调开，并使之卷入与英国的冲突。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战术方法，它与俾斯麦在北非和中东的政策是一致的，而且在俾斯麦对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打算中，它无疑也属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尤其是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俾斯麦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侵略，在外交范围内是支持的，因为法国向中国南部

边境的推进，势必导致英法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由于他对法国在东亚和非洲的殖民扩张予以援助——没有这一援助，此种扩张是不可能的——他加深了法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并使法国同意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进行殖民扩张。总的看来德法之间的“殖民协议”，和特别是法国入侵远东期间俾斯麦的态度和行动，大大有助于茹费理（Ferry）的成功和法国资产阶级对东京（越南——译者）的占领。

法国入侵东京，引起其他西方大国乐观的期待。许多报纸预言，中国不久就会将其铁路修筑工程向各国全面开放，而且会成为现代工业大量的形形色色产品的市场。对三亿消费者的不切实际的奢望开始激起一大批想要推销货物的人们的幻想。有势力的资产阶级集团开始迫使其各自的政府和外交人员采取步骤，以帮助他们在所期待的巨额交易中搞到尽可能大的份额。当和平恢复时，在英、德、法与实力较弱的美国的各银行及其重工业合伙人之间，为了向中国当局贷款和订合同，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其中外交官们充当了十分积极的角色。英国在对华的一切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和决定性的言论，不再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了。

在贷款和签订合同的国际斗争中，德国被认为是极为活跃的参与者。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有关政府曾象德国政府那样，与银行家和实业家如此紧密合作。巴兰德作为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克虏伯以及其它殷实的工业企业于1885年组成的辛迪加的代表，从北京政府榨取到一份声明，大意是中国在订购军火、战舰和铁路器材或借款时，将给予德国以优先权（为此他不久即被提升为枢密顾问并荣膺贵族称号）。

次年，该辛迪加派出了研究中国状况的三人考察团，从而引起了英、法方面的商业代表和外交官们更大的紧张不安和更哄乱的活动，但整个闹剧并未因此而能改变中国京城内政界人士对批准大规模筑路一事的严词拒绝。这方面的一切希望不得不延迟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满清政府对“维新”的抗拒最终被克服之

后。

资本主义国家间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关于军火贸易的合同。英、法制造厂商对德国在这方面，特别是火炮和战舰方面近乎垄断的地位，予以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为加强法国方面的努力，夏努安（Chanoine）将军被任命为法国公使馆武官，怡和洋行为使英国货挤进市场，不惜亏本销售阿模士庄的大炮。但是在德国武器出口中居统治地位的爱森的克虏伯，就象它在其它国家的情形一样，得到了德国驻华使节的非常积极的支持。到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为止，德国避开了所有对手的打击，向北京政府及其它政府和各地总督出售了价值数百万马克的火炮和其它武器（如1888—1889年订货总额达一千四百万马克）。该企业为了取得这种成果，在采用手段方面是毫无顾忌的：从巴兰德的外交干预，为中国军队雇佣德国军官作为顾问和教官，直到利用中国报纸代克虏伯宣传，和向中国的高级官员们赠送大笔贿赂。在笼络高官方面最著名的一例是，中日战争后在上海附近建立了一座直隶总督和外交事务的实际掌权者李鸿章与满面笑容的F．A克虏伯的纪念像，像中两人所持武器都是克虏伯军火企业的产品。据领事司艮德（Seckendorff）男爵报告，1893年当他向李呈上纪念像的设计时，这位极可敬的主顾"似乎对此很满意"。

对于向中国出售武器，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人们自然会担心，这些武器或许迟早会不单是用于对付法、俄、日、而且会用于对付所有的欧洲列强。但是这种危险警告并不受到重视，因为利润太高了，并且出售的武器常常是过时的。在德国外交官和官员中，还有很多有道理的怀疑：极端腐败无能的中国专制制度和官僚体系是否确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现代化军队。军事顾问和教官的经验则绝不支持此种怀疑。然而有时提出倒并非纯属无稽，正如1900年事件所表明的，当德国部队在天津附近登陆时，即遭到克虏伯武器的射击。

1895年以前，极少有欧洲人在上海以外的地方开办任何种类

的工厂和工业企业。强加于中国条约对外国人的此类活动并未明确规定。甚至李鸿章也严厉地拒不允准方这面的任何企图。工业化如果终于要进行的话，那也是中国高级官员的特权。当1888年北京官衙与欧洲外交使团对这一问题发生争执时，巴兰德在他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我们对于打破中国当局对建立联合企业或公司的抗拒“很感兴趣”的话，他是不敢苟同的。建立联合企业是迅速发展工业生产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这种发展“对我们的许多制造业来说，将人为地造成新的竞争者”。他的观点为他的上司所赞同。柏林外交部商务司司长赖卡特（Reichardt）所力主的官方政策是：“以我们之见，在我国产品的市场正有发展希望的那些国家里，不应鼓励其工业的发展。因为很明显，我们会由此而帮助正在成长的竞争者。”（1889年5月）各条约口岸的德国领事也接到指示，设法劝阻中国人为发展工业的目的而建立工厂或作坊的一切尝试。

因为这些经过预加保护的市场对某些德国出口工业日渐重要。在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的几年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英国的优势开始下降，转而有利于德、美、日以及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与中英贸易总额相较，中德贸易总额不仅在绝对量上，而且在相对份额上都在增长。

德国棉制品对华输出的增加，成了英国工业家叫苦连天的话题；而在此同时，伦敦不再是中国生丝销售的重要中心了。日本对华贸易的大大增加，导致了与德国贸易的洋行的激烈竞争，这些洋行觉得他们在廉价大众消费品输入中国方面的领先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那些年代里，德国除军火外，还向中国输出呢绒、染料、金属制品（特别是缝纫用针）、啤酒和饮料、紫铜、黄铜、铅、灯具、玻璃器皿、文具和玩具；它从中国进口茶叶、香料、羽毛、猪鬃、皮革、砂金、草帽辫、毛皮和樟脑。除了茶叶和香料，其它进口货实际上都是德国各类工业的原料。德商的贸易行号，主要设于汉堡、香港和上海，其对华出口显然倾

向于输送那些经得起英国竞争的货物。

在本文述及的这一时期末（1892—1894），德国对华出口达德国出口总额的0.9—1.0%；中国是德国大炮和缝纫用针的最大市场。1892年德中贸易总额为四千三百一十万马克，1893年为四千八百七十万马克，1894年达四千九百二十万马克——这一数额远远高于德国与其亚洲和太平洋所有殖民地贸易的总和。

最后，德国在对华的金融渗透上也作了些准备工作。自1875年德意志银行被迫关闭上海和横滨的支行以后，有人（特别是巴兰德）一再提出在东亚开设一家德国银行的建议，而终于为政府所采纳。自1881年起，政府不时要求柏林的银行巨头和汉堡商会在这方面带个头，但银行家和商会对这项事业都不太感兴趣，他们显然认为，由于英国对经营远东贸易的银行业的垄断，以及银价的波动，这项事业是没有前途的。讨论与谈判从1883年拖拖拉拉地持续到1887年底，那时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布莱希勒德尔（Bleichroder）银行和北德意志银行的代表们一致同意，在德国政府从帝国银行的储备中以“一定的价格”提供白银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德华银行机构。俾斯麦同意了这项协议，但当知道它应提交帝国国会批准时，又被否定了。

经过多年的争论后，银行家们声称，如果普鲁士国家银行参加，并且如果皇帝正式批准每届当选的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他们就准备自己动手。这些条件被接受了，因此德华银行于1889年5月建立，贴现公司（与布莱希勒德尔银行一样，由于与俾斯麦政权的密切关系而闻名）持有最大股份。实际上德国所有的重要银行都参加了创建工作，它们中大部分都是董事会成员，其中克虏伯的汉斯·詹基（Hans Tenche）也是一个重要成员。最初几年，这家新银行在华处事很谨慎，为巴兰德所不满。只是在1895年后，当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控制时，它才成功地在对华贷款的谈判中获得较大份额。

在如此长的时期中，俾斯麦之所以对不愿相从的银行家们持

续不懈地予以鼓励，其原因可在这位首相的促进海外商业利益的政策中反映出来。各海外银行，特别是在远东开设银行的目的，就在于打破德国对英国的贸易信贷和货币汇兑的依赖，这种依赖必然会阻碍德国的经济扩张。因此，可以引用1888年他给伯蒂格（Boetticker）的一封信，来恰当地结束这篇概括的研究。这封信总结了他的政策：

“如果说我特别强调在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德国金融机构，那么我这样做的理由是，我确信这个地广人稠的国度，迟早将向欧洲商业全面开放，并向外国工业提供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尤其是在铁路建筑方面。根据外交部历年收到的许多看法一致的报告，可以断言，无论这种情况何时发生，那些在华设有实力雄厚的银行的国家，在为其工商业争取到预期中的巨额交易的最大份额时，注定要比所有其它国家在利用有利时机方面捷足先登。”

译自摩西（Jonh A.Moses）与肯尼迪（Paul M. Kennedy）合编：《德国在太平洋和远东，1870—1914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李荣昌译　李必璋校

日、英等国干涉交收东三省谈判

Б·格林斯基

1901年2月初，我国将三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会议最后拟定的协定草案（即俄中交收东三省条约草案——译者）交给了清政府所派与我国谈判的中国驻彼得堡公使杨儒。同时，我国驻北京与李鸿章打交道的代表，也将协定的内容通知了李鸿章，以求尽快取得结果。但谈判未获成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列强的干涉。对协定表示坚决反对的是日、美、英三国。美国国务卿交给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一份备忘录，指出该协定有使中国丧失部分领土的危险。日本政府声明，如果拒绝签订这一将对中国产生有害后果的协定，它将支持中国，而日本驻北京公使也

译者按：本文译自格林斯基著《俄日战争的序幕》一书的第十三节，其主要内容是叙述日、英、美、德、意等国对清政府与俄国关于交收东三省彼得堡谈判的干涉经过。

1900年9月末，俄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合法化，积极谋求与中国政府谈判，订立条约。因当时清政府逃到西安，沙俄军事当局便强迫盛京将军增祺于同年11月30日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将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监督之下，夺去全省军政大权。清政府于1901年1月2日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办接收东三省事宜"，俄中关于交收三省谈判在彼得堡开始。谈判分废暂约（暂且章程）、立新约（俄中交收东三省条约）两个阶段。1月23日，俄国同意废除暂约，但将暂约的主要内容纳入新约，强迫杨儒签字。日、英、美、德、意等国，先后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对俄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签订沙俄独占中国东北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拒绝签字，谈判于同年3月26日结束。本文叙述了日、英等国在谈判期间进行干涉的情况。《俄日战争的序幕》一书，是根据[illegible]编写而成的，文中所反映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

向李鸿章说明利害，并提出公开威胁，最后竟说出了这样的话：李鸿章不是代表中国人而是代表俄国人讲话的。英国和其他列强一起举行了讨论满洲问题的会议，劝说中国在会议未取得结果之前，不要同俄国签订协定。后来连意大利驻北京公使也提出了抗议，他在递交给中国的备忘录中声称：在与有关各国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结束之前，中国无权与某个大国就割地和赔款问题单独签订协定。

外国列强的抗议给中国撑了腰，于是中国向俄国政府声明，不同意协定草案中的一系列条款。中国公使杨儒交给俄国政府一份备忘录，希望削减对中国过于苛刻的条款。中国皇帝也致函彼得堡，要求俄国在中国困难之际表现宽容与援助之情。

鉴于中方提出请求，俄国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重新研讨了协定草案，2月底确定了修改后的草案文本。新草案中的重大修改，可归结为：（1）中国政府可在满洲驻军，但驻军人数和驻扎地点须征得俄国政府的同意；（2）俄国只限于在满洲享有铁路、矿山和工业的租让特权。

3月初，我国将协定的新文本交给了杨儒，并声明：如果两周内不签字，俄国政府在满洲问题上将自行采取行动。但是，我国的让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驻华西安府的清廷受到中国驻外公使报告列强抗议的影响，声明不能接受俄国提出的协定内容。俄国政府对此作出如下答复：既然中国不同意俄国提出的协定文本，俄国将拒绝就满洲问题继续举行谈判，并保留自己采取自由行动之权。

据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二号（1904年）》记载，外国列强在满洲问题采取的行动如下：

1901年1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赖斯顿侯爵电示大不列颠彼得堡公使奇·斯科特和驻北京公使艾·萨道义："请查证《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2月31日电报中所报道的、发表在1月3日该报的消息，似乎俄中之间似已签订有关南满问题的协定，其结果

是，在俄国保护下表面上恢复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

《泰晤士报》发表消息如下：

俄中之间已被俄国武装占领南满重要省分盛京省和在俄国保护下恢复中国地方行政机构达成协议。有关协定由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和俄军总司令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的代表科罗斯托维茨将军签署。俄国同意恢复盛京将军和中国官员在盛京和盛京省的行政权力，其条件如下：

1、盛京将军（增祺）须尽心管理省务和维护省内治安，并须协助修建铁路。

2、在俄军武装占领期间，以及在他们保护铁路和维护省内治安时，将军应以礼相待提供住房和给养。

3、将军必须收缴中国士兵的武器，遣散他们回家，并将俄军未曾占领的军械库中的弹药，全部移交俄国军事当局。

4、俄军在盛京各地未曾占领的炮台和工事，以及俄军不需用的火药库，应在俄军当局参与下予以拆毁。

5、在目前俄军所占领的牛庄等地，待俄国政府确认全省已安定无事时，才能恢复中国行政管理机构。

6、盛京将军所辖中国巡警，应执行法令和维护社会治安。

7、在盛京应设总揽监督大权的俄国总管一员，盛京将军应保证他了解一切重要事项。

8、在地方巡警无力应付某种情况时，盛京将军应同俄国驻盛京总管取得联系，要求给予援助。

9、协定的文字解释，以俄文本为准。

俄国驻盛京的总管，在职责上，与俄国驻布哈拉的总管或大不列颠驻印度土邦的总督类似。

继上述协定之后，必定会就另外两省提出类似的协定，从而将使满洲真正处于俄国保护之下，何况根据以往的协定，

俄国已有权为维护铁路的需要而保持一定数量的军队。

1月5日，奇·斯科特通知赖斯顿侯爵说，他一直未弄清事实真相，不过在彼得堡，人们议论纷纷，正如《泰晤士报》所说，俄国似乎确已同满洲当局签订了某种初步协议，根据协议，俄国可能将享有通过满洲到旅顺口的铁路修筑权和护路权，而且东清铁路公司的权利也将转让给俄国政府。

1月4日，艾·萨道义自北京通知赖斯顿侯爵说，此间相信《泰晤士报》所报道的文件属实。看来，增祺将军的代表和俄军总司令阿列克耶夫的代表于11月22日签署了协定。据说，现在正待北京批准。根据艾·萨道义从中国方面得到的情报判断，协定不可能业已确定，因为在旅顺口签署协定的中国代表无权这样做。

1月12日，日本驻伦敦公使林董男爵通知英外交部说：日本政府由俄国方面获悉，俄国政府和中国当局就调解满洲事务的谈判，似已通过中国驻彼得堡公使达成协议，不知是否属实；如确有其事，我们想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协议。林董男爵表示，弄清这件事，无论对大不列颠还是对日本，都有好处。因而他奉命转达这一想法：如果大不列颠政府也能出面过问，日本政府就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步骤将会产生更为令人满意的结果。

1月15日，中国驻伦敦公使向赖斯顿侯爵表明，俄中两国政府之间并未缔结报纸所报道的那种有关俄国占领盛京省的协定。

2月5日，日本公使告知赖斯顿侯爵，根据日本政府得到的可靠情报判断，俄国政府现正坚决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由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和盛京将军缔结的关于满洲的协定。日本政府授权林董男爵作如下声明：日本政府欲使中国驻东京公使理解，日本政府认为缔结此类协定，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祸根”，中国政府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缔结涉及大清帝国领土权利的协定。林董男爵表示，大不列颠政府也应这样提示中国驻伦敦公使。日本政府认为，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是同所有大国共同协商。同时，林

董男爵指出，中国政府本身也愿意摒弃满洲协定和惩办缔结协定的盛京将军；但是，他对于中国政府会在缺乏列强道义支持的情况下，作出这种决定，表示怀疑。赖斯顿侯爵答应考虑林董男爵的意见。

2月7日，赖斯顿侯爵向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发出如下备忘录："大不列颠政府获悉，俄国政府坚决要求中国政府批准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和中国盛京将军就满洲问题缔结的协定。大不列颠政府还获悉，中国政府如能得到外国列强的支持，愿意摒弃此协定并惩办签署协定的盛京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拟通知中国驻东京公使，指出缔结此类协定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危害，中国政府不应同任何大国缔结涉及大清帝国领土权利的协定。大不列颠政府也拟向中国驻伦敦公使发出类似的通知。"此外，赖斯顿侯爵谈了他同林董男爵谈话要点之后，希望德国也能按林董男爵提出的看法向中国政府表态。德国大使馆答应尽快将德国政府的决定通知赖斯顿侯爵。

2月6日，奇·斯科特电告伦敦(电报是2月11日收到的)，关于俄国在满洲的行动，尚未探得任何确切消息，但是曾有机会由拉姆斯多夫伯爵处得知一些显然与俄中缔结南满协定有关的情况。拉姆斯多夫伯爵对于已发生的事情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他说，他认为，报纸上报道的消息，理应引起国会中的质询，从而可证实俄国是否为在南满求得新特权或对南满实行真正保护而同中国已缔结或准备缔结临时协议或正式协定。但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可见，这一消息完全不确实。这一谣传的唯一根源是这一事实：在恢复中国当局原来的职权之前，暂时占领该省并负责维护该省秩序的俄国军事当局，曾受命同地方当局制定俄中双方暂时共管南满的暂行办法，其目的是防止在邻近俄国边界地区发生骚乱和持护从俄国边界到旅顺口的铁路。暂行办法的某些细节已送往彼得堡审核，但未同中国政府签署任何协议或协定，即根本没有签订有关满洲问题的正式协定，而且俄皇也丝毫没有打算

违背自己曾公开作出的保证，即只要情况允许，满洲将作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领土完全恢复原状。就确定撤出满洲的最后期限来说，俄国目前的处境，与盟国何时撤出北京和直隶省的情况相同。至于全部彻底撤出满洲，俄国政府必须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有关不再发生进袭俄国边界和破坏铁路事件的切实保证。俄国政府毫不打算提出领土要求，把满洲置于俄国形式上的、甚至实际上的保护之下，俄国政府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使中方今后保证认真履行商妥的条件，而以往在骚乱时，中方却未能做到。看来，这种保证条件，将成为拉姆斯多夫伯爵和中国公使的会谈内容，或者将提交北京讨论。目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引起报刊谈论的某种协议，就俄国军事当局和南满地方当局之间制定的暂行办法看，只能是暂时性的，可见并没有同中国中央政府缔结任何协议或协定，即对该省的国际地位并无任何改变，该省日后将归还中国，俄国军事当局一停止实行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在牛庄以及在其他地方，一切都将恢复原状。

2月12日，德国驻伦敦大使馆通知赖斯顿侯爵，德国政府拟指示德国驻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德国政府认为，在中国政府尚未考虑对所有列强应承担的义务之前，中国政府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缔结有关领土或财政问题的单独协议。"德国政府将就此事通知其驻北京公使，并将通知中国驻柏林公使。赖斯顿侯爵获悉德国政府已准备采取这一决定，深感欣慰。

2月13日，赖斯顿侯爵通知中国公使，大不列颠政府认为签订任何类似报纸上报道的那种协定，都会成为中国政府的祸根，中国政府和任何一个大国之间不应缔结涉及大清帝国领土权利的任何协定。同时，英国驻北京公使受命，将给中国驻伦敦公使的通知内容，转告中国政府。此外，关于这一切，也通知了东京。

2月19日，美国政府向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送交了一份备忘录："目前，所有列强就大清皇帝的某些官员和臣民侮辱列强公使和臣民的问题正在协商解决办法。由于列强皆承认必须保持中国领

土不受侵犯，所以在这一点上继续得到国际上的切实保证，对中国显然是有利的。可见，签订某项协定或研究某项非正式的建议（这会导致与某大国签订条约，从而在领土和财政上工作出让步），对中国来说是不明智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美国政府一心想防止中国遭受上述危险，维护大清帝国同其他国家极其自由和良好的关系，所以遵循1900年7月3日的照会中所阐述的原则，并本着对大清帝国和目前所有参与协商的大国的友好精神，想表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认为只要目前进行协商的列强不能充分了解实情，不能得到它们的赞同，任何私下研讨有关领土和财政问题的活动，都是对中国不适时、不适当的，甚至是有害的。”

2月27日和28日，艾·萨道义自北京向伦敦报告说，在俄国政府坚决要求中国驻彼得堡公使缔结的条约中，据他所知，包括下列条款：

1，归还满洲。

2，只要条约的最后四项条款没有履行，俄国将保持额外的部队，以保护满洲铁路。

3，俄国帮助中国维持治安。

4，在满洲铁路竣工之前，中国不应驻有军队，以后驻军人数问题，应与俄国协商解决。不准运进弹药。

5，俄方如对清政府官员不满，不论该官员职位多高，清政府均应予以撤换。警察部队人数，须与俄方协商后方可确定。警察部队不得使用大炮，除俄国人外，其他外国人不得在该部队中任职。

6，不得允许外国人在华北的陆海军中任职。

7，取消金州厅的中国行政机构。

8，未经俄国同意，中国不得允许外国人在俄国毗邻地区，如满洲、蒙古、伊犁、叶尔羌等地享有采矿、修建铁路和其他任何权利。同样，中国在这些地区修建铁路，也须事先征得俄国同意。除牛庄外，其他地方也不得租借给俄国人以外的任何人。

9，这些原则也适用于今后对列强的赔款问题，以及对俄国在满洲开支的补偿问题。

10，通过与铁路局交涉来解决满洲铁路及其员工损失的赔偿问题。

11，对损失的赔偿，可通过提供新的租让权益或修改现行条约的办法来进行。

12，按修建满洲铁路的条件，向北京方向修建一条其主线或支线抵达长城的铁路。

据艾·萨道义的报告，俄国大使馆坚决要求李鸿章同意这项协定。显然，整个问题必须报朝廷批准。李鸿章对日本公使说，他认为，此项满洲协定不会损害中国在这个边远地区的统治权，所以他决定予以同意。小村的有力规劝，并未奏效。

姚宝珠译
邹　宁校

宋子文与上海银行界 1931—1933

P·M·科布尔

上海金融资本家对公债券的巨大投资，把自己与南京政府和宋子文越来越紧地联结在一起。这些银行家购买了南京政府的几亿元公债，到1930财政年度，保证债券（大多为政府公债）占了上海几家主要银行总资产的15%还多。① 这样，就使上海银行界对国民党政府的持续稳固具有极为重大的利害关系。

银行家们与宋子文在政治上结成了联盟。宋子文的地位和声望对政府的公债起了保证作用。宋子文关于集中控制预算、增加税收，以及削减军费开支等方案，就是南京政府将来有能力完全偿还这些债券的最好保证。

但是到了1931年秋，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困难在损害着宋的公债政策。几种主要的债券行情开始暴跌（见表七）。

宋子文无法继续削减支出和无力平衡预算，是造成公债市场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1930年爆发了蒋介石与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力量之间的战争。蒋、冯、阎大战迫使宋子文增加军费。军费开支从1929财政年度的二亿一千万元增加到1931财政年度的三亿一千二百万元。同一时期的政府总支出，从四亿三千四百万元增

① 李紫翔：《中国的银行之特质》，载《东方杂志》1933年11月1日，第35页。

表 七　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主要债券情行表

1930年12月—1931年8月

日期（周末）	市场交易价格		公债
	本周最高价	本周最低价	票面价值
民国十八年关税库券			
1930.12.3	65.20	62.00	75.17
1931.3.4	62.60	60.00	73.70
1931.8.5.	52.20	50.10	63.07
民国十九年关税公债			
1931.3.4	82.70	78.35	92.80
1931.8.5.	68.50	65.20	86.80
民国二十年卷烟税库券			
1931.3.4	79.70	77.70	95.33
1931.8.5	64.30	60.10	93.00

资料来源：《金融与商业》，1930年12月3日，第23页；1931年3月4日，第23页；1931年8月5日，第19页。公债的票面价值代表公债未偿本金的百分数。见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债券汇编》(1935年、197年华盛顿再版)，第142—143页，228—229页，296—297页。

加到七亿一千四百万元。① 1931年发行的政府债券总数达四亿一千六百万元，超过了1929和1930两年的总和。②

上海银行界为弥补政府这种日益增加的赤字而购买了公债的大头。但是到了1931年中期，这样的市场饱和了。尽管宋子文竭尽各种努力，例如为推行他的计划而召开会议、一再扬言要辞职、怂恿上海银行家出面疏通，然而他始终无法说服蒋介石削减军费开支。宋子文财政改革计划的失败，引起了对政府公债信用的怀

① 《财政部民国十九年——二十一年度财政报告》，第11页。

②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0—373页。

疑。宋子文公债政策的基石开始动摇，而这些公债券将来能否偿还也成了疑问。银行界开始谨慎地对待政府新发行的债券。

1、广州的分裂运动与上海公债市场

1931年春季，新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削弱了公债的价格。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由于与蒋介石在执行临时宪法（即《训政纲领》——编者）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于1931年2月辞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采用软禁的办法来报复胡汉民，这样就触发了一场以广州为中心的新的反蒋运动。文职领袖人物孙科、汪精卫、唐绍仪和陈友仁等联合了广州的军事长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并于1931年5月27日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宣布反对蒋介石。① 广州政府扣留了广东、广西两省的税收，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宋子文的财政源紧张并且削弱了南京政府债券的信誉。上海交易市场对政治风云的起伏是非常敏感的，因此公债的市价开始下跌。②

宋子文的公债政策又成了南京与广州之间争吵的主要问题，这样就更进一步增加了交易市场的政治敏感性。在对南京政府的攻击中，广州集团特别把公债政策问题提出来加以抨击，并且暗示，广州集团一旦取得权力，将不会为这种公债的信用承担责任。广州集团宣称："发公债，在南京是一件极普通的事……南京自从宋子文管账以来的公债，惟一的用途，是供给蒋介石穷兵黩武。"广州领袖人物还抨击宋子文经营公债的黑幕。据他们揭露："一部分充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入蒋介石宋子文的私囊。"③

① 《中华年鉴，1932》，第528—530页；第538—548。

② 《公债风潮之经过》，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25日；赖仁航（音）：《动摇的民主主义者：孙科生平，1891—1949》（哲学博士论文，伊利诺大学，1976），第137页。

③ 《南京所发之八千万元赈灾公债》，载《中央导报》1931年9月9日，第2—3页。赖仁航：《动摇的民主主义者》，第123—129页。

广州集团特别将宋子文对发行军事公债的积极卖劲与对赈济水灾的敷衍塞责作了对比。1931年，华中地区长江泛滥成灾。当年9月，立法院建议发行九千万元的公债作为赈济水灾之用，但是宋子文断言市场只负担得了一千万元。最后达成妥协，批准发行八千万元，但是实际上只发行了三千万元。广州集团的领袖们尖锐地谴责宋子文的这种行为。他们揭露说，宋子文真正担心的是救灾公债的发行会影响军费公债的销售，而且救灾公债的使用将被立法院控制而不掌握在他宋子文手里。他们又指控说，宋子文唯恐不能照例从中捞取非法利润。①

与此同时，与广州分裂运动有联系的《民众论坛报》对准了"宋王朝"进行猛烈攻击。它将宋子文手中的财政管理称之为"南京政府弊政的实例"。② 这家杂志对宋子文用大打折扣和提高利率等办法发行公债一事进行谴责，并指控宋子文，以四亿元的实际收入为政府换来了九亿五千五百万元的债务，它断言，"南京集团迄今为止都在不断地破坏健全的财政制度的基础"，"共产党破坏了乡村，南京政府摧毁了城市"。②

广州集团发布了一个财政方案，要求清理国内外的所有债券。旧的公债应该兑换成一种降低利率和延长偿还期限的新的统一公债。这样的整顿会使付应债务的支出大为减少。③广州集团的这个计划一宣布，上海银行家便大为惊恐。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现，银行家们就要受到很大损失。

南京与广州之间关系继续恶化。中国似乎濒临一场大规模内战的边缘。然而由于日本人1931年9月入侵满洲，才迫使蒋介石与广州方面谋求妥协。蒋介石于1931年10月14日释放了胡汉民。

① 《南京所发之八千万元赈灾公债》第2—3页；《蒋中正的党治精神》，载《中央导报》1931年9月6日，第一页。

② 傅秉祥（音），《宋王朝》，（宋子文家族）《民众论坛报》第四期（1931、6—7月），第133—136页。

③ 《南京政府的货款政策，《民众论坛报》，第4期(1931年，6—7月)，第120—122页。

② 黄慎之，《中国财政整理问题》，《中央导报》1931、8、5 59页。

一星期以后，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和伍朝枢到达上海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和广州召开。①

双方谈判在11月份一直持续进行，而蒋介石敦促要广州的领袖人物到南京来一同举行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两派联席会议。以孙科为首的广州代表团宣称，只要蒋介石还在台上，他他们就拒绝妥协。迫于国内强烈的政治压力，蒋介石于1931年1月15日辞去本兼各职，为组成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宋子文在同一天离开了政府。② 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2月22日至29日在南京联合召开，选举孙科为行政院长，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参加了全会开幕式，并于当天（12月2日）下午离京，稳退于家乡奉化。③

2、上海公债行情暴跌，1631—1932

日本人入侵满洲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使公债行情大跌。日本人9月18日入侵满后的六天内，上海五种主要债券的平均市价猛跌到它们的票面值60%以下。这表明这些公债从1931年9月1日的价值跌了四分之一（见表八）。日本人侵满洲不仅给南京带来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困难，而且也增加了这个政权在财政上的困难。原来靠满洲的收入来维持的张学良的军队退到河北、山东，成了南京和宋子文的一个沉重负担。④

到1931年12月1日，上海交易市场上的几种主要债券的价格跌落到它们票面值的一半，12月23日，也就是蒋介石离开南京去奉化的第二天，公债市场跌落到最低点。公债只有在低于票面值40%的条件下才能成交，如表八所示，它们从9月1日的价值下

① 《中华年鉴，1932》，第544—553页。赖仁航：《动摇的民主主义者》，第144—145页。

② 《中华年鉴，1932》，第544—553页。

③ 同上；《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日。

④ 《公债风潮》，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25日。

跌了一半。

这样的价格是极低的，因为本息的支付都要按票面价值计算，而且这些债券的大多数又都是些短期的，偿还的比率很高。以《民国廿年江海关短期付税库券》为例，这种债券就为1932年1月份带来0.8%的月息支付，和每月要付的1.1%的本金偿还，并且都要按票面价值计算。由于这种债券只能以相当于票面价值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因此，实际年利和还本的费用大约等于这种债券的市场价格的70%。①

公债市场的暴跌对上海金融资本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本来银行拥有政府的债券可以视为投资，也可以当做他们的银行钞票的储备金。他们利用以往从债券方面获得的巨额红利来以高利率吸引定期存款。他们对私人贷款也用债券做保证。在不到四个月内，公债价格跌落了50%这一事实，使上海银行家们在债券上损失了几亿元。他们的储备金不足以保证他们的银行钞票，他们的投资资金又陷于冻结，于是便引起了现金短缺。存户唯恐银行倒闭，开始抽出存款并把银行钞票兑换成白银。金融市场紧张起来。由于政府公债市场的不景气，导致两个银行倒闭，好几个钱庄和银行处于极为拮据的状况。许多上海资本家以个人身份投资于政府公债，常在差价上投机。很多人由于缺款而被迫以低价出售债券，遭到了严重损失。②

①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债券汇编》（1971年华盛顿重版），第324页。在1932年1月"《民国廿年江海关短期付税库券》的票面价值是七千二百八十万元。当月支付利息是五十万二千元，即票面价值的0.8%。偿付金八十万元，即票面价值的1.1%，所以1932年1月还本付息额是票面价值的1.9%。由于这项债券大体以其票面价值三分之一的价格成交，所以实际月总支付是5.8%—所以年支付大体是69.9%。

② 李紫翔《中国的银行之特质》，第36页；《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1月30日，第282页。

表　八　　上海交易所的政府主要债券行情表

1931年8月至1932年1月

日　期	平均价格	票面价值	平均价格为票面价值的百分比
民国十八年关税库券			
1931年8月1日	51.25	63.07	81.3
9月1日	50.50	61.51	82.1
9月24日	40.10	61.51	85.2
10月1日	40.50	59.94	67.6
11月1日	39.50	58.36	67.7
12月1日	33.50	56.77	59.0
12月23日	28.00	56.77	49.3
12月31日	31.50	56.77	55.5
1932年1月6日	29.50	55.18	53.5
1月12日	28.50	55.18	51.6
1月20日	27.00	55.18	48.9
1月25日	25.00	55.18	45.3
民国十九年关税短期库券			
1931年8月1日	67.25	86.80	77.5
9月1日	69.00	85.60	80.6
9月24日	53.00	85.60	61.9
10月1日	58.75	84.40	69.6
11月1日	51.00	83.20	61.3
12月1日	47.00	82.00	57.3
12月23日	35.00	82.00	42.7
12月31日	42.50	82.00	51.8

民国十九年关税短期库券

1932年1月6日	40.00	80.80	49.5
1月12日	38.50	80.80	47.6
1月20日	36.50	80.80	45.2
1月25日	35.50	80.80	43.9

民国十九年善后短期库券

1931年8月1日	66.75	86.80	76.9
9月1日	68.00	85.35	79.7
9月24日	52.00	85.35	59.5
10月1日	58.00	84.40	68.7
11月1日	49.25	83.20	59.2
12月1日	40.50	82.00	49.4
12月23日	32.00	82.00	39.0
12月31日	39.50	82.00	48.0
1932年1月6日	36.75	80.80	45.5
1月12日	34.75	80.80	43.0
1月20日	31.75	80.80	39.3
1月25日	32.25	80.80	39.9

民国二十年关税短期库券

1931年8月1日	64.75	96.00	67.4
9月1日	66.00	95.00	69.5
9月24日	50.00	95.00	52.6
10月1日	56.00	94.00	59.6
11月1日	47.50	93.00	51.1

民国二十年关税短期库券

12月1日	40.25	92.00	43.7
12月23日	30.25	92.00	32.9
12月31日	37.00	92.00	40.2
1932年1月6日	33.00	91.00	36.3
1月12日	30.00	91.00	33.0
1月20日	29.50	91.00	32.4
1月25日	31.00	91.00	34.1

民国二十年统税短期库券

1931年8月1日	64.25	98.00	65.6
9月1日	66.25	97.00	68.3
9月24日	50.00	97.00	51.5
10月1日	52.00	96.00	54.2
11月1日	44.25	95.00	46.6
12月1日	43.50	94.00	46.3
12月23日	29.00	94.00	30.9
12月31日	37.00	94.00	39.4
1932年1月6日	32.50	93.00	34.9
1月12日	31.00	93.00	33.3
1月20日	28.00	93.00	30.1
1月25日	29.50	93.00	31.7

五种主要库券的平均市价

日　　期	平均市价占票面价值百分比	指　　数（1931年9月1日）=100
1931年8月1日	73.7	97.4
9月1日	75.7	100.0

五种主要库券的平均市价

日　　期	平均市价占票面价值百分比	指　　数（1931年9月1日＝100）
9月24日	58.1	76.8
10月1日	63.9	84.4
11月1日	57.2	75.6
12月1日	51.2	67.6
12月23日	39.0	51.5
12月31日	47.0	62.1
1931年1月6日	43.9	58.0
1月12日	41.7	55.1
1月20日	39.2	51.8
1月25日	39.0	51.5

资料来源：每日市价系引自《中行月刊》3卷(1931年9月)76b；3卷(1931年10月)72b；3卷(1931年11月)84b；3卷(1931)年12月)90b；4卷(1932年1—2日)176b；4卷(1932年3月114c。正常价值取自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债券汇编》(1935年版，1971年华盛顿再版)142—143页，228—229页，252—253页，256—257页，324页。所有百分比和指数的数字均取自上述各书。

日期按以下情况选取：

1931年8月1日　随机
9月1日　随机
9月24日　沈阳事变后行情低落
10月1日　随机
11月1日　随机
12月1日　随机
12月23日　蒋离京回奉化后行情低落

12月31日	新年停业前的最后一天交易。
1932年1月6日	新年停业后第一天开业。
1月12日	因孙科宣布停付公债本息而停业前的最后一天交易。
1月20日	行政院宣布继续支付债券后而开业的第一天。
1月25日	三个月的停业（市场停业直至1932年5月2日）前一天的营业。

3，孙科政府与上海银行界

孙科得不到中央和省的党、政组织的足够的支持来建成一个能够稳定存在下去的政权。尽管孙科一再努力设法想要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三人参加他的政府，但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这三名常委都不愿参加。孙科在1月初曾两次到上海去说服汪精卫，并且派了冯玉祥和何应钦到奉化去劝说蒋介石返回南京。蒋和汪已经联合起来，不支持孙科，希望迫使孙科辞职。孙科还拍了电报给广州的胡汉民，但胡显然察觉到实际上是蒋介石在控制着南京的局势，因而不敢返回南京。①

孙科面临着紧迫的经济破产问题。当他到达南京时，国库空空如也，而军费开支却每月需要一千六百万元，但是孙科每月能筹集到的款项只有六百万元。上一次发行的八千万元的金融短期公债已经抵押进去以弥补中央银行的透支和别的银行的贷款，其中一千万元已经过期。② 孙科被迫承认“眼望着国家而临崩溃，……如果不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出这个死胡同。③

① 《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1日；1932年1月18日；《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1月16日，第200页。
赖仁航：《动摇的民主主义者，第154—155页，第161页。

② 《停付内债本息风潮》，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1日；《公债风潮》，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25日。

③ 孙科：《国家面临的问题》，载《民众论坛报》第1卷(1932年，1月16日)，第125页

孙科政权的敌人制造了许多财政困难。多数省的政府效忠于蒋介石，因此蓄意与孙科政权作对。他们扣留了统一盐税，使孙科无法治理国事。① 江浙的军事长官中许多人公开表示反对孙科，要求蒋介石回来。这些军事长官要挟孙发军费，而这在当时显然是无法筹集的。② 据张嘉森记述，宋子文所将有的文书档案都从财政部搬走了，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③ 宋子文也公开预言孙科政府维持不了三个月，以损坏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信任。④

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面对着这种危机，他的职位是不值得羡慕的。迫不得已，黄只好求助于上海银行界。当孙科是铁道部长时，黄曾任次长，所以他与上海银行界有点关系。黄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经理。该行虽也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成员，但因为黄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所以他对上海银行界既缺乏联系，又无甚影响，不足以进行有效的交涉。⑤ 由于广州集团先前曾经攻击过宋子文的公债政策，所以上海银行界对孙科很不信任。他们对孙科统治才能的不信任和怀疑，体现为公债价格的跌落。但公债跌价反过来又耗干了银行家的流动资产，这样就限制了他们对政府进一步贷款的能力。

黄汉梁试图加强银行家们对新政府的信任。为此，政府任命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和上海市商会及浙江银行集团的头面人物林康侯为财政部次长。黄保证："竭尽一切努力……来严格支持赔偿基金，以便政府能履行偿还债券的责任。" ⑥ 1月4日，黄亲自与银行界首脑人物会面，保证财政管理要公开，并且答应立即

① 《公债风潮》，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25日；《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1月16日，201页。

②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载《传记文学》23期（1973年7月）第92页。

③ 张嘉林：《中国的第三势力》（纽约，1952年），第101页。

④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载《传记文学》23期（1973年7月）第91页。

⑤ 《公债风潮》，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25日；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第91页。

⑥ 黄汉梁：《节约与改革》，载《民众论坛报》第一卷（1932年1月9日），100页。

召开经济会议。① 到了1月10日，黄公开表示政府能征集到所需的经费以履行其职责。②

新政府采取了一个稳定公债的计划，期望由此而能增加公债的销路。计划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用它们总资本的10%来购买政府公债。今后只有政府公债才能作为银行钞票的非现金储备。财政部与上海银行界将要设立一定的机构来稳定公债的价格。③

黄的努力见效有限，政府每月仍有一千六百万元的赤字。黄要向上海银行家借一千万元的紧急贷款时，仅借到三百万元。④发行新公债仍然不可能。旧的公债券的价格只比12月23日的最低价稍高一点。新年后开业时，如表八所示，证券交易所内几种主要债券只能在它们票面价值的40%左右成交。

潜伏着的省际矛盾突然爆发，妨碍了黄的计划的实现。广州集团在新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使长期郁积着的不满燃烧起来，导致广东派浙江系在党内、政府内和工会、学生及商业的一切组织中发生纠纷。广东派的领袖们夺得了上海市总工会的控制权后又把这种纠纷扩散到新改组的上海市商会里去。⑤

广东籍的冯培熹，是原上海总商会主席。1929年春天，当上海市国民党当局要改组上海商业团体时，冯进行了抵制，因而被撤换。蒋介石下野后，冯培熹作为上海广东帮的领袖，曾经组织了一个广东商人团体企图把上海市商会强行夺回。冯采用了上海市国民党当局1929年春天与上海总商会发生争执时使用过的那种粗暴手段，利用了上海市商会位于公共租界内属于中国主权管辖的天后宫里，公共租界的外国警察不得进入天后宫区域的有利条

① 《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1月9日，第169页。

② 《中国评论周报》1932年1月21日，第75页。

③ 《金融与商业》1932年1月6日，3页。

④ 《公债风潮》，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25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12月29日，113页；1932年1月2日，第132页。

件。虽然在短暂而激烈的争夺中，冯培熹一伙被打败了，但是这一事件并没有缓和浙江集团与广东派新政府之间的关系。①

鉴于黄汉樑的失败，孙科采取了更直接的行动——停止支付所有的政府债券的本息。向来在海关税和盐税的月收入中，有将近一千五百万元是指定的偿债基金。孙希望用停付公债本息对上海银行界施加压力，而且以为这样做从理论上说来就能抵消他每月一千六百万元的亏空。事实上，由于许多省，包括广东、福建、山东等省在内，没有把他们的税收上缴给南京，所以这一千五百万元并不是全都可以到手的。②

1932年1月12日，包括孙科、李宗仁、冯玉祥、吴铁城和陈铭枢在内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10人特别紧急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孙科和陈铭枢的动议案，暂停偿付公债本息六个月。次日，1932年1月13日，公布了这个决定。③

关于暂停偿付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上海。1月12日下午，一群银行家拜会孙科，询问有关停付的问题。当孙科证实这一报道后，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立刻停止交易，以免公债价格完全崩溃。那时，政府公债只能以沈阳事变以前的一半价格卖出。④

1932年1月13日，上海各银行发生了挤兑的情况。银行钞票的储备金中60%是现金，40%是保证债券，而大部分是政府的公债。停付公债本息后，这些公债实际上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于是银行便缺乏适当的储备金。钱庄一向是使用银行发行的钞票的，在1月13号也开始抛出这种钞票，而竞相争购外币，银行界在那天召开了紧急会议，以应付这种危机。⑤

一场抗议停付的风暴发生了。黄汉樑和林康侯二人都曾强烈反对过孙科的做法，所以他们于1932年1月13日辞职。上海银行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12月29日，113页；1932年1月2日，第132页。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8日。
③ 引文同上。《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8日。
④ 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8日。
⑤ 《益世报》1932年1月14日，收于波多野乾一《现代支那的记录》1932年1月，第167—170页。

业同业公会和海钱业公会联合打电报到南京谴责这种做法。上海市商会和偿债基金委员会也跟着响应抗议。1月15日，天津和北平银行界也打电报到南京表示反对。①

国内债券的持票人会是反对停付的最重要的团体。这个团体是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和张啸林领导的。②还在停付的决定宣布以前，持票人会就曾经向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召集全国会议，并且抱怨道："近来公债价值的暴跌……国家金融可悲的窘困"威胁着"政府的信用和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③1月12日，上海紧急会议这天，持票人会就打电报给南京反对暂停偿付的决定。④

青帮头目们如此强烈反对孙科，使人想起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杜月笙和张啸林是上海最有势力的人物。他们对银行界的支配力量不能等闲视之。在支持国家公债方面，杜和张自有其金融利益，因为他们都是好几家"合法"银行的老板、经理或者董事，而且杜又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董事。这个证券交易所大量地经营政府的公债。不过后来有两次他们两人都曾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公债的减息展本计划，一次是在1932年2月，另一次是在1936年1月。1936年那次的情况是，上海银行界强烈反对公债偿付的减息展本计划，但是在那次有张啸林出席的持票人会上，他只是随便恫吓了一下，银行家们便乖乖地赞成减息展本偿付了。⑤尽管缺乏直接证据，然而杜和张在1932年1月却反对停付的做法，也可以解释蓄意损害孙科政权。他们俩人这样反对孙科，也可以说明孙科难以得到上海银行界支持的一部分原因。

---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8日；《中国评论周报》1932年1月28日，106页；姚嵩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第11部分，载《传记文学》第27卷（1975年9月），第101—102页。

② 《公债风潮》，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25日

③ 《金融与商业》1932年1月13日，3页。

④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18日；参阅姚嵩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第11部分，103页。

⑤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123—124页。

孙科与银行界之间的争执终于导致了悄悄进行的谈判。1月13日，与蒋介石及浙江银行界都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张人杰，与前上海市长张群进行了接触，请求张群出面调解。1月15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和上海市财政局长蔡增基会见了上海商界的领袖们。杜月笙和张啸林代表持票人会；张嘉璈代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秦祖泽代表上海钱业公会；王晓籁代表上海市商会，李铭代表偿债基金委员会。①

吴铁城解释说，政府已将开支削减到每月一千八百万元之数。这是全国性危机时期唯一可能的最低数额。然而政府每月的收入仅有七百万元，赤字将达一千一百万元，这一点银行界无论如何要帮助弥补。银行界则坚持，政府不撤回停付公债本息的决定，他们就不可能贷给政府多于每月五百万元的贷款。只有待金融市场大大松动以后，银行界才有可支配的资金。②

张人杰前往南京向孙科转达了银行界的要求。为了获得他所需要的款项，孙科同意妥协，并撤回停付的决定。1932年1年17日，行政院电告上海各金融组织，宣布支持公债的信誉。次日，中央政治委员会议特别紧急会议，将与银行达成协议的四部分概括为：第一，政府将撤销停付决定；第二，孙科将挽留黄汉樑和林康侯留任；第三，政府需要向银行界每月借款一千万元，为期两月；第四，双方将在不久召开的一次财政会议上进一步解决有关问题。③

1月19日，银行界答应每月贷给南京八百万元，比孙科要求的少了两百万元。黄汉樑于1月18日返回财政部视事，并于1月22日将八百万元的贷款手续办好。证券交易所于1月20日重新开盘。虽然公债的售价很低，但是比较稳定。④

---

① 《公债风潮》《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1月25日。

② 同上。

③ 《公债风潮》。达成的协议由杜月笙，张啸林、张嘉璈、秦祖泽、王晓籁和李铭等人正式转达他们各自代表的组织，

④ 《公债风潮》。

这项贷款还不足以使政府摆脱困境，广州集团严厉地攻击银行界的态度。《民众坛报》提到这项贷款协议时，在一篇题为“掠夺性的金融界”的文章中说：“虽然已经答应给政府一笔贷款，但条件是政府必须继续分期支付（原文如此）相当于这笔贷款两倍的数额，以清偿在道义上不该由它负责的沉重债务”。。文章说“在这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要为公众的利益作出牺牲，但是……银行界却反而提出了他们的极不合理的要求。”①

文章并且暗示，银行界之所以拒绝支持南京，是为了要逼迫孙科下台。“自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银行界认真地企图对政府的日常经费进行扣勒，……如果有人……如果把银行界对今天的国民政府的态度与他们对先前的南京政府的态度加以比，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如果有人要问银行界的先生们究竟是为国家利益还是只为某一派别利益服务，难道不是有理由的么？”②它把现今贷给政府的每月八百万元与宋子文在1931年一年就发行了四亿一千六百万元(尽管不是按票面价值)的公债券加以对比之后，这种论点就显得更有说服力。

孙科的治国无能暴露愈发明显，军队和党内的首脑人物吵闹着要蒋介石重新上台。与宋子文、孔祥熙在杭州进行广泛的商议以后，蒋介石于1932年1月22日由汪精卫陪同返回南京。1月24日孙科辞职下台，接着是不少要员辞职。根据商定安排，改组后的政府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③

孙科政府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星期。他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也许是由于那些忠于蒋介石的党、政、军机构中不少人反对孙科，同时也由于孙科未能取得汪精卫或胡汉民的支持。尽管如

① 《掠夺性的金融界》，载《民众论坛报》第1期（1932年1月23日），第41—48页。

② 《掠夺性的金融界》。

③ 《中华年鉴，1932》，第241——242页。

此，经济崩溃仍是孙科最严重的问题，而有些研究孙科失败原因的论文，则在较大程度上归咎于上海银行界拒绝支持新政府，例如《中华民国人名辞典中“孙科传”说“孙的努力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他没有取得象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样的重要人物的支持”。①钱端升认为孙科“很少有机会去战胜蒋介石的军界和金融界支持者的破坏阴谋”。②

虽然除了上海银行界被指控为蓄意破坏这一点值得商榷以外，其它说法一般而论是正确的，实际上，上海银行界能够给孙科的支持是有限的。他们在1931年秋季由于公债市场的低落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的流动资金大多投放在公债上，而这些公债在四个月内就损失了一半的价值，

归根到底，和其它因素比起来，杜月笙和张啸林有意和孙科作对是影响上海银行界态度的较为重要的决定因素。1932年1月的情况与1927年秋天的情况很相似，那时蒋介石辞职下野，一个国民党的新联合政府掌了权。当时孙科任财政部长。在1927年春、夏，蒋利用青帮的关系控制了上海，在蒋介石的“恐怖统治下”，每月敲榨勒索到近二千万元的收入。但当孙科一上台，尽管反复与上海银行界商议，孙每月只能筹措到八百万元③。现在，1932年1月，由于孙科没有青帮作“爪牙”再一次有效地压制银行界，所以一上台就遇到了困难。尽管黄汉樑一再协商，银行界只答应每月贷给五百万元，孙科的王牌——停付公债本息，也只争得三百多万元。蒋在上海的爪牙——杜和张——仍然忠于蒋介石，并且煽动反对孙科，银行界也积极配合，使孙科一筹莫展。

---

① 包华德：《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3卷，第164页。

②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和政治，1912——1949》（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0年），第97页。

③ 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9660/893，《美国驻沪领事克宁翰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代办迈耶》，1927年11月12日；
美国国务院893/9706，《克宁翰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克漠》，1927年，12月12日。

4. 宋子文复职和整理公债

蒋介石和宋子文一复职，就面临严重的危机。由于1932年1月18日上海中日两国平民之间的一起事件，和1932年1月22日，日本军舰开到上海，中日关系突然紧张起来。1月28日黎明前，日军从公共租界日本区出发，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区，战事在扩大，包括空军对人口稠密区的轰炸，摧毁了闸北地区及其周围地带。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公共租界。①

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广东人居多的第十九路军。陈铭枢是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是1931年秋天从江西开到上海的。陈铭枢在孙科政府内曾任行政院付院长。十九路军誓死作战到底，并且实际上进行了英勇抵抗。

蒋介石极力要限制冲突的范围。1月29日，中国向国际联盟呼吁，请求以国联的名义进行干涉。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迁移到了洛阳，并且宣称不愿对日本宣战，而只限于自卫。政府声明说："只要日军不对中国施加暴力和侵略，中国政府就不会对他们采取敌对行动。"②战事持续了一个多月。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从中调解，于1932年3月3日开始停火，由于中国的屈服，于1932年5月5日达成协议。③

上海事件使上海的商业陷于停顿。包括规模很大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在内的、位于闸北的许多工厂、商店和钱庄被毁。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银行，商店，工厂和中国居民区的同类行业一起，以停业来抗议日军的暴行。所有证券交易所也在

① 《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2月22日。

② 《一华年鉴，51236》第61页。

③ 《上海市公共租界工业局1932年度报告》（上海，1932），第31—32页。

1月25日停业，在整个战事期间一直关闭。①

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上海，而现在上海商业的停业，给已经被孙科的一幕插曲搞得千疮百孔的国家财政以严重的打击。宋子文立刻采取行动来扭转局势。2月7日，宋打电报给各省的军事长官，要他们停止扣留国家税收——这是孙科政府时期十分普遍的做法。宋子文警告说这些经费的支出必须直接由中央政府来处理。他同时还宣布了一个极为紧缩的计划，从政府部长直到步兵士兵的薪饷都要削减。他命令所有政府机关要严格压缩支出，用宋的话说："当此危急时刻，那怕暂时把它的一切剥得精光，也不影响政府的存在。"②

这个紧急方案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但是它也有可能被洛阳政府用来作为他们对十九路军据说未加支援的托辞。十九路军正承受着守卫上海的正面压力。虽然由于争论而使整个上海事件的真相变得模糊起来，然而人们时常指控蒋介石主张绥靖政策，因为他对十九路军的支援微不足道。例如，上海地方的国民党部和上海市总工会，在1932年2月间曾联名打电话给洛阳，抗议蒋对十九路军缺乏支援。③这种指控在事实上是否准确，则不十分清楚。蒋介石的辩护士们说，蒋是主张抗日的，但在公开场合他只能号召克制，以避免战事扩大。④不论真相究竟如何，政府的紧

---

①杨荫溥：《淞沪抗日战争与中国金融》，载《新中国》，1933年1月25日，第45—46页。

《国内要闻》，载《银行周报》1932年2月9日；1932年2月16日。

在1932年2月4日，为了公众的利益，上海市商会决定凡是不在战事区域银行和米店都要重新开门营业。

② 《财政部民国十九年——廿一年报告》，第1页。

《国内要闻》载《银行周报》1932年2月9日；1932年2月16日；《国内一周大事日书》，载《国闻周报》1932年2月22日。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3月12日，第34—35页。

在孙科政府执政期间，上海地区国民党党部和上海市总工会曾被广东集团加以改起。

④ 有关上海一·二八事件期间蒋介石与十九路军之间争执的详细论述，参阅伊斯门《流产的革命》，第91—92页。

缩为只给十九路军以有限的一点援助提供了借口。

上海事变和宋子文的紧缩计划成了政府改变公债偿还规定的借口。宋子文的方案与先前广州集团提出的计划很相似。宋的建议是通过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把政府对公债持票人的偿付几乎削减一半。对债券的利率要压低，还本的期限也要延长。

1932年2月18日，宋子文在上海与许多银行界领袖人物讨论他的主张。持票人会、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上海钱业公会和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全都出席了。基本上就是一月间与孙科会谈的那些团体。杜月笙和张啸林两人都参加。①但是那个曾经向孙科提出了极不合理的要求的银行团体，此时，一下子变得很“爱国”，接受了大大压低的公债本息偿付方案。尽管这个计划的实现要给他们带来严重损失，但他们除了接受别无选择。银行家现在没有用来对付孙科的那种神通了。蒋介石对党、政、军机关的控制能力要比孙科强得多。杜月笙和张啸林为首的持票人会赞成整理公债，这一点或许也与上述的原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作为保全政府面子的一这姿态，银行家们甚至同意把即将公布的公债减息展本方案说得好象是持票人自愿提出的办法。用张嘉璈的话说，银行界想要“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以便它集中力量于国防措施。”②

在1932年2月24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整理公债。洛阳方面声称过去政府已经履行了它对持票人的一切责任，“但是由于公债市场受到上海事件的影响而陷于瘫痪，致使国家的财政处于停滞状态”。“政府认为解决这个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将债券的利率减低和延长偿还期限。”③

---

① 《申报》1932年2月20日，第2页；《国内要闻》，载《银行周》》1932年2月23日。

② 《中国银行年度报告，1933》（上海，1933），第41页；艾萌，《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第18页；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第102页。

③ 《中新年鉴》，1932》第472页；中央银行债券汇编》第543页。

政府保证每月从关税中拨出偿债基金八百六十万元作为公债偿付之用。这个数字比原先几乎减少了一半。各种债券的利率统一降低到6%。由于延长偿付期限的结果，实际偿付几乎减少了一半。政府的命令还保证，这个新规定的条件一定不再变更，今后不再减息。“不论政府的财政在最近或将来处于何种状况，已经确定的国债基金绝不用于有违宗旨的用途。”

1932年2月26日，持票人会以上海各金融团体的名义发表声明，接受整理公债的命令，并号召持票人与政府密切合作。声明提出了他们接受整理的重要条件：第一，政府今后要公开报告国家的财政情况，并且要贯彻一个紧缩开支的计划，从今以后要正规地严格地执行国家的预算制度，并且要允许各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新的全国财政委员会。第二，政府今后不再向金融团体举债为内战及政费之用。最后，声明指出，持票人既因国难，牺牲个人利益，竭诚拥护国家，自此次减息展本之后，无论政府财政如何困难不得牵动基金变更所定办法。宋子文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发表声明说，“持票人为了公众利益，已经毅然同意作出个人牺牲。”①据说。除了这项公开的保证外，宋子文口头上还答应今后四年内不再发行国内公债。②

1931年11月曾经正式宣布成立新的全国财政委员会，但是由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辞职，所以实际上那时并没有履行职责，全国财政委员会的职责是准备编制国家预算，审查财政部关于政府的财政开支，起草有关政府开支的公开报告，并且防止拨款去打内战。在2月协议中，宋子文答应持票人有权派代表参加新的全国财政委员会。他断言这个委员会能够防止政府的赤字开支和保证将来的公债偿付。③

① 《中华年鉴，1932》，第472页；中央银行《中国债券汇编》，第545—549页。

②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第122页；王了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439页；艾萌：《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第18页。

③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1年11月23日；《国内要闻》载《银行周报》1932年6月7日。

但是到1932年6月6日，当全国财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宣布后，上海资本家大失所望。虽然在这个有卅七名委员的机构中包括了十一名银行界和工商界的代表，但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员。在三十七名委员中就有八个将领，三个院会长官，六个正副部长和六个其它党、政官员。汪精卫是全国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宋子文为副主席①

这个全国财政委员会看来未必能够尽责。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说，“当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陈济棠、李宗仁、何应钦和韩复榘等军事将领都是全国财政委员会的委员时，这对宋子文主张要使这个机构能够保证防止拨款去打内战的主张，不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讽刺吗？他们在向财政委员会提出要求增加内战军费的时候，我们能奢望他们会来反对他们自己吗！”该报也指出财政委员会是被委托来监督国家预算，审查账务，和对行政院和财政部发挥制约作用的；然而汪精卫和宋子文都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付主席，同时，他们两人又是行政院的院长和付院长兼财政部长，”那岂不成了他们自己监察自己吗？”该报的社论说：“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政府更荒唐可笑的了！”②

整理公债协议的一部分，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的编制要有所改变，以便持票人会享有代表权，该会得在那个十九人委员会中占据五名席位。原来任命的五个商界代表中，要减少两个，从上

---

① 《益世报》1932年6月9日，收入《国闻周报》编《论评选集》1932年6月13日。

全国财政委员会的成员是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陈济棠、李宗仁、何应钦、韩复榘和陈铭枢；这些人全都是军事将领；还有汪精卫行政院长；于右任监察院长；邵元冲，代理立法院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张寿镛，财政次长；顾孟余，铁道部长；陈公博，实业部长；朱家骅，交通部长；黄绍竑，内政部长；蔡元培，中央研究院院长；张人杰，全国建设委员会主席；还有党政人员孔祥熙、范旭东；李石曾是国民党元老；刘瑞恒，公共卫生局长兼禁烟委员主席；钱永铭、吴鼎昌、周作民、李铭、张嘉璈、胡云、卢学溥、淡荔孙，都是金融家；荣宗敬和刘鸿生，工业资本家；虞洽卿，商业资本家；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教育家晏阳初；和知识分子胡适。

② 同前。

海市商会和全国商会联合会各减一个，李铭仍任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的主席。①

整理公债的协议是宋子文在政治的上和经济上的一次重要胜利。从财政上看，由于有了这个协议，政府仅在第一年就节省下了大约八千五百万元至一亿元的公债偿付款项，将这个数目与1932年度的总收入六亿八千三百万元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②从政治上来讲，这个协议也是对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就一直在为之奋斗的那些主张的赞同和支持。持票人接受整理公债的条件是公开财政，严格控制预算和紧缩开支及坚决结束发行公债作非生产性的开支。实际上，这些基本上就是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提出过的重要主张。现在中央政府对他这些奋斗目标公开表示承诺。

这次整理公债使那些困难重重，伤透脑筋的银行家们损失惨重。上海公债市场自1932年1月25日以后就已关闭，紧接着又是整理公债，所以直到5月2日才重新开业。与此同时，上海战事又损害了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出现了存户大量提取存款的现象。银行界发现他们在公债上的投资全都冻结了③由于这个整理公债协议，公债的价值大为跌落，以1932年应偿本付息的《民国二十年关税短期库券》为例，按票面价值每百元应偿付一元八角三分的数字，但是在2月整理以后，减少到每百元只偿付九角四分。④因此，尽管府政1931秋情况有了，市场也已经重新开放，但公债价格仍然很低（见表九）。主要的债券只是以其票面价值的40%—55%的价格成交。这虽比1932年1月间的最低价有所提高，但是仍远低于1931年秋季危机前的水平。

① 中央银行编《中国债券汇编》，第552—554页；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49—150页。

② 《中华年鉴，1932》，第470页；《财政部民国十九年一廿一年报告》，第1页，第4页。

③ 《中国评论周报》1932年2月25日，第185页；杨荫溥：《淞沪抗日战争与中国金融业》，第45—84页。

④ 中央银行编《中国债券汇编》，第324页。

从1931年9月至1932年2月的这6个月，对上海银行界说来曾经是金融上政治上的一场灾难。而且，他们现在比以前更要依赖宋子文了。宋子文对银行界的保证和他影响蒋介石的能力，是整理公债协议对于持票人说来的唯一可靠保证。

表九　　上海交易所政府主要债券行情表

1932年5月—9月

日期（本周内）	平均价格	票面价值	平均价格占票面价值的百分比
民国十八年关税库券			
5月11日	27.60	51.61	53.4
6月1日	28.25	51.95	55.4
7月6日	28.20	50.30	56.1
8月3日	26.65	49.65	53.7
9月7日	25.25	49.00	51.5
民国十九年关税公债			
5月11日	39.95	80.00	49.9
6月1日	39.73	79.00	50.3
7月6日	40.33	79.00	51.1
8月3日	36.52	79.00	46.2
9月7日	35.07	78.00	45.0
民国廿年卷烟税库券			
5月11日	37.10	85.58	43.4
6月1日	35.75	85.14	42.0
7月6日	35.42	84.70	41.9
8月3日	32.35	84.26	38.5
9月7日	31.47	83.82	37.5

资料来源：成交价引自《金融与商业》1932年5月6日，第29页；1932年6月1日第25页；1932年7月6日，第167页；1932年8月3日，第254页；1932年9月7日，第390页。所列成交价，以一周内最高价和最低价相加平均折算。票面价值引自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辑的《中国债券汇编》（1935年版，1971年华盛顿再版）第143页、204页、297页。

5、宋子文与蒋介石在政策上的争执

宋子文在执行紧缩计划和着手整理公债上一开始是有成绩的。当时上海的战事还在继续，蒋介石只得赞同宋子文的紧缩计划。军费支出已经从1931财政年度的每月支出二千六百万元削减到1931年春季每月一千三百万元。这个节省开支的方案，同时加上公债减息延期偿付，使宋子文能够取得盈余。“自1932年2月以来，这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的廿一年中政府第一次能够平衡它的预算。”宋子文在他的1932财政年度的财政报告的末尾这样骄傲地说。①

宋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对日战争的危险刚一减弱，蒋介石对紧缩方案就不感兴趣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上海战事才一停止，军费开支反而立即增加了。②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缓靖政策。他主张在没有把国内共产党的威胁消除以前，南京政府对日本只能采取消极抵抗。蒋介石认为只有缓靖政策才是应付日本军方的唯一可行的短期办法，在他看来，共产党才是对中国人民更加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天，与日本的战争危险才一减退，蒋就开始准备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在国内围剿共产党。

宋子文激烈反对蒋的这种政策。③宋认为抵抗日本侵略比在国内镇压异己更为重要，而且政府应该积极努力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在剿共的军费开支问题上激烈冲突。蒋介石于1932年6月初启程去汉口他的剿共司令部时，要求增加军费开支，从每月一千三百万元增至每月一千八百万元。如果这样做，就必然使宋子文的紧缩财政开支计划流产，而且必得大量发行新公债，

① 《财政部民国十九年——廿一年财政报告》，第1—4页。
② 同上，第1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6月18日，第84页，第107页；《国内要闻》，载《银行周报》1932年6月21日。

这样，只能是背弃宋与上海银行界达成的协议。①

1932年6月3日，当蒋介石命令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时，宋子文与蒋介石的争吵达到了顶点。蒋惧怕这支已经成为中国抗日象征的十九路军。蒋认为这支军队已经构成他权力的威胁。在上海抗日期间，十九路军的长官们成了民族英雄，而他们主张抵抗侵略的态度与蒋的不抵抗的绥靖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然，蒋介石希望这支军队在调到福建后，会在剿共战争中被大大削弱。②

宋子文反对调动十九路军，因为宋认为调动就是公开承认蒋的绥靖政策。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为了抗议蒋介石，都辞去政府职务退居上海。虽然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专程去上海说服宋子文返回南京，但宋子文在6月11日再一次坚持他的辞职决定。③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连珠炮似的抨击。在对新闻记者的一份声明中，宋指出："在最近四个月内，由于厉行节约，国民政府才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了两个目的。"即宋所谓，"实现了一个梦想"和"奠定了建设的永久基础。"宋子文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无法供给反共战争所需的军费。由于日本的侵略使贸易陷于停滞，要增加税收是不可能的。④

宋子文还反对进一步借款，他说："那条路只能导致破产，政局不稳和最后的灾难。我已经非常清楚用短期贷款来弥补赤字这种恶性循环的痛苦滋味。我不赞成走这种自杀性的回头路。"持票人的牺牲已经使得国家有可能平衡预算，但是这种牺牲'不可重复。'宋子文指出日本侵略期间，上海银行界所遇到的困难，"那真是

① 《国内外一周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13日；《申报》1932年6月11日，第8页。

② 伊斯门：《流产的革命》，第92页。

③ 《国内外一周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13日；《申报》1932年6月11日，第8页陈铭枢辞去交通部长职。他的这一职位是在孙科政府垮台不久被任命的。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6月18日，第84页，第107页。

岌岌可危!(当时接近崩溃到了何种程度，只有那些熟悉内情的人才能够知道)"①

最后宋子文对蒋介石为他那反共政策辩解的理由进行了反驳。宋说:"匪患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纯军事现象吗？我们能够指望那种旧式的耗费巨大的军事讨伐迅速奏效吗？""难道匪患和共产主义运动不是由于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处理不当才发展起来的吗？如果我们进行一种虽非轰轰烈烈却是有条不紊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治理，他们的反应不是会好一些吗？……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任何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②

宋子文反驳内战理由的挑战性言论，有些是故作姿态哗众取宠。他在6月16日继续与汪精卫讨论，并且于6月18日暂时恢复了财政部长的身份，陪同汪精卫及外交部长罗文干到北平去。此行的公开目的是去会见李顿调查团（当时正在中国调查满洲事件)，但实际上是去敦促张学良采取强硬措施抵抗日军侵略。宋子文还发表了一项有关满洲税收被夺走的强硬的反日声明。6月23日，宋子文回到上海，重申坚决辞职的决定。经过进一步讨论，汪精卫公开肯定了宋子文的意向。③

尽管多次请求辞职，其实宋子文还是愿意妥协的，而蒋介石为了要使宋留在政府内也显然准备让步。7月2日，汪精卫和何应钦及其他一些南京政府官员与宋会面，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制定一个既能使宋回到政府里来，又能使剿共经费不致中断的方案。宋子文将上海银行家们找来一起谈判，他为银行界五十个领袖人物和代表政府来谈判的官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④

---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6月18日。

② 《国内要闻》,载《银行周报》1932年6月21日。

③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20日；《一周间国内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27日；《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7月4日。

④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7月11日。商谈小组成员除汪精卫和何应钦外，还包括南京方面的李济深将军、顾祝同将军、朱家骅（交通部长)、曾仲鸣（铁道部次长）和刘崇恒（禁烟委员会主席)。在汪精卫与李铭

汪精卫和何应钦向宋子文和银行家提出，要发行一种新公债来弥补反共战争的支出。中国新闻界报道合，为了剿共战争，南京正准备发行两种公债券，① 上海金融界显然极不愿意接受公债。发行新公债是违反整理公债协议的，而且定会把公债市场弄得更加萧条。7月12日，《银行周报》尖锐地提醒宋子文，他在1932年2月间对持票人作过四年内不再发行新公债的保证。①

7月7日，上海谈判达成妥协。宋子文答应复职视事，军费支出从每月一千三百万元增加到每月一千五百万元，比蒋原来要求的少三百万元。7月12日，宋子文保证，不再为反共战争发行新的公债，但是额外的收入将通过提高盐税和其它来源解决。② 这个妥协对上海资本家是个局部性的胜利，因为他们的最密切的同盟者回到了政府职位上，宋子文重新掌握了权力，而且他们有效地抵制了新公债的发行。

在宋子文辞职和复职条件上，贩卖鸦片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很重要但又不便公开的争端。虽然不少消息来源报道宋子文与蒋在鸦片问题上意见分歧，而禁烟委员会主席刘瑞恒也参加了汪、宋之间的谈判，但是整个问题一直包裹得很严，所以这次争吵的性质无从知晓。据英国方面消息称，蒋介石从禁烟委员会获得很大一笔收入。这项烟款是直接交给蒋的军事总部而不经财政部之手。③ 宋子文反对这样做究竟是出于原则立场还是宋自己也有他在鸦片收入上的打算呢？这个问题还不清楚。据北平《实报》报道，作为汪宋谈判的一项结果，不得以政府销售鸦片增加国家

（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及王晓籁（上海市商会主席）之间还有过单独会谈。

① 《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国闻周报》1932年7月11日，引用《上海晨报》和《北平晨报》的原话。

② 《国内要闻》，载《银行周报》1932年7月12日。

③ 《国内一周大事日记》，《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7月1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7月18日。

①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温哥华，1975），第21页《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7月4日；《申报》1932年5月13日，第10页。

收入。①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保证，这样的保证并未兑现，但是蒋介石一直都在接受这种收入，而且后来就是用这种鸦片收入作为资金创办了他的中国农民银行。②

宋子文可能远在1928年就与杜月笙和蒋介石在鸦片问题上争吵过。③1931年 7 月22日，当宋子文到达上海火车站时，刺客的子弹打死了宋的秘书，险些击中宋子文，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与杜月笙在鸦片管制问题上的争吵导致了这起事件。但是，也有消息说这事应由广州集团承担责任。③1934年发生的第二次企图杀害宋的事件，也被人和那样的争吵联系在一起。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反正杜月笙是中国的大鸦片商。他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烟交易，在内地制造，还从伊朗进口。1934年，蒋介石任命杜为上海市禁烟局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掌握中国上海关查获的全部鸦片和进行"处理"。④

6、上海银行界反对军费开支的斗争

在与蒋介石争吵的整个过程中，宋子文都是把上海资本家当作盟友的。例如，在1932年 5 月21日，宋亲自会见了上海商界领

---

① 《实报》1932年 7 月 5 日，第 1 页。

② 休斯(IlonaRalfSues)，《鱼翅和小米》(波士顿，1944)，第57页；香港经济情报服务公司编：《中国的官员是怎样敛聚数以百万计的资财》(纽约，1948)第4页；恩迪科特，《外文企业》，第21页。

③ 美国国务院893/5614，《克宁翰致马克谟的报告》1978年 8 月11日。
《晨报》1931年 7 月24日，收于波多野乾一《现代支那的记录》1931年 7 月，第325—327页；艾萌：《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第15页；王一驹，《杜月笙，1881—1951：尝试性的传记》，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期(1967)第441页。章君谷在《杜月笙传》(台北，1967)第 3 页，第48页中宣称杜月笙与暗杀宋子文未遂事件无关。他断言，这是一个名叫王亚樵的人干的。这个王亚樵在上海开设有一个"暗杀公司"。但是马歇尔(Jonathan Marshll)在他的近来的研究中，仍然坚持说杜可能参与了这起暗杀阴谋，因为杜、宋二人在鸦片专卖的条件上有争议。参阅《关心亚洲学者的通报》第 8 期 (1976— 9 月)，第33页所载《国民党中国的鸦片与流氓政治》一文。

④ 休斯，《鱼翅与小米》，第68—74页；《上海年鉴：1937》，第F—53页。

袖人物，提倡以私人努力援助上海遭受战争蹂躏的地区的善后建设事宜，他同意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来筹措四百万元的善后经费。① 宋子文还敦促上海资本家组织力量支持他的限制反共战争经费的主张。1932年5月，上海市商会、全国总联合会、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5月25日，他们通电全国所有的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文化教育团体及妇女协会，阐明同盟宗旨并且邀请这些组织参加。②

据电报称，同盟的唯一宗旨就是制止内战。中国遭受外国欺辱的原因在于内部混乱。只有制止了国内冲突，中国才有可能抵御外侮。同盟将运用宣传、调解和拒绝合作等三种方式作为它的武器。在和平时期，它将大力宣传内战的罪恶；在战争的威胁实际存在的时候，它将通过广泛代表民意的团体，促使冲突双方进行商谈；如果战争爆发，同盟的所有成员将绝对拒绝与交战任何一方合作。电报邀请一切赞成同盟宗旨的团体或个人参加，不受职业、性别、团体和党派关系的限制。同盟总部将设在上海而以非官方的捐赠为其经费来源。③

以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浙江集团的银行头面人物、国闻出版公司的主席吴鼎昌（达铨）和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全国组织大会。吴鼎昌运用他个人的力量和通过《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的力量，积极推动同盟的事业。④

《国闻周报》指出："如果上海商界不购买政府公债作为直接支持，过去这四、五年的内战就不会发生。"如果现在同盟的成员们都拒绝合作，"那么，军阀就没有军费来供养他的军队，没有钱去购买武器，内战也就会立刻停止。"该报报道了该同盟获得广泛

① 《申报》1932年5月22日，第4页。
② "废止内战运动"，载《银行周报》1932年5月31日。
③ 同上。
④ 吴鼎昌，《废止内战大同盟》，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27日；季鸾，《论废战运动》，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6日。

支持的情况。"这是人民取得政治自主的第一步；这也是人民直接与军阀所作的斗争。"如果同盟的宗旨胜利，就是为中国经济建设打开了大门，为长期抵抗外国的侵略和收复失地作出贡献①

《国闻周报》概述了同盟必须抓紧解决的具体问题。不论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凡是触犯了同盟宗旨的，同盟都要发动强大舆论加以抵制。同盟必须准备从事政治斗争，必要时，号召总罢工。最重要的是，同盟必须拟制一个考虑到裁军的平定共产党的具体计划。最后，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分裂也要求同盟去调解，以免导致敌对行动②

1932年8月27—28日，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市商会会馆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有将近五百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了全国的七十二个商会，十个银行公会，九个钱业公会，一百零四个同业行会，十一个妇女联合会，十一个同乡会，五十个科学团体和四十二个工会组织。大会由王晓籁、吴鼎昌、刘湛恩、林康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陈叔澄（武昌大学校长）、杨美真（代表妇女团体）和卢章元（代表广东同业公会）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主持。③

在写有"反对内战是中国人民自救之路""决不与发动内战者合作"的横幅标语下，代表们听了王晓籁、林康侯反对内战的发言。由五十多位代表提出的一项决议案，号召拒不支持政府为打内战而发行公债和贷款。当银行家钱永铭保证参加同盟会的上海银行和钱庄没有一家会贷给政府一分钱去打内战时，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④会议的日常事务委托给一个主要由上海银行界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去主持。选举了名誉委员会，包括胡适、段祺瑞

① 季廉：《论废战运动》，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6日。
② 同上。
③ 《申报》1932年8月18日，第18页；《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9月5日；《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9月3日，第2页。
④ 《申报》1932年8月28日，第17页；1932年8月29日，第15页。

等在内的一批名流被选为名誉委员。①

宋子文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反对内战大会，但是整个大会期间，宋一直呆在上海，并明显地在支持会议的宗旨。宋指出“废止内战大同盟……由国内健全分子组成”，“正在迅速壮大，不久就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使得用军事力量解决政治问题成为非法”。② 它最终将成为一个“任何跋主义者不敢忽视其意志”的组织。③

同盟所采取的也许是上海资本家在南京统治的十年内规模最大也最有冒险精神的一个政治行动。有五年的时间，上海金融界给南京的军事清剿资助了经费，而当政府无力支付公债的本息时，他们又承担了损失，同盟就是他们结束这种过程的一个武器。

除了扯起一些宣传反战的横幅而外，同盟是否还能够做别的事情呢？专栏作者王仲芳指出，“银行界可以拒绝贷款，工业家可以拒绝供应装备，但是以往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如果银行家、商业家胆敢喊叫一声反对军事领袖们的勒索，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他预言，同盟不会有什么成效。④ 北平《晨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同盟的作用等于零。著名左派杂志《生活周刊》评论道，这个运动是一个肤浅的行动，并且断言：“他们废止内战的方法是不会成功的。”⑤

这种怀疑论调被证明是有道理的。虽然同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广州去消除广州将对南京公开采取敌对行动的威胁，⑥ 但是同盟避开了它的主要任务——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战争。同盟不愿也不能直接抨击蒋介石的行动。同盟的常务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措词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9月5日。荣誉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尚有马相伯、李石曾、梁士诒、黄郛、熊希龄、朱庆澜和虞洽卿。参阅胡适《废止内战大同盟》，载《独立评论》1933年6月5日，第2—3页。

② 宋子文：《政府的建设政策》，载《民众论坛报》1932年11月18日，第257—259页；《申报》1932年8月30日，第13页。

③ 《中国评论周报》1932年11月10日，第1177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9月10日，第52页。

⑤ 《论废止内战》，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6日；翰笙，《我们对于废止内战运动的感想》，载《生活周刊》1932年5月28日，第318—319页。

⑥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7月11日。

含糊的决议说："关于镇压土匪类型的战争算不算内战的问题，常务委员会将研究情况而后决定。"当亲蒋的代表们提出会议应该把剿共战争不得视为内战一条记录下来时，会议爆发了激烈争论。整个问题交给了常务委员会。8月29日，常务委员会开会，没有对此争议作出决定。② 从此，同盟的名字从新闻报道中消失，这个组织也不再有所作为。

在没有取得新的情报来源以前，很难准确判断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破坏了这个组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青帮头目杜月笙和张啸林钻进了那个银行家占支配地位的常务委员会。而且在8月29日任命的管理同盟事务的五名执行委员中，令人惊奇的是，杜月笙竟为其中之一。① 考虑到过去杜和张常常接受任务去说服银行家支持南京，完全有可能，他们两人是阻止同盟直接反对蒋氏政策的工具。

废止内战大同盟的失败说明了上海资本家的政治力量的狭隘局限。他们可以发表些公开声明，或是嘘声恫吓以支持某一个大官如宋子文的政治立场，但是南京决不会容忍那些会严重地改变它的政策的行动。蒋介石的政治权力和统制能力是足够强大的，只要他认为资本家的行动是危险的，就可以进行镇压。正如王仲芳所说，要抗拒就会使资本家自己的"生命财产面临严重的危险"。

7、宋子文反对赤字开支失败

宋子文创造不出更多的经济奇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把1932年春天的预算勉强应付过去而稍有盈余。但是在1932年7月和汪精卫达成协议以后，他不得不在恪守向上海银行界所作四

① 《申报》1932年8月29日，第15页；1932年8月30日，第14页。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载《独立评论1932年11月6日，第2—5页。

② 《申报》1932年8月30日，第14页。杜月笙最初在同盟中并不怎么积极。五人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几名成员如吴鼎昌、王晓籁、林康侯和刘湛恩都是同盟的主要创始人。

年内不发行新公债的保证的同时，每月筹措额外增加的二百万元军费。

宋子文通过改革盐税的税务管理和1932年7月成立国税局等办法，增加了一点收入。① 尽管有这些增收，但在1933财政年度的净总收入中，借债的数字仍占16.8%。当然这比1931财政年度的30.3%和1932年的19%是要好一些，但是距宋的平衡预算的目标相去尚远。② 由于宋曾向持票人作过停发新公债的保证，所以不能再发新公债，他只得直接求助于银行贷款以济所需。1933财政年度，这项贷款的净收入达到八千七百八十万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远远超过以往四个财政年度的总和。③

这项贷款的详情细节尚不清楚。中央银行无疑提供了这项贷款中的一部分。自1928年以后，中央银行已经稳步成长起来，到1933年底，已有总资产三亿六千三百六十万元。④ 但是这项贷款的主要部分仍不得不来自上海各银行。就在银行家们在1932年8月废止内战大同盟大会上发言反对贷款给政府去打内战的同时，宋子文已经来到上海，千方百计要这些银行家们拿出钱来。⑤

在向银行界索取这项贷款时，宋子文手上有一张王牌。早在一年以前，1931年8月1日，政府曾经公布过要对银行钞票储备金征税。法律规定银行必须有60%的现金和40%核定债券作为发行本票的保证。对这些保证基金要课以2.5%的税，等于全部银行钞票的一笔1%的年税。这项法律适用于八家上海主要银行和中央银行。由于银行界的强烈反对和当时政治局势不稳，这项法律

① 《国内要闻》，载《银行周报》1932年7月26日；《财政部民国十九年——廿一年度报告》，第8页。

② 《财政部民国十九—二十一年度报告》，第3—4页；《财政部民国廿一年—廿三年度报告》，第3页。

③ 《财政部民国廿一年—廿三年度报告》，第2页；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研究》，第122页。

④ 《财政部民国廿一年—廿三年度报告》，第14页。

⑤ 《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8月29日。

被迫延期执行。①

在1932年8月间与上海银行界商谈过程中，宋子文再次将这个银行金融税的问题提了出来。在热烈的争论中，银行界指出了过去一年灾难性的经济情况，要求在该项税率上有所减让。当宋子文提出要四百五十一万元的时候，他们答应交二百二十五万元。最后大家在三百零六万元的数目上达成妥协。《大美晚报》认为宋子文挑起这个争议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这三百多万元，而是要借此逼迫银行家们向政府作进一步的贷款。②

从1932年秋直到1933年整个冬季，财政情况一直都在恶化。军费开支扶摇直上，使宋子文力图平衡预算的计划化为泡影。蒋介石剿共战争直到1933年春天还在继续，投入了十五万以上的兵力。当这样的努力仍未能消灭共产党人时，蒋在1933年秋天集结了七十万人之多的庞大兵力，准备再战。费用激增。从1932年7月初开始的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每月平均为二千六百七十万元，比宋子文同意支付的一千五百万元多得多。而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将会达到每月平均三千一百万元。在1933财政年度，宋子文只勉强弄得一点净收入来弥补这样增高了的军费开支。到1933年年中期，政府每月要有一千万元的赤字。③

宋子文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仍然是紧张的。宋子文不仅反对剿共战争的军费支出，而且他认为蒋介石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以后，宋子文仍继续支持十九路军和陈铭枢。在蒋拒绝对十九路军供给后，据说，宋每月仍拨给他们四十万元。这个行动使蒋介石极为恼怒，特别是在1933年春天，那时福建前线司令部成了猛烈抨击蒋介石抗日立场软弱的

---

① 《中华年鉴，1933》，第519；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71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9月3日，第33页；杨明照音，《中国现代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硕士论文，伊利诺伊大学，1937），第31页。

③ 《财政部民国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度报告》，第1页，第4—6页。

大本营。①

1932年10月，行政院长汪精卫宣称“病了”，而且要出国去接受长期治疗。汪出国的真实原因显然是由于和蒋介石打交道受到了挫折。汪精卫的缺席使宋子文成了代理行政院长。宋利用他的新的地位来推动蒋介石采取较为坚定的抗日立场。12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宋子文联合孙科和其他一些人，拟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的的中国驻军，“遇有日军来犯可根据命令”集中力量“进行抵抗”，如有可能，这些军队还应进入满洲，“努力收复失地”。这个决议案，要求全国一致抵制日货并谴责国联处理日本侵华问题行动迟缓。决议又说“：中国人都应该向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和第五集团军学习。”这个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带有含蓄批评的决议草案，为蒋介石死党所支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②

日本的侵略在继续：1933年1月1日，进攻山海关，2、3月间占领了热河省。1933年2月11日，宋子文飞到北方去说服中国军队长官坚决抵抗。他和张学良一道视察了热河前线，他随后声称：“热河地势重要，为华北门户，日军如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他又指出，“热河为中华完整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将同于南京被攻”。③

但是宋子文希望坚决抗日的愿望与他的严格紧缩开支的政策发生了矛盾。热河的防务费迫使宋子文不得不再一次以发行公债开辟财源。他在北平时会见了那里的银行公会主席周作民和平、津其他银行界人士。2月21日，宋子文由北平抵达上海，又与包括钱永铭、王晓籁和虞洽卿在内的上海金融界人士进行了两天的讨论。④

2月23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同时宣布发行“民国二十二年

① 艾萌，《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第17页。

② 《中华年鉴，1933》，第253—254页。

③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3年2月20日。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4月1日，第190页。

爱国库券”二千万元。这个新公债是在宋子文对持票人作出四年内不发行新公债的保证以后不到一年发行的。但这不完全是宋子文失信于银行界。这笔公债被认为是“专用”公债，全部收入都将用于华北防务。这笔新公债是以华北的烟酒税收入作保证的。根据1932年整理公债时的规定，公债以关税作保证，但这个新公债与其他那些公债不同，没有以关税作保证。这样宋就避免了必须取得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赞同这一程序。这笔公债的一半为上海各银行认购，另一半为平、津银行界认购。①

不论发行新公债或是主张坚决抗日，宋子文显然都有上海银行界的坚决支持作为后盾。北平和天津的银行界，由于整个华北都已经受到威胁，也坚决支持抗日主张。北方的银行界，其实都与上海银行界有密切的关系。上海的几个主要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全都有分行或总行设在天津或北平。例如，北平银行公会主席周作民通过四行储备基金联合储蓄会的渠道与上海银行界人士钱永铭和吴鼎昌等有密切的关系。② 和这种利害相关的集团取得一致，宋子文要发行公债就不难得到银行界的支持。③

上海市商会在主席王晓籁的领导下，赞成坚决抗日的政策。在1933年6月25日的年会上，上海市商会请求南京政府采取积极政策收复满洲和华北的国土。④ 根据《大阪每日评论》的分析，宋子文是坚决抗日的，而且指出宋得到“浙江集团”的银行家，工业家和航运家的支持。⑤

宋子文的努力又一次宣告失败。张学良并没有认真抵抗，而汤玉麟将军又在3月3日未经一战就从热河省省会承德撤退了。汪

---

① 《申报》1933年2月23日，第7页，第9页。

②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第149—595页。散见有关各页。这四家银行是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和盐业银行。

③ 《申报》1933年2月23日，第7页，第9页。

④ 《申报》1933年6月26日，第9—10日；1933年6月27日，第10页。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0月14日，第268页。

精卫于3月17日回国，继续履行其行政院长的职责。3月中旬，蒋、汪和孙科进行了广泛讨论后，认为对日让步是避免战事扩大的唯一抉择。在汪精卫领导下，南京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订》，实际上把北平以北整个河北省的国土都交给了日本。宋子文意识到政府的政策显然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而且不愿和《塘沽协订》联系在一起，便于4月18日离开中国到欧美去作长期游历去了。虽然侨居海外，他将继续设法寻找抵抗日本侵略的新办法。①

8、宋子文的抗日经济计划

1933年春在国外游历期间，宋子文着手制订一个既可刺激中国经济增长又可消弱日本在华经济力量的方案。其关键性要点包括：终止对日本关税优惠待遇，成立一个以一笔美国贷款为基金的经济建设机构——全国经济委员会，争取国联派技术援助代表团来华，成立一个中外各方金融家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来代替过去的银行团。

这一方案的目的不仅是想要取得经济发展，而且，事实上还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和外交后果。为了限制日本经济力量的侵入，宋力图增加在中国的非日本外国投资。他希望如果欧美商人在中国有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一旦发生新的日本侵略，他们的政府就可能会采取较为强硬的行动。宋还认为如果他能取得外国经济的援助，特别是如能得到由财政部直接支配的援助款项，他在南京政府中就会有更大的权力。②

宋子文主张首先按照中国海关税的章程取消对日本的特惠待遇。1925年11月，缔约各国曾经许诺归还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928

① 《中华年鉴，1934》，第357页；《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3年3月27日；1933年4月3日；1933年4月24日。

② 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载《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11月15日，18—19页；冯和法（音）：《中美棉麦大借款之分析》，载《前途》1期(1933年7月)，第6页。

经过广泛的商谈，南京政府公布了实行新的关税率并决定1929年2月1日开始生效。但直至1930年5月日本人默认以前，实际上中国的关税自主是不完全的。作为换取同意的代价，东京要求对某些日货如棉制品和水产品等实行为期三年的优惠税率。这个让步限制了中国与进口货竞争的能力。①

1933年5月16日，对日特惠协定满期在那一个星期内，财政部公布了一个新税则，大大提高了日本进口货的税率。据财政部解释，新税则不是专门针对日本的。但是因海关官员S.莱特(魏尔特)(Stanley Wright)的话说，"目的在于不再给日本以特惠待遇"。②

对那些与中国货竞争的进口货极大地提高了进口税。例如，对棉府绸的税率提高800%；对某些毛织品提高200%；对各种等级的纸张分别提高8%到28%。人造丝、鱼类和水产品、烟草、酒和煤等都提高了税率。新税率对日本进口货产生了严重影响，在那段时间内，这些商品的销售额减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③

1933年新税则的修订标志着南京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系统地利用关税来刺激国内的工业发展。长期的经济振兴比及时的资金需求获得了优先考虑。按新税则，对那些与发展经济有重要关系的非竞争性的进口产品的税率大为降低，例如，对机器、轮胎和将在中本组装的汽车配件等，税率分别降低了30%到15%。1933年的关税是有意识的利用进口税保护中国的工业并且创造有利于投资的条件。④

新税则只是宋子文开发计划的一个方面。宋子文还计划设立

---

①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载中行月刊》9月卷（1934年8月），第三页。

② 莱特：《中国关税自主沿革史》，677页。中国银行编《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第3页；苏开明(音)和巴白(Alvin Barber)合著《中国的关税自主，是事实还是神话》，载《远东评论》1936年6月3日，第117页。

③ 中国银行编《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第3页、14页；《中国的关税自主》第117页

④ 莱特：《中国关税自主沿革史》，第667页；苏开明和巴白，《中国的关税自主》，第117页。
中国银行编《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第3页。

一个经济建设机构——全国经济委员会。在1933年春夏之间，当他还在欧美旅游时，他还倡议成立国际协商委员会，以便为在中国建立大工业和铁路工程谋取长期信贷。该委员会成员将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但是没有日本人。宋子文的打算是让这个机构代替，原先由列强于1920年组织而现在已经不起作用的银行团，从而把日本人排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事业之外。宋子文邀请琼·蒙内特(Jean Monnet)为委员会主席；请摩根公司(J·Q·Morgan Co)的托马斯·拉门德 (Thomas W.Lamont)为美国组组长；请汇丰银行的查尔斯·阿迪斯爵士(Sir Char IesAdds)为英国组组长。①

宋子文在美国时，商定了一项五千万美元的棉麦贷款来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这项贷款是由美国农业公司贷出棉花和小麦，利息是年利5％，由中国的关税收入作保证。这些商品将在中国销售，所得款项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支配。随后，在日内瓦，宋又与国际联盟商定派遣以路德维格·拉西曼(Lndwig Rajchman) 为首的技术援助代表团来中国帮助全国经济委员会进行建设工作①。

宋子文的这些努力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反对，此时东京方面正在加紧对南京施加压力，提出新的经济政治要求，特别是对华北和内蒙提出了要求。日本当局将宋子文的努力看成是要争取西方的支持以阻挠他们的这种活动。② 宋子文在国外外交上的成功也增强了他在国内的声望。③ 由于日本人视宋子文为他们在南京政府中的主要反对者，所以他们极力使宋的计划落空。正如美国国务院官员霍恩贝克 (Stanley Hornbec)在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赞竹富利彦会谈后在报告中说，日本人“担心宋子

① 博格(Dorothey Borg)：《美国与1933—1938期间的远东危机》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4)，第63页；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495——496；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35—36页。

② 《中页银行简报》1935年3月，第24页。《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0月14日，第287页。以后数字中的元是指的美元

③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502——504页。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1月11日，第448页。

文在国内外的影响增大。他们认为……在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一项有利于日本的正式协议方面，宋子文是他们实现计划的障碍”。①

在宋子文1933年8月回国之前，日本人的阴谋得逞了。他们破坏了宋子文企图组织一个国际协商委员会的计划。摩根公司的拉门德先生在与旧的银行团的日方组长野原大助接触以后，便拒绝参加宋子文倡议的协商委员会。拉门德声称，他不得不“考虑日本人的反对，因为他的企业……在日本有很大的生意要做”。②

野原也与汇丰银行的阿迪斯爵士进行了接触，并且提醒他说：“对宋子文先生的真实意图有流传很广的谣言和怀疑”。③伦敦方面不想疏远日本，所以迫使英国的金融界接受日本人的请求，不参加这个新的协商委员会。据恩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说，当汇丰银行总经理正试图贷款给南京时，“英国银行总监含糊地威胁这家银行，说它将失去进一步贷给中国的地位和权力”。④迫于这种压力，宋子文的国际财团计划被完全挫败。⑤

当宋子文启程回国时，日本报纸加强了对他的攻击，说他是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罪魁祸首。⑥宋子文所乘的轮船按原定日程将在横滨港靠岸，中国报纸暗示，他将在东京会见日本官员。⑦而日本政府却公开声称宋是不受欢迎的人。宋子文并没有登岸而且拒绝接见日本记者。⑧

东京方面开始逼迫南京把宋从政府中撵走。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和国联日本局前主任杉村太郎两人，一再告诫蒋介石和汪精

① 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448页。

② 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第64页；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506页。

③ 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506页。

④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36—37页。

⑤ 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第64——65页；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502——504页。

⑥ 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509—510页

⑦ 《申报》1933年8月19日，第8页。

⑧ 《申报》1933年8月26日，第10页；《中国评论周报》1933年8月31日，854页。

卫，必须设法撤换宋子文。① 当宋子文1933年 8 月29日回到中国时，谣言已经传遍，说他将被撤职。《中国评论周报》声称"宋子文被认为是亲英美政策的首要倡导者，而这种政策是与南京当局的步调相违背的"。②

日本人在上海资本家中间使尽花招来挖宋的墙脚，使他们撤销对宋的支持。《大阪每日评论》的报道说，中国银行界只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日本人能够操纵这个集团来对抗中国的反日情绪。又有谣言说，不少有影响的上海银行家和商业家渴望与日本和满洲完全恢复贸易关系。又说"一位颇负盛名的本地银行家"曾经表示，他愿意支持任何一个亲日的财政部长。据日本联合新闻社报道，"浙江金融界"强烈反对宋子文的棉麦贷款，而且表示只要宋子文在政府职位上，他们就拒绝再给政府以贷款。③

这种种的攻击绝大多数是宣传战。④ 实际上，宋子文的棉麦贷款曾经为上海最大的棉纺厂和面粉厂厂主荣宗敬公开赞成，而且只要宋子文还任财政部长，上海银行家就会再给政府提供贷款。⑤ 虽然上海资本家在支持宋子文的反日经济政策上肯定不会

---

① 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 3 月，第444页；《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1月11日，第448页。

② 《中国评论周报》1933年 8 月31日，第854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1月 4 日，第390页；1933年11月11日，第448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1月4日，第391页。该报认为发动这种种攻击都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出现这么多谣言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某些日本有较密亲关系的银行家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将于1933年 8 月去东京有关。据报纸推测，张氏想要和日本会商有关改进中日贸易关系问题。见《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 9 月30日第202页。另一种可能是：张嘉璈的日本之行可能与政学系有关。政学系是中国的一个很活跃的政治派系，主要人物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和张嘉璈。见田胡茂(音)著《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斯坦福，1922)，第68—70页，黄郛曾经参与了《塘沽协订》的谈判，并且传说黄那时又在北平参与了更多的会谈，目的是想要稳定中日关系。张嘉璈访日之行可能与黄郛的会谈有关。

⑤ 《关于棉麦借款的经营及销售经过》，载《中行月刊》8卷（1934年 4 月），第72页。中国商界有些领袖人物曾经对进口这么大数量的美国物品以后会造成中国的棉麦价格下跌，表示关切。事实上在执行该计划后，麦价确有下跌但美棉与华棉

全一致，但是对宋的支持似乎是坚强可靠的。资本家们在宋子文回国时举行了盛大的公开示威。8月23日，二十多个商业团体和教育团体在上海市商会馆集会会，筹划对宋的欢迎。8月29日宋的轮船抵岸时，热情的广大群众将宋当作英雄来欢迎。①

宋子文回到南京，然后在一些政府官员陪同下一道上牯岭与蒋介石面谈。宋子文在国外四个月的阅历加深了他与蒋的分歧。据说蒋介石不喜欢宋子文的外交活动，当然主要问题是经费。宋子文离职期间，政府欠了上海银行界一大笔债，截至1933年9月份，估计约为六千万元。②

宋子文被迫发行新的国内公债，从而完全背弃了他在1932年2月对持票人和银行界所作的保证。1933年10月4日，财政部公布发行一亿元的〔民国三十三年〕关税库券。据宋子文解释，热河的战事和华北税收的丧失，都使这次发行成为必要。实际上除了发行新公债，宋子文没有别的办法来弥补他的透支。③ 10月8日，宋子文飞到上海与银行界商议认购这项债券的有关问题。这种"续发江海关附税库券"，不在公开市场上销售，以免由此而压低了市价。银行界接受了六千万元的"续发江海关附税库券"以抵偿政府的债务。而以其余部分公债作为保证，再借给政府一千五百万元。④

因质量差别，所以对华棉价格没有影响。参阅佩耶(Cheryl A.Payer)：《1927—1937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与战后国外救济计划之比较》(哲学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71)，第27页，第38—39页。

① 《申报》1933年8月19日，第13页；1933年8月30日，第13—14页；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第18页。

② 《时事新报》1933年10月8日，第1版，第2页；《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9月9日，第66页。

③ 《时事新报》1933年10月4日，第一版，第3页。

④ 借给政府的一千五百万元的贷款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共贷给了九百万元；钱业方面贷出了二百五十万元；还有六个大的商业银行贷出了其余的三百五十万元。《时事新报》1933年10月8日，第一版，第2页；1933年10月14日，第2版，第2页；1933年10月12日，第一版第4页；1933年10月21日，第2版，第2页。

9、宋子文的辞职

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提出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中央政治委员会接受了宋的辞呈并任命宋的姐夫孔祥熙接替这两个职务。① 当宋子文辞职的消息证实后，上海的主要商业团体致电南京表示反对。② 宋子文的这个行动也给上海公债市场造成恐慌。债券价格已因预料宋子文会免职而下跌。到10月27日下午，便突然从成交八百万元的顶点上垂直暴跌。③

官方报纸对宋的辞职的解释是由于健康不佳。半官方报纸《时事月报》报道说，"其实宋氏之辞职原因，至为简单""宋氏自民十六起任财长，艰难支持，已历七载，其间虽两次离职，而为期极暂，七年积劳，心力交瘁，其辞职休养之意，由来固甚久也。"④ 宋否认这种说法。10月30日，宋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气愤地说，任何有关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的说法都不真实，他不想用"东亚病夫"作为辞职的托辞。宋说，事实上由于他在国外的旅行，近几个月来他一直感到精力特别充沛。宋子文拒绝公开他辞职的真实原因。⑤ 据胡汉民说，宋在私下说，"当财政部长和做蒋介石的狗差不多。从今后我以要做人不再做狗了。"⑥

官方对宋子文辞职的另一种解释是他无法扭转财政状况。《时事新报》说，"宋子文辞职的原因是穷于应付财政困难"。政府的赤

---

① 《时事新报》1933年10月28日，第一版，第2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1月4日，第416页。
发电报的团体有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上海钱业公会、上海市商会、上海航运业公会、上海市总工会、公共租界和纳税华人协会及工界总联合会等。

③ 《时事新报》1933年10月28日，第一版，第2页；
刘振东：《财政部长易人之经过》，载《时事月报》第9期(1933年12月)，第195页。

④ 刘振东：《财政部长易人之经过》。

⑤ 《时事新报》1933年10月31日，第一版，第2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3年11月6日。

⑥ 艾萌：《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第18页。

字每月超过一千万元。①中国新任外交部长向美国公使馆参赞通报说，把宋子文的辞职与中日关系连系起来的谣言不真实。“宋子文先生的辞职与外交政策毫无关系”，他指出，“仅仅与财政问题有关”。②

把财政状况解释为宋子文辞职的主要原因也缺乏说服力。诚然，财政情况是严重的，但宋子文曾经碰到过比这更糟糕的情况。正如专栏作家汪仲芳所说，“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政府的财政情况一直处于困难之中……去年，尽管有长江水灾和上海战事，但宋子文不用借一文债终于平衡了予算……现在国家的情况没有一年以前那样危急”。汪最后归结道“如果了解宋子文以往的胆识和魄力，那种把他的辞职仅仅归结为没有能力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说法，就显得实在可笑了”。③

事实上，日本问题上的分歧是宋子文辞职的首要原因。蒋介石在与汪精卫和孙科商量以后，决定设法进一步与日本人和解。外交部长罗文干因与宋子文都持共同的反日态度，因而在宋子文回到首都前不久就被派到新疆去了。外交部的实权转到唐有壬手中。唐有壬是汪精卫的亲日派门徒。宋子文既然成了中日亲善的障碍，④当然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就保不住了。

宋子文的去职被广泛认为是日本人的一大胜利。⑤《中国评论

① 《时事新报》1933年10月28日，第一版，第2页。

② 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446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1月11日，第448页。

④ 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405页；第444页；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44页；参阅《国民党领袖人物传略》（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48）的“宋子文”部分。“宋子文”一文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分析的秘密文件的翻译稿，认为宋子文是国民党内亲英美集团的代表。当蒋介石转向亲日的汪精卫和“政学系”以后，这个集团便失去了权力。
罗文干是8月中旬被派到新疆去的。直到11月他从新疆返回来以前，罗都没有正式辞去外交部长的职位，见包华德：《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2卷，第440—441页。

⑤ 促成宋子文辞职的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胡汉民在《论中日直接交涉》一文中（18—19页），提及国内财政状况及与日本之纠纷，但胡也认为蒋介石担心宋子文的不断增长的影响。蒋介石总是喜欢消除那些正在变得强大的力量。宋子文由于国外之行和举借棉麦贷款的的成功而声望大增，蒋介石耽心宋子文与上

周报》评论道，自从中日冲突爆发以来，宋子文的名字就成了一种对抗日本的政策的象征。奉行这样一种政策直到它符合逻辑的结局，对中国是否明智，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可以肯定，如果能够放手工作并且得到合作，那么在实施他为自己规定的计划上，他至少可能已经取得部分的成功。"①

汪仲芳评论道："自从日本占据满洲以后，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和谐系关就破裂了。"蒋介石据说主张尽早对日和解"。而宋子文在"他的经常的公开的言论中表明，他对任何屈服于日本的卑鄙行为都是反对的"。汪最后指出：所以宋子文的辞职，完全可说是那些主张早日消除中日歧见的官僚们的一次大胜利。"②

从事反共战争，当然与对日问题密切相关。宋子文的政策恰好是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反。宋主张坚决抗日，并主张采用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抑制共产主义。《中国评论周报》说"他的辞职可能意味着放弃了这种政策，又重弹武力统一的老调"。③共产党方面的材料说，宋子文和其他一些银行界人士主张一致抗日，而不赞成打共产党。"宋离开南京政府是由于战争费用问题"。④

据报道，日本人对宋子文的去职十分高兴。满洲国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认为，"宋的辞职标志着中国政府官员内英美派的进一步

海金融界的联盟会变成一个强大的相互利用的集团。宋子文曾经建立了一支独立的盐税税务总队。这个税务总队可能会发展为成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菲力浦（J.W.Phillips）在《中国的兰衣社》一文第一章（载《今日中国》第1期，1934年11月）第52—26页，曾提及这个财政部的税务总队。建立这支三万人的武装力量的理由是控制盐的走私，但菲力浦认为蒋耽心它会变得太强大和太独立。

① 《中国评论周报》1933年11月2日，第1069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1月11日，第448页。

③ 《中国评论周报》1933年11月2日，第1069页。

④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刘鼎1936年在延安告诉尼姆韦尔斯（Nym Wales），民族资本家象王晓籁和林康侯这一类人主张保卫华北，而不愿资助内战。见韦尔斯《延安笔记》（宾迪进、康涅狄格州，1961年），第197页。

失势”。① 毕恩来评论道，：“日本人的外交攻势在南方又获得一大成就……宋子文博士……被迫辞职了。”②

10、宋子文辞职的影响

宋子文的辞职是上海资本家的一次重大挫折。宋在任财政部长期间，一直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领袖人物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与这些资本家确实存在分歧，例如在1929年提高统一税时和1932年征收金融税时，他们之间都有过争执。宋与银行界时常为了贷款的多少和公债认购数目的大小而意见不一致最后又通过谈判而达成妥协。工商资本家虽不象银行家那样与宋子文关系紧密，但是从许许多多他与金融界的会议、会面、协商的历史记录上看，从许许多多上海商业团体对他的支持的电报和派出的代表团上看，从关键性金融问题上的利害一致来看，宋子文是上海资本家在南京政府中最亲密的同盟者。在他辞职以后的几年中，上海资本家的影响和地位急剧下降了。

宋子文权力的下降是日本在华经济势力的胜利。日本既然除掉了他们在南京政府中的主要对手，他们就能够把宋子文的方案一个个毁掉——使宋子文1933年5月份实施的保护性新税则流产，截断美国的棉麦贷款，并且限制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规模。

对1933年5月的新税则，在东京方面曾经表示过强烈抗议，日本人认为这种新税则是伤害日本经济的。③ 随着这种新税则的设计师宋子文的去职，东京方面就一直逼着南京改变这种新税则，1934年1月，日本驻中国公使亲自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提出了抗议。④

与这种政治压力同时发生的是日本人在在多条战线上的进攻。1934年1月，日本人向察哈尔进攻，而且对华北提出新的要求。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11月4日，第416页。
② 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纽约，1938年)，第50页。
③ 中国银行编：《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第3页。
④ 莱特：《中国的关税自主沿革史》，第667页。

4月间东京发表了《天羽声明》——日本人对中国的“门罗主义”声明——这个声明实际上就是宣布中国为它的保护国，禁止“中国方面有任何要利用别国力量抵抗日本的企图”。① 东京开始要求偿还“西原款贷”。最后，竟然发展到1934年6月11日日本人借口他的副领事失踪，而把炮舰开到上海。而这个副领事后来发现躲在一个公墓内。②

面对着日本人这样的压力，蒋介石仍然坚持缓靖政策，反而认为宋子文1933年保护性的关税政策是惹出麻烦的祸根。1934年7月3日，南京突然宣布执行一种对日本人大为有利的新税则。用赖特的话说，这种改变“与前几年保护性的修订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个新税则对许多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大为降低”。③ 对印花棉布、杂色棉布、鱼类和各种水产品——日本关切的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关税率降低幅度：印花棉布是2—48%，杂色棉布是17—39%，鱼类是14—26%。因为这些商品原来的税率平均近似它们价值的25%，所以那个税率曾对市场价格起了很好的效用。④

现在新颁布的税则，对一些非竞争性的产品也实行高税率，而且其中很多产品是为中国工业所必须的。原棉的税率提高了43%，金属产品提高了20—25%，机器和工具提高了33—100%，矿石和金属提高了4—55%，煤油提高了28%⑤

1934年的关税对中国的工业界是一个严重的打击。1933年实行保护关税所得到的利益又失去了。对中国有竞争性的产品的税率且降低了，对中国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料和机器的税率反而有了极大的提高了。例如，原棉的43%的关税使得中国的纺纱工业遇

① 柯乐博(O·Edmund Clubb)，《二十世纪的中国》，(纽约，1966)，第174页

② 莱特，《中国的关税自主沿革史》，第677—678页；苏开明、巴白合著《中国的关税自主》，第117页。

③ 莱特，《中国的关税自主沿革史》，第678页。

④ 引文同上；苏开明、巴白合著，《中国的关税自主》，第678页；中国银行编，《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第16页。

⑤ 苏开明与巴白合著，《中国的关税自主》，第118页；《经济统计月志》1卷(1934年8月)，第8—9页。

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他们的产品无法与进口的棉产品竞争，而这些进口的棉产品的税率反而降低了。① 中国《经济统计月志》指出："这种新税率的准确效果尚待分晓，但是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棉纺工业的影响是有害的"。②

难怪中国银行研究部的结论是："这种新税率的根本目的不是……发展或保护中国的工业。其主要目的是推翻1933年5月税则精神……倒退到过去中日双方〔就关税达成〕协议时期所奉行的歧视中国资本并阻挠其发展的方针上去。"③

宋子文修订的税则，虽只实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短短的时间内却演出了一段保护本国利益的插曲。

1934年修订的税则，主要是针对着日本在远东的主要竞争者美国的。这种新税则对美国特别不利。显然，新税则就是有意要鼓励日本货进口而限制美国货进口。税率表上提高最多的那些货品恰好多数正是美国对中国的供应品。以原棉和煤油为例，来自美国的分别占中国总进口额的63.4%和50·2%。而来自日本的这两类进口货只占总数的0·2%和0·3%；但低税率货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如棉货和渔产品，从日本输入的各占总进口额的61·2%和46.5%，而从美国进口的只各占总进口额的0.3%和0.8%。中国银行研究部断言，日本从这个新税则中获利最大，而美国则受害最重。④

从此，中国的进口贸易偏离美国而倒向日本。到1935年，高税率的原棉和煤油及其他物品的进口显著下降了。⑤

输入到中国（不包括满洲在内）的美国与日本的进口商品占

---

① 苏开明与巴白合著《中国的关税自主》，第118页，112页；中国银行编"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第17—19页。

② 《经济统计月志》1卷(1934年8日)，第4页。

③ 中国银行编："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第19—20页。

④ 引文同上书，第15页、17页。

⑤ 苏开明与巴白合著：《中国的关税自主》，第120页。

总进口的百分比的变化如下：①

年	月	美国	日本
1933年		21.9	9.9
1934年	1—7月	27.8	10.6
	8—10月	23.6	15.0
1935年		18.9	15.6
1936年		19.6	16.6

虽然美国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1934年7月以后，美国在中国的总进口额的百分比明显地下降了，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却极大地升高了。日本对南京的压力得到了很大的报偿。

这个修改的税则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侵犯。这种税则是在强迫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以损害美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大与日本的贸易。这样做当然也就限制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发展。正如苏开明和巴白所断言，"1934年新关税等于是中国方面对保护性原则的放弃，而这种原则曾是它对工业建设抱有许多希望的基础。但是这种被迫制定的税率所起的作用非但不是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反而成了阻碍本国发展所需产品进口的桎梏。"②

从长远看来，南京收回关税自主权对中国人自主的工业的利益是有限的。南京对于关税收入的需要和日本人的压力始终是实施一种真正的保护性关税的障碍。从1928年到1934年，税率的经常改变成了使中国工业发展失去稳定的一个破坏性因素。南京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65页；1934年的数字系取自《中行月刊》第9卷（1934年9月）第150b；第9卷（1934年10月）第156b；第9卷（1934年11月）第126b；第9卷（1934年12月）第120b；第10卷（1935年1—2月）第204a，208a。在日本侵占满洲以前，它在中国进口中占有较大的数额——1931年达到20%。但在1932年6月以后，中国的海关统计不再包括满洲的在内，因此，日本的贸易减低了将近一半。见张肖梅和蔡致通《二十二年份中国对外贸易检讨》，第一部份，载《中行月刊》8卷（1934年1月），第74—87页。

② 苏开明与巴白合著，《中国的关税自主》，第121页。

经常那么快地改变税率，致使中国的工业家不得不随时调整投资以适应市场的各种机会，往往是投资尚未获利，情况又改变了。①

日本人对宋子文发展经济计划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阻碍和破坏。最明显的是对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破坏。日本人强烈反对了中国向美国举借的用以资助经委会的实物贷款和由国联派遣技术代表团。日本人既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抗议，又展开广泛的宣传战来进行干涉。1933年10月，国联技术代表团的路德维格·拉西曼抵达中国，立即被当作日本的敌人进行攻击。② 竹富利彦向霍恩贝克提出抗议，反对美国给中国棉麦贷款。他指控这种贷款很大部分会被用在军事上，那样就等于是美国武装了一个仇视日本的政府。③

日本人的抗议终于限制了宋子文的计划。东京的舆论战破坏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支援。部分地由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1933年9月，美国参议院调查了有关一千万美元的实物贷款被转用于购买枪炮和飞机的指控。④ 在日本人的外交压力下，美国和英国都不准备在贷款给中国的问题上与日本作对。⑤ 宋子文辞职以后，南京方面自己就越来越对东京有求必应。据英国情报称，1934年4月初，蒋介石就决定了要尽快中止国联所派技术顾问的工作。⑥ 结果，宋子文所商定的外国对中国的开发的重要援助计划就全都宣告流产。

东京方面遏制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主要手段是，设法减少了美

① 郑友揆：《对外贸易与中国的工业建设》，第64页。

② 博格：《美国与1932—1938年远东危机》，第65—67页；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3月，第494页；琼·维内特：《回忆录》（巴黎，1976年），第130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34年9月22日，第122页；博格：《美国与1932—1938年远东危机》，第65页；参阅胡汉民《塘沽协定与棉麦借款》，载《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7月15日，第27—28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34年9月22日，第122页。

⑤ 博格：《美国与1932—1938年远东危机》，第65—67页。

⑥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47页。

国贷给中国的棉麦贷款数额。1933年夏天，宋子文匆匆与美国商定了以实物销售的办法给中国以信用贷款。原来的协议准许贷给中国四千万美元的棉花和一千万美元的小麦。日本人对华盛顿和南京两方面施加压力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对于履行这一协议的支持。中国国内经济衰退，又阻碍了南京对这种实物的销售。美棉最初的主要买主是在中国的日本棉纺厂主。这些人支配了中国的优质纺纱业。根据东京的命令，日本厂主突然完全停购美棉，中国既无法处置这些棉花又迫于日本的压力，南京只得决定减少贷款额。①

1934年3月，南京政府赞成将这项贷款从五千万美元减少为二千万美元。当1935年4月购买结束时，中国实际上只用了一千七百一十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其中一千万美元用于购买棉花，七百一十万美元购买小麦。最后的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中国货币三千八百万元。只占这项协议原规定的数字的40%弱。由于全国经济委员会几乎完全依靠这项贷款充作经费，因此贷款的削减，实际上大大地打击了委员会的活动能力。该委员会1934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是一千五百万元。1935年财政年度是一千二百万元。②

宋子文权力下降，也使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业务活动受到影响。当初设立时，宋子文、孙科和汪精卫三人为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负责指导这个新机构。1933年9月，在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前不久，这个三人常务委员会勉强一致地决定了对棉麦贷款的处置。本来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项目上。这项贷款收入原来指定30%用于乡村复兴；30%用于改良中国棉花；20%用于整顿中国货币；还有20%用于资助某些特定的企业。③

① 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4年3月，第211页；第373—374页；杨格：《中国的建国的努力》，第383页；佩耶：《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支援》，第41页；冯和法：《中美棉麦大贷款》，第7—9页。

② 《大公报》1934年3月27日，第4页；《密勒氏评论报》1935年4月13日，第230页；1934年12月22日，第118页；《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12月27日，第1268页；杨格：《中国的建国的努力》，第346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9月23日，第40页；1933年10月14日，第287页。

但是在这项计划可以付诸实施以前，宋子文的地位突然下降。虽然宋仍然留在常务委员会中，但在1933年12月8日，这个委员会扩大了席位，将蒋介石和孔祥熙也包括进来了。① 宋在委员会中的领导作用受到了抑制，而原来强调的要把重点放在经济开发上的做法也就受到了阻碍。② 在蒋的支配下，有关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帮助乡村复兴、改良棉花以及整顿货币等等计划不是被降了格就是完全取消了。而钱都用在蒋所关注的与军事有关的项目上去了。王业键断言："计划经过调整，首先考虑的是军事目标，强调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宣传。"③

蒋介石关注的方面之一，是建设公路。蒋于1934年6月22日亲自出席了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极力主张给经委会所属的公路局增加经费。1934—1935财政年度美国贷款中的27%以上的经费是用于公路建设的。④

这个公路建设计划是为了适应蒋介石的剿共战争的需要，而对经济建设没有多少利益。正如王业键所说："修建这么多的公

---

① 《中华年鉴，1935—1936》，第295页。

② 随着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位后全国经济委员会领导层的改组，也削弱了上海资本家在制定委员会的政策方面的作用。宋子文当时曾经邀请了将近一打上海资本家主要领袖人物参加了四十人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是1933年10月初宣布的其中包括张嘉璈、李铭、周作民、吴鼎昌、钱永铭、陈光甫、徐新六、虞洽卿、王晓籁和刘鸣生。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评述》，载《国闻周报》1933年10月16日；《大公报》1934年3月26日，第2页。随着宋的权力下降，这些上海资本家虽然依旧包括在委员会之中，影响也就不大了。因为决定政策的权力在五人常务委员会。这个常务委员会每月开会两次，并且是牢牢地掌握在蒋的手中。直到1934年3月26日，这个委员会尚未开过一次全会，但在此期间，常务委员会却开了八次会，并且已经为委员会起草了一个计划。委员会全会上委员们的建议又转送回常务委员会来作决定。见《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会记》，载《国闻周报》1934年4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国闻周报》1934年10月1日。

③ 王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458页。

④ 《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7月8日，第666页；《中华年鉴，1935—1936》，第295页；《大公报》1936年3月2日，第7页；杨格，《中国的建国的努力》，第386页。在这个委员会下尚没有水利委员会、卫生委员会、西安办事处和江西办事处及棉业统制委员会和蚕业改进委员会。

路，几乎完全是当局为了要扩大军运、军事给养和作战人员之用，很少是用来运输货物的。"① 由于棉麦贷款的削减，加之新的重点又摆在军事用途上，这就使得全国经济委员会难以完成宋子文的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案。

日本将宋子文1933年倡导的开发经济的规划几乎全部破坏。关税自主丧失了，国际财团的计划夭折了，棉麦贷款削减了；国联的技术援助代表团被阻止了，经济委员会的活动范围缩减了——这全都是由于日本的压力。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宋子文被解除了职务。

从1931年至1933年，上海资本家遭到了多次政治上的挫折。由于1932年1月的政治危机和整理公债，使他们所购得的政府公债极大地贬了值。宋子文无法贯彻他的明智的财政计划，他已被解职。"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无法削减政府的支出。日本人成功地破坏了宋子文的计划，对上海资本家来说，这也是对他们自己的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上海资本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入侵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中国资产阶级的健康成长是违背日本人的帝国主义经济目标的，日本人日益加强其对中国的控制，预示着上海资本家的厄运。

译自《上海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五章

杨希孟译　一　叶校

① 王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457页。并见王伊同：《农民的骚动与建设》，载《今日中国》3期（1936年11月），第7页。

国民党政权与英国和解
(1927—1931)

冯兆基

1927年标志着新的中英关系的开端。北伐战争将国民党阵营分裂成为南京政权和武汉政权，它们都相继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清洗。尤其是南京政权，它最终击败了武汉，使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共产党人被清洗，以及右翼和军人集团的得势，国民党放弃了群众运动，尽可能避免用民众的暴力行为作为达到外交政策目的的手段。诚然，回顾国民党在1924—26年间，反帝立场曾是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却转而将国际合作的政策作为中国自强和改造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力求用和平办法来解决几十年来未能解决的修约问题。中国与大不列颠的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转变。大不列颠多年来曾经是中国民族主义反对的主要对象之一，它在1926年12月宣布了一项新的调和性的对华政策。

1927年以后，伦敦和南京都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而不是象往常发生过的那样，行使暴力。本文将审察英国政策的渐变和国民党人与之呼应的过程。重点将放在政策的转变上，并为了便于说明尤将重点放在分析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问题上。

英国与国民党在较早时期的互相敌对

如所周知，孙中山在向苏俄寻求对其革命事业的支援以前，已对西方深感失望。挫折驱使他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

作，这就明显地改变了他对列强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他发动了一场反对列强的宣传战。1924年1月26日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了一项反帝政策，谴责了外国帝国主义，并把中国的困境和半殖民地状态归咎于外国帝国主义。①

孙也许未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倾倒，也许也不赞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②但是，反帝确已成为孙的政治思想，成为1924—26年间国民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③1925年3月孙逝世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将他的三民主义和呼吁早日召开国民大会、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作为党的指导方针。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一项更为激进的反帝宣言，责成党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一切在华的外国特权，并宣布一切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都是必须被消灭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④反帝当时被当作促进国家统一的手段。

反帝的主要锋芒所向，涉及所有的外国权益和特权的整个范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大不列颠陷入同民族主义者的冲突。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不平等条约主要是英国的产物。尽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在华贸易衰减，日本在华贸易增长，英国在华地位依然如此重要，以致她不得不同日本一起，在许多中国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面前首当其冲。几乎每一个含有中国主权的问题——关税自主、治外法权、海关行政、公共租界、会审公堂——都在很大程度上把英国牵涉进去。正如一位前英国外交部顾问略带夸张的说法那样，"受罚正是英国为其强大所不得不付出

① 宣言的全文，见中国国民党党义研究会编：《中国国民党历年宣言汇刊》（南京，1929），第37—54页，以下引用时作《历年宣言》。

②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Patrick Cavendish）：《国民党的反帝运动（1923—28）》，见陈志让、尼古拉斯·塔尔林（Nicholas Tarling）编：《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史研究》（坎布里奇，1970），第28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66），第一册，第四章；林百克（Paul M.A.Linebarger）：《孙中山的政治学说》（巴尔的摩，1937），第189页。

③ 辜宏鼎（音）（Ku Hung-ting）：《国民党反帝运动的兴起》，《东方研究杂志》，第14卷，第1—2期（1978），第87—97页。

① 《历年宣言》，第78—104页。

的代价”。①

就英国官员而言，他们对中国的国民运动，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非常不喜欢孙中山，把他描绘成一个“有害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幻想者”和“梦想家”，他领导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颠覆运动”。由于广州政权为苏联影响下的“过激分子”所控制，伦敦便承认并支持了北京政权。反英骚动被视为一种受外国鼓动的现象，外来势力向骚动的烈火提供燃料。② 可以认为，英国敌视国民党人，支持诸如吴佩孚那样的军阀统治的北京政权，乃是对其在中国断断续续的内战中宣称中立的嘲讽。这也表明，英国偏爱未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政权。

继上海的巡捕房在1925年5月30日枪击了中国示威者之后，反英骚动在五卅运动中达到了高潮。这一事件是由于杀害公共租界内日本纱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而触发的。但因为枪击的命令是一名英国捕头下达的，反日骚动便立即发展成了一场全力反英的运动，表现为抵制英货、罢工、城市居民大规模示威等。这场运动被操纵统一战线组织的共产党人所利用，③ 不久便导致了6月份的省港大罢工。

伦敦逐渐明了，同国民党人的对抗致使英国在华政策的目的无法达到。其总目的是扩大贸易，而这又与其他三个目标相关联：保护英国的贸易特权和工商企业；保护英人的生命财产；维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达到这些目的，英国曾遵循了一种动用或炫耀武力的高压政策，以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保护英国的利益。这种政策曾奏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在二

① 约翰·T·普拉特（John T.Pratt），《中国的战争和政治》（伦敦，1943），第200页。

② 理查德·斯特兰姆斯基（Richard Stremski），《中国国民革命期间英国政策的形成》（台北，1979），第13—14、55—56页。

③ 理查德·W·里格比（Richard W.Rigby），《五卅运动：事件和主题》（堪培拉，1980）。关于英国外交方面较简短的集中研究，可参见尼古拉斯·R·克里福德（Nicholas R.Clifford），《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运动与保卫外国特权》（安阿伯，1979）。

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它不仅被证明为毫无成效，而且还适得其反。① 它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因而有利于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贸易的扩大取决于顾客的好感。1925—26年间的罢工和联合抵制，反映了英国贸易政策无视中国人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产生的后果。②

在1921—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国曾列身于许诺要为中国在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方面伸冤的列强之中。但是，列强强加的先决条件，使他们的允诺徒有虚表。满足中国人的期望决不是该会议的真正意图；它的主要目的是裁减海军。③ 会议制定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条约，为此后十年的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主要框架。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动乱和列强自己之间的抗衡猜忌，会议未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外交的新秩序。④ 况且，国际合作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内，外国的对华监护将继续下去。因此，列强在对付大多数中国人的不满，或在恢复管辖自己事务的措施方面，无所作为；这些事务，诸如会审公堂、海关行政等，在辛亥革命前就已为中国所掌握。⑤ 在列强之间，有一种普遍的惰性；直到1926年，英国自己仍然满足于遵循一项“无为而治”的方针，期望中国的局势会稳定，并期望在同列强的协力之下，她能对付新生的中国，履行华盛顿会议的诺言。⑥

然而，中国的形势正在骤变。继五卅事件之后，北京政府联

① 参见E·戴维斯（E.Davis），《英国在远东(1922—1931)，外交和防务政策的研究》，未刊哲学博士论文，伯明翰大学，1973。

② 关于联合抵制的后果，参见查尔斯·F·雷默（Charles F.Remer），《中国联合抵制的研究》(巴尔的摩，1933)。

③ W·W·威洛比（W.W.Willoughby），《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中国》(巴尔的摩，1922)，第1卷，第23—25、27页。

④ 入江昭，《模仿帝国主义：在远东寻求新秩序（1921—1931)》（坎布里奇，麻萨诸塞，1965)，第1、2章。

⑤ 普拉特，《战争和政治》，第194页。

⑥ 除了斯特兰姆斯基的书外，可参见彼得·G·克拉克（Peter G.Clark），《英国与中国革命（1925—1927)》，未刊哲学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1973；大卫·C·威尔逊（David C.Wilson），《英国与国民党（1924—1928)，对英中官方政策、观念相互作用的研究》，未刊哲学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73。

合了广州政府，要求废除条约体系中两个最可恶的部分：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这导致了关税特别会议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以讨论准予中国征收华盛顿附加税的方法。伦敦改变了原先的立场，现在主张，列强应放弃外国对中国海关税收的控制，中国有权无条件地获得附加税；主张列强恢复1912年以前的制度，由中国人自己来征收和储存税收。这就意味着附加税将不能用作中国举借外债的担保，这些债务（主要是1917年的西原借债）与日本、而不是与英国自身有关系。设想这样就会促进中英关系的改善，从而有助于解决广州的联合抵制。①

1926年4月，段祺瑞政权的突然崩溃破坏了关税会议，而列强可与之交涉的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显然尚需若干时日。但在1925年年底以前，英国外交部已根据中国近期发展的情况，开始了修订其对华政策的行程。段祺瑞政权的消失，以及北伐的迫近，给政策的修订增添了新的紧迫性，因为英国必须刻不容缓地同将要成为中国执政党的政党达成协议。英国外交部不顾当时一些人的反对，积极着手制订一项新政策。副外交大臣、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维克多·韦尔斯利爵士（Sir Victor Wellesley）承认，已不可能继续实行炮舰政策，“从陆军和海军的观点来看，对付象中国那样的一大群混乱的民众，我们多少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排除任何强制性的东西，除非有可能与其他列强一起进行海军示威。”②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国逡巡不前，发觉自己处于一种仿御的地位，没有足够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去介入远离本土并有可能持久不决的冲突之中。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只有把政策改得温和些，才能达到在华扩大贸易的总目标。如果英国的贸易要在正常的、过得去的状况下继续下去，就必须同中国当局谈判，无论从什么地方找到一些暂行的解决办法。英国在华毕竟没有领土要求。正如韦尔斯利坚决主张的那样，英国

① 斯特兰姆斯基：《英国政策的形成》，第6章。

② FO371/11653F3424/8/10韦尔斯利的备忘录，1926年8月20日。

必须从中国撤退。既然高压政策未能维护英国的地位，选择撤退看来就意味着失败和耻辱。但是，撤退必须有条不紊，不致成为溃退；撤退的目标是避免败北，以便用其威望和未受损伤的惊人强盛来使英国摆脱混战。①

外交部回过头来认识到，应当运用同情而将中国的国民运动从布尔什维主义那里争取过来。从政治上讲，如果屡遭困顿、挫折的国民党人不得不同共产党人和苏俄长期结盟，就将是灾难性的。相反，赞助这一运动中的稳健分子，促其成功，将对英国有利。而且，国内的工党反对派赞成同情国民党人的政策。公众舆论也反对任何会导致在远东使用军队的政策。②因此，在1926年将近年底的时候，外交部终于在一份备忘录里制订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该备忘录于12月18日发往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并于节礼日那天在英国公布。

英国新的对华政策

通过“十二月备忘录”，英国政府对国民运动表示了友好态度，声称对这场运动缺乏“同情的谅解，并不符合列强对华的真实意图”。③英国自己保证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并呼吁其他列强——特别是日本——放弃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越俎代庖。英国曾反对由北京关税会议处理中国的无担保债务问题，因为债务问题与英国的关系不大。英国打算准许中国无条件地征收华盛顿附加税，认为附加税的收入应当专用于生产性目的，诸如铁路建设、社会或经济改革等，这些将对整个中国有利。在中国没有

① FO371/12398F70/2/10韦尔斯利关于蓝普森（Miles Lampson）来电的笔记，1927年1月3日。亦可参见FO371/13170F4155/7/10韦尔斯利关于英国在华政策的备忘录，1928年8月3日。

② 张伯伦致蓝普森，1927年1月29日，引自哈罗德·E·凯恩（Harold E.Kane）：《迈尔斯·蓝普森爵士在北京公使馆（1926—1933）》，未刊哲学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75。

③ 这份备忘录的全文，见FO371/11664F5688/10/10。

一个稳定政府的情况下，外国对海关税收的控制，适足为任何偶然控制北京的人提供为军事目的举借新债的机会。英国认识到，中国由于刚在关税会议上原则上获得了关税自主权，将不再容忍外国对其税收控制的任何延长，也不再会在整理债务或裁撤厘金（地方政府的过境运输税）方面屈从，因而，列强如以进一步的控制强加于中国人，则是与华盛顿条约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为此，列强应当“宣布，一旦中国自己制订并颁布了新的国家海关税则，他们就立即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

英国新政策的核心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采取保护立场，承认中国修约要求的基本合理性，同时也承认目前情况下磋商新约的困难。英国呼吁其他列强，改变其一贯拘泥于条款行文的僵硬态度，只保留对危及根本利益的情况进行抗议的权利，然后采取联合行动促其生效。一旦中国建立起一个具有谈判权力的政府，伦敦就准备同它就修约和其他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始谈判。

“十二月备忘录”体现了英国想解决耽搁已久的中国问题的主动性。英国不相信，在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个受到承认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约。她将不再等待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类似1926年年底的情况），而想立即通过单方面的行动，采取步骤，消除中国人的不满。单方面的行动将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同任何人就任何问题进行无法期望的协商；一是同地方当局磋商达成协议。① 英国外交部希望的是：修约时机到来之时即是中央政府在华诞生之日，“届时会发现，至少有部分条约的修改已按照令人满意的方式实现了。”第一个单方面的行动将允许在中国各地无条件地立刻征收华盛顿附加税。

没有人会相信，备忘录会象它的作者所期望的那样，被视作是宽宏大量的。英国当然不准备一下子就放弃在华的所有权益和特权，但是，象外交部所理解的那样，把新的对华政策解释为一方面对中国人作出让步，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恫吓，则是错误

① FO371/12414F7085/3/10普拉特的笔记。

的。① 事实是，在伦敦看来，较小的利益可以自愿放弃，中等的利益可以磋商，而根本的利益则必须维护，直至充分的保护措施得到保障，尤其是确保英人的生命财产。如同韦尔斯利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正在从事撤退，而撤退必须是“有条不紊的撤退”，以使英国的威望不会受到损害。

英国的主动在武汉遭到了冷遇，国民党左派已在那里建立了新政权。外交部长陈友仁极有理由地认为，从华盛顿附加税中免去海关税收，将有利于北京政权，从而使内战延长。② 另一个正当的异议是，备忘录只涉及原则，泛泛空论而无实际内容。这导致英国外交部立即于1927年1月27日向武汉、并于一天之后向北京提出了一项更具体的建议。该提议由七项条款的“改约方案”组成，涉及的范围从英国对中国的某些现代法庭和法律程序的承认，到放弃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购买土地的权利。③

1月29日，外交大臣奥斯订·张伯伦爵士在伯明翰宝石匠、银匠协会年度宴会上，为英国的提议作了辩护。他说，英国的愿望是赞成“一个强大、统一、独立、有秩序和繁荣的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英国就可以同它进行贸易。他指出，英国是个“买卖人之国”，其唯一的愿望就是“维持营业并与国民友好相处”。他认识到，与中国签订的旧条约业已过时，必须变更。中国人的修约要求是如此的坚决、如此的合理，为此即使中国仍在内战之中，英国也必须就这种变更，尝试同各方互相敌对的政权进行谈判。这就是“十二月备忘录”的精髓。谈到七项条款的改约方案，张伯伦确认，英国必须更多地迎合中国人。他肯定这是“一个正确而明智的步骤”，因为“我们正在考虑今后百年间同中国的关系”。这七条建议可以立刻付诸实施，无须等待出现一个受到承认的政府

① H·欧文·查普曼（H.Owen Chapman）：《中国的革命（1926—1927）：共产党控制时期的国民党首都——汉口见实记》（伦敦，1928），第137—8页。

② FO371/12397F18/2/10戈夫（Goffe）致外交部，1927年1月1日。

③ FO371/12400F953/2/10。

再缔结新约。①

陈友仁对张伯伦伯明翰演说作出了反应，陈再次十分严正地指责他运用了一种必将导致中国真正分裂的外交手腕，因为英国的建议将把中国分割为以武汉为基地的国民党中国和以北京为首都的“封建主义的中国”。② 陈所要求的是承认武汉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而这并非是伦敦准备做的。

不过，国民党人因看到一个和解的英国而感到宽慰。仅在四周之前，英国已就中国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行动作了让步。1月3日汉口租界的归还，是“一场激昂的反帝群众运动和英租界有关当局十分克制的态度”的结果。③ 英国政府抵制了用武力再度占领租界的压力——这一压力来自迈尔斯·蓝普森公使，此人的权威可与外交当局相匹敌。对英国外交部来说，汉口是一个试验性的实例。国民党已用暴力手段夺回了租界，但一经占领，他们自己就承担了维持秩序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责任。如果他们证明了自己愿意并能够实现这项保证，即进一步的暴行和暴力威胁不在汉口发生的话，英国仍有可能采取单方面的行政措施，就一项有限的改约方案着手谈判。如果反之，则与国民党就已列入计划的方案进行谈判，或就其他方案进行谈判，都将是无益的。尽管发生了汉口事件，倘有可能，英国仍然希望同国民党人达成一种暂行解决办法。外交部驳回了蓝普森要求实行的道义与武力双管齐下的政策建议，并训令公使馆达成协议。2月19日达成了陈——欧玛利协定，中国籍此获得了对汉口租界的控制，而英国纳税人将与市政委员会中的中国方面的代表，共同协调该地区的财政和管理。④

对外交来说，诸如在汉口、厦门、镇江和九江的那些租界是

---

① 《泰晤士报》(伦敦)，1927年1月31日。

② 《泰晤士报》，1927年2月8日。

③ 李恩汉（音）(Lee En-han)：《1927年中国对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佩思，1980)，第13页。

④ FO371/12410F8200/2/10蒙西（Mounsey）的备忘录。

“较小的利益”。所有英国在汉口的主要商号，甚至都不在租界区内，而是在租界之外。用武力重新占领租界将会危及那些商行。由于拒绝使用武力，英国获得了道义和策略上的优势，得以否认加给它的帝国主义的指责。由于签订了陈——欧玛利协定，英国将负责的义务交给了国民党，国民党将被置于受考验的地位。①

英国的和解给武汉政权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友仁不顾反英的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不同意见，深信英国同意放弃租界，“体现了一种妥协的精神”，他打算对大不列颠采取一项相应的友好政策，以免永久对抗。② 为了报答英国的温和态度，陈在1月23日宣布，他的政府除了谈判不会用另外的手段来收回其他外国租界；他愿意以平等地位单独同任何列强就修约问题进行谈判。③

至于英国，其根本利益在上海，汉口事件确实引起了她对上海利益的急切关注。英国还不准备将那里的公共租界归还中国人管辖。公共租界当然是国际性的，但却是英国贸易和商业利益的中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抗民众暴力，以确保安全。中国在汉口成功之后，暴民和散兵极有可能对上海进攻。英人的根本利益以及生命财产岌岌可危，这就是内阁会议在1月17日决定派遣上海防卫部队的原因。英国政府坚称，这支部队纯属防卫性质；它准备贯彻在“十二月备忘录”中概述的政策，而不希望被击溃以至放弃其根本利益。④

事实上，中英缓和的障碍并不是上海防卫部队，而是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外人的生命财产断送在国民党散兵手中，这使英国的外交官员和在华外侨团体为之哗然。英国的调和政策是否明智已遭到疑问。在陈友仁拒绝了列强的联合要求后，外交部受到多方的强大压力，促其采取诸如轰炸汉阳兵工厂或重占汉

① FO371/12436F5349/67/10关于汉口协定的备忘录。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伦敦，1930），第275页。

③ 伍德海（H.G.W.Woodhead）编：《中国年鉴（1928）》（天津，1928），第762—4页。

④ CAB23/54内阁会议决议，1927年1月17日，内阁会议2（27）2。

口租界的报复行动。自厅沉浸在烦恼激怒之中。最终，温和的对策因理由充分仍占上风。首先，在该事件的最初骚动平息很久之后，采取报复行动能否有效地达到目的尚属疑问。其次，列强未能在共同行动的方针上取得一致；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均不愿介入英国的行动。再次，英国和日本一样，正指望着蒋介石，他已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对立的国民党政权，并对共产党人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清洗。英国的报复将会削弱他的反共立场。从政治上讲，同情一个致力于在中国清除布尔什维克影响的政权，将会对伦敦的保守党政府有利。①

南京事件严重地损害了武汉政权的声望，并导致张伯伦在5月9日的议会上发表了声明，他说，武汉政权“已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目前已名存实亡。”② 五天后，英国召回了驻汉口的代表欧文·欧玛利（Owen O'malley）。这次事件历时一年多未能解决，英国在各种场合向中国人表明，解决这次事件是谈判任何有关条约问题的先决条件。

寻求一项解决办法的努力始于1927年夏，但一无所获。1928年初，又重作努力，但在3月的最后时刻，由于英国外交部拒绝对炮轰南京表示歉意，并拒绝在同一份协议中承认“尽快”修约的愿望，谈判便告破产。③ 3月30日，国民党人单独同美国达成了一项协定。南京政府对暴行承担全部责任，同意对美国人财产和所有人员的损伤给予充分的赔偿；作为回报，美国对它无法控制的局势竟需要炮轰南京来保护美国人生命一事感到痛惜，并表示希望中国的形势将会创造修约的机会，以修改那些也许已成为

① 克拉克：《英国与中国革命》，第585—630页；威尔逊：《英国与国民党》，第557—98页。

② 引自伊罗生（Harold R.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斯坦福，第二次修订本，1961），第206页。

③ 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急于与中国人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他对此事所持的意见与外交部不同，引起了他同国内远东司成员之间的某种恶感。参见凯恩：《迈尔斯·蓝普森爵士》，第4章。有关中国方面的叙述，参见金问泗：《外交工作之回忆》（台北，1968），第6—14页。

不必要或不适合的条款。① 直到1928年 8 月，才与英国达成了一项类似的解决办法

南京的对英态度

甚至在北伐胜利以前，国民党人就已表示了要同英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清洗共产党人，以及继苏领事馆介入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后同苏俄断绝关系，都是起了作用的因素。南京政府仍未得到列强的承认，它急于要赢得外国的尊重。既然苏俄已不再是过去那样的朋友了，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友人。在所有的与中国订有条约的列强中，英国和日本最有影响，美国则紧紧追随其后。英国和美国都拟作友好和解的打算，而在田中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则推行着一种“强硬”和“专横”的对华政策。面对已经疏远的苏俄和具有干涉危险但又不想去得罪的日本，国民党人十分自然地感到，增进同英、美的友好关系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国民党的外交政策仍然围绕着条约问题打转。在蒋介石看来，列强可分为两类：赞助中国革命的和反对中国革命的。要交好前者，反对后者。② 1927年，蒋曾在多种场合当众声明，当中国必须与帝国主义作战时，中国将向一切平等待华的国家寻求最诚挚的关系。每个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而友谊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一项彼此尊重国家主权的新条约，就是对这个基础的考验。③ 1928年年初，蒋宣称：只要可能，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达到——虽然是本着不妥协的精神。与所有条约国的谈判应当同时地分别地进行。如果列强拒绝这样做，或者谈判最终没有结果，国民党政府将“根据通

① 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纽约，1947），第378—385页。

② 入江昭：《模仿帝国主义》，第94页。

③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二卷，第588页；萱显光：《蒋介石：军人和政治家》（上海，1937），第1卷，第162页。

常的国际惯例并在形势变化的压力之下”，承担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责任。① 换言之，作为最后一着，中国将单方面采取行动。

在1928年2月初举行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国民党外交政策的目标被确定为民族之平等和国家之独立，两者的实现，自须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不是新观念，而是同孙中山的愿望相一致的。国民党强调，中国不能用武力对付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唯一希望在于国家的自强。国民党进而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应该用“现实主义的建设”，而不是用共产主义的暴力手段，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并非是某种无须艰苦卓绝的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②

这种改变对外政策方向的意义，可以从国内政策的新倾向中看出来。在国内，南京政府现在致力于一项改造和自强的计划，其重点放在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上。去年12月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加强了国民党右翼的地位；右翼支持蒋的建议，即所有反对外国政府的群众运动都应当受到党的中央当局的监督。这类运动被说成在过去犯下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有必要制订新的规章，以控制它们的组织、活动和目标。③ 被右翼操纵的国民党，对已被发动起来的民众力量感到忧心忡忡，决心控制他们，以免他们被用来反对自己。

1928年2月21日，新任命的外交部长黄郛宣布，国民运动将为早日同友好的列强开始谈判以缔结新约而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此期间，拟将保持和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关系。黄还保证，他的政府要保护在华外人的生命财产，并承认今后地方当局同外国政府缔结的所有条约和协议。④ 黄的声明温和而明智，完全没

① 《密勒氏评论报》(上海)，1928年1月29日，第222页。

② 中央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纪录》(南京，1928)，第12页。读者或许已注意到，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宣言被编进了第五次全体会议纪录。

③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见杰克·格雷(Jack Gray)编，《近代中国对政治结构的探索》(伦敦，1969)，第138—86页。

④ 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台北，1976)第一卷，第322—3页。

有孙中山和陈友仁那种反帝论战气味，比同共产党人决裂前的任何外交政策声明都更为妥协。①

随着北伐的最后胜利，国民党人于6月15日宣告：关于新条约的谈判，时机已经到来，谈判将根据外交程序，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行。继此之后，7月7日的一份外交部官方通告宣称：所有期满的不平等条约事实上已作废，国民政府将立即按照适当的程序采取措施予以终止；那些还未满期的条约，则须缔结新约，在此期间，将实行临时办法。②

王正廷，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职业外交家，继黄郛任外交部长，十分倾向于西方。他曾三次出任北京的外交部长，一次出任代理总理，并担任过关税特别会议的首席代表。③他似乎对英国有高度的评价，并竭力设法使英国外交家对他的对英友好的态度产生深刻印象。④在中国急于寻求外国援助的动机促使之下，他告知英国公使，中国需要一个朋友，声称正是他（王）才使他的政府确信，他们应当转向英国。⑤

王认为，美国对中国除了经商、传教和慈善事业之外，别无兴趣，因此很可能是首先同意修约的国家之一。俄国和德国在几年前就已不再作梗，只剩下英、日、法以及次要的强国。由于害怕日本，王的策略是，首先同英、美、法谈判，同时与日本保持友好的气氛而不致引起日本的怀疑。他抱着一旦能确保英国同意修约就可以说服日本跟着做的期望，全力去争取英国的合作。⑥

王觉得英国公使是“一个智力敏捷，多才多艺的人，他同情

① FO371/13165F929/7/10托勒（Toller）的笔记。

② 外交部：《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南京，1929），第37—9页。

③ 包华德（Howard L.Boorman）编：《中华民国人物辞典》（纽约，1970），第三卷，第362—4页。亦可参见王正廷的未刊回忆录：《回顾与前瞻》，作为口述中国历史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

④ FO371/13173F6708/7/10许立德（W.Hewlett）致蓝普森，见于蓝普森致库申邓勋爵（Lord Cushendun），1828年10月10日，附件2。

⑤ FO371/13174F6906/7/10蓝普森致外交部，电报第55号，1928年12月12日。并见普拉特的笔记。

⑥ 王正廷：《回顾与前瞻》，第14章，第5—6页。

中国厕身于完全平等的国际大家庭的愿望"。① 这种看法得到了回报。蓝普森及其同僚觉得，同其打交道的王是一个令人愉快而具有才干的人。后来，王正廷同英国驻南京的总领事许立德私交甚深，同他办理过很多棘手的交涉。②

除王之外，一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参与了对英国的劝诱工作。两个明显的例子是胡汉民和孙科，他们在1928年的一次长时间欧洲旅行中，分别籍机拜会了张伯伦，向他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在7月18日与张伯伦的会晤中，胡首先使张伯伦确信国民党对大不列颠的友好感情。胡汉民说，俄国提出的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他们的说法，曾使他们误入歧途；他们已发现，俄国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们而已。国民党赞赏英国的新政策，因为中国在工业和财政方面需要英国的帮助，并迫切地希望这种帮助即将到来。在答复中，张伯伦对胡关于友好的主张作出反响，并解释了"十二月备忘录"中制定的政策。英国准备改变条约制度，但张伯伦坚决认为，条约的改变必须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单方面宣告无效。他还劝告中国人要为自己国家的信誉着想而还清债务。③

孙科同张伯伦的会晤于7月23日举行。他首先概述了国民党对英态度的历史，欢迎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敌对变为友好。党的主张已由军事阶段发展到改革阶段。中国有能力自己进行改革，但其进程将颇费时日。不过，中国如果得到外国的援助和专家指导，这一改革阶段将能缩短为二十或三十年。因此，中国政府希望外国援助，但这种援助只能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外国的援助不能很快到来，国民党人也许会再度求助于俄国。鉴于日本继续驻兵山东，国民党人怀疑日本在满洲的用意；孙科警告说，这或许也会迫使国民党人再度同苏俄结盟。④

① 同上，第6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伦敦，1943），第205页。
③ FO371/13170F379/7/10胡与张伯伦会谈记录，1928年7月18日。
④ FO371/13170F3881/7/10关于孙科、张伯伦会谈的备忘录，1928年7月24日。

正是同俄国的联系，才导致了国民党同西方国家为敌。孙说，鉴于恢复这种联系并不恰当，国民党便企望“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同英国合作。最后一句话隐约涉及条约问题。张伯伦领会了这一暗示，坚持英国不应忍受对条约的所有指责。条约之所以“不平等”，是因为缔约时，中国人不准备向外国人开放自己的国家，“租界”在当时并非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约束。不过，张伯伦同意，条约中的有些条款正在激怒中国人，修改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他强调了两点：第一，修约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和共同协议来实现；第二，中国的改造不只是经济，还有政治、社会和司法，乃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张伯伦的意思是，修约和改造都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而前者的实施有赖于后者的进展。

张伯伦建议，作为开端，中国似可就关税自主开始谈判，并缔结一项为期数年的商约。至于治外法权，在中国法庭的水平、中国法官的公正，以及中国监狱的状况得到显著的提高改进以前，中国人不能期待英国放弃保护其在华臣民的权利。

孙科同意，谈判是处理条约问题的唯一途径。但是，他坚持认为，既然中国已重新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修约的进程就应立即开始。提高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司法水平，也许要经几代人，但在此期间，作出若干暂时的安排，应当是可能的。一旦英国朝着这个方向表现出行动的迹象，就立即会对中国人民产生有益的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将偿还一切理当承担的债务。

显然，孙正在要求英国加速修约的进程，因为这将有助于巩固国民政府的地位，以对付非议者和政敌。但是，张伯伦固执地认为，采取重大措施颇费时日，力劝孙不要让条约问题掩盖中国的内部困难。南京事件一经解决，英国政府就准备讨论商约和关税自主问题。同时，中国人受到了忠告：不要试图去进攻诸如海关那样的中外共同经营的机构，这种机构是为中外双方的均等利益服务的。

英国策略的改变

英国意识到，她现在不得不对付一个统一的中国，尽管南京政府的稳定和权威都还有问题。更全面地执行“十二月备忘录”中制定的政策的时刻已经到来。无论怎样辩护，任何背信的企图都将被视为不真诚的标志，而中国人也许会被迫擅自处理。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外交部觉得，英国有必要尽可能地避免同敌人进行拼搏或对抗，除非对自己阵地的坚不可摧有绝对的把握。例如，假如发生类似南京事件那样的暴行，英国将避免发出最后通牒，而会当场应付这种局势，并且会毫不迟延地在当时当地就进行报复。至于修改条约，英国的战略是区别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得不进行对抗的话，那对抗必须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①

正如韦尔斯利所见，修订条约是件棘手的事情，涉及取消大量复杂的外国权益和特权。至于英国，这个取消的过程在1927年就已开始。例如，通过准予中国人无条件地征收华盛顿附加税，英国实际上把关税率提高了；将汉口、九江租界归还给中国人；改变了天津英租界的市政管理，以及将上海的“会审公廨”交还中国管辖。以后的修约应沿着同样的路线取得更大的进展，亦即使逐渐取消的过程继续下去。

英国担心中国人也许要作全面交涉，因为英国宁愿逐条逐点地根据是非曲直分别进行处理。如果中国人想走得太快、太远，英国将不得不刹车，并决定对哪一点可作抵制，在哪一点上可以拖一拖。

对英国来说，较快地满足中国人在关税自主和海关行政方面的愿望，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海关自主已于1926年在原则上

① FO371/13170F4155/ 5 /10韦尔斯利关于英国对华政策的备忘录，1928年8月30日。

给予中国；剩下要做的是让其生效。在此问题上，英国的兴趣在于缔结一项有利于（或至少无损于）英国贸易的新商约。至于海关行政，要是象1911年前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时代那样把它交由中国人管辖，将对英国有利；它应当不再充作列强为了外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而控制中国税收的工具。英国对中国将履行其财政上的义务而感到满意。

治外法权仍然是不平等条约的渊薮，正是在这里，英国人准备不惜代价地采取对抗的立场。外交部无意继续绝对地排除中国对英人居住区和租界、英国房屋和英国船只、或有关征税事项的司法权。但无论如何，将不会允许在缺乏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英国臣民身上行使中国的司法权。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将是漫长而艰难的。

“十二月备忘录”和1927年1月的提议继续指导着英国的政策。但在策略上，外交部对采取主动则持比前一年更为谨慎的态度。一个至少在名义上统一的中国的出现，进一步使英国处于防御，并迫使外交部改变策略。伦敦决意等待中国人首先采取步骤，然后对其提出的每一项建议作出回答，而不采取主动。① 这并不意味着由主动角色变为被动角色。由于其国际影响和仍然十分重要的在华利益，英国绝不可能满足于一个被动的角色。正如一位英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所说：“如果英国不能结束以条约体系为其支柱和象征的开拓时代，就没有一个强国能够做到。”②

外交部和在北京的公使馆对中国的新形势作出了一致的反应。在中国重新统一于南京政府以前，公使馆在贯彻对华政策的方法上，同外交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于英国政策的目标，并无异议；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利弊，也无争论。他们的分歧起因于对武力在保护英国利益的作用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外交部的

① FO371/13157F3779/ 5 /10普拉特和蒙西的笔记。

② W·罗杰尔·路易斯（W.Roger Louis）：《英国在远东的战略（1919—1939）》（牛津，1971）第140页。

立场是，除了在英人的生命财产遭到袭击或处于岌岌可危的十分特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并非需要，而且会适得其反。公使蓝普森，一位曾在远东任职、并当过外交部具有声望的总务司首长的富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家，对这一立场是否明智表示了疑问，因为，象他同时期同一代的许多英人一样，他认为中国人不会听从任何道理而只会屈从于武力，所以，对付他们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手掌握正义，另一手掌握武力。换言之，蓝普森想公正地对待中国人，并就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同他们论理；但他认为，如果中国人拒不通情达理，由此危及英国的利益，就应使用武力以作为外交的支持。在1927年上半年骚乱的几个月中，他曾极力主张用武力重占汉口租界；他曾要求“在一切地方”使用上海防卫部队，以增强他讨价还价的力量；而且，在南京事件之后，他曾参与号召对中国人进行报复的活动。他是张伯伦的门徒，在洛加诺谈判期间曾是后者的“得力助手”，一种特殊的关系使他可以同外交部意见相左而不受惩罚。①

在一系列事件证明了外交部的容忍的调和性政策是正确的之后，为使蓝普森与之一致，外交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还使外交大臣发出了若干私人和机要的信件。

关税自主

国民党人把完全的关税自主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事务，南京事件一得到解决，他们就同美国进入了双边谈判。1928年7月25日，美国未经与英、日协商，就同中国达成了一项协定，给予其最惠国条款所属的完全的关税自主。② 美国这一出乎意料的行动，遭到日本新闻界的激烈指责，并被英国视为一种决心夺取英国通过

① 凯恩的未刊论文第2、第3章，对蓝普森同外交部的摩擦作了最好的叙述。
② 博格：《美国政策》，第401—4页。

“十二月备忘录”所取得的“精神领袖地位”的迹象。①

美国的新方针是对南京表示友好，但中国人未得到任何新东西。直到确实获得其他列强的认可，关税自主才能进入议题，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正是英国地位的实力，因而胸有成竹地等待中国人提出他们的建议。

英国的目标是，通过促成其他列强的赞同，使关税率一致并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以求保护英国的利益。此外，英国还企图尽可能多地取消贸易限制，而保存英国在其中具有主要影响的海关行政。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英国不让自己无故地卷入任何为整理中国债务的国际阴谋。② 如同“十二月备忘录”所允诺的，一旦中国人能制定并颁布国家关税率，英国将立即赞同关税自主。唯一的条件是不应歧视英国的商品和商人。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在1929年初关税自主生效以前，必须同时磋商一项互惠的关税协定。英国希望中国人采用1926年关税会议上外国代表所草拟的临时附加税一览表为其国家的基本关税，并将该表稳定数年；作为回报，某些中国商品将被允许免税进入英国。③

中国人同意在临时附加税一览表的基础上颁布国家关税，同意对英国的商品和商人不加歧视。但是，他们固执地认为，互惠关税协定不能构成关税自主条约的一部分；这样的一项协定可以单独磋商。他们也不接受英国关于将关税稳定两年的提议。他们只同意一年并外加两个月，作为实行新关税的通告日期‘这将从货物到达中国的日期开始生效，而不是象英国所要求的那样从货物运往中国的日期开始。

中英关税条约于1928年12月20日签署，中国藉此将从1929年2月1日起，实行国家临时附加税一览表。与此同时，南京仍在单独同日本谈判；在中国人同意从海关税收中调拨足够资金以整

① FO371/13158F3951/5/10普拉特的笔记。

② FO371/12415F8535/3/10普拉特的笔记。

③ 关于这次关税谈判的概要，见FO371/13893F1056/11/10蓝普森致张伯伦，1929年1月4日。

理债务之前，日本不准备让完全的关税自主生效。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为了各自的主张向英国寻求支持。但是，英国拒绝卷入任何中日纠纷而使自己只限于劝说双方达成一项妥协的方案。①

在关税条约签署的同一天，英国对南京政府给予了外交上的承认，这大大地提高了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威望，也标志着中英关系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发端。1929年1月，中国政府任命了梅乐和（Freberick Maze），一个罗伯特·赫德爵士政策的狂热信徒，为总税务司，从而解决了海关的行政问题。关于归还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谈判，于1930年圆满结束。一项关于使用庚子赔款的协定也达成了。1930年年底前，英国还正式将其在镇江和厦门的租界归还了中国。

治外法权

撇开英国小心翼翼的试探不说，关于治外法权的谈判，一方面由于英国在华贸易集团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对内政策而变得复杂化了。众所周知，在华英商是一帮紧紧抓住其特权和条约权利的“死顽固”。他们大部分在上海营业和居住，另一部分人则在汉口、天津、广州和其他地方。这些“上海人”和其他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构成了一个国内之国。正如阿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所述，“上海的明智之士”表示不能承认自义和团暴动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变化，并企图完全改变伦敦的和解政策。②

在同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每一阶段，蓝普森都认为有必要使侨民领袖们相信：伦敦无意牺牲他们的利益，而保护措施的落实将作为归还任何英国重要租界的交换。他随时让他们了解伦敦的

① 冯兆基，《英国、日本和中国关税自主（1927—1928）》，《英国日本研究协会1981年年报》，第6卷，第1期（1981），第21—36页。

② 阿瑟·兰塞姆，《中国的难题》（伦敦，1927），第28—32页。

意图，有时则是秘密地进行。但他们看不到放弃治外法权的好处，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国有按照西方作风执法的能力，即免遭政治干涉和不受贿赂。最主要的，他们对公共租界的前景极其关注。1929年12月，上海工部局委托南非的费唐（Feetham）法官调查研究上海的未来前景。不出所料，1931年年中发表的费唐报告书，是一份指责中国人及其政府的短处、指责他们无能力建立"法律秩序"的起诉书。它建议继续由外国管辖，并在未来几十年而不是几年的长时期内维持现状。报告书发表时，正值中英谈判须作出关键性决定的时刻。在同中国人签署协定前，伦敦在极大的压力下仔细考虑了报告书。① 1932年1月，当日、中军队在上海发生冲突时，"上海居留民"就盼望日本胜利，认为伦敦应放弃其"防御性"的政策，趁此机会重新坚持对华的条约立场。②

在中国方面，对外政策因国内的政治状况而复杂化了。国民党一如既往，内部充满了派系斗争。有许多政治评论家，尤其是国民党的左派，对广泛的中国对外政策大吵大嚷。在条约问题上，他们采取了更为过火的方式，鼓吹完全废除外国的权益和特权，并指望这个取消的过程很快实现。如果通过正常的谈判无法在最近的将来做到完全废除，作为最后一着，他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举行罢工、实行联合抵制、以劳工动乱和鼓动民众相胁迫。这就是革命外交的概念，与现代常规的正统外交截然不同，这种外交鲁莽蛮横，认为中国应该依靠民众的支持而保持主动，不必顾及先例和常规。③ 不过，大多数左派认为，突然废除条约必然会陷入军事冲突；只有很少数人主张立即全部废除条约。甚至不惜以战争为代价。④

---

① 有关费唐报告书的文件可以从FO371/15482中找到。

② W．N．梅德利科特（W.N.Medlicott）编：《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2辑，第10卷（伦敦，1970），第54页，文件第31号。

③ 周鲠生：《革命的外交》（上海，1929），第1—6页各处。亦可参见载于左派周刊《革命评论》（1928年夏上海出版）上的各种文章。

④ 汤良礼：《秘史》，第322页。

总之，南京政府因其“软弱”的外交和与帝国主义调和的倾向而遭到了抨击：例如，关于南京事件的解决、同美英缔结的关税条约、1928年4月日本人对山东的干涉、以及同年11月的中比友好贸易条约。①

这些批评导致蒋介石在1928年12月10日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说，其中谈到，北伐胜利后的首要任务在于外交事务，中国在这方面最大的困难则与不平等条约相关。蒋亲口保证要废除这些条约，但要求党员们根据中国同列强的力量对比来通盘考虑问题。他强调外交必须以军事力量和人民大众为后盾。但是，中国软弱的军事无济于事，而中国的民众又是一盘散沙。蒋指责道，他们不是通过积极的发展和进步来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却去从事消极的排外。这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蒋的结论认为，唯一的方法是通过自强，而这需要时间，至少要三年，可能会更长——五年，甚至十年。②

在1929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重申了国民党在条约问题上的立场。③但是，这次大会却被左派指责为非法和滑稽可笑，这些左派由汪精卫、陈公博以及其他为捍卫1924年改组原则而建立国民党改组派的人所领导。桂系继此反叛了南京。桂系的广州同盟者张发奎也于9月对蒋宣战。④

但是，内乱一经平定，南京政府就急于向中国的民众表示其在治外法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1929年12月28日，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从1930年1月1日起，所有在华外侨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章。⑤列强并不把中国的命令真当一回事，因为知

① 周鲠生：《革命的外交》，第64—74、145—55、169、183—200页；汤良礼：《秘史》，350—1页。

② 蒋介石：《蒋总统言论汇编》（台北，1956），第九卷，第105—13页。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汇刊》（南京，1934）第145—9页。

④ 汤良礼：《秘史》，第347—8页。

⑤ 罗汉·巴特勒（Rohan Butler）编：《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2辑、第8卷（伦敦，1960），第252—3页，文件第182—3号。

道这是应付国内的。事实上，王正廷于12月30日发出了一份单独印刷的声明，大意是他的政府准备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考虑并讨论列强对该命令的任何申述。①随着这些声明而来的是同英国达成某种谅解，即，只是在原则上承认1930年1月1日为开始逐步取消治外法权的日子。中国人至此所取得的，仅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建立了一项原则，而为在适当时期内用谈判来解决问题敞开了大门。②

1930年再度出现的内乱，无疑削弱了南京的外交。自1929年12月28日的命令发布以来，已过去了好几个月，但却一事无成。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政府，都不能两手空空地去出席即将来临的国民大会。因此，蒋在1931年3月30日公开表示，希望条约问题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得到解决。③ 4月10日，焦急不安的王正廷发布了一份印刷的声明，承认中国和列强之间、特别是中国与大不列颠之间，在若干根本点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他警告说，除非中国期待的解决指日可待，否则他将被迫“宣告目前同有关列强的谈判已成僵局”。④ 5月4日，即国民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政府采取一项大受赞赏的单方面行动，颁布一套把在华外侨置于行使司法管辖之下的法规，该项法规将自1932年1月1日起生效。⑤

至1931年6月，在蓝普森和王正廷之间，已拟就了一项协定的草案。经过漫长的谈判，几乎到了最后阶段，才达成了按英国观点来说是四项原则。如以重要性为序上溯，这些原则是：上级法院提审，外国人共同会审，刑事司法权，保留地（广州、汉口、天津和上海）。蓝普森的策略是逐渐从第一项原则即保留地作退却，而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在上海的治外法权，至少要维持数年的时间。在

① 同上，第257页，文件第188号。
② FO371/14740F4284/2826/10关于1929年中国的年度报告，第34—5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31年4月4日，第152页。
④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2辑，第570—1页，文件第460号。
⑤ 同上，第514页，文件第417号。

蓝普森和王之间，经过几乎是无休无止的争吵才达成的协定是：治外法权最多在上海延续十年，在天津则延续五年。①

如果不是5月开始的广州独立运动使局势日益复杂的话，伦敦和南京双方虽然都有点勉强，但还是可能采纳这个协定草案的。蓝普森和王都感到，在南京和南方之间的冲突未获得结果之前，不得不中断谈判，将全部问题暂搁起来。重新开始谈判的希望被满洲危机粉碎了。在此情况下，英国便同美国一样，认为放弃治外法权为时尚早。英国外交部认为，就外交部而言，谈判已进展到最大限度，而问题的通盘解决，应留待中国同美国和其他列强的谈判取得同样的进展，并应等待中国表现有能力履行这些谈判可能产生的条约。英国将联合其他列强，坚决抵制中国从1932年1月1日起对外国侨民行使司法权的任何企图。至于中国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12月19日，南京声明将暂缓执行5月4日的法规。②既然中国人因日本入侵满洲而竭力支持国际法，他们就不希望因为任何取消外国条约权利的企图而受到国际联盟的传讯。

结　论

在1927—31年这段时期，可以看到中英关系的显著改善。中英恢复友好关系主要归功于英国对华政策的主动性，这项政策旨在逐渐取消旧的条约制度，并满足中国的合理愿望，只要英国的有关利益得到适当的补偿。认识到民族主义潮流的兴起和自身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飘摇不定，英国再也不能维持旧条约的统治，被迫从最终必定防守不住的阵地进行战略撤退。从英国人的观点看，尽管在1927年有几个月的骚乱，撤退在大体上还是成功的。至1931年底，两国之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和

① 同上，第559—601页，文件第460号。

② FO371/16234F4981/4981/10关于1931年中国的年度报告，第24—6页。

平的解决。余留问题的谈判因日本对满洲的干涉而陷于停顿。

尽管英国对其坚决推行的一项由其自身结果证明是正当的政策而感到满意，但它既不能够也不愿意去促成一种同国民党人更加密切的关系。例如，英国曾固执地拒绝将公使馆移往南京并升格为大使馆。中国的政治动荡，加上逐渐发展的中日冲突（英国不想被卷入这一冲突），促使伦敦维持其留有余地的友好态度。至于中国人，他们越来越求助于美国的指点和援助，特别是在财政事务方面。①

国民党由于自己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变化，欢迎并响应了英国的和解表示。由于反共和中断了同苏联的联系，国民党在其改造中国的努力中需要朋友和外援。因此，英国对南京的新政府来说就十分重要了。而且，举例来说，同与日本交涉的困难相比较，与英国的谈判证明是能得到合理的成功的。

在寻求国际平等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温和的方式，为支持和平谈判而放弃了群众运动，虽然它有时也因为国内的原因而以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相威胁。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薄弱和内部问题，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了“华盛顿方案”，即直到中国的司法行政机构经过改革并与西方或日本的机构相一致时，才能在一个时期内，分阶段地、逐步地逐条解决条约问题。②这种解决方案为列强所赞成，但却为那些鼓吹革命外交的中国人所抵制。

国民党对革命群众运动已失去兴趣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英国或对其他任何有这类问题的列强采取更“革命”或更“激

---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2辑，第11卷，附录，《蓝普森对中国诸事件的回顾（1926—33）》，第564页。有关美国对财政事务方面的指导意见的研究，参见阿瑟·N·杨（Arthur N. Young），《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1927—1937）：财政经济记录》（斯坦福，1971）。

② 卡文迪什：《反帝运动》，第24—25、43、54页。

烈”的态度，是否对中国更有利，则大可怀疑。① 虽然国民党人并未从英国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但是他们至少赢得了英国的友好和谅解。正如蓝普森在1933年回顾其任职公使期间中国发生的事件时所说的：“我们可以……公正地声称，中英关系处于一种令人满意的良好基础之上，目前关系之好的确是前所未有的。”②

译自英国《近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7卷，第1期（1983年）。

袁鸿林　陈怡均译
范　琪校

① 1929年，中苏在中东路方面的纠纷明确表明，在通过谈判修订条约之前，中国必须履行其条约义务。列强并不同情南京的行动，而欢迎俄国人采取的强硬立场。这次武装冲突对国民党领导人来说，是一种促其清醒的经验；列强不会无动于衷地承受挑衅。参见柯乐博（O.Edmund Clubb），《中俄大比赛》(纽约，1971)，第254—65页。

②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2辑，第11卷，第589页。

奉系军阀与帝俄白卫军的勾结

曼朱列茨

早在1919年，投靠日本的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通过日本人与奉系军阀和安福俱乐部总部勾结起来。谢苗诺夫赠送安福俱乐部总部十万金卢布，谢苗诺夫的同僚恩琴则分别赠送奉军将领耿①旅长和张昆元②旅长各两门大炮，以及附有子弹的五百支步枪。于是，谢苗诺夫就得以在中东路上随意调动其物资和人力。此外，他还得到允许，在距俄国边境一百五十俄里的海拉尔地区拥有一个给养基地，无偿使用那里的牧场，专为其部队提供牲畜。在日本控制中东路所属地段期间，谢苗诺夫享受着中国方面给与的优厚待遇。这一状况持续到1920年末。

由于红军的追击，谢苗诺夫率残部撤离外贝加尔地区，向滨海地区仓惶窜逃。这些亡命的白卫军进入中国国境后，极端仇视中国人，他们每到一站便大肆抢劫，要不是日本人对奉天方面施加压力，恐怕就会跟中国军队在中东路上发生严重的冲突。

当时，日本人还要奉天方面注意，中国军队有同苏俄发生正面冲突的危险。张作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白卫军是奉系的天然盟友。

1921年1月，经旅顺来到奉天的谢苗诺夫，受到张作霖的隆重接待。谢苗诺夫试图同张作霖订立协定，共同对付红军，但张作霖未曾答应。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被逐出北京，败退东北。张作霖为扩充自己的兵力，打算收编滨海地区的帝俄白卫军。于是，美尔库洛夫政府的代表受到奉天当局的正式接待，并以外交官的身份留驻奉天。美尔库洛夫政府的代表曾与奉天当局

①、② ——音译。

多次谈判，准备将滨海地区的全部白卫军交由张作霖统管，但日本人从中阻挠，不让任何武装部队进入满洲，结果未达成协议。

1922年10月底，迪帖里赫斯将军在红军逼迫下，不得不率部逃离符拉迪沃斯斯托克（海参崴），这支白卫军多数越过珲春，窜入吉林省，驻扎在吉林市四郊。中国方面曾供养他们达半年之久。迪帖里赫斯部队在越过珲春附近的国界时，向中国人缴了械，计：步枪约七千支，机枪六十七挺，大炮十四门。

当时奉天方面很想将这支白卫军编入中国军队。因为，奉军在天津被直军击败，其主要原因是奉军技术装备不足，士兵不会使用大炮，而直军在这方面却大大胜过奉军。

从此，张作霖想方设法召募白卫教官，聘用原谢苗诺夫部的参谋长克列尔热为顾问，并通过克列尔热录用了一批炮兵军官和骑兵军官。第一批录用的有炮兵军官八名，骑兵军官四名，飞行员两名，参谋一名。后因修理缴自吴佩孚的几架破飞机，又录用俄国飞行员库德拉因科和技师基尔。

1922年末，奉天兵工厂扩建，急需各种专门工程技术人材，张作霖聘用俄国教授塔尔列，令其主管奉天火药厂。接着，又聘用炮兵高级军官一名，队列军官四名。

与此同时，张作霖录用白卫飞行教官五名，机械师四名，安装机枪教官一名；此外，还聘用工程师一名，钳工十名。

在招募白卫分子这件事上，张宗昌不甘落后，也加紧活动。他为组建自己的炮兵连和机枪班，通过切霍夫大尉，雇佣白卫军一百名。

1924年，张宗昌准备把所有的帝俄白卫军收编为一支由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完整的部队。但这一计划遭到总参议杨宇霆的反对。经过长期争论之后，杨宇霆转而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

1924年7月末，张宗昌派人前往白卫分子的集中地哈尔滨，开始招募白卫雇佣军。

白卫分子的服役条件是：1、按照合同，服役期为六个月；2、

薪饷比中国人高一倍，制服发给，膳食费从薪饷中支出；3、伤残津贴费为五十至一千元；4、服役期满后加入中国籍，并获得一份土地。这样，张宗昌招募了一批白卫雇佣兵。

第一批白卫雇佣兵抵达奉天后，就酗酒滋事，打架斗殴，胡作非为。为此，奉军司令部要求张宗昌迅速将他们逐出奉天城，并建议张干脆将其遣散。但是，张宗昌继续招募白卫[illegible]佣兵，只是把他们的集结地点转移到他的旅部所在地开源车站。

为了整饬军纪，张宗昌任命谢苗诺夫的同僚涅恰叶夫将军（实际上是中校，曾在谢部指挥满洲师）为这支雇佣军首领。

1924年9月初，张宗昌收编的白卫雇佣军正式建成，共计四百八十人，其中包括早在张宗昌部服役的一百名白卫军，新招募的白卫军仅仅是三百八十名。张宗昌把这些白卫分子分别编为步兵营（二百五十人）、骑兵连（八十匹军马）、炮兵连(两门大炮)、机枪队（八挺机枪）。

1924年9月中，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攻占天津，张宗昌的白卫雇佣军肆意劫掠，他们个个都发了财，于是又有一批白卫分子投入了涅恰叶夫部队。到1924年11月中，涅恰叶夫指挥的这支队伍扩充为八百五十人。这是该部队兵员的最高数额。

后来，中国人和报界都说这支白卫雇佣军拥有五千人之众，这纯属误传。

1924年11月，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写信给张作霖，表示愿为大帅效劳，并建议以谢苗诺夫的名义招集白卫分子，组建一支上万人的军队，一俟中国内战结束，他有权部挥这支军队进犯苏维埃领土。张作霖对此未作答覆。

1925年3月初，北京政府下令解散白卫雇佣军。奉天当局也命令：凡未加入中国籍的所有白卫军官，一律退伍。

这样一来，到1925年夏，涅恰叶夫的部队已缩减为五百人。

摘译自苏联《新东方》1925年第10—11期第110—115页

吴永清译

艾奇逊及其顾问与中国(1949—1950)

沃伦·科恩

绪言：准备与共产党中国共处

艾奇逊曾在他的回忆录《在创造的现场》中写道，他出任国务卿不久就遇上了蒋介石政权崩溃的厄运。其前任马歇尔曾试图防止蒋的失败。马歇尔及其顾问深信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勾结，一旦共产党控制中国，将对美国的在华利益和世界力量均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尽管他们对蒋从不欣赏，对他的前途也不抱乐观，但他们一致认为支持对毛泽东势力的抵抗是可取的。①

对杜鲁门政府来说，在援助国民党的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提供多少和提供什么。在国务院内部形成了一种欧洲优先的共同观点。重建和保卫欧洲的费用将十分庞大。制订遏制苏联影响计划的人们一如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缔造者，也不认为援助中国是优先急务。而马歇尔和1947年8月从中国返美出任远东事务局局长的巴特沃思（W.Walton Butterworth）又都不相信国民党政府需要重大援助。他们认为中国人有足够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由于很不放心中国官吏贪赃渔利，他们要求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②

① 梅（Ernest R.May）：《杜鲁门政府与中国（1945—1949）》（费城：利平科特，1975），（以下简称《杜鲁门与中国》），第20、25—26页；莱文（Steven I.Levine）：《对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新看法：马歇尔使团和满洲》，为笔者所有的手稿。

② 梅：《杜鲁门与中国》，第28—31页；巴特沃思：《口述史访谈录》（1971年7月6日），麦肯齐（Richard D.mckenzie）和威尔逊（Theodore S.Wilson）撰写（密苏里州，杜鲁门图书馆）。（以下简称《巴特沃思口述史》）。

马歇尔及其助手赞成提供适度的经济援助，因此他们及时响应了国会中蒋政权友人的要求。但军事援助、派遣顾问团和出兵支持，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马歇尔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同，他不相信有限的军事援助能影响中国内战的结局。他对于蒋作为战略家的评价不高，而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拒绝忠告却有第一手的经验。马歇尔怀疑蒋之所以会对美国军事顾问感兴趣是为了把美国拖进与共产党人对阵的战争。①

马歇尔和巴特沃思决意避免向蒋许诺提供足以致胜的援助，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负担加在美国身上会“由于无法确知的份量和期限”而难以忍受，而且可能促使苏联采取对抗性行动。国民党如果进行改革，就无需大量美援；如果不改革，再多的美援也不能使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将国内的敌人镇压下去。②马歇尔的政策委员会（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凯南（George Kennan）对马歇尔出于种种担心而提出的有限经济援助政策的合理性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凯南对中国在冷战中的重要性估计很低。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垮台，固然“可悲”，但不大会是“灾难性的”。因为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缺乏成为强大国家的物质力量。他还断言，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接管了中国大部，他们对莫斯科的依赖就会减少。1947年11月，在难得一次屈从国会和公众要求的情况下，凯南建议美国向蒋提供“满足美国舆论和（如果可能）防止中国政府突然全面崩溃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援助”。③

在马歇尔任国务卿的最后几个月里，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似已迫在眉睫。美国的调停以蒋政权的虚弱排除了胜利的可能性为理由而取消。此外，俄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

① 梅：《杜鲁门与中国》，第30—32页；马歇尔和巴特沃思与陆军部长和参谋部的会谈备忘录，1948年6月11日，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外交关系》（以下简称FR），1948年，6，90—91。

② 梅：《杜鲁门与中国》，第39—40页。

③ 凯南备忘录：致罗维特（Robert Lovett），1947年6月23日，和致马歇尔，1947年11月3日，国务院政策委员会档案（以下简称PPS），13函，《中国（1947—1948）》卷宗，国家档案馆。

作用。他们从共产党控制区的撤离，加上1948年初铁托和斯大林的分裂，对于美国的无能为力可以算得是某种慰藉。虽然毛的成功无可否认，但是也许能避免中国成为“苏联势力的附庸”。①当马歇尔相信他已不可能有所作为时，便放弃了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只能听之任之的职务，而以毛可能象铁托一样，宁可选择与斯大林抗衡而不愿成为另一个苏联卫星国的微弱希望聊以自慰。

艾奇逊和他的班子②

艾奇逊作为国务卿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明显了：他一旦下定决心，无论是下属、国会，或是公众的意见都不能使之动摇。然而并不排斥这几方面影响的总统却能够而且有时也确实对艾奇逊的建议予以拒绝、修改或者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

艾奇逊对中国的事情兴趣不大。但在1946年他曾出力支持马歇尔防止内战的努力，也分担过马歇尔与蒋打交道所遭受的挫折。他不打算在1949年继续任何这类徒劳无益之举。他知道共产党人即将获胜，虽然对这种局面感到遗憾，但颇愿意遵循马歇尔定下的方针。当新问题出现时，他信赖巴特沃思（他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他的副国务卿帮办，后来又接替了巴特沃思的职务），和他的亲密好友杰塞普（被任命为无任所大使）的情报和分析。艾奇逊虽不像马歇尔那样看重政策委员会，但是常常听取凯南和政策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John P.Davies）的意见。1950年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根据腊斯克的建议被吸收进国务院，以挽救对亚洲政策的岌岌可

① PPS备忘录，巴特沃思同意“基本的调查结论”，1948年9月7日，FR，1948年，8：146—65。

② 以下简介主要依据对各种文件的广泛阅读；并请参阅以下七条注释。

危的两党支持。虽然艾奇逊对杜勒斯颇不以为然，杜勒斯对他却有耿耿忠心，杜勒斯主要与腊斯克共事，间或也与杰塞普一起工作。①

艾奇逊渴望遏制苏联在各处的影响，但他是一个主张对西欧给予最优先考虑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1949年首先关心的是欧洲的恢复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建。阻遏太平洋彼岸的共产主义也符合心愿，但却是一个次要任务。他对亚洲除了决心使日本像德国一样同西方联结在一起以外别无兴趣。他对东亚的忽视使杰塞普、凯南和戴维斯深为不安，但在朝鲜战争之前他们对他的政策建议几乎毫无影响。他只允许他们采取象征性的行动、表示关切——而不许做出任何要求投入大量美国财力或兵力的事情。

杰塞普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由于对国际法的研究成果而受到很高的尊重。他是艾奇逊的多年老友，又有过在国务院工作的经历，因此他把自己视为艾奇逊的总顾问，一个必得对一切行动都能理解的心腹幕僚策士。他处理专门指派给他的任务，并且总能成为这位国务卿思考问题时切磋琢磨的对手。他与腊斯克有非同一般的友好关系，曾在1948年与腊斯克亲密共事，一道处理联合国事务，而且是他把腊斯克拉入了他与艾奇逊的关系之中。②

杰塞普比艾奇逊和凯南更少为“现实政治”所吸引，更愿意按照是非而不是根据强权进行思考，更愿意谋求问题的和平、合法的解决，而不愿炫耀美国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队经历使他接近和平主义，而厌恶用武。他在三十年代支持中立法，在1940年加入了美国至上党。他曾出于避免美国参战的热望，赞成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而在四十年代末期的形势下，他准备奉行的是把公正的原则一视同仁地运用于亚洲和欧洲的全球主义，而不是大西洋主义。他比艾奇逊和凯南一类人更热心于

① 艾奇逊的《在创造的现场：我在国务院的岁月》(纽约：诺顿，1969年）一书最能展示他的思想和人品。我1976年10月1日对杰塞普和1977年4月9日对腊斯克的访问亦有助于对他的了解。

② 《杰塞普访谈录》。

扶助弱国，更同情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因此他对联合国的潜在能力也更为乐观。

虽然杰塞普长期在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担任要职，他却没有为亚洲费过心思。然而，当事关对华政策的问题烦扰艾奇逊时，艾奇逊还是把问题交给了杰塞普。但无论为艾奇逊搜集情报，还是保护他，杰塞普着手中国事务的目的就是为国务卿服务。

腊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短期任职于中缅印战区，在艾奇逊的主要顾问中他是最关心中国人民困境的一个。他与杰塞普一样，是个全球主义者，对亚洲和欧洲同样关心，看不惯凯南对不发达世界弱小国家的蔑视。作为一个南部的自由主义者，他对轻蔑无论什么地方的有色种族都极其敏感。尽管他忠于马歇尔和艾奇逊，知道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征服不可避免，仍然为中国非共产党人的苦难忧虑烦恼，并寻找机会使他们得以幸免毛的统治。他那通过联合国发挥作用和加强联合国组织的愿望也与杰塞普一致。①

腊斯克作为副国务卿帮办，被卷进了交由国务院处理的一切重要事务。由于艾奇逊对东亚毫无兴趣，他承担了负责处理东亚事务的额外责任。他自告奋勇处理种种棘手的政治问题，因而受到国务卿的宠爱。他最可贵的本领是有能力安抚国会议员——那些使得艾奇逊无法忍受的傻瓜们。他与杜勒斯的关系也很重要。由于艾奇逊难以容忍任何一位共和党领袖，腊斯克和杜勒斯便成了两党关系的媒介。当1950年初对于对华政策的政治压力加剧时，由腊斯克来代替巴特沃思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腊斯克在忠于艾奇逊的顾问班子中是得到国会共和党领导层信任的仅有一人。

巴特沃思是一名职业外事官员，一度在中国任职，于马歇尔使华期间和以后数月行使大使职权。他对中国并无特殊好感，一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那些由于在中国出生或供职而对这个国

① 科恩，〈迪安·腊斯克〉，载费雷尔（编），〈美国的国务卿及其外交〉，即将出版。

家或其人民产生了同情的同事。他自诩对中国不抱幻想，对使美国负担起保护中国的特殊职责的那种美中之间的特殊关系不抱幻想。他在思想上与凯南相近，凯南在1945年曾希望派他到莫斯科去。作为一个普林斯顿的保守派，他坚决反共，并且蔑视那些对于和佛朗哥之流打交道顾虑重重的自由主义者。他对马歇尔为使共产党人加入联合政府而作的努力表示怀疑。但在财政方面的保守谨慎又使他不能不对援助蒋政权的价值同样心怀疑虑。他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人，但他也不愿在中共的手下败将身上胡乱花钱，特别是在他不赞成宋子文的财政花招时更是如此。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及其在国会内的朋友们把巴特沃思视为马歇尔和艾奇逊政策背后的恶魔。当巴特沃思于1950年另就新职时，他们不胜欣喜，尽管顾维钧大使发现，他的继任者腊斯克难以测度。①

凯南是国务院首屈一指的苏联事务专家，也是表达遏制苏联、实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建议最明确有力的发言人。他对公众或国会的意见、缺乏创见的墨守成规、对国际组织的错误信念，以及对非洲人、中国人或犹太人的慈悲关怀，一概不屑一顾。他对国家利益作出判断，然后向国务卿提供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最佳方案。在马歇尔任国务卿期间，凯南深受器重。艾奇逊则对他赏识不足，常常求计于腊斯克或杰塞普。最糟的是，凯南喜好抱怨，这是艾奇逊无法容忍的另一类。在艾奇逊任职期间，政策委员会降到了次要位置，因而凯南最终离开了国务院。②

凯南处理中国事务的记录大致说来无可挑剔。虽然他对共产党人竟能轻易控制大陆这一点估计不足，但他对国民党不存幻想。他1949年对默许共产党取得胜利这一问题所作的理论阐述在

① 《巴特沃思口述史》；并见顾维钧日记，1949年1月13日和2月16日诸条，顾维钧文件，217函（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与司徒雷登会谈〔富格（Phillip Fugh）在座〕的备忘录，1949年8月13日，顾维钧文件，130函；以及顾维钧日记，1950年4月20日条，217函。

② 凯南的《回忆录（1925—1950）》（波士顿，1967年）展示了这些情况，该书包罗万象，极其详尽；《腊斯克访谈录》。

当时的国务院并未受到非议。赞成公开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张似乎也是他提出来的。这种主张后来发展成为白皮书。但是凯南几乎没有就其他重要问题，比如说，就有关承认和有关台湾（原文为福摩萨，下同。——译者）的问题，给艾奇逊出过什么主意，虽然他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提出过一个奇怪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

戴维斯生在中国（双亲均为传教士）并在中国担任过外交官，这一点与谢伟思相似。然而他们又有着显著的不同，没有一个人能指责戴维斯对中国人感情用事，或是指责他亲中国。他非常超然，特别热中于分析那种能使人联想到19世纪开放通商口岸时的心理的中国人的性格。但是他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与其他中国人不同，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力量，形成为反抗俄国人的势力，他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十分鄙视俄国人。戴维斯的目标是利用他们，犹如他早先曾试图利用国民党政权一样。对于蒋政权他曾写过，它未能“按华盛顿的命令行动”。待到他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他又不知道如何才能引导他们“依附美国”。他似乎并不比那些从未接触过中国的人更了解或者同情中国人的民族抱负。戴维斯在1949年和1950年对凯南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他所提的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对付他们的意见与他的上司关于台湾的意见一样不可思议。他那种以咒骂中国共产党人对俄国人奴颜婢膝作为手段，刺激他们，使他们更要表现得像是民族主义者的坚决主张，反映在公布白皮书的那份函件里，也反映在艾奇逊和腊斯克的无数公开言论，包括腊斯克1951年那篇臭名昭著的有关“斯拉夫式满洲国”的演说之中。①

杜勒斯是著名的大律师，共和党对外政策的发言人和两党外交事务幕后集团的领袖人物。如果1948年11月杜威（Thomas De-wey）当选总统，人们普遍揣测杜勒斯将成为他的国务卿。到1949年仍为纽约州州长的杜威曾提名杜勒斯去填补美国参议院中

① 戴维斯：《龙尾》(Dragon by the Tail)，(纽约：诺顿，1972年版)，各处。

的一个空额。由于在几个月后的一次特别选举中失利，杜勒斯才在1950年为国务院所用，去执行腊斯克所想出来的一项任务：遏止共和党人的捣乱活动。他在羁勒他自己那个党内的肆无忌惮的蠢货方面并不太走运，但是他却成功地使顾维钧和蒋的一些支持者相信，腊斯克比巴特沃思对他们更为友好。由他充当国务院和它的批评者之间的中间人是很有用的。杜勒斯与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当时译为詹逊。——译者）不同，他首先忠于政府，这一点在顾维钧的文卷中是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①

在整个1949年，国务院经常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它改变方针，帮助蒋扭转形势。在1950年，反对派的主要要求是要保卫台湾。这种压力既来自国会中的反政府势力和报刊舆论，也来自国防部。国防都的最高级官员与蒋的代理人串通一气。②艾奇逊坚决顶住，不愿为无知的国会议员而改变方向。他对五角大楼压力的抗拒，在一般情况下都获得了成功。他几乎总能得到总统的支持。但在几个重大时刻总统却未能接受国务卿的建议，而大大推迟了国务院准备采取的行动。

从艾奇逊走马上任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这段时间，国务院对中国的关切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需要决定对于溃败的国民党和新出现的无论什么党派的政策；二、必须对台湾问题做出抉择；三、必须确定对于即将出现的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在每一个方面艾奇逊的意图都遭到了挫折，在有些情况下是由于暂时拖延以赢得举国一致这种可以理解的需要，但是归根结底是由于朝鲜战争和由此发展的中美冲突。

对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设法脱身

艾奇逊宣誓就职之前十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继续努力以

① 顾维钧与杜勒斯多次会谈的备忘录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极其有用。见顾维钧文件。

② 参阅顾维钧1950年6月3日与助理国防部长格里菲斯（Pakl Griffiths）、以及1950年6月30日与国防部长约翰逊的会谈备忘录，见顾维钧文件，180函。

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势力的附庸”。委员会成员还一致认为为中国作出的努力在优先考虑的序列表上，应低于那些给美国的安全带来的利益与耗费“更接近于平衡”的努力。①

到1月底，长江以北的全部中国领土都已落入共产党之手，毛的部队云集江岸。蒋回到故乡奉化，把政府交由李宗仁掌管，李开始向共产党人作出愿意和谈的表示。对艾奇逊和华盛顿的其他人来说似乎很清楚，停止援助的时机已经到来。2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美国暂时停止向中国运货。然而几天以后，国会领导人强烈要求总统不采取任何正式行动。他们的这种关心不是为了国民党的命运，而是为了安抚他们的同僚和选民，这一点从他们希望通过非正式行动拖延运货的愿望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杜鲁门接受了这一劝告。援助将不中止，但是要设法拖延装运。美国的政界领袖担心公开宣布停止援助会导致国民党政权立即崩溃，也害怕为此承担责任。艾奇逊自有他的安排。②

2月底，比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更同情蒋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将军断定，运送援助给蒋的军队将比无济于事更糟：这种援助几乎立即就会被共产党人夺取。3月中旬，艾奇逊致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Tom Connally），反对一项建议以15亿美元援助中国的提案，他坚称即使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也不能扭转形势。但是他同意，对国民党统治区“突然”停止援助也不妥当。几天以后，艾奇逊在该委员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得更加坦率。他汇报说，他已被他的顾问们说服，相信“目前继续援助中国的任何人都将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③

几星期后艾奇逊表示自信已赢得了结束对国民党的援助和寻

① NSC(国家安全委员会)34/1，1949年1月11日，FR，1949年9，474—75。

② 卡特（Marshall S.Carter）的备忘录，1949年2月7日，艾奇逊与杜鲁门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2月7日，以及索尔斯（Sidney W.Souers）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1949年2月8日，同前引，第485—87页。

③ 巴特沃思会见魏德迈的备忘录，1949年2月25日，以及艾奇逊致康纳利，1949年3月15日，同前引，第490—91，607—9页；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部会议，1949年3月18日，《历史卷宗》，《第81届国会》，第41页。

求与中国共产党人和解所必需的支持。他告诉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蒋政权已被“淘汰”，共产党人在中国已可放手行动。中国人民已经厌倦，进一步援助国民党只会激怒他们。他向贝文说明，“我们已经放弃了继续支持这个政权的想法，我们的援助只延续到6月2日为止，根据援华法案将再提供五千八百万美元。”公开撤销援助是困难的，但是他认为“国会中蒋介石的极端支持者正在对事实作出更正确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艾奇逊向贝文许诺，“美国今后将推行一项有关中国的更为现实的政策。”①

4月中旬，由于为其政府充分争取美国支援的努力遭到失败而近乎绝望的顾维钧会见了杜勒斯。他说他发现艾奇逊一心只想欧洲，并把国务院对中国困境的漠不关心归咎于马歇尔的影响。杜勒斯同意他的说法并进而补充说，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参议院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将不再坚持援助。国务院已使范登堡相信，无论提供多少美援，也无法使国民党获胜。②

到了1949年春季，艾奇逊相信已经获得了撤消对国民党的援助所必需的舆论支持。到6月2日援华法案期满之时，美国将不再浪费它的资财。国民党中国已经死去。要做的只剩下举行最后仪式——说服美国人民。艾奇逊想起凯南早先提出的一项建议：要在党派的偏激批评给公众造成错误印象之前让公众了解美国政策的根据。马歇尔曾在1948年11月向内阁宣读过这项建议，但为杜鲁门所否决。人民需要真相，可是揭露蒋的无能和他那政权的腐败等于是美国给它以致命的一击。然而，9个月以后，杜鲁门认为时机已到。他支持艾奇逊而不顾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中国白皮书》终于发表。可能是了解到蒋的院外活

① 艾奇逊-贝文会谈备忘录，1949年4月4日，FR，1949年，7：1188—41。
② 与杜勒斯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4月18日，顾维钧文件，130函。

动集团和共和党批评者之间的联系，促使杜鲁门下了决心。①

艾奇逊决心不顾毛的“一边倒”讲话所引起的忧虑、五角大楼的强烈反对，以及国务院内部和国会的保留态度，而且是在国民党仍然占据着广州的时候发表白皮书，只可以解释为决心钉进最后一颗棺材钉。他决意结束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状况，预先平息蒋的美国友人可能发起的任何新的攻击，并为与共产党政权和解做准备。艾奇逊未能成功，但不是由于缺乏努力。他所厌恶的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并且根据不同于艾奇逊论点的理由重又挑起了争端。

诀 别 台 湾

应该如何对待台湾的问题引起了国务院内部的极大争论，并酿成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的尖锐冲突。这问题也显示出了凯南的极端荒谬可笑和艾奇逊的极端倔强。如果当年是艾奇逊的观点占上风，美国与人民共和国非常可能早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战争先一步来到朝鲜，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孤立境地的艾奇逊不得不向后退——但是，从未投降。

在1947年5月中国内战的结局明朗化以前，巴特沃思就从台湾当地人和他们的国民党“解放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看到了一种对美国具有巨大潜在利益的形势。②当艾奇逊于1949年1月重返国务院时，他发现国务院内一致认为最好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个岛的战略价值显而易见。问题只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而又不至于逼得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靠拢俄国人，或是不至于干

① 凯南致马歇尔和马歇尔致罗维特，1948年11月26日，FR，1948年，8：214—15、220；杰塞普致艾奇逊，1949年7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防部长，1949年7月21日，艾奇逊致杜鲁门，1949年7月29日，FR，1949年，9：1376—81、1388—90。

② 巴特沃思致国务卿，1947年5月1日，123巴特沃思，Wm. W. Jr HH，国家档案馆。

涉得太露骨而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慨。

戴维斯和巴特沃思告诫不要向台湾派遣军事力量。那样做将会会促进共产党在那里的颠覆活动。代替的办法是，由美国培育台湾的独立运动，使它具有拒绝把该岛让给任何大陆人的强大动力。这样，如果需要，美国就能够以支持台湾人自决这样一种道义上无可非议而颇能博得国际支持的姿态采取行动进行干预。美国必须保持距离，掩饰其关切，并以阻止大陆中国人进一步涌入的方式，把该岛与中国的内战分隔开来。这些意见曾为国家安全委员会37/2号文件所采纳，总统于1949年2月4日签署了这份文件。①

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宁愿以在台湾驻扎海军部队或者作出其他一些美国愿意使用武力的表示，作为阻遏共产党进攻的威慑性手段。艾奇逊对五角大楼几次使得美国对该岛的兴趣引起关注的消息走漏极为恼火，他的论点是，必须避免“恰巧在我们试图利用纯属苏联造的满洲和新疆民族统一问题之时弄出个美国造的民族统一问题来”。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人成为苏联势力的附庸，必须使苏联帝国主义成为关注的中心，并“小心地掩饰我们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愿望”。②

事实证明一个独立的、不容国民党染指的台湾政权的设想是一种幻想。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不无苦恼地搞清了，这种独立运动是微弱的，而蒋介石的支持者已经控制了这个岛。在那里负责经济合作的官员报告，台湾已经成了“那位总裁的亲信分子，也就是由于自私、腐败和眼光短浅而自己断送了大陆政权的那班人的退守据点”。麦钱特（Livington Merchant）被国务院派去调查形势，在那个岛上停留数月之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台湾自主是不可能的。他建议美国放弃不使该岛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① 戴维斯笔记，1949年1月14日，PPS档案，1947—1953年，13函，《中国(1949)》卷宗；NSC 37/2杜鲁门文件，PSF/205函，杜鲁门图书馆。

②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防部长，1949年2月10日，以及艾奇逊致杜鲁门，1949年3月3日，杜鲁门文件，PSF/205函。

的努力，敦促政府“把它与一个早已在更大的范围内表明其无能和不得人心的统治集团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以维护自己不仅在台湾和中国，而且在整个东南亚的道义立场”。①

巴特沃思和凯南接受了麦钱特的分析，提出了使台湾脱离大陆控制的新建议。巴特沃思建议要求召开联合国特别会议讨论台湾问题。目的是要联合国监督公民投票，以便人民在大陆控制和实行某种性质的联合国托管以导致独立之间作出抉择，他认为选择后一方案的可能性更大。凯南主张一种使台湾脱离国民党灾星的更直接的途径。他认为台湾具有比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能承认的更大的战略重要性，他十分厌恶弥漫在国务院里的失败主义气氛，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他说，“我们应当使自己适应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人之手的前景。”继续无所作为是不能允许的。凯南主张利用美国的力量把蒋的军队逐出台湾和澎湖列岛（原文为佩斯卡多尔列岛。——译者），并在美国的保护下建立一个不受大陆支配的政权。他建议把已在岛上的大陆中国人遣送“他方”，但是表示了可以让蒋留下作政治避难的心愿。凯南很清楚这会触怒他的某些同事，但认为他的计划会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可能做到的”一样被“坚决、迅速、无情和自信”地付诸实施。②

艾奇逊对两项建议中的任何一项都无动于衷。他接受了麦钱特的结论和分析。既然准备不论国民党的旗子在哪里升起都要把它从记忆中抹掉，他宁愿放弃占据那个岛的努力。因为如果蒋的怙恶不悛的追随者控制了台湾，台湾就注定要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他们只会重蹈内战失败的覆辙，于是美国在这个岛的努力

① 格里芬（Allen Griffin）致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转巴特沃思，1949年4月29日；麦钱特致巴特沃思，1949年3月6日；麦钱特致国务卿，1949年5月4日；麦钱特致巴特沃思的备忘录，1949年5月24日。FR，1949年，9：31——、297、24—26、337—41。

② 巴特沃思致腊斯克，1949年6月9日，以及凯南备忘录PPS53（附件注明日期为1949年6月23日），1949月7月6日，同前引，第346—50、356—64页。

就会付诸东流，对于使毛与斯大林分离的尝试也将产生不利影响。1949年8月，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驳倒对手，使自己的意见占了上风。参谋长联席会议承认即使解决这个问题的经济和外交对策都失败了，军事措施也是不明智的。几星期后，巴特沃思和麦钱特告诉英国官员，他们预计台湾将被共产党人夺取，多半是通过渗透。①

在国务院内部，杰塞普、腊斯克与巴特沃思、凯南和戴维斯一起研讨可以避免共产党征服台湾的选择方案。9月间，杰塞普极力主张联合国插手。腊斯克不顾有关蒋可能拒绝联合国托管的各种说法，强烈要求亲自出马。他告诫人们，舆论将要求美国采取除军事干涉以外的行动。除了继续执行一项极为有限的经济援助计划以外，艾奇逊不作任何让步。他通知总统，据中央情报局估计，到1950年底台湾将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②

11月初，国务院高级官员和主要的中国事务专家举行会议并一致认为，美国不应依靠武力或通过联合国托管谋求台湾脱离中国。有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就是如果另一国首先采取行动，美国也许会支持导致台湾自决步骤。③

由于国民党政府及其在美国的友人、麦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共和党的政治领袖们强烈要求采取行动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在1949年的11月和12月里对国务院立场的压力增加了。10月间，由于杜鲁门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援助法案，其中包括一笔用于“中国广大地区”的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蒋的支持者们颇觉鼓舞。但是他们惊恐地发现艾奇逊不打算用这笔钱援助台湾政权。对亚洲的共产主义

① 国务院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1949年8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防部长，1949年8月17日，与英国官员会谈的备忘录，1949年9月9日，同前引，第369—71、376—78、388—90页。

② 《为与贝文先生会谈做准备的远东事务讨论》，1949年9月13日，890.00/9—1349，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报告，1949年10月6日(NSC 37/8)，杜鲁门文件，PSF/205函。

③ 会议备忘录，1949年11月2日，FR，1949年，9：160—62。

固然要加以遏制，但他坚决认为中国缺乏抵抗基础。他不能容忍美国在整个亚洲作为丢尽脸面的国民党的支持者出现。艾奇逊毫不留情地逼迫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迫他们后退。注明日期为1949年12月3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48/2号文件虽然重申了寻求以经济和外交手段使台湾不为共产党人所得的目标，但强调了艾奇逊的论点——自立对于国民党是成功的关键。国家安全委员会48/2号文件还明确说明经济和外交手段可能失败，并且重申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将退而以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为基地而与台湾诀别。①

1950年1月2日，腊斯克通知英国，美国不准备“卷入”台湾“防务”。国民党尚有资金购买军需，但美国将不准许蒋购买轰炸机和重型坦克，这些东西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就可能用于进攻香港。三天以后，艾奇逊会见了参议院中蒋的两位最坚定的支持者——诺兰（William Knowland，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和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新泽西州共和党人）。他直率而详尽地告诉他们为什么美国将不再有所作为，而且必须“准备接受看来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在一周后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史密斯继续纠缠艾奇逊。他提出，假使美国会为台湾的陷落感到遗憾，为什么不援助这个政权？艾奇逊的答复是，援助不会奏效，而且有损于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史密斯问，台湾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是否不可避免。艾奇逊回答，“据我个人判断，正是这样。”②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艾奇逊受到的压力并未消失，但是他毫不动摇。2月间，出于对蒋军轰炸上海的愤怒，他问道，对他的主张的这种粗暴回答是否提供了摆脱台湾、终止对他所厌恶的那

① 艾奇逊会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1949年12月29日，同前引，第463—67页；NSC 48/2，《绝密文件参考分类》〔75〕，269B。

② 腊斯克会谈备忘录，1950年1月2日，艾奇逊会谈备忘录，1950年1月5日。FR，1950年，6：256—63；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部会议，1950年1月13日，《历史卷宗》，《第81届国会》，第184页。

个政权的最后一点援助的机会。然而完全不受掣肘和摆脱国民党的时机显然并未成熟。①

3月间，艾奇逊认为巴特沃思作为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所忍受的辱骂该有个尽头了，决定接受腊斯克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建议。腊斯克在国务卿最无能为力的地方——在国会，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在预计台湾将要陷落的未来几个月里，有一位焕然一新的干练人物上台是极其重要的。然而腊斯克比艾奇逊或巴特沃思更为强烈地关心在东亚构筑遏制防线，也比他们更听得进有关台湾的战略价值的论点。他意识到美国和亚洲的舆论都认为亚洲的主动权在共产党人一边，并为此感到苦恼。他、杜勒斯（于3月份进入国务院）、杰塞普、凯南和戴维斯都认为采取一个引人注目的立场以表明超出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的关切对于美国是重要的。腊斯克与凯南一样认为台湾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又与杰塞普一样，认为联合国托管可使美国不重新卷入中国的内战。

腊斯克在1950年5月底所赞同的方案要求杜勒斯去见蒋介石，并告诉他，台湾的陷落不可避免，美国不准备采取行动帮助他。他的唯一出路就是呼吁联合国对该岛建立托管。如果他这样做，美国将支持他，并在托管尚未实行期间阻止进攻。其目的显然是要摈弃那种据认为舍此便无法避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人之手的前景。其手段仍然是建立一个不要求统治中国的独立政权。艾奇逊始终期望着出现一个能够成为自由民主橱窗的独立的台湾的可能性。腊斯克在预期的共产党进攻之前的几周里，试图迫使蒋与美国政府趋于一致。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还在另外两个方面采取行动，这两方面行动都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蒋顽固不化一如既往。首先，他们为他寻找台湾陷落后的避难处（菲律宾人说，他将是不受欢迎的，如果他来了，他们将限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境）。其次，他们向中国代表指出蒋是美国援助台湾的障碍。顾维钧和董显光回避和腊斯克讨论这个话题，杜勒斯则拐弯抹角

① FR，1950年，6：313注④、314注⑥。

地对他们进行劝诱：美国人一直表明艾奇逊有可能被争取过来援助一个经过改革的，也就是没有蒋的政权。美国有兴趣看到吴国祯和孙立人掌握实权，这种倾向长时期以来已经昭然若揭。6月间这些暗示结出了果实：一份报告递到腊斯克手里，一场政变即将发生。然而就在那个星期再过几天，战争在朝鲜打响了。①

准备与人民共和国和解

艾奇逊之所以决心中断对蒋介石的援助并默许台湾陷落，其主要原因是希望与毛泽东的政权建立尽可能好的关系。共产党的胜利对美国形成了威胁，因为毛的同事中明显存在着苏联的影响。艾奇逊和他的顾问们渴望减少这种影响，并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产生一种需要和西方建立联系的观念。

国务院把开展贸易、承认中国和给予中国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资格视为达到与中国建立可接受的关系的手段。贸易将用作一种武器，以显示中国有赖于西方的程度。最终承认虽已想定，但不会自动实现。承认也可以用作美国赢得好处的工具。对安理会代表权问题的政策则必须更具灵活性。人民共和国没有美国的同意也完全可能取得席位。美国不打算使用否决权。

虽然国内的种种束缚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使承认推迟，但是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有迹象表明美国将在1950年11月选举之后对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正式的有规则的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恰如其份"是期望中的关系。② 国务院设想北京的代表最早可于1950年2月或3月代表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艾奇逊为战胜公众和国会在与共产党人和解问题上的反对意见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告中止，并在中国介入这场战争之后

① 阿姆斯特朗（W.Park Armstrong）的备忘录，1950年5月31日，同前引，第347—51页、346页注②；顾维钧日记，1950年6月4日条，217函；《腊斯克访谈录》。

② 所引出自《巴特沃思口述史》中巴特沃思之口述。

被彻底放弃。

凯南和他的工作班子在1948年11月曾为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定过调子。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灭亡，因此美国必须决定那时它在承认问题上的政策。援助蒋介石已经无用，但是美国在中国的目标可以通过利用经济上讨价还价的能力迫使对手——很可能是迫使政权的继承者共产党人让步的方法达到。①

巴特沃思在1949年1月和2月与英国官员的谈话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立场。他们一致同意利用贸易和承认提供讨价还价的机会。巴特沃思还准备在共产党控制区中断经济合作总署的一切行动计划，造成“对于共产党人越困难越好”的局面，“以迫使他们倾向西方”。另一方面他赞同以与共产党中国恢复贸易关系作为“保持接触的最适宜的手段”，并认为最好能准许共产党人进口石油产品“以便使他们养成有赖于西方的意识”。②

国务院的上述观点都被详细写进1949年2月末国务院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41号文件。目的是防止“苏联出于战略目的控制中国”。可选择的方案是：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以孤立和威胁中国人；或是恢复经济关系，努力离间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国务院坚决认为第一种方案可能迫使毛完全依附苏联，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非万不得已不应冒险。第二种方案倒可能产生一个独立政权，因此是应该奉行的政策。③

来自驻外机构，包括莫斯科和驻中国办事机构的报告，加强了会出现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权的希望。在俄国和中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有人怀疑，受俄国人控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显然有兴趣与美国建立互利的关系感到担心。上海总领事卡波特（John M.Cabot）在到南斯拉夫旅行之后，发出许多很有见地的信件和电报，表明他相信中苏分裂不可避免。而关

① PPS 39/1，1948年11月23日，FR，1948年，8：208—11。

② 斯普劳斯（Sprouse）会谈备忘录，1949年1月6日，和1949年2月10日，FR，1949年9：5—6、823—26。

③ 同上，第826—34页。

键性的时间问题可以通过美国的政策加以影响。3月，艾奇逊授权司徒雷登大使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但是告诫他，避免结论、不得张扬。艾奇逊是渴望与毛和周恩来探讨问题的，但是谈话报告只能送“国务卿一人过目”。美国公众和总统还缺乏承认这些胜利者的充分准备。①

4月间，正当人民解放军摆出了就要渡江的姿态，艾奇逊通知驻中国的外交官不得要求共产党人承认他们的正式领事身份。这样的行动将意味着“法理上的关系，而我们不能就此关系采取对等行动”，这大概是因为国民党仍控制着中国的长江以南。在长江的防御工事被攻破以后，艾奇逊向司徒雷登提出了事实上承认的问题。他很关心共产党对美国官员和资产的态度。事实上的承认是保护美国利益的最佳希望吗？共产党人会不会要求得更多？他们会立即要求法理上的承认吗？而“美国在〔对方〕缺乏某种国际责任感的情况下是不准备给予这种承认的”。司徒雷登很勉强地承认，事实上的承认固然有可能会使共产党一方采取较比正确的态度，但是只有在这种承认被当作相当于法理上的承认对待时才会如此。司徒雷登显然更喜欢在施与他所谓的对良好行为的奖赏之前进行更其精明的讨价还价。在国务院，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讨论越来越像是一个青春期心理学讨论会。②

6月1日，北京总领事柯乐博（O.Edmund Clubb）报告了认为是来自周恩来的一个异乎寻常的主动表示。象以前毛已经有几次表示过的那样，周表示他对美国根据互利的条件进行贸易和投资感兴趣。但是柯乐博也提到有些党的领导人反对与美国建立

① 卡波特致巴特沃思，1948年12月30日，FR，1948年，7：707—18；商务处长致尼采（Paul H.Nitze）的备忘录，1949年1月7日；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1月27日；科勒（Kohler）（莫斯科）致艾奇逊，1949年4月19日；卡波特致司徒雷登，1949年4月20日；卡波特致艾奇逊，1949年5月31日；司徒雷登艾奇逊，1949年3月10日；艾奇逊司徒雷登1949年4月6日；FR，1949年，8：16—19、88—89、249、256—57、355—57。173—77、230—31。

② 艾奇逊致驻华各领事馆，1949年4月6日；艾奇逊致司徒雷登，1949年5月13日；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5月17日；同前引，第926—27、21—25页。

友好关系。一种比较乐于提供帮助的态度可能会受到欢迎、适合时宜，并对彼此有利。①

当国务院得到周的口信和拟定答复时，艾奇逊正在巴黎。柯乐博和司徒雷登劝告代理国务卿谨慎从事。柯乐博怀疑共产党人想要两头取巧，既支持苏联，又获得美国的援助。司徒雷登希望中国人以行动表明他们谋求良好关系的愿望。总统极力主张：不能对共产党人有任何松软的表示。周采取的步骤毫无结果。②

5月和6月，司徒雷登和他以前的学生，时任共产党外事处长的黄华有过几次会晤。这些会晤最终导致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京的燕京大学，他可以指望在那里受到毛和周的欢迎。邀请的消息在国务院内引起了兴奋，但是巴特沃思和戴维斯担心引起公众的敌对反应。戴维斯认为司徒雷登应该接受这个机会就良好行为的准则对毛和周加以训导，他相信公众会赞成出于这种目的的旅行。巴特沃思煞费苦心地制订了一个把这次旅行伪装成为了援救沈阳总领事馆人员而去执行任务的计划。总统对任何一种办法都没有采纳；司徒雷登"无论如何不得"访问北京。一次不寻常的探索和解条件的机会被置于不顾显然是由于总统不想承担对国民党进行致命打击的责任。杜鲁门拒绝国务院旨在改善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的建议非止一次，这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只是艾奇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住杜鲁门，使他没有命令司徒雷登非但不去北京，反而到广州去拜访国民党总部。③

---

① 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6月1日，同前引，第357—60页。

② 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6月2日；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6月7日；韦布（James E. Webb，代理国务卿）致柯乐博，1949年6月14日；韦布的备忘录。1949年6月16日；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6月27日；同前引，363—64、372—73、384—85、388、398—99。又见布卢姆（Robert M. Blum）：《北平发来的电报：1949年的戏剧性事件》，载《纽约时报杂志》，1978年8月13日。

③ 司徒雷登致奇逊，1949年6月30日；戴维斯致凯南的备忘录，1949年6月30日；艾奇逊致司徒雷登，1949年7月1日，FR，1949年，8：766—69。又见布卢姆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研究论文《1949年和1950年的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和承认问题》，美国参议院：《第93届国会》（1973年1月），7—10页。

在艾奇逊把总统的决定通知给司徒雷登的那一天，毛以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行动增加了达成和解的困难。他谴责美国并宣布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中国不会使自己变得依赖西方。艾奇逊已经料到会有此种言语，并已努力使国会和总统对此作好思想准备。3月中旬他曾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他们控制中国时将"故意显示他们赞同与俄国人合作的态度。我想他们将对我们和西方表现出极大的敌意"。① 他预期由于中苏紧张状态的发展，中国人甚至会变得更加强调他们与俄国人之间亲如手足的密切关系。他愿意表现出耐心。但是，毛的讲话即便没有使得艾奇逊心烦意乱，也仍然给他说服总统、国会和公众相信他的方针明智的工作增添了难题。

艾奇逊处理对华政策的这种镇定自若，为他的大多数顾问所不能。凯南、戴维斯、腊斯克和杰塞普担心美国在东亚明显的无所作为对美国人和亚洲人都将造成混乱。7月间，凯南要求在对东南亚政策中"改变气候"。腊斯克把凯南的意见变为一个四十七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共产党中国"宣布不承认"，继续在联合国支持国民党中国，并给"非共产党中国"以援助。8月间，凯南、戴维斯和杰塞普制订了一个包含要求制定一项"坦率敌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的二十一点计划。他们想要表明美国不惜使用武力，不惜作出强有力的、"庄严而伟大"的反应。一周以后，戴维斯建议轰炸满洲的几个军事设施，以表明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类似于盗匪和敲诈者"的行径。②

提议的广州之行见艾奇逊与杜鲁门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7月11日；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7月18日；艾奇逊与杜鲁门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7月18日；克拉克致艾奇逊，1949年7月19日；艾奇逊致司徒雷登，1949年7月20日，1949年，8：780—81、791、793—94。

①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部会议，1949年3月18日，见《历史卷宗》，《第81届国会》，第34页。

② 腊斯克致国务卿的备忘录，1949年7月16日，890·00/7—1649，以及杰塞普备忘录，1949年8月18日，890.00/8—1849，国家档案馆；戴维斯致凯南，1949年8月24日，FR，1949年，9：第536—40。

艾奇逊拒绝怂恿杜鲁门扮演泰迪·罗斯福①的角色，并继续使国家做好他认为在所难免的与人民共和国和解的思想准备。然而他的助手们却执意做出种种努力玩弄贸易和承认政策，以迫使中国共产党改变其行为，和迎合公众、国会和总统的意见。9月间的一次国务院高级会议断定英国急于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腊斯克和巴特沃思极力主张推迟，艾奇逊同意请求贝文一定要中国在承担国际义务方面作出令人满意的表现。他向贝文表明，让这场混乱平定下来，让事态本身而不是西方的行动宣布共产党的胜利，这对于美国是极其重要的。显然，艾奇逊准备等待到蒋介石和他的军队被歼灭，这是他不希望再拖延的另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②

1949年夏秋之际，据认为是出自总统之口的许多言论表明，他宁愿以比艾奇逊所主张的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他至少有一次在言谈中暗示，他怀疑国务院是否在遵照他的意愿行事。在拒绝批准司徒雷登前往北京之后几个星期，杜鲁门开始催促修改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四十一号文件，因为这份文件妨碍对新政权进行经济战。10月1日，他“强烈表示”，他希望国务院不要暗中破坏国民党对大陆港口的封锁。据代理国务卿韦布称，“总统再次强调：他的政策是要让封锁奏效，他希望这项政策能得到严格遵守。”两天后，他说，美国不应匆忙承认人民共和国，特别提到美国曾等待了许多年才承认俄国政权。不久，当瓦尔德（Augus Ward）总领事在满洲受到监禁时，杜鲁门反复考虑使用武力解救领事馆人员。③

---

① 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二十六位总统（1901—1909）。——译者，

② 890.00/9—1349，国家档案馆；艾奇逊与贝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9月13日，FR，1949年，9，81—85。

③ 麦钱特致斯劳斯普的备忘录，1949年8月24日；艾奇逊与杜鲁门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9月16日；韦布与杜鲁门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日和31日；同前引，870—71、878、1141、1355页；韦布与杜鲁门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3日，PPS档案，13函，>中国（1949）>卷宗。

在这种境况下，艾奇逊未能响应中国对于承认的关切，但这与他阻止其同事和总统采取更富挑衅性的行动的成绩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他在回答总统修改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四十一号文件的要求之前拖延了两个月，然后提出反对改变政策。国务院没有提出对人民共和国炫耀武力的建议。与此相反，艾奇逊倒为准备承认进行了研究，向国会议员讲解了承认的意义，并以杰塞普为设计师，精心设计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舞蹈”，这种“舞蹈”几乎跳了六个月之久，这正是最有效的成果。他相信时间对明智的政策有利，他也相信他的对手完全明白他在干什么。顾维钧由于杰塞普和外界顾问研究政策，由于杰塞普乘海轮出国调查东亚形势而叫苦连天。顾意识到国务院正在拖延时间，拖到每个人都同意帮助国民党中国已为时太晚为止。①

使承认人民共和国的门保持敞开是一项极其困难，基本上是办不到的任务。然而艾奇逊所作努力的记录是一清二楚的。在整个1949年和1950年的上半年，他坚持不懈地试图使杜鲁门相信：促使北京政权与莫斯科分离的努力不等于姑息，干扰这种努力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杜鲁门与他共事是十分勉强、忧心忡忡的。在面临中国的蛮横行为时，艾奇逊争辩道，美国的最高利益没有受到影响，采取那种有可能迫使毛更靠近斯大林的政策是没有道理的。1949年5月，瓦尔德的情况达到危急的地步以前，他认为这应该看作是个特殊情况。11月，由于瓦尔德受审，公众的愤怒濒临爆发边缘，艾奇逊却强调了这一事实：在共产党控制区内没有美国人遭到杀害。他争辩道，考虑到革命和内战的环境，以及美国拒绝承认该政权的态度，美国领事馆驻地的情况“一般而言并不算坏”。公众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但是急流倾泻般的辱骂没有

① 艾奇逊致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1月4日，FR，1949年，9：890—96；杰塞普致诺布尔（Bernard Noble），1949年10月9日，47函，杰塞普文件，国会图书馆；《杰塞普访谈录》；顾维钧日记，1949年11月18日条，217函。

使他动摇，他还可以依仗总统的支持。①

1950年1月，国务院和共产党政权双方在北京闹出了一个有利于中美和解反对者的小问题。艾奇逊认为他已经给共产党人发出了美国打算一旦可行就建立正式关系的明确信号。但是中国人迫不及待，步步紧逼美国和其他仍然拒绝承认它的政权，扬言要使用他们在北京的房地产，包括这些政府的领事馆址。艾奇逊想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妥协方案。通知共产党人，他们可以占用大部分地皮，但不应包括美国计划用作领事馆办事处的建筑物。这样一种安排既给了共产党面子，也不会在美国引起骚动。但是警告北京政权：夺取这座建筑物是不能接受的，其后果将是撤走驻在中国的全部美国外交人员。中国人夺取了这座建筑物，美国人被勒令离开中国。双方显然都认为对方是在虚张声势。这种结果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不管是在北京的柯乐博，还是艾奇逊，都没有把这个行动理解为最后的决裂。杰塞普和国务院的其他人长期以来就提出把撤离作为手段，以避免可能给反对中国的舆论火上浇油的事件发生。②

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Lie)会见艾奇逊，表示他为后果感到担忧。艾奇逊1月12日发表的"让这场混乱平定下来"的讲话曾使他对美国的意图感到放心，但是他担心北京的行动可能使事情复杂化，推迟问题的解决。他担心美国可能试图把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可能导致常任理事国俄国的退出。会见时在场的腊斯克表示，据他预料，"在几周内安理会的七个成员国将承认共产党政权，那时共产党代表将通过表决程序取得席位"。腊斯克使人毫不怀疑美国把这个问

① 艾奇逊与杜鲁门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PPS档案，13函，《中国(1949)》卷宗；艾奇逊致上海总领事，1949年5月3日，和致索尔斯，1949年11月4日，FR，1949年，9，936—38、891—92。

② 《巴特沃思口述史》；《远东的形势》，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部会议，1950年1月24日，《历史卷宗》，《第81届国会》，第205—6页；柯乐博致国务卿，1950年1月20日，FR，1950年，6：286—89；杰塞普致艾奇逊，1949年7月28日，PPS档案，13函，《中国（1949）》卷宗。

的自由主义运动。他向顾维钧解释，美国的朋友厌恶国民党政权。题看作程序问题，而且“我们既不会自己行使否决权，也不会默许其他任何国家行使否决权”。①

艾奇逊并没有对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感到焦虑不安，他以为毛结束他与斯大林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归来时会出现更好的机会。他与《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苏兹贝格（Cyrus Sulzberger）一起散布了斯大林企图敲诈勒索的流言。但是毛和斯大林在2月签定的同盟条约对他显然是一个挫折。4月间，柯乐博的情报提供人几乎没有给他带来北京和莫斯科会在近期内公开分裂的希望。看来在几年里对美国采取比较和解的态度只有微弱的可能性。但艾奇逊仍旧从容不迫。国民党在大陆的抵抗力量实际上已被消灭。蒋介石飞到台湾又增加了新的复杂情况，但是中央情报局估计这个问题在年底以前就会消失。总统可能准备在11月选举之后采取行动。在此间隙，不予承认可能会使法国高兴，它对中国支持印度支那的胡志明感到忧虑不安。只要蒋被消灭，只要没有把美国进一步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艾奇逊就可以等待。没有必须采取刻不容缓的行动的理由。②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使艾奇逊在东亚问题上自以为得计的状况告一段落。他对台湾的立场即刻从根本上受到损害，他为坚持其有关于承认、联合国代表权和对国民党的援助等问题的一整套方针而做出的努力，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以失败而告终。

艾奇逊在北朝鲜发动进攻之后与总统第一次会晤，就建议杜

① 会见备忘录，1950年1月21日。

② 艾奇逊致布鲁斯（Bruce）（巴黎），1950年1月25日和2月11日，柯乐博备忘录，1950年4月9，日FR，1950年，6，294—96、308—11、327—28；英国设想承认将在1950年选举之后，见杰塞普和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Sir Oliver Franks)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8月28日，以及驻印度大使致印度—尼泊尔事务负责人，1950年12月30日，同前引，第164—66、613—16页。

鲁门命令海军阻止人民共和国侵入台湾和阻止蒋的军队进攻中国大陆。由于朝鲜战争，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显然比起艾奇逊早先所能承认的要大得多。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尚未弄清、朝鲜的侵略被击退之前，台湾必须受到保护。再者，如果〔南〕朝鲜必须保卫，那么对台湾袖手旁观恐怕很难说是正确的。命令舰队去台湾海峡可以使批评美国没有对蒋的事业尽到义务的责难声减弱。总统接受了这项建议并公开声明，“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定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在随后几个月里，艾奇逊强烈反对约翰逊和麦克阿瑟使美国与蒋政权结盟的努力。他奋力阻止蒋利用美国海军作为进攻大陆的掩护，并争取到了下达给麦克阿瑟的一份总统指令，警告他不得鼓励任何这类行动。作为代替之策，艾奇逊说服总统接受杰塞普—腊斯克—杜勒斯的主意：通过联合国逐步走向一中一台的政策。他至少暂时不能默许共产党征服台湾。美国将寻求联合国监督公民投票，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岛上的人民可能投票要求摆脱大陆人任何形式的控制。蒋介石怒不可遏，非常清楚美国一心要搞垮他的政权。艾奇逊决心不让朝鲜的冲突再使美国进一步陷入中国内战。他和总统急切地向毛发出信号：无论他们做些什么，都不打算把蒋装备起来反攻大陆。以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朝鲜战争之后，艾奇逊也不愿与蒋合作。甚至在他对与北京和解已感绝望而在考虑着推翻它时，他的幻想中也没有蒋的位置。①

腊斯克在他与顾维钧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不容置疑地指出，美国对台湾承担更大义务的前提是它要能成为独立、自由的民主国家。7月间他用去两个小时试图说服胡适领导一个反蒋

① 艾奇逊致兰金(Karl Rankin)，1950年7月21日；国防部长致国务卿。1950年7月29日；国务卿致国防部长，1950年7月31日；国防部长致麦克阿瑟将军，1950年8月4日；艾奇逊——弗兰克斯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8月31日；艾奇逊致驻印度大使，1950年9月1日和19日；韦布 致兰金，1950年9月13月；FR，1950年，6：385、401—5、423、473—76、478—80、514、497—98；顾维钧与腊斯克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9月19日，顾维钧文件，180函。

这个政权的继续存在和自称是中国的政府给美国带来了难题。但是他也提出了希望：实行民主改革并在针对大陆的行动中采取克制态度可能会使美国增加援助。①

顾维钧的一名幕僚人员为他准备了一份对美国政策的最精当的分析。执笔者论断，美国对抗共产主义虽是普遍性的，但在实施上是有选择的。在东亚，美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援助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朝鲜战争也没有使政策发生变化。美国人在朝鲜打仗，而着眼点是南斯拉夫和伊朗。他们希望他们的对抗能对别处共产党的活动起到威慑作用："拯救朝鲜只是附带的"。海军的行动也不表明对华政策的改变。杜鲁门和艾奇逊对共产党中国比对"我们的政府"更有兴趣，对台湾岛比对国民党政权更有兴趣："拯救我们的政府也是附带的"。②

这位国民党分析家概括了美国的意图：（1）一出现友好的迹象就承认共产党中国；（2）如果铁托主义证明是不可能的，就分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3）保持台湾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象征以维持大陆反共分子的希望；（4）把台湾用作与共产党人讨价还价的筹码；（5）在台湾逐步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分子集团，使之在承认之后可以参加共产党人组建的任何联合政府。如果与共产党人达成妥协证明是不可能的，美国将设法利用台湾作为抵抗共产主义的防御堡垒和举行一次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以判断台湾人是否要求独立。

顾维钧的助手看上去对腊斯克和杜勒斯的论点领会得很透。8月中旬，腊斯克向特别同情蒋的美国外交家兰金概述了美国的政策。美国将在不损害其行动自由的情况下，"继续"推行不把台湾给予共产党人的政策。它将提供国民党政权所必需的物资。暂时来说，可以提供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只要它仅仅用于规

① 顾维钧日记，1950年7月24日条，218函；与腊斯克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7月25日和8月31日，顾维钧文件，180函。

② 《美国在华政策》，顾维钧文件，175函（卷宗6—3）。

定用途而不“受盘剥”。(杜鲁门曾惊呼美国给国民党领导人的全部金钱都成了对美国不动产的投资。)经济合作总署不准备参加与国民党的联合行动，因为这类行动可能成为美国同意对该岛经济承担义务的象征。“至于这种关系在今后将持续多久，我们不想对中国当局做任何承诺。”援助、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三项就是美国政策的全部内容，这不能看作是对中国政府承担任何义务的问题。9月间，顾维钧询问腊斯克，美国是否在故意拖延时间以待苏联的意图明朗化。他在日记中记着，腊斯克脸红了！①

当联合国军击退了入侵者而接近三八线时，美国对中国的临时性政策的轮廓是清楚的。美国不对国民党政权承担义务并且设置障碍以防止它进攻大陆。引人注目的是，艾奇逊把蒋对人民共和国的进攻称作美国不愿参与的侵略行为。②听任共产党人夺取台湾的可能性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依然存在，尽管艾奇逊也一直想朝着一个独立的台湾政权的方向努力。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至少要推迟到选举和朝鲜战争以后，主要取决于人民共和国是否干涉朝鲜进攻台湾。美国做了种种努力使北京确信华盛顿的善意，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能继续保持沉默而不计较空军的飞越领空、袭击满洲以及麦克阿瑟与蒋介石大事喧嚷的策划。尽管美国投反对票，但归根结底美国还是愿意接纳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的。

或许朝鲜战争和美国与国民党利益的暂时合流本来都会无足轻重地成为过去，只不过像柯乐博所说的是一个“冷冰冰的插曲”。但腊斯克、杰塞普、戴维斯和国务院的其他人早已断定，对于联合国军来说，越过三八线，统一全朝鲜是极其重要的。戴

① 腊斯克致兰金，1950年8月14日，FR，1950年，6：434—38；杜鲁门在“朝鲜形势”备忘录中的话，1950年6月26日，艾奇逊文件，65函，杜鲁门图书馆；与腊斯克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9月19日，顾维钧文件，180函。

② 艾奇逊致约翰逊，1950年7月31日，以及艾奇逊致印度大使，1950年9月1日，FR，1950年，6：404、478—80。

维斯坚持认为中国人唯恐被俄国人利用，不存在"犹豫的迹象"。腊斯克不愿在联合国军进展如此顺利的时候确定苏联人有关结束战争的条件。迅速的胜利引起更大的雄心，艾奇逊也被说服，相信中国不会干涉朝鲜。尽管中国人发出了威胁，参谋人员也屡次告诫，他们并不是在虚张声势，艾奇逊和腊斯克经过选择还是接受了中国人不会去援救北朝鲜的估计。他们错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而他们的反应却是谴责中国人而不是自责。腊斯克在短时间内想到过美国军队向中国边境进军已经激怒了他们，但是他和艾奇逊对此都没有作过多的思考。①

美军和中国军队在朝鲜的直接对抗结束了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到这种可能性再度出现时，二十年已成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安理会代表权问题的立场改变了。此时的美国强烈反对任何可能使北京得到席位的安排，因为不能奖赏"侵略"。腊斯克甚至暗示，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席位将导致美国退出联合国——虽然杜勒斯曾告知顾维钧美国仍可能接受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案。②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仍然是矛盾的。当美国人在朝鲜和中国共产党人打仗时，他们不可能让共产党人夺取台湾。以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抛弃蒋介石和台湾使毛泽东减少敌意，阻止他投入斯大林怀抱的那种希望被放弃了。中国的行动表明北京对美国做了最坏的预料，因而毛的情感如何已经无关紧要。然而艾奇逊和他的助手们很难对国民党政权制订一项较为友好的政策。他们从未放弃摆脱蒋及其一伙的希望。周以德(Walter Judd)、顾维钧和几

① 会谈备忘录，1950年10月11日，同前引，第524—28页；艾利森（John Allison）致腊斯克的备忘录，1950年7月1日；PPS备忘录稿（与杰塞普磋商），1950年7月25日；戴维斯的备忘录稿，1950年9月22日；班克罗夫特（Harding Bancroft）的备忘录，1950年9月23日；柯乐博致腊斯克，1950年9月27日；麦钱特和约翰逊（V.Alexis Johnson）致腊斯克的备忘录，1950年10月30日；腊斯克和弗兰克斯会谈备忘录，1950年11月29日；FR，1950年，7：272、469—73、753—77、759—63、795—96、848—49、1252—53。

② 腊斯克与比利时大使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11月30日，同前引，1665—67页；与杜勒斯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12月19日，顾维钧文件，180函。

个中国使团都为腊斯克对于能够取代蒋的政治人物的兴趣所动。甚至在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带着供给大陆反共游击战的物资横渡太平洋时，腊斯克仍不愿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权。同样，腊斯克始终拒绝台湾的军事援助要求，仍旧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或斗志嗤之以鼻。虽然用以加强台湾防务的微少援助即将提供，但是仅此而已——没有为收复大陆提供任何援助。①

然而，在政策上有了重要的改变。谋求联合国就台湾问题通过一项决议的努力中断了。杜勒斯和一些友好的参议员警告艾奇逊：如果联合国大会通过任何可能容许把台湾交给共产党人的决议，给国内带来的政治后果将是难以忍受的。艾奇逊仍然反对联蒋，但是他同意，由于中国的出兵干涉，形势已经改变，而联合国大会的表决是无法预料的。最好是推迟讨论台湾问题，推迟台湾独立的计划。政府也恢复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援助。其结果正如柯乐博所告诫的，可能造成这样的印象，即美国不再赞成由联合国考虑台湾问题，“我们打算不管怎样都要与台湾的国民党人建立密切的政权关系”。②

结　　语

仔细研究国务院的工作文件，可以发现国务卿所主张的政策往往并不反映他的顾问们的意见。分析艾奇逊对情报和劝告的反应，使人隐隐感到，假如看法与他的强烈信念一致，他在选择时是不注重其来源的，这个强烈信念就是：适当的无所作为政策最符合美国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在美国1949年和1950年的对华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成分是国务卿有意不理睬他的下属的劝告以及五角大楼、国会中的反政府力量和为蒋介石进行院外活动的美国人

① 与腊斯克的会谈备忘录，1951年1月18日和3月23日，顾维钧文件，184函；以及顾维钧日记，1951年3月23日、5月9日和15日诸条，218函。

② 杜勒斯致艾奇逊，1950年11月15日，以及柯乐博致腊斯克，1950年12月1日，FR，1950年，6：572—73、585—86。

的压力。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认为艾奇逊极为自信，并始终一贯地支持他的作法。

艾奇逊的主要顾问都主张在东亚实行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只有巴特沃思例外。看起来巴特沃思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与艾奇逊之一致甚至超过了杰塞普。腊斯克的想法与国务卿相去最远。他锲而不舍地想要改变艾奇逊对台湾防卫问题的想法，并极力把台湾塑造得使艾奇逊可能感到兴趣。他的见解对国务卿没有什么影响，但他是一个优秀战士，忠心耿耿，而且在牵制蒋的友人方面极其有用。

艾奇逊异常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蒋的院外活动以及粗鲁政客和庸俗报人对这些活动的支持只能增加他的厌恶。国民党领导阶层腐败无能这种印象弥漫于国务院。蒋介石一帮人已经失去要求美国进一步支持的权利。艾奇逊在研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种种分析时，了解到这一运动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毛、周一类人决心保卫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共产党人的这种形象可以证明他不想再为蒋白费力气的愿望是正确的。

艾奇逊的目标是在对美国最有利的条件下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他希望促使北京政权疏远苏联并认识到它与西方的历史性联系的重要性。为寻求有利条件而进行的探索无疑造成了拖延，而终于导致失败，但是艾奇逊认为没有理由迫不及待地寻求与新政权关系正常化。当毛和周私下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援助而又公开宣扬美国资本主义需要与中国做生意以避免经济萧条的教条主义论断时，他更加强了审慎从事的决心。他认为俄国人不可能提供中国需要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这将有助于人民共和国觉悟到它需要美国更甚于美国需要它。意识到这一点可以促使它举止检点。

他反对公开与台湾缠在一起，因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使人民共和国摆脱莫斯科的控制，手法之一是使苏联帝国主义成为注意

的焦点。不给共产党人提供具体的反美争端这一点非常必要。当艾奇逊了解到蒋不久即将安身台湾，而当地的独立运动又缺乏足够的力量撵走国民党时，他连暗中行动拯救台湾的兴趣也化为乌有了。

艾奇逊对他的消极的亚洲政策的自信心基因于他对这一地区的漠不关心。他不相信对于美国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会发生在亚洲大陆。他关心得更多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意见，是抚慰主要的盟国，而不是蒋介石或者东南亚的命运。当他的顾问们为他的漠不关心忧虑得要疯时，他才同意做做政治姿态——邀请亚洲的领导人物，声明亚洲的重要性，以及安排杰塞普作旷日持久的旅行。当杰塞普报告说不需要大量耗费美国的兵力和资源，只需要少量援助和搞点心理战时，他说的正好是艾奇逊想听的。

艾奇逊同样自信他有能力对付国会和公众舆论。在朝鲜战争前民意测验实际上显示出对蒋很少注意，几乎看不出有要援助他的倾向。当然，民意测验也表示反对承认共产党政权或让这个政权在联合国内占有席位，但是也完全有理由设想，一旦蒋消失了，这类保留态度也会随之消失。共和党人对政策的反对和麦卡锡主义者的攻击使艾奇逊感到恼怒，却并不担心。过去他就和范登堡、杜勒斯解决过这类难题，他认为，“这些原始人”还是好对付的。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二个重要成分似乎是杜鲁门对国内压力较为敏感。国会领导人担心〔亲蒋的〕中国集团的破坏性影响，对1950年的重新当选十分关注的民主党人也感到忧虑不安。杜鲁门推迟了对国民党终止援助的计划，并阻止了可能导致与共产党人关系早日正常化的步骤。艾奇逊和杜鲁门认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外交政策的目标不会因为服从国内的暂时政治需要而受到危害。

1950年春天，在腊斯克改变政策的努力和敲响蒋介石的丧钟之间似乎展开了一场竞赛。由于不能从毛得到预期的回答，由于杜鲁门，或许还有法国，对北京在东南亚的意图感到忧虑而引起

的拖延，使对华政策的第三个重要成分——朝鲜战争，为蒋赢得了死刑的延缓。但是，甚至亚洲这场战争的到来也没有排除与人民共和国和解的可能。艾奇逊不顾一切地努力使这种选择保持在可以挽回的地步，而且，若不是因为决定派遣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很可能已经成功。即使在那时艾奇逊仍试图避免与蒋联合，因为那可能妨碍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和解。

艾奇逊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但在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值得赞扬。不难想象腊斯克在说明中国出兵干涉的危险性时打了折扣。也存在着艾奇逊服从了马歇尔和国防部副部长洛维持（Robert A.Lovett）——他所尊重的极少数中的两人——领导的五角大楼的可能。而最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解放”朝鲜使国内的批评者哑口无言这种诱惑强烈得不可抗拒。但是艾奇逊对中国出兵干涉的反应是愚蠢的。他非常清楚美国（这要怪麦克阿瑟）在向北京传送着令人迷惑的信号。由于处在激战关头，再加上为美国人死于中国人之手而感到的沉重内疚，他谴责中国人对美国泄愤。他认定中苏分裂的出现简直遥遥无期。毛可能是独立的，但他强烈反美，而他的敌意必须受到回报，必须成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不过艾奇逊仍然拒绝与国民党中国结盟，而把这个错误留给了下届政府。

1951年，艾奇逊和杜鲁门政府准备同瘟疫般的麦卡锡主义——一种他万万没有想到又不能置之不理的公开的强制——作一番较量。但是本届政府却因越过三八线的灾难性决定而使那些“原始人”重新得到了武器——并在麦卡锡的攻击下步履蹒跚地度过了任期的余年。

译自《捉摸不定的年代：中美关系（1947—195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一书第13—52页。

曾学白译　江　枫校

“艾奇逊及其顾问与中国”

讨 论 小 结

沃尔多·海因里希斯

沃伦·科恩的论文，就美国对华政策作出了新的理解。这篇论文揭示了迥然不同于传统解释的一种可能性，即，在有关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和解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曾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是一篇具有新见解，经过激烈争辩，引起热烈讨论的论文。

科恩的论点，可以简单归纳为：到1948年底，国务院在思想上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完全一致，而认为有可能出现一个铁托主义的中国，并且有可能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打进一根楔子。艾奇逊孜孜不倦，而且是在日益不顾其部属反对的情况下，推行这样一种政策，经过1949年，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才告终止。他断言，美国必须承认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不久就会成为我们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仅有的中国人。他并不指望友好的情谊，他设想的是建立一种类似于同三十年代的希特勒德国和当代的苏联这一类敌对国家建立过或维持着的正式关系。艾奇逊竭尽一切努力，谋求总统对这种政策的支持，但是杜鲁门却在一些关键性时刻以完全相反的决定加以干预。科恩相信，如果不是由于这种干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的计划早在1950年6月以前可能就已经实现。艾奇逊是柯恩这篇论文的论述焦点。中国本身在艾奇逊看来并不重要，而使中国脱离苏联的轨道，作为遏制苏联的一种手段，却

十分重要。

大多数讨论者都接受艾奇逊是谋求和解的这一论点。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他是科恩的主要批评者，对柯恩的论文作为一个整体表示怀疑。关键在于他认为，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在谋求扩张。贯穿美国对外政策各方面的一个因素，无论过去或现在，始终是对不接受美国控制的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持敌对态度。一个不屈从于美国利益的中国，就是敌视美国利益的中国。这类指导思想使他难以相信他所谓柯恩对于艾奇逊的同情描绘——把他描绘成战火炽热时期深受国内的敌对气氛和诚实的判断错误之害的牺牲品。

斯蒂尔认为，证据将支持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怀疑，艾奇逊怎么可能在，譬如说，在1949年10月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我国对华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新政府’确实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一个工具”的同时，使北京相信他希望实现和解的意愿。而且，他还指出了艾奇逊于1950年1月关于美国不应援助一个缺乏公众支持的政府的告诫和要求菲利浦·杰塞普务须切实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以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指示之间的矛盾。如果艾奇逊决定致力于同北京和解，他就不会容忍部下设计那种旨在导致台湾分离的方案，他就会为一种新方针积极争取和增强舆论的支持。

艾奇逊更喜欢象印度支那保大政府那样听话而“干净”的傀儡政府，蒋介石确实使他感到难堪，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位国务卿就已经准备好转向北京。艾奇逊和他的同事们对于自称代表全国的国民党残余政权，正处于困难窘境。他们并不真想正面作出是抛弃他们认为已经注定灭亡的蒋还是接管他的政府这样一种抉择。美国政府的态度，这时的特点，不在于对新中国的明确果断，而在于对那个残余中国犹豫不决。

斯蒂尔最后论断，1950年6月25日以后作出的那些决定，即使按照他所作的解释来看，也反映了，至少并不违背，艾奇逊既往已

有的观点。把舰队派入台湾海峡，已经早有考虑。越过三八线去打退共产主义的诱惑要比同北京和解的任何愿望更强有力。艾奇逊把印度大使所传达的警告当作只不过是潘尼迦惊慌失措的浮夸之词而不予理会，这表明，和共产党中国建交远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总而言之，在斯蒂尔的印象里，艾奇逊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远大目光的政治家，而是一个典型的始终一贯缺乏正确指导的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决策人。

在随后的讨论中，有不少发言表明政策制定的政治性因素足可以解释艾奇逊的显而易见的首尾不一、前后矛盾之处，从而有助于加强科恩论文的说服力。据认为，公开言论之间的歧异之所以可能发生，是由于艾奇逊要应付不同的听众：人们应该考虑到他发表那些言论的时间和对象。厄内斯特·梅（Ernest May）提请注意一个国务卿可能会扮演的各种角色。除了要代表国务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他自己——制定的各种政策立场，艾奇逊也还有可能要把自己当作总统的律师而考虑到以他的“当事人”为一方、以国会和公众为另一方的广泛得多的种种争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保持始终一贯的现象，又毫无疑问会因而发生。讨论参加人对艾奇逊在官僚政治中的表现所作的评价各不相同。在积极的方面，科恩看到了艾奇逊以精明的技巧成功地应付了军方，在各种场合作一些口头上的让步，以达到——至少在朝鲜战争以前——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任何有碍于承认北京的行动。艾奇逊有时也以同样的方式听任他那些顾问发表五花八门的意见。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国务卿或部长试图在他所辖的部门内压制不同意见，在政治上都极不明智。至于舆论的形成，有好几位讨论者断言，艾奇逊曾经作出巨大努力来为新政策铺平道路，中国白皮书和杰塞普的新闻发布会可以为证。

在另一方面，也有好几位与会者对艾奇逊在推行一种要使中国共产党人脱离莫斯科的政策方面的坚韧和真诚提出疑问。在

罗伯特·勃鲁姆（Robert Blum）看来，艾奇逊似乎犹豫不决。对华政策首尾不一，带有试验性，同时在好几股道上跑车。他在1949年一年就发现了三个不同阶段：春天，试探中国式铁托主义的可能性，7月1日毛泽东发表“一边倒”的演说以后，对中国共产党人强硬起来；从9日往后，艾奇逊决定要“蹲下来”以静待中苏关系经过长期发展而告被裂。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指出，据艾奇逊自己估计，这种关系破裂，在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还不会发生。惠廷强调，中苏结盟对于从根本上改变艾奇逊外交活动的背景条件具有极大重要性。托马斯·佩特森（Thomas Paterson）在另一次讨论会上的一段议论在这里也值得一提，他说，为了适应铁托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原型，美国政策也只是在经历了非常缓慢而小心翼翼的过程之后才完成的。

好几位讨论者都注意到当时国内压力的升高：美国政治气氛日益恶化，而官方思想，如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所反映的，则越来越沉迷于苏联的威协而倾向于扩充军备和把世界政治一分为二。如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所说，当时敲响了的不仅是国民党的而且是艾奇逊政策的丧钟。这些趋势，事后回顾，都很明显，但是与会者无法确知，当时在台上的那些人物在朝鲜战争以前究竟从中看出了何种重要意义。柯恩坚称，至少艾奇逊确信，时间是对他有利的。

也有人考虑到艾奇逊有关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公开言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对他那种政策是否可行提出疑问。惠廷引中国白皮书的发布函件为证，这份文件以最权威的方式把中国共产党人描绘成莫斯科的傀儡，而白皮书本身竟未收录战争时期美国外交官员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在延安交谈的任何记录。惠廷继续指出，毛和周恩来都知道，他们在延安并不曾有屈从莫斯科的表现。事实上，1946年周恩来就曾直言不讳地告诉马歇尔，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莫斯科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对白皮书立即作出的感情用事的、谩骂式的反应，在惠廷看来，

是可以理解的，白皮书破坏了直到1949年5月还在负责试探美国立场的那些人的计划。

为什么艾奇逊要走得这样远来投射出一个和他的政策精神截然相反的形象，是个难解的问题。科恩的论文提出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艾奇逊听从了约翰·戴维斯的建议，要在中国人身上骂出一个更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姿态来。惠廷的结论是，无论作出什么样的解释，艾奇逊是低估了他也许认为是他那种政策浮表的一面对另一方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减少了曾经存在过的无论什么样的和解机会。

艾奇逊之乐于赞同越过三八线，无可避免地成了引起重大兴趣的一点。罗伯特·梅塞（Robert Messer）问道，艾奇逊为什么要放弃他那始终一贯的有关于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解的“几乎是宿命论式的现实主义”政策，而默许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决定？

正象在处理一些难以捉摸的有关动机的问题时常常会遇到的那样，与会者的解答是各不相同，然而，却又并不一定互相排斥。梅塞本人认为，最说得过去的一种解释也许是，艾奇逊未能抗拒彻底胜利的诱惑——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对中国人的傲慢态度，而这种傲慢又来源于他对中国人——也许，作为一个种族，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支军事力量的致命的估计不足。沃纳·希林（Warner Schilling）觉得，如果艾奇逊果真矢志于和解，他就不会表现得象别人一样，而把越境进入北朝鲜视为对中国的侵犯。卡明斯指出，麦克阿瑟将军的职权范围削弱了国务院对那里事态发展的影响。他还认为艾奇逊在立场上的大变化，是相当典型的：由于在战争的一阶段流了血，吃了亏，美国人谋求报复。

科恩本人说，他对艾奇逊有关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所能作出的最好的解释，仍然是他十年前在“美国对中国的答复”中提出的：“这是政治机会主义的一例，在当时的情况下做起来似乎轻松而顺手，于是就做了。”正如好几位讨论者所指出的，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的以及在国内政策方面的种种麻烦，一般说

来，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需要，要求在朝鲜有一个强硬的形象。令人迷惑不解的一点是，艾奇逊怎么能在了解到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袭击大陆和轰炸满洲之后还相信他要北京放心而发出的那些信号仍然是适当的。柯恩声称，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为止，艾奇逊都可以认为他向北京发出的信号是相当清晰的，这使他更难以承认战争开始后美国的信号已变得多么混淆难辨。

梅塞以最简洁的语言概括了科恩论文的价值，他说，在他看来，就文章所构成的整个画面而论，具有揭示性的新内容是，艾奇逊在贯彻他谋求和解的政策方面是“如此坚决、如此审慎、如此精明”。他对艾奇逊的评价却没有这么高，尤其是因为考虑到他的公开言论和后来的著作。对于愿接意柯受恩论文的一部分人来说，艾奇逊的和解目标似乎并不象柯恩所描绘的那样明确具体和至高无上，而是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遥遥无期，和易受国外偶发事件和国内压力的影响。引起这种疑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即使不曾越过三八线，艾奇逊的政策是否有足够的影响来使得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的努力继续下去。

江　枫译

孙中山与日本

苏联东方学研究所

在中国著名政治家孙中山的外交活动中，他与日本的频繁交往占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也许由于他逃亡期间，这个国家成了他的避难所。无怪乎这位中国革命家称日本为第二故乡。在反清年代里，孙中山曾得到日本的支持与赞助。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有相同的文化遗产和种族渊源，因此，它在明治维新后的进步与现代化建设，使这位中国领袖钦佩不已。

本文中心思想仅在于说明孙中山在效法日本、改造中国、争取日本援助和建立中、日联盟等问题上的立场。

孙中山在其政治活动初期，对日本便有所注意，认为它是今后改造中华的模式。1894年，他上书清朝大臣李鸿章时，称日本是经过改革达到国家繁荣昌盛的榜样。此外，他还指出，虽然日本与西方建交在中国之后，但它在短期内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①

孙中山确信，中国已具备以日本为榜样进行根本改革的一切条件。1905年8月，他在对中国留日学生演说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表示十分乐观。他断言，只要中国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现代技术成果，不用二十年，定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强国。孙中山的依据是，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大批能够促进改革事业的“务实派”人士，这一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并不具备。②

这种看法在他1917—1919年所著的《建国方略》中也有所反

① 齐赫文斯基：《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活动》，莫斯科1964年版，第30页。

② 鲍罗赫：《孙中山论加速发展中国问题》，载《亚洲人民》1976年第5期，第56页。

映。孙中山在文中指出，日本人着手改革时，人口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领土比四川省总面积还要小。当时，日本在科学知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不如中国。然而，它并没有自暴自弃，它坚决破除守旧思想，纠正错误的锁国政策，一改过去反对“异族”的做法，主动拜各国专家为师。它致力改革，积极吸取欧美各国一切有益经验。孙中山指出，美国走上繁荣、富强，用了将近一百五十年时间，而日本只用了五十年，在时间上比美国几乎快两倍。孙中山由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立志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很快便能成为强国。他进一步提出，完成此项任务，约需十年时间。①

孙中山指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为第一流国家；近年来，日本又取得新的成就．亚洲各国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孙文学说》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位民主革命家号召国人不仅在国内改革上，而且在国际活动上要效法日本，即要争取关税独立和废除列强几乎在同一时期强加在中国和日本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②

由此可见，孙中山把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振兴，归结为它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成果，尤其是废除了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认为，这个成功之道必定会增强国人的信心，激励他们在国内励精图治，进行改革。

孙中山不仅把日本看作是中国的学习榜样，而且看作是能够支持和帮助中国推翻清政府、建设一个富强与独立的国家的盟友。然而，他没有从日本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这一点上，看清它的阶级本性。他首先注重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

1898年（原文如此——译注）初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即打算再度着手推翻满清王朝。他广泛结交日本政界人士，其中包括大隈外务大臣手下人员，一心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此期间，孙中山与继承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时期革命民主主

① 《孙中山选集》，莫斯科1964年版，第227页。

② 齐赫文斯基：《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活动》，莫斯科1964年版，第210页。

义思想的民主派代表人物过从甚密。他们当中的宫崎寅藏、宫崎弥藏等人，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这些人认为，日本国不久前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当然应该无私地援助中国，使它步日本后尘，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起初，日本统治集团没有干预“兴中会”的反满活动，因为他们唯恐沙俄企图改变《马关条约》既成局面的做法，会直接影响清廷的对外政策。况且，他们希望中国能产生一个执行对日本有利的政策的新政府。但是，伊藤博文上台以后，日本各政党内部在尔后对华政策上产生了分歧，日本当局遂拒绝向孙中山及其拥护者提供武器，因而1900年顺利开始的起义（指惠州起义——译注）最终宣告失败。日本这个时期的立场表明，它很怕得罪其他国家，因为它们在义和团被镇压下去以后，纷纷与满清朝廷在北京签订了和约。再则，伊藤内阁正在制订向满洲扩张的计划。虽然孙中山对列强的对华政策存有戒心，但仍然继续争取日本的支持，想借助外力拯救中国。其实，谁都知道，日本曾与西方列强和沙俄一起，镇压了义和团起义。

1903年，侨居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在日本出版了《江苏》刊物，上面刊载了孙中山的文章《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该文集中反映了孙中山这个时期的观点。这位中国革命家企图怂恿日本舆论界起而捍卫自身的领土完整，免遭“白种列强”侵犯。①同年，孙中山在与宫崎滔天谈话时（谈话记录发表在中国旅日侨民出版的《黄帝魂》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只有支持他们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和建立中华民国，才能防止“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列强同时瓜分日本。②

孙中山企图通过对日本舆论界和志同道合人士的呼吁，改变日本统治当局对他的态度。后来相继发生的事件也说明这一点。1907年，日本政府在北京当局的压力下，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

① 史扶邻：《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洛杉矶1968年版，第309页。

② 齐赫文斯基：《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活动》，莫斯科1964年版，第66页。

并进而在实际上拒绝向他提供革命活动经费。正如M·扬森所指出的，1911年革命爆发前，孙中山虽然对日本人民的友谊深信不疑，但他更注重寻求美、英等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持。①②中国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通盘政策对共和派不利，加上日本以武装干涉相威胁，这一切情况自然对孙中山的立场有所影响。③

后来，日本政府的立场有所转变，它一反过去，采取适应中国两个政权这一现实的政策：一方面积极支持北京政府（袁世凯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保护它在华中的权益和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工商界才"慷慨解囊"，向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提供了几笔数目有限的贷款。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好接受。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日本陆军省派了几名日本军官到南京，充当观察员和南京政府顾问。④

1913年初，孙中山把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便以中华民国政府要员（他当时任全国铁路督办）身份赴日本考察。在那里，他受到了盛情接待，深为感动，对日本又重生幻想。孙中山回国后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此行目的在于试探日方的诚意。考察期间，他终于了解到，"日本人关于友谊的庄重声明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发自肺腑的。"正如孙中山所认定和阐明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宗旨不是掠夺中国的领土，而是同中国发展贸易。⑤

由于孙中山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持这种见解，他在1913—1916年期间的行动就必然自相矛盾，前后不一。⑥1913年春，孙中山企图争取日本工商界和政界支持和赞助他反对袁世凯。但日本当局和外务省对"二次革命"持观望态度。

---

① M·扬森：《日本人与孙中山》，斯坦福1954年版，第205页。

② 《中国人与日本人。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影响》（论文集），新泽西州1980年版，第126页。

③ 马丁·伯纳：《非凡的精力。孙中山传》，纽约1968年版，第129页。

④ 齐赫文斯基：《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活动》，莫斯科1964年版，第146页。

⑤ M·扬森：《中国与日本从战到和（1894—1972年）》，芝加哥1975年版，第207页。

⑥ 《中国文化介绍》，纽约-伦敦1973年版，第255页。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度逃亡日本。这期间，他积极组织反袁斗争。他求援心切，不得不向对方提出一些事关重大的许诺。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新任内阁首相大隈重信，希望对方给予援助。为了取得日方的援助，孙中山建议中、日长期结盟。①1914—1915年间，孙中山多次向日本官方人士保证：一旦他执掌政权，他将给在华日本公民以特种权利。从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一位大臣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曾向日方提供在华贸易的新的优惠待遇，作为日方援助他反袁的交换条件，并且同意接受日方派出的军事顾问和专家，同意保障日资在经济上援助中国方面享有优先权以及其他种种特权。②③

由于日本当局于1916年决定帮助孙中山反袁，孙中山和日本官方人士的来往十分频繁，他的拥护者对此产生了疑虑和不满。④但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日本又反过来支持北洋军阀和出兵占领山东省，这种种事变促使孙中山开始打消与日本交好的幻想。尽管当时他对日本的看法仍然有所保留，但待日本参战、倒向协约国一边时，他对日本就真正失望了。日本在凡尔赛会议上的反华行径，促使孙中山接连数次发表反日声明。但是，尽管如此，孙中山在1920年11月致宫崎的信件中，依然向对方保证：只要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中国方面无疑还会同日本建立亲睦关系。

孙中山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和演说中，进一步发展了他早就提出的中、日联盟的思想，这一点很有代表性。1917年，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和日本利害一致，认为这种一致性是两国联盟的基础。文中写道：“日本与中国之关系，实为

① M·扬森：《中国与日本从战到和（1894—1972年）》，芝加哥1975年版，第211页。

② M·扬森：《中国与日本从战到和（1894—1972年）》，芝加哥1975年版，第212页。

③ 马丁·伯纳：《非凡的精力。孙中山传》，纽约1968年版，第184页。

④ 《中国人与日本人。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影响》（论文集），新泽西州1980年版，第127页。

存亡安危两相关联者。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①

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发表演说时，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思想。在演说中，孙中山再三呼吁日本政界人士支持中国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的不平等地位是日、中联盟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孙中山认为，日、中联盟是亚洲各国人民团结的基础，它将有助于他们恢复本国在欧美势力入侵东亚以前的地位。正如Л·П·杰柳辛所指出的，孙中山认为，中、日联盟应当建立在实现正义和人道主义、反对暴力和反对“列强”专横肆虐的基础上。② 总而言之，孙中山在神户的演说充分表明，他在他的政治活动后期仍然对日本抱有幻想，他没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已经成为羽毛丰满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正竭力扩大和巩固它在亚洲的地盘，而中国首当其冲，成为它首先猎食的对象。

译自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国家”第14次
科学会议提纲与报告汇编》
第 2 册，第176—182页。
丁如筠译

① 《中国：传统与现代》，莫斯科1976年版，第173页。
② 同上，第174页。

戊戌变法与日本

——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

志村寿子

序

明治维新以后直到甲午战争，日本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一心一意致力于吸收西方文明。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关心，包括舰船武器及其制造技术，还有作为发挥现代国家机能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同时，在他们之中，由于受到西方文明冲击而产生了自卑感与必须尽快赶上去的焦急心情。这种自卑感与焦急心在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对中国和朝鲜的态度上，表现为同情心或者优越感。那种同情心或优越感，一方面体现了日本作为半欧化半脱亚的独立国家，想在西方社会中占一席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作为亚洲的代表或领导者对抗西方列强的要求。这个要求正好与日本原来的大陆扩张政策结合起来了。这样两个方面的愿望和要求，造成了甲午战争后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政策上的混乱和摇摆。脱离亚洲，希冀以亚洲中的“两欧”姿态与西方列强协同步调的见解，与充当人种同盟亚洲盟主以及机会主义的见解，交错地表现出来。由具体的舆论和外交政策显示出的两面性，往往产生表里不一的现象。虽然难以区分时期，但是这两种大陆观基本上是受中国内政的变化和西欧列强的东方扩张政策的动向所左右的。虽然在甲午战争以前，对于中国的国力给予传统的高度评价的时期，尚有企图联合中国保卫东洋的主张。但

是，在中国的内情逐步明朗的情况下，则立刻改变为依靠日本来改造和提携中国的主张。然而还出现了这样的意见，即由于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的改革，日本不如和列强一起“共食其肉，为膳上之客”。①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带来的自信，这种意见遂演变成中国分割论。

甲午战争体现了在日中两国吸收西方技术的不同结果。胜者日本虽然得以自夸为亚洲挤入西方各国行列的唯一国家，但是，接着而来的三国干涉还辽，使其痛感自己的地位仍低于西方国际社会，以及西方列强的力量之强。败者中国也开始认识到不仅要采用表面的技术，还应该根本改革本国的制度，因而产生了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必须挽救祖国危亡的民族主义思想萌芽，而且产生了为此应该向日本学习的思想。1898年（明治31年），在中国，虽然一度通过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改革派之手，实行了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的政治革新，可是仅仅三个多月就以失败告终。这就是历史上称为戊戌变法的改革。

围绕着中国这场改革运动及其失败所表现出来的日本对华政策和舆论，如前所述，基于中国观的两面性，而显示出不同的方向。

本文试图论述甲午战争后日本的中国观和日本关于戊戌变法的动向。

第一章　大陆观的演变

（一）日中提携论

明治维新后，政府最重要的课题是确保民族独立。尽管新政府成立后采取了对外和睦的方针，但是统治集团仍宣称“海外万国皆吾皇国之公敌，”②对于列强抱有强烈的反感。十九世纪后半

① 杂贺博爱。，《杉田鸦山翁》（昭和3年），第584页。

② 《岩仓具视关系文书》（昭和9年），第一卷，322页。明治2年岩仓三条实美提出的意见书中“外国之事”。

叶，在所谓西力东渐的潮流中，如仍确保日本的独立，是个大问题。为此，必须吸收西方文明实现现代化，而与大陆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直到甲午战争，西方列强的压力虽然没有直接加于日本，但是列强势力对大陆的渗透，对于日本的独立仍然具有危险性。因此产生了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感情，主张日中提携，共同抵抗西洋的压力。岩仓具视在明治15年给井上馨的意见书中，认为今日在全亚洲保持独立的只有日中两国。如果两国不提携联合，就不能阻挡“西力东渐”的大势。①这个时期的日中提携论是以对中国国力的高度评价为根据的。然而，与努力实现关系国家危亡的现代化的日本相比，中、朝两国对西方文明的吸收丝毫没有进展，显示出在将来要维持中、朝两国的独立是不可能的。由于日本的独立和中、朝两国的独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两国的这种状况，必将给日本的未来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自然就产生了通过日本之手，促进中朝两国的国内改革，并援助其实现现代化的主张。持这种“中国改造论”主张的有两种人，一是自由民权派的人们，二是以陆军出身的荒尾精，根津一等为中心的人们。而且还有与这两派均有微妙关系的玄洋社。这种提携论——以改造为前提的提携论，逐渐发展为亚细亚主义，或称大亚细亚主义。在平凡社出版的《亚洲历史事典》中，对自由民权论者的亚细亚联合论作了如下的说明：“植木枝盛把支撑着他以民权论的自由平等的原理应用到国际关系之中，说明亚洲各民族抵抗的正当性。与此同时，为了进行这种抵抗，必须使亚洲各民族在完全平等的立场上联合起来。并进一步推进这种立场，以至于提出了一种乌托邦的世界政府论。但是，更有力的还是樽井藤吉、大井宪太郎的主张。他们认为，为了对抗欧美列强，亚洲各国在设法推进国内民主化的同时，有必要互相联合。又强调指出，由于日本在民主化方面先行一步，因此应该伸手援助其他亚洲各国实现民主化，这是日本民族的使命。不久就进入了明治二十年代，随

① 《岩仓公实记》，（昭和2年），下卷，907页。明治15年岩仓给井上馨的意见书。

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倒退，天皇制国家机构的确立对华军备扩张，从民权论者的这种亚细亚联合论中，大亚细亚主义开始抬头。”①

坂垣退助在明治14年论述兴亚问题时说：“真正亚细亚的兴起”，“只有以欧美新主义唤醒沉睡的中国、朝鲜各国人民，方可实现。”“把我们的自由主义传到亚洲中央，并弘布全洲，最终创造出一个高于欧美文明开化之上的新的亚细亚，这就是我们的目的。”②

《东洋自由新闻》在明治14年发刊第一号上说明其主张时也写到，要“把我日本国民自由之权扩展延及东方各国”。③

还有自由党的杉田定一（鹑山）在明治16年写的《兴亚策》中提出，为挽救亚洲的衰运，应该大力实行亚洲各国知识的交流，在各国设立人民的结社，并实现他们的大联合。④明治17年发生中法战争，杉田为探求“中国如何抵抗白种人的侵略，确保东洋的自由和独立”，⑤而亲自去中国。他的目的是打算在中国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动员中国朝野名士正确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使他们掀起与我国同样的国会开设运动。

此外，东洋社会党的发起者樽井藤吉为了推进朝鲜的现代化，共同防御列强的侵略，主张日朝两国在平等的立场合并。⑥自由党左派的大井宪太郎，试图使朝鲜独立并谋求朝鲜人民的利益，以此作为亚洲改良的一例。为此而策划阴谋，这就是所谓大阪事件。⑦

其次，关于第二种人的组织，明治23年荒尾精在上海创设了日华贸易研究所。这是在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次官桂太郎的支持下，由根津一协助荒尾精创办的。他们希望广泛发展贸易，实

① 《亚洲历史事典》第六卷，第6页，“大亚细亚主义”之项（执笔者野原四郎）。
② 《坂垣君意见要览》（明治14年），第49—52页。
③ 《东洋自由新闻》第1号，明治14年3月18日，中江笃介：《祝词》。
④ 杂贺博爱：《杉田鹑山翁》，第544页。
⑤ 同上书，562页。
⑥ 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收入《现代日本思想大系9．亚细亚主义》（1963年
⑦ 平野义太郎：《民权运动的发展》（昭和23年）第61—65页。

行两国经济的合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实行政治的合作。这个研究所虽然在明治26年培养了八十九名毕业生后解散，但这些毕业生在中日战争中作为陆军翻译、军事侦探，十分活跃。荒尾在研究所设立以前，曾在汉口经营由举田吟香提供的汉口乐善堂药房，并在此集合同志。他在《心得书》中主张，策划中国的革新，一扫积弊，而成为我国的藩篱，两国合作共同抵抗西力东渐的浪潮。①他的中国观表现在明治27年提出的《对华意见书》中。荒尾认为，西力东渐意味着黄白人种的竞争。因此，即使不为朝鲜的贫穷、中国的老朽而忧虑，也应为我国而忧虑。故而，为了提高日本在国内外的威信，应该帮助这两个国家恢复势力，以成三国鼎峙，抵挡西方。第一步是要使朝鲜依靠我国之力而独立，接着必须使中国鼓舞振作，图谋一大革新。然而，如果中国成为富强之国，恐怕将成为我国之劲敌，故而应该慎重考虑，制订百年之计。②

在明治二十年代，标榜民权论的玄洋社逐渐转变为国权论者。他们认为："民权伸张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是空谈民权不顾国权的消长，只能使国家受辱。如果想要很好地维持日本帝国的精神，就必须依据军国主义，大张国权。遂把过去的民权论舍弃如敝屣。"③在这里，自由民权派的提携论与荒尾的改造论取得了一致。明治33年成立了继承其衣钵的黑龙会。另外，在甲午战争后继承了提携论观点的组织里，有近卫笃麿、犬养毅等在明治31年组织的东亚同文会。其宗旨书指出日中两国处于兄弟唇齿关系，先前两国的不和给予西洋各国以可乘之机。今日由于事关重大，需要"两国政府"、"两国商民"、"两国士大夫"和衷共济，富强国家。④

---

① 上田健二郎：《东亚的风云和人物》（昭和18年）中的《荒尾精》（井上雅二）。
② 荒尾精：《对华意见书》（明治27年），第81—96页。
③ 《玄洋在社社史》，（大正6年），第409页。
④ 近已霞山会：《近卫霞山公》（大正13年），第131页。

（二）脱　亚　论

在对上述亚细亚联合主义的大陆观进行过正面批判的人中，必须提到福泽谕吉。积极引进西方文明，提倡天赋人权学说的福泽，同时也是一个彻底的国权论者。如同福泽在《通俗国权论》一书中所论述的，尽管要承认权，尊重个人的自由，但是在现实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尤其应该把提倡国权论作为第一要务。正如在《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可以看到的，当时福泽最关心的是保持日本民族的独立，“保全国体”。福泽在明治14年的《时事小言》中说：“在今日东洋各国中，能够成为文明的中心……能抵挡西洋列强的，舍日本国民还有谁？……今西洋列强以其威势逼迫东洋，犹如大火蔓延。然而东洋各国，特别是由于我之近邻中国、朝鲜等等迟钝，难挡其势，恰似无法控制的木屋之火。因此，我日本对此加以武力援助，不单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须以武力保护之，以文化诱导之，使其速仿我例，导入现代文明。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强制胁迫其进步。辅车相依，唇齿相助，虽可通用于同等国与国之间，但是期望与今日之中国、朝鲜互相提携，就未免过分迂阔了。”③这种主张乍一看也许与联合主义的改造论相似，其实与改造论的实质完全不同。明治18年，福泽发表了《脱亚论》。认为在今日之世界，只有采取西洋文明才能保全国家。因此，我国应该摆脱旧的一套，一切都采用西洋现代文明，成为亚细亚全洲的新机轴。这个主义所以用脱亚两字，是因为“日本的国土虽然在亚洲的最东边，然其国民的精神已经脱离亚洲的固陋，移至西洋之文明”。然而中国、朝鲜留恋旧传统，缺乏改革精神。按现在这样，很难维持独立，数年之中肯定要亡

①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昭和33年，第四卷。
②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福泽谕吉全集》第四卷，第32页。
③ 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福泽谕吉全集》第五卷，第186—187页。

国，其国土将被文明诸国分割。他认为“辅车唇齿虽然可以比喻邻国间相互援助，但是今日之中国、朝鲜对我日本国不仅不能有一丝一毫之援助，同时在西洋文明人的眼里，由于三国的地理接近，时而可同等视之，即意味着用评价中国朝鲜的方法来看日本。……这种影响已经显示出来，并且经常地造成外交上的障碍，成为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因此，为今日谋，我国既然不能等待邻国的开化而共同复兴亚洲，不如脱离其伍而与西洋的文明国共进退。与中国朝鲜接触时，也不必由于邻国之故，特别打个招呼，而只能按西洋人与其接触的办法处理。”①福泽提出的这种“脱亚”的道路，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更前进了一步。

（三）甲午战争后的论潮

甲午战争的胜利，引起日本朝野的狂喜。这是这是由于尽管当时中国内部腐败状况已日渐明显，但是还存在着对中国国力的高度评价。外相陆奥宗光说：“在平壤、黄海战役胜利之前，国民们还担心最后战争结局的胜败。现在国民对将来的胜利已经毫不怀疑了，他们所考虑的只是我国的旭日军旗何时进入北京城。普遍气氛都是壮心快意的狂跃和骄慢，国民如醉如痴，到处是喊声、凯歌声，对于将来的欲望也在日益增长。”②这种狂喜不仅存在于一般国民之中，就连政府和正在激烈对立的政党也是一样。必须征服中国，或者西欧文明不久将死亡，日本将代之而起，雄飞于世界万国之林之类的意见，经常出现在自由党、进步党的报刊上。战前，福泽谕吉曾对中国作出冷静的判断。他认为中国虽然国土广大，但是政治组织已从基础上腐败，国民也无牢固团结，这样的国家的国内并不可怕。而这次，也高兴地认为日本战

① 福泽谕吉：《脱亚论》，《福泽谕吉全集》第十卷，第238页。《时事新报》明治18年3月16日社论。

② 陆奥宗光：《蹇蹇录》，岩波书店（昭和16年），第126页。

胜是文明的胜利。①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中国分割论。例如田口卯吉认为日本首先应注意东洋国力的均衡，中国的国力决不能超过日本。"即便使爱新觉罗氏自立为强国，但由于欧洲强国早已看透中国的衰弱，首先要灭亡中国，并据其地与我对抗。"因此主张不论中国政府如何改良内政，也不能让其岁入总额超过我国。为此，应该分割其土地。②

福泽谕吉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可能会促进中国革命的到来，如果发生内乱，列强决不会坐视，而将瓜分中国。因此，"（瓜分的）时机到来决不会太远了，从现在开始，我国应注意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这种认识是极端重要的。"③

于是通过"马关条约》让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第二年明治29年，又与中国缔结了新的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取得了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所签订的同样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这种日益发展的向大陆膨胀的意愿，和已成为西方列强伙伴的自吹自擂，由于三国干涉还辽而一下子被击溃了。陆奥描述当时的状态说："当时中国一般状况如何呢？可以说如同一种政治危机袭来，警愕已极。""（人们的）胸中郁积的不平不满之念一下子爆发出来。昨日还抱有过分的骄慢，而今日终于蒙受屈辱。对其骄慢的挫折产生的极度不快与不满，早晚要发泄出来以得自慰。"④

德富苏峰在《时务一家言》中说："我接受了三国干涉实力之福音之洗礼也。""我于此认识到无力的道理得以战胜有力的无道理，要实行道理首先非要具有实行的实力不可。"①

日本国民作为一等国的幻想无情地破灭了。国民痛感到日本在国际政治中仍处于低下的地位。

---

① 《福泽谕吉全集》第十四卷，第572页。《时事新报》（明治27年9年23日）《中国之大不足惧》。

② 《东京经济杂志》，明治27年12年1，《仲裁谈》。

③ 《时事新报》，明治27年12月13日，《眼中的中国》（社论）。

④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75—276页。

这个时期的大陆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大陆分割论”、“日中提携论”和“日英同盟论”。当然，这三种见解都不是以其原有形式表现的，而是各种思想杂交，并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而变形出现的。通过甲午战争的失败，既然中国的内情已经完全暴露于世界各国面前，瓜分必将开始的论调甚嚣尘上。而且，当时还要求为使日本不致落后于西方列强，希望能作好准备。福泽在《时事新报》上认为日本为维持在远东的地位，应与西方强国合作，提出了日英同盟论。另外，在政府内部，山县有朋认为由于中国的瓜分不可避免，围绕满洲问题，日俄两国早晚要发生大冲突，为此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声援，因此也主张日英同盟论。①

另一方面，尽管主张日中提携论的人同样也惦念大陆的瓜分。但是他们主张，如果把中国当做敌人，只能对西方各国有利。为防御西方列强，还是应与中国提携合作。荒尾精于明治28年在《对清辨妄》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民足以与谋东洋大事”，“东洋的大事唯有日中两国齐心协力经营之一途。若舍此一途，茫茫大陆将被欧美列强宰割分食，能幸免者几希矣。”②还有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上写道：“东洋的前途，最终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比如，一时的外交策略能产生各种变化，那也只是一时的变化。而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之下，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应认清白种人是共同的仇敌。”“各国同盟瓜分中国之时，也就是黄白两个人种竞争的结局。……日本人的命运，岂能独立于人种竞争的活剧之外乎？”③这是明治33年成立东亚同文会时继承下来的主张。

主张日英同盟论的福泽对于这种日中提携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日中同盟能不能意味着保护东洋的利益，两国协同促进东洋的文明开化，实现富国强兵，成为对西洋各国的共同运动呢？就

① 德富猪一郎，《公爵山县有朋传》（昭和8年），下卷，第494—496页。

② 荒尾精：《对清辨妄》（明治28年），第23—29页。

③ 《太阳》，明治31年1月1日（第四卷一号），《同人种同盟附中国问题研究之必要》。

好比把东洋当作一个病人，接受日中两个医生的治疗。可是中国是中医，而日本是西医，使本来性质素养完全不同的两人共事，如何能达成协议呢？”“实际上只要现在的满清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真正的同盟就难以实现。这个政府的状况与我国德川政府末期差不多，已经失去了自立能力，如果仅仅保住一个外形，迟早要被风雨所袭倒。”①

但是，甲午战争后政府的外交方针，可以仅仅归结为“慎重”一语。②三国干涉以来，无所作为并被迫屈服于列强的软弱外交，遭到舆论的攻击。政府以“国力的充实”为第一课题，并极力注意避免使列强抱有“日中同盟抵御欧洲”的疑惑。③

第二章　戊戌变法和日本

（一）　中国改革运动的概况

从1861年到1895年的三十余年间，中国以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大官僚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努力输入西方现代技术，而且在在这个时期创设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许多现代企业。这批大官僚还以现代装备和训练建设军队。以代替已经不起作用的传统清军。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这个所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围绕着根据《马关条约》必须支付的赔款二万万两，列强争着提供借款，以便通过借款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1897年11月，德国首先占领了胶州湾，以此为开端，接着俄国、法国、英国也纷纷抢占租借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在甲午战争中主张拒和主战的人们，开始实行改革运动。他们主张利用战败之耻激起新的公愤，清除积弊，富国强兵。这个运动以

① 《时事新报》，明治28年6月6日，《日中同盟到底可行否》（社论）。

②③山县有朋文书（宪政资料室所藏）《关于中国特使的意见书》，明治32年5月27日。

康有为为中心。康有为虽然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官吏，即工部主事，但是通过著书和办学会（类似政党的组织）、报纸，宣传改革，鼓动了很多低级官员和张之洞、王文韶、文廷式等大官。最后，他还受到年轻的光绪皇帝谘问。在1898年6月到9月末的戊戌新政中，作为皇帝的顾问，提出了很多建议。他的改革建议，从初期的军事、教育等技术的改革，逐渐变为关系国家根本的急进主张，即最终要求全面接受西欧或日本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如果不变法必定要亡国，并要求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实行政治、教育以及国家各种制度的全面改革。特别是要废除或为教育最大弊端的科举制度，充实发展学校制度，大量培养有用人材。光绪帝虽然确有改革之意，但不掌握清政府的实权，又得不到除湖南以外的那些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的地方大官僚的支持配合。没有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改革运动很快就搞不下去了。由于官制改革而失去职务的满族官员的不满，以及反对改革的荣禄等人的压力，再加上袁世凯的告密，西太后决定恢复训政，新政就此结束了。

以上简略叙述的中国改革运动与当时的日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第一，一贯采用“以夷制夷”为传统外交手段的李鸿章，为了对抗日本，表现出亲俄的态度。与此相反，改革派则期望与日本及英国联盟，并在军事、教育设施上借助日本的力量。①

第二，在改革的初期，由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官也参加了，日本朝野希望通过与他们的接近，避免与中央政府交涉，从而使日本势力得以渗透进去。

第三，政变前夕，感到皇帝处于危险地位的改革派人士，想要依靠日本和英国来拯救皇帝。②

第四，政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求救于日本和英国公使

① 王树槐：《戊戌变法》（1956），第165—175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1997年），第280页。

馆，并经他们之手亡命日本。

那末，这次中国的改革运动在日本政府及民间的大陆政策、大陆观中是如何被评价的呢？它在各种大陆观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将谈到这些问题。

（二） 列强对大陆的扩张

如前所述，1897——1898年（明治30—31年），东洋在国际政局中最令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占领了胶州湾。1898年，俄国又租借了旅顺，大连湾，法国租借了广州湾，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1898年5月，随着日本得到了中国的全部赔款，只得从一直占领的威海卫撤退。可是，日本撤兵后，英国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退还辽东半岛以来，日本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让步，对德、俄、法的租借仅仅旁观而没有表态。日本各报纸都纷纷非难政府的这种态度。

例如当时国家主义情绪最严重的《日本》杂志①指出，当时我国接受三国劝告退还辽东，是因为我国承认保有辽东将对中国政府产生致命威胁，有害于东洋的和平。可是三国却做出这样的暴举。"为了有害东洋和平而还辽的我国，本来绝无容忍俄、法如此暴举的理由，而新内阁（第三次伊藤内阁）却竟然保持沉默。……俄法能否接受，不是今日之问题。我国首先要将占理之处公诸天下，从而尽到对东洋和平的责任。"②并特别强调，"即使中国自己不能抗拒，我国也应该以三国曾对我的理论作堂堂之争。"③批评了政府对三国不发一言抗议的态度。

另外，有中立倾向的《万朝报》，从1898年1月到5月，也主张我国有对三国抗议的权利。屡次指责政府的这种旁观态度，不

① 西田长寿，《明治时代的报纸和杂志》（昭和36年），第240页。

② 《日本》，明治31年1月25日，《责任的继续》（社论）。

③ 《日本》，明治31年4月7日，《均势论》（社论）。

但丧失我国的威信，而且有害于东洋的和平。并且进一步主张日本绝对不能从威海卫撤兵。3月4日的《万朝报》认为："正是由于日军驻屯威海卫，才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俄、法、德的暴举。如果日军撤退，就会引起比目前更严重的后果。政府不肯宽宏同意延期交付赔款，以致这样的事态发生，这是很可悲的。"①

山县系的《国民新闻》4月9日也认为，为了恢复均势，应该把威海卫改为长期租借。若日本表示驻守威海卫，英国也会高兴地同意的。"②并且主张，如果英国不肯答应，那末也应该在舟山群岛或者台湾对岸割地。③《报知新闻》4月9日也认为，日本向中国提出租借地要求决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使占据中国的各国力量之间互相牵制，以防中国发生祸乱。"④

政府未对三国提出抗议，又未向中国提出租借地的要求，遭到了舆论的一致攻击。伊藤内阁仍坚持政府有政府的方策，该打时必打，民间不必说三道四，而无视社会舆论。而且按照政府早就制定的方策，要求北京政府发表不割让福建的宣言。虽然清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于4月26日发表宣言，但是各报纸却认为这个宣言毫无价值，并继续非难政府的无能。《日本》4月30日指出，这个宣言使列国能够说，"中日之间的约定不为我们所知，我们将要向清廷要求福建省之地。"⑤《万朝报》也批判政府的政策，认为即使得到这一保证，但如果中国没有遵守这一保证的诚意，也不会有任何益处。一旦在列强强迫割让这些土地时，日本如果为了保全国家的荣誉，要努力绝不对列强的一切手段实行妥协，这样反倒承担起责任了。⑥

在这些意见之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对中国的未来如何考虑，日本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

① 《万朝报》，明治31年3月4日，《外交的无策》。

②③ 《国民新闻》，明治31年4月9日，《远东均势的恢复》（社论）。

④ 《报知新闻》，明治31年4月9日，《对清之言》（社论）。

⑤ 《日本》，明治31年4月30日，《福建不割让之约》，（社论）。

⑥ 《万朝报》，明治31年5月中国政府的言》，）'1日》督论坛）。

首先是《每日新闻》提出了维持东洋和平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出于日本与中国是邻邦，又加上同文同种，"文物相类"，感情上的一致，而由日本帮助中国保全独立，防止欧美各国的东进。另一种是看到西方各国在中国扩张势力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避免，而以和平为宗旨，协调各国势力，开放中国各港，作为共管之地，使其处于全世界监视之下，任何一个强国也不能独占。因此，"我辈赞成后者"。只有这样，才会成为"文明的开拓者，""以自进自富自强之实力，而进入世界竞争者的行列"。又认为，"今日吾人断不可仍拘泥于东西洋区域的划分，而痛恨欧力的东渐，使东洋自己孤立"。①竭力主张不要听信"东洋之东洋"之类言论，而自己进入列强世界之中，成为世界之日本，"国际协约之一员。"②同时，在论述日本今后的方针时，《每日新闻》认为，日本的实力对付外敌还不够充分。因此在今日，如果"一再引起干涉东洋的事端，会加速强国的行动，更会酿成数倍之不利"。故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宁可退养国力，坐待事局之变化"。③这种意见大体上与当时政府的方针是一致的。它又和主张在日本的国力得到充实以前，必须极力保全中国，为此应由日英结成同盟，努力使德诚势力今后不得再扩大的日英同盟推进论相关联。

《国民新闻》也有同样的论调。1月11日的《国民新闻》反对近卫笃麿在《太阳》上发表的同人种同盟论："由于中国与我们属于同一人种，而结成人种同盟对付欧罗巴，这种理论很容易迷惑人。……然而，这种同人种同盟实际上是十分危险的理论。如果日本果然以欧洲诸国为敌，后果如何将不堪设想。"④接着，在1月13日指出，从军事力量上来看，如果缔结日英同盟，可以确

① 《每日新闻》，明治31年5月22日，《维持东洋和平的两种方法》（社论）。
② 《每日新闻》，明治31年4月21日，《进入列强的行列》（社论）。
③ 《每日新闻》，明治31年2月25日，《对于东亚局势变化日本所持的国策和国民的觉悟》（中）（社论），坂部行三郎。
④ 《国民新闻》，明治31年1月11日，《一种日中同盟论》（社论）。

保巩固的远东和平。① 2月23日，又主张在远东拥有最大利益的三国，即日本、英国、美国，“互相协力，以维持远东的和平”。②尤其是由于日英美三国与中国的独立关系密切，三国作为中国的后盾，“保护中国国境的安全，扶植中国，加强互相了解。”愿意维持和平之各国携起手来，开导与促进中国的文明，发展彼此商业上的利益，这是最理想的方法。③

以上所举都是与政府意见相近的人，即主张当前必须对中国尽量抱冷静客观的态度，与西方的强国如英国和美国携手，等待时机，而决不考虑与中国结成同盟对付欧洲列强。针对这种观点，在《日本》杂志上展开了关于亚细亚联合论的讨论。

4月17日，《日本》在论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时认为，欧洲人常以人种的差异和政体的差异，来决定外交。对人种不同的国家，一有机会就要把它置于白种人国家的统治之下。而对欧洲以外政体不同的国家，则竭力促使其变更政体，然后也置于欧洲的统治之下。对于中国，主要是使用第一种原则，最近又以第二种原则来策划统治中国大陆。而日本虽然受第二种原则的影响改变了政体，但对于欧洲各国施于中国的第一种原则未表示任何抗议，采取了旁观态度。然而，早晚日本也不得不接受第一项原则。④而且，伊藤内阁由于中国迟早要被肢解，因此感到与它交往一旦受到列强的猜疑，就很为难了。虽然企图坐视中国被瓜分，但又认为这是错误的。⑤为什么“他们欧洲人的所谓远东不包括我们日本呢？”为什么他们“对中国、朝鲜有野心，而独把日本置之圈外呢？”虽然日本为了将来参与瓜分中国，正在扩张军事实力，即使自认为已成为西方社会之一员，而西方列强在瓜分中国以后，势

① 《国民新闻》，明治31年1月13日，《远东和平的保证》（社论）。
② 《国民新闻》，明治31年2月23日《日英美在远东》。
③ 《国民新闻》，明治31年3月11日，《再谈远东问题》（社论）。
④ 《日本》，明治31年4月17日，《欧人对外的主张》（社论）。
⑤ 《日本》，明治31年3月7日，《伊藤内阁的对外政策》。

必也要向日本伸手。③至于日英同盟，仅从英国人种不同，对利害的反应敏感来看，就可断定不是可以信赖的国家，不应该考虑轻易与其结成同盟。④

《万朝报》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严厉的批判，认为日本的外交是有利于欧洲人的外交。①而且认为如果日本能真诚地对中国尽到帮助的责任，中国定可抗拒列强的横暴。②关于日英同盟，《万朝报》指出，英国是专事不劳而获的国家。在甲午战争前装出与中国亲密的姿态，日本战胜后，又抛弃中国讨好于日本。而在三国干涉时却没有给予日本任何帮助。今天它对俄国的态度是：只要俄国得一权益，英国不得一权益则不罢休。这样的国家，难道可以信赖吗？③因此，表面上狂热欢呼日英同盟，实际则应提倡“不可误国”。④

这种大陆观的分歧，在对待中国改革运动的评价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下面将要探讨这一问题。

（三） 对改革运动的评价

关于中国的改革运动，日本的报纸杂志以康有为的上书和皇帝的上谕为中心，详细地作了介绍。特别是康有为，是将他作为在甲午战争中高唱主战论，战后又号召青年忧虑中国的现状；提倡改革的志士，同时又作为中国南方的豪杰而加以介绍的。可是在对改革运动的评价与同情这一点上，各报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别。

首先是伊藤系的《东京日日新闻》，表现出相当冷淡的口气。

---

⑥ 《日本》，明治31年2月7日，《欧人东侵的新动向》，（社论）。

④ 《日本》，明治31年8月8日，《关于日中同盟》，

① 《万朝报》，明治31年3月12日幸德秋水，《日本的外交》（论坛）。

② 《万朝报》，明治31年3月19日，幸德秋水，《今日之东洋应如何相处乎？》（论坛）。

③ 《万朝报》，明治31年3月15日，幸德秋水，《英国的外交方针》，（论坛）。

④ 《万朝报》，明治31年6月3日，《论近日之外交》（论坛）。

认为虽然保国会等改革组织成立时，曾企图联合日本以阻止西方各国的扩张，但日本不能无视清廷与列强，而支持改革派。①并主张“我国政府、公使、人民虽然应该尽量给予改革运动一定的支持和声援，希望其它获得或多或少的成功，以尽邻邦之谊，并有利于亚洲大局。……但是必须注意做得稍微谨慎些，其支持声援不要太显眼，以免引起追究。……只有避名取实，才便于实现最终目的”。还说：“我国对它的态度不能太露骨，否则可能反而妨碍大计，以至中途而废。”②另一方面，对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的改革努力，则表示非常高兴。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可以不与顽固的中央政府交涉，而采取对外不太引人注目的招收留学生，用日本人监督一般事业与训练中国军队等方式，作为在这些方面逐渐扩张势力的良好机会。

《国民新闻》为改革的形势而高兴，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教育了中国，说明输入西洋文明知识的必要性，并意识到这种输入通过日本远比通过欧洲为好。它指出：“促进中国人的大觉醒，是我国朝野人士的一大责任。”③而且主张要使中国政府产生经常信任和依赖日本政府的倾向，不论军事、教育以及一般事业，一切事情都应与“日本政府商量。”可是虽然有这种利害关系，但决不是人种同盟。所以在这一点上必须清除世界的误解，而日本国民也应该注意不要误解其目的。④

大隈系的《报知新闻》认为改革运动只是“康有为一派志士奔走各地，鼓吹改革的空喊”，⑤从而否定它的效果。但是，对于中国以日本为改革的榜样这一点，认为是值得高兴的。⑥尤其是像张之洞那样“南方社会有势力”的人物立志改革，“与我邦加强

① 《东京日日新闻》，明治31年6月23日。
② 《东京日日新闻》明治31年7月28日，《中国如何》。
③ 《国民新闻》，明治31年2月8月，《南部中国的近况》。
④ 《国民新闻》，明治31年3月8日，《对远东问题的觉悟》（社论）。
⑤ 《报知新闻》，明治31年7月15日，《中国谈》（上）。
⑥ 《报知新闻》，明治31年8月3日，《中国的醒悟》。

善邻的交往”，更值得欢迎。这些举动对于东洋社会来说，确是一种希望。①

《时事新报》认为中国要跨入文明之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为此最好以日本人为教师。②但同时又对康有为本人和改革的方法表示疑问。例如在皇帝的庇护下，依靠这些地位低下的人的力量，能实现改革吗？而且又批判说，采用这样激进的方法，反倒会引起混乱。③还批判了日中提携论者积极援助改革的主张，指出：“日本人按自己的想法原封不动地在中国试验，将是非常错误的。”④还劝戒说，北京政府的新政不能由日本人来说出。另外，如果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客等交往，主张革命，将会引起北京政府对日本的恶感，中止派遣留学生，甚至全面排斥文明主义。所以对这样的事情，不能不极力注意防止。⑤

《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报知新闻》等的论调和《时事新报》的言论，虽然性质多少有所不同，但是对中国改革运动的成果加以否定的客观分析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同时，在对于那种主张援助改革运动改造中国，并与其合作共同抵御西欧的意见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

《万朝报》认为日本决不能采取如诸列强对中国所取的行为。任何时候也不能乘人之危，而应采取“护理不幸的病人”那样的态度。⑥表现出对这个改革运动的深刻理解。《万朝报》指出，在中国，虽然从咸丰、同治以来就有议论时局者，但从来没有达到目前这种议论的广度深度，提出这么多改革建议。虽然曾陆续采用了进步的意见，但也从未有过象召见康有为等征求改革意见这样的先例。“但是，据与他们接近并与其朝野人士交往了解内情的观察者看来，中国改革的气势尚未足恃。改革派的领袖康

① 《报知新闻》，明治31年8月20日，《中国奋发的真相》。
② 《时事新报》，明治31年5月17日，《转祸为福》（社论）。
③ 《时事新报》明治31年8月8日，《设置制度局之议》（上海通信）。
④、⑤ 《时事新报》，明治31年9月22日，《论中国之改革》（社论）。
⑥ 《万朝报》明治31年5月18日，《我邦对沙市暴动的处置》（论坛）。

有为、汪康年等很年轻，这些人物尚缺乏扭转乾坤的大气魄、大力量。加上中国人民柔惰怯懦之风不易改变，虽然改革的建议层出不穷，但为使其风气大开，尚需及早计议。”①《万朝报》又将这些改革派与当年日本的维新志士加以比较。尽管有人讥笑中国的志士不通外国语，他们学到的西方学问只是一知半解陈旧的东西，不符合西方最新的学说，不足以成为中国的救国之策。可是想一想当年维新前后，我国的志士中懂得外国语、通晓西洋事情的人又有多少呢？把大宝令的复古和新时代的新组织混杂并设，甚至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改革方案远为优越。因此，对清廷的存亡姑且不论，而仅以通晓中国兴衰之事的人士的观察为基础，就否定其成功的可能，这是错误的。②从而给予这次改革运动很高的评价。

《日本》杂志虽然同样高度评价这次改革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又主张不放弃这个机会，必须在日本的指导下实行内政制度的革新。③为此，它还进一步建议诱导他们，如果国家间难以协力合作的话，可以由大陆和日本的志士以个人名义集合，以“人道的进步”为目的组织结社，以挽救亚洲的衰亡，实现“亚洲的亚洲”。近卫笃麿也提倡启发中国，“与之携手从事东洋保全事业”。他主张以“同文同种诸邦亲善”为急务，“东方诸国戮力同心对抗西方势力”。并于这年6月，创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组织“同文会”。⑤

《日本》2月20日报道清政府发布“新设官吏考试经济特科的上谕”时指出，“这岂不是可以视为中国大革新之兆吗！”改革科举制度是为了采用西方学术。“虽然这在我们看来只是普普通通的

---

① 《万朝报》，明治31年9月11日，《中国改革的风气》（上）。

② 《万朝报》，明治31年9月13日，《中国改革的风气》（下）。

③ 《日本》，明治31年5月13日，《应应促进中同内政革新之议》（社论）。

④ 《日本》，明治31年1月24日，福本日南，《为了东亚大陆可兴直率的共济会式的秘密结社》（社论）。

⑤ 《近卫霞山会》，129页。

改革，而且尚未彻底打破科举制度，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是惊心动魄破天荒的改革了。由此特科的设立，虽尚未过分，但如果一旦新门一开，旧门迟早要归无用，可以使向来为八股文条竭精耗神的无数儒生不得不改变志向。"促使顽固的北京政府进行这种改革的，是甲午战争的打击，和民间志士革新舆论的勃兴。"现在政府自己改变了方针，革新的趋势已如洪水决口一样了"。①4月间，其骨干福本日南亲自赴华考察，返日后报告了中国发奋改革的实现。根据他的看法，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本来是为了保障朝鲜的独立，惊醒中国的顽冥，使日、中、朝三国鼎立，以维护东亚的和平。因此，近来中国的朝野产生了与日本亲近并向日本学习的想法。就连张之洞、刘坤一那些过去是主战论的核心的官员，现在也成了热心的日中同盟论者。还有如康有为提出，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也认为，想得到欧美的新知识，不必远行欧美，只要向日本学习就可以了。革新主义的报纸、杂志、译书、学校犹如雨后春笋，社团、学会也不断产生，革新的气氛十分浓厚。特别是广东，简直可以说是站在了明治维新时水户或者萨长的立场。热心者已不用光绪年号而用孔子纪元，自称汉人而不愿称清国人。在发生胶州湾被占领等事件之际，清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抗议，无视建议拒绝租借的张之洞、陈宝箴等人的意见。因此流传有南方的汉人官僚将要独立新王国谣言，这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这样高涨的改革趋势，"其程度如果比起我国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岂不类似嘉永末年安政初年？当时（日本）希望革新者与今天（中国）朝野官民的情况不太一样。当时无论是公武合体论或是尊王讨幕论，无论是水户派的勤王论或是平田派的复古论，无论是象山之流的外交论或是南洲之流的国权论，纷纷相执不下，相竞不相合。而中国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是中国尚未兴起国民的大运动的重要原因。故今日之急务是引导他们合为大同，促进其发展，早日达到庆应初年的地

① 《日本》，明治31年2月20日，《中国大革新之兆》（社论）。

步。”①而这个任务只有我日本才能承担。它主张不要放过沙市暴动的好机会，这使北京政府革新内政，促使各国公使同意协力“胁迫”。如果北京政府不从的话，那就只得使其在列国的压力之下直接革新。他认为通过革新成立的中国新政府的形态，最好是各省独立的联邦国家。②5月16日，更进一步提出，为了建立日本对抗列强势力的均势，不能只靠“割地窘民”的方法。对华政策的要点应是“给予中国革新以原动力”，通过外部的压力，促使中国革新体制，而使这种政策成为维持东亚和平的根本点。③在6月26日的《告宪政党诸君》一文中又指出，“诸君既然以文明国民自居，就必须不仅要在内政，而且要在外交上采取文明国民的态度。如果一方面在内政上期望实现立宪主义，而在外交上却奉行实力论，即雷同于弱肉强食主义。那就只有内受藩阀权家的玩弄，外招欧美识者的嘲笑。”我国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宁，也为了东洋世界的和平，征得列强的同意，首先促使中国政府自己实行革新。”④

可是，在中国，尽管发出进行改革的一次次上谕，而实际成果却不大。事态最后发展到“西太后再次恢复垂帘听政，总揽万机。攀附于此的守旧党充斥宫廷内外”。而且“改革并不容易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已日渐明显”。令人遗憾地感到至今的各种改革也“仅是皮毛的改革，而非实质的改革”。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只是想原封不动地模仿我国的制度，把我国的大学规则原样加以翻译实行等等，而并不考虑在日本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中国不一定适用。⑤引起种种不同理解、在某些方面被期待、而在另一方面又被忽视的中国改革运动，终于在9月21日以失败告终。

---

① 《日本》，明治31年4月15日，福本日南：《日汉之时局》，（论坛）。
② 《日本》，明治31年5月13日，《促进中国内政革新主义》（社论）
③ 《日本》，明治31年5月16日，《对华政策的要点》（社论）。
④ 《日本》，明治31年6月26日，《对华问题如何》（社论）。
⑤ 《日本》，明治31年9月21日，《中国的官制改革》（论坛）。

（四）政变后的中国与日本

西太后恢复训政后，立刻对很多改革派加以逮捕与处刑。康有为、梁启超等经香港亡命日本。光绪帝被幽禁，一时生死不明。1898年6月来，已下野的伊藤博文恰好在漫游中国途中，从9月14日起在北京逗留。政变发生后，日本与英国公使馆一起救出康、梁，并说服李鸿章劝告政府减轻对改革派张荫桓、黄遵宪的处分。然而，日本政府的基本态度是无论新党还是旧党掌握政权，“不偏向哪一派，而仅仅对于作为友邦之中国表示友好”。① 对于这种政策，《日本》杂志持反对态度，认为虽然不应干涉内政，但在主权者将被废绝的今日，不想讲什么救济的办法，难道不违背友好国的情谊吗？尤其是“此时并不是按照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办事的时刻，为解救邻邦中国皇帝的危难，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如果只是投机取巧，怕丧失当今北京政府的欢心，或以张之洞、李鸿章之流的向背行事，那末作为东亚先进国的名声威信，将会丧失殆尽”。②对于政府的态度进行了批判。《日本》认为如果中国被瓜分，那末损失最大的就是日本。其次，以贸易繁荣为首要目的的英国，也会受到损害。因此要和英国协商，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真正有统一力量的政府”。③10月27日，《日本》再次责问政府说：对于这次政变，我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是否竭力劝告北京政府“减少被动”？还是对皇帝的安全做了什么防范？有没有尽力救护改革派？这次的政变本来可以反过来加以利用，以促进中国的“自新”，但由于我国政府放过了这个机会，以致让训政政府巩固基础，而使多年经营积累起来的革新趋势受到重大挫折打击。今后我国为了促进中国的“自新”，应该采取如下方策：（1）

① 《日本》，明治31年9月26日，《中国之政变与鸠山次官》。
② 《日本》，明治31年10月13日，《中国皇帝的危难》（社论）。
③ 《日本》，明治31年10月25日，《中国瓜分与英国》（社论）。

否认训政政府；(2)劝告让皇帝复权；(3)要求采用文明制度。①

与《日本》同样同情中国改革的挫折，非难日本政府对政变处置的还有《万朝报》。《万朝报》虽然没有表现出和《日本》一样的过激见解，但是它对政府的批判更严厉。10月27日《万朝报》指出：中国改革派志士的言论行动与我国明治维新时的志士非常相似。"其议论之峻峭"、"其动作之激切"、"其规画之躁急"等等，常常使守旧派有机可乘。由于他们的方针这样过激粗糙，因此，"我国外务当局的方针，并不指望他们一派的改革取得什么实效，而寄希望于具有伟大头脑、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以有秩序有规律的渐进方针，来进行对种种旧习的刷新。"然而，这种想法无视我国维新的历史，是不了解"国势时局变迁之机"的人的想法。事实说明依靠他们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实行改革是不会有效的。②即使尝试以苟且的手段，进行枝枝节节细小修补，在时势大转变之际，也不得不以大破坏开始，而以大建设告终"。③康有为等的行动虽然确实轻率，但是等经过这个破坏期以后，他们的方针也会变化，又会产生出更慎重有能力的人材。"如果说只从现在维新党的轻举妄动而料其最终成功是所谓愚者的话，那末，不希望其成功的外务当局那种幼稚的说法，岂不比愚者更愚？"《万朝报》进一步认为只有依靠这些志士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我国政府对待他们应取的态度，虽然不一定是帮他们大动干戈，可是如果挫伤了他们的进取精神，阻碍我国国民对他们的同情，那就成了"公道面前的大罪人了"。④

12月11日的《万朝报》介绍了梁启超的政变论。⑤梁启超详述了政变的原因和今日的情形，说明事关东洋的安危及与日本的

① 《日本》，明治31年10月27日，《政变前后的措施》(论坛)。
② 《万朝报》，明治31年10月27日，内藤湖南：《中国改革说的两之时期》(上)。《万朝报》，明治31年10月29日，内藤湖南：《中日改革说的两个时期》，(中)。
③ 《万朝报》，明治31年10月30，内藤湖南：《中日改革说的两个时期》，(下)。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一册，第[illegible]页。

关系，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万朝报》的文章认为“梁的本意并不一定是希望我们做发兵讨伐的无谋之举。而且我们对待清廷，如果不采取强硬态度，恐怕结果也是无效的。我国舆论如果不为这封信所动，“不但是我国民之耻，亦天不助我邦也。”①

这两份报纸还就接受亡命者一事发表了议论。10月14日的《万朝报》指出要“事贵始终”。“由于对他们实现志愿的决心和方略缺乏深思熟虑，单凭一片感情。开始给予厚谊，中间误于手段，后来冷热变化无常，而且把他们当成暴徒使其恼怒，以为海外之累，那还不如开始就不下手呢”。②《日本》10月30日认为，“本来是对清政府抱恶感并可得到亡命者感恩的庇护者，却依靠警官，禁止出入，断绝交通，犹如幽禁囚犯，那还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呢？自己不愿长期收留，稍加处置也觉得很为难，这是何等的陋态啊！”③这种担心终于成为事实发生了。政府虽然表示要保护亡命者，但是为了避免与西太后政府产生外交上的障碍，又于同年末下令驱逐亡命者。

其次是虽然希望中国产生文明主义，可是却严格排除联合主义方法的《时事新报》，采取什么态度呢？10月27日的《时事新报》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很好改革，将会成为其致命伤。即使推翻观王朝而取得革新成功，也会遭到列强的干涉以致四分五裂。而我国期待的是中国的开放和贸易的安全，因此应以保全中国为第一，帮助真正的政府，使其维持统一。④另外，日本的任务虽然是引导和保全中国的独立，但是在有的场合，也宁可失去中国的欢心而与列强协同行动。如果现在中国过于反动，就必须加以制止，而使其进入文明之门，这是按照列强的意图办事的。⑤虽然有的报纸将康有为作为大人物来报道，但

① 《万朝报》，明治31年12月10—11日，内藤湖南：《读梁启超的政变论》。
② 《万朝报》，明治31年10月14日，《期待始终》。
③ 《日本》，明治31年10月30日，《责向政府对中国的措施》（论坛）。
④ 《时事新报》，明治31年10月27日，《对华之大方针》。
⑤ 《时事新报》，明治31年10月13日，《良药不可强服》，（社论）。

《时事新报》并不那么看。由于康不注意改革的方法，失败是必然的。它还警告说，如果日本人对康的亡命轻率地表示欢迎，将会给日中之间的外交带来不利的影响。①

最后，《东京日日新闻》认为这次政变最令人担心的还是其国际关系的背景，也就是西太后一派是否以俄国为靠山的问题。不过至今两者之间似乎还没有达到那种关系。②无论改革派执政还是守旧派执政，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外交的核心在于保持我国的权力和利益，不要受其内部事务的牵连，而陷入危险的政策。"③《东京日日新闻》还认为，我国在中国之所以有较大的发言权，不是由于人情风俗的一致与同文的感情，而是两国利害关系最大，中国遇到大事情不得不依赖我国。④中国为要实行改革，需要制订友邦一致，保证中国的财政，保证防止内乱的政策。至于当时是改革派还是守旧派掌握政府，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将来友邦可以共同开发中国，帮助中国文明进步，同时中国也能很好保全自己的利益。这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⑤而且，现在我国希望中国，首先是保持政治上社会上的安定，其次是为追求物质的进步，[illegible]与世界国民共同需要的资源。我国正致力于避免列强之间互相冲突。通过列强的协调，支持北京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以必要的资金和兵力援助北京政府进行兵制改革、财政整理和机构改造等等，这是今日之要务。⑥

《时事新报》和《东京日日新闻》的意见认为中国的改革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本来和日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英国、俄国借此纠缠，当另作别论。日本不太喜欢亲俄的西太后政府。尽管如此，如果支持改革派进行过激的运动，造成政局不安，不

① 《时事新报》，明治31年11月16日，西郡宗三郎，《论康有为》（北京特报）。
② 《东京日日新闻》，明治31年10月19日，《北京的形势》。
③ 《东京日日新闻》，明治31年10月26日，《对华政策》（上）（社论）。
④ 《东京日日新闻》，明治31年10月27日，《对华政策》（下）（社论）。
⑤ 《东京日日新闻》，明治31年10月16日，《北京及其友邦》（社论）。
⑥ 《东京日日新闻》，明治31年11月26日，《现内阁和中国问题》（社论）。

久就会引起列强的介入，导致瓜分的局面，这是令人担忧的。改革派亲日当然是好事，可是，如果完全以日中同盟的身份、言论来进行改革，就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麻烦。这和前面谈到的《万朝报》、《日本》的联合主义、国权主义的意见正相反。这说明，甲午战争后，经过三国干涉，日本的统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大陆观逐渐朝两个方向分化。

（五）关于政府的见解

根据以上所述的各种意见，已经可以说明日本政府对于改革运动与改革派人士的态度了。1897年来，第二次松方内阁倒台，代之以第三次伊藤内阁。而这个伊藤内阁又于1898年6月辞职。自由党和进步党在6月联合成为宪政党，于是我国首届政党内阁大隈内阁成立。然而，大隈内阁也由于宪政党内部的分裂和反对政党内阁的山县派势力的策划，仅仅四个月就垮台了。11月又成立第二次山县内阁。

无论这些内阁如何变迁，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没有显著的变化。由于对于从占领胶州湾开始，德国、俄国、法国等强租中国要地的行为，没有任何抗议，甚至威海卫也被英国占去，因此，伊藤内阁受到严厉的攻击。可是，连大隈内阁也没有对大陆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日本》认为大隈是对外强硬的祸首，而板垣则是人权自由的倡导者。另外，各大臣还攻击伊藤内阁对于维持东洋和平与权力均衡无所作为。《日本》非难政府说，可是自己执政的内阁又怎么样呢？当中国的改革顺利时，宣传以自己的力量进行改革。但是经过政变，改革已经全部失败了，却还在说“期待中国的改革能逐步成功”。那末，究竟期待什么样的改革呢？①

对于中国的改革运动，日本政府虽然没有发表什么正式的见解。但是，由于改革派对日本表示好感，对于改革前进的方向，

① 《日本》，明治31年10月16日，《中国政变记》（论坛）。

希望得到日本的指导和援助，因此也曾考虑对此积极地加以利用。当时，"北守南进说"有较大市场。这种观点认为，与其从朝鲜向满洲扩张势力范围，还不如以台湾为基地，向对岸大陆南部扩张势力。因此，也为中国的南部人士产生改亲革日的气氛而感到高兴。于是，积极地影响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例如1897年11月，陆军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与张之洞面谈。神尾等多次访问张之洞，通过谈判，达成由日本帮助中国建设新式军队，派日本军官训练中国军队，中国派学生去日本留学等协议。①日本还通过驻华公使矢野进一步向中国总理衙门提出了关于中国学生来日本留学的建议。②于是，决定从湖南、湖北派二百名学生留学。类似这样对中国的工作，尽可能不通过中央政府，而直接与地方的总督巡抚接触，企图在他们的权限范围内得到实现。而在日本方面，出来交涉也尽量只限于个人身份。政变后，日本政府担心表现出这种亲日态度的中国地方官僚被当作改革派而被革职。驱逐康有为与梁启超，也包含着这种考虑。张之洞在政变后申辩说，他与康有为的主张完全不同，康有为当作自己的功劳而吹嘘的改革运动，实际上是从同治时代起就由西太后等进行的。这次的新政改革虽然没有恶意，但是重用康有为一派却是错误。而且，日本如果保护康有为等，日本与自己的交涉就会受到中央政府的阻碍。于是，很快提出了驱逐他们的要求。③日本政府恐怕保护亡命者会引起与清政府关系的变化，同时也担心与张之洞的关系恶化，而且又怕使张之洞在中国的处境发生危险，因此急于驱逐亡命者。

这样，日本政府担心支持改革派的亲日态度反而会损害自己

① 沈镜如：《戊戌变法与日本》，《历史研究》1954年6期。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152页。

② 《时事新报》，明治31年6月2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

③ 《外务省文书》，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政变的状况（一），明治31年12月12日，机密第69号，《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近况并关于政变等意见的报告》，附录甲"康有为的事实"。

的利益，因此除了与英国等协同行动以外，极力回避涉及与政变有关的问题。例如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认为中国的现状被看作是排外的，为国内的有识之士所鄙视。照这样下去将来中国的存亡就是可虑的。矢野在与庆亲王等中国政府大官通信时指出："作为我国可尽善邻之谊，试以忠言相劝。……如果不能容我忠言，劝告无望时，则我国亦可根据情况处之。故今日首先当尝试忠告，以了解其对于改革主义到底执意如何，是否值得相助。"而且，矢野还劝告不要黜免改革主义的人物，不如索性任用他们，以显示政府的方针并不完全是守旧的。"①矢野恐怕清政府的排外政策使国内发生排外暴行，会成为列强出兵镇压的口实。同时也担心以后亲日的改革派会被革职逮捕。矢野公使的这种忠告被本国外务省看成是过分的行为而受到非难。都筑馨六外务次官认为："如本件涉及内政的劝告，徒伤当局者之感情，有何效果？采取改进主义还是守旧，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只能以我国的利害为唯一标准，来利用这些机会。"②这是代表当时的政府与外务当局见解的典型言论。

最后，关于在政变当时恰好在北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伊藤的中国之行，在出发前就有各种各样传闻。传说此行恐怕带有一定的任务，因此受到怀着不同意图的中国的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欢迎。③伊藤在政变前夕的9月20日，会见了中国政府的四名大官，谈到了关于中国改革的问题。④伊藤对清政府大臣所谈的意见是格外慎重的。⑤他说，"事情要比较轻重缓急，不误顺序，渐次实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717页，矢野驻华公使致青木外务大臣函，《给庆亲王私信试以反复忠告件》。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17页，矢野驻华公使致青木外务大臣逐，函，栏外注记（一）。

③ 《时事新报》明治31年9月10日，《小话一题》。《时事新报》明治31年10月8日《伊藤侯的来到》，（北京特报）。稻田正次：《关于戊戌政变》，仁井田陞编《近代中国研究》（1948年）。

④ 伊藤博文文书（宪政资料室藏），《伊藤博文中国之行关系资料》。

⑤ 《东京日日新闻》，明治31年11月16日，《伊藤侯游清余话》。

行。”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初犹抱守旧固陋之见者”，经过“不得不实行新旧参半的政策，”渐渐根据利益所在实际执行的结果，也逐渐改变了“冥顽不灵的精神”。特别是不能完全采用新进气锐的改革家的主张，断不能有“轻躁的行为”。在此前一日，即9月19日，伊藤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会见了康有为。改革派的人士倾听伊藤对于改革运动的意见，并希望对西太后等守旧派施加压力。可是，伊藤对康有为的态度却相当冷谈。①针对康有为请求谈谈关于改革的经验，伊藤回答：“应该扫除自尊自大之陋习，切勿自称中华，而称他国为夷狄。”康有为说：“君侯为何如此轻蔑敝国？”本来是为了听取大学专门学科的道理，结果却只教以如同假名读法那样初步入门的知识，因此使康感到愤愤然。以后在两人的谈话中，康有为告以皇帝没有全权，而皇太后昧于内外情势，还未觉察到中国已经陷入危机。伊藤却只是随声附和。恐怕伊藤已从公使馆听说了这个改革运动进行的状况，②感到由于康有为一派的无谋，会引起中国国内的混乱。伊藤又认为中国的存在，只有依靠列强力量的均势才能保住。如果从内部下手改革，会招致列国的介入，加速瓜分。而当时的日本是以保全中国为第一要务，如果要实行瓜分，也希望能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结　语

自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朝野对于东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见解，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作为东洋唯一的文明国、独立国，应该走上脱亚之途，像西欧列强那

① 《日本》，明治31年11月1日、2日，《伊藤博文与康有为的会见》。

② 《外务省文书》，各同内政关系杂集、中国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政变的状况（一），明治32年1月23日，机密第十一号，《中国政变前后见闻的报告》，其中有北京公使馆中岛雄二等书记官的报告。而中岛书记官向伊藤提供的，也是同样的报告。

样对待东洋。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西方对东洋的侵略面前，日本应该与中国提携，或者积极地通过日本之手来改造中国，并与其合作共同防御西方，实现“东洋的东洋”。

这些见解经过甲午战争，随着列强共同加紧对中国的扩张，区分已经变得更为明显了。在围绕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中，一再反复强调“慎重又慎重”的政府，也在1900年与列强一起出兵镇压义和团，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在1902年缔结了期望已久的日英同盟。这样，日本就名符其实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了。①日英协力保全中国，把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向全世界均等开放。这样，虽然大体完成了脱亚的道路，而另一方面，亚细亚联合论，作为“东洋的盟主”的使命感，又作为机会主义的膨胀论，也越来越活跃起来。完成文明化的日本给非文明的中国带来文明的想法，又从“东洋的东洋”向“日本的东洋”的观点转化。日俄战争以后，迎来中国的革命时期，这些见解又作为帝国主义的大陆扩张论的各种各样形态，在现实的大陆政策上表现出来。

译自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杂志》六卷二号（1966年）

王晓秋译　陈　选校

① 《时事新报》，明治35年2月14日，《日英协约的效果》（社论）。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中两国的现代化

依田憙家

前　言

——国内统一市场问题

鸦片战争后，为什么日中两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有很大差异？这个问题虽然提出已久，但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解答。

一种观点认为，其原因是中国社会的极大“特殊性”和由此产生的"停滞性"。但是，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决不是“停滞”的国家；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化的例证也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各国前资本主义的特点共同决定其“国民的”类型。在进入资本主义以前，不同的社会形态，固然对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及其向现代国家转变有很大影响，但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欧美各国的压力，当时主要指向中国，所以它们对日本的压力相对减轻了。诚然，目前外交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远东政策主要针对中国，欧美的对日压力因此而减弱，可以说，日本是在印度和中国成为牺牲的情况下，实现了独立和现代化的。可是，中国当时为何不能有效地抵抗西方的压力呢？这个问题也应该同时加以探讨。有人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日中两国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认为十九世纪初日本在这些方面都处于更为先进的阶段。这是过去关于“真正

的工场手工业论战”的根本问题之一。然而，根据现在日中两国的研究成果，当时中国浙江省、江苏省、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和广东等地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以及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未必低于日本。所以，它不能成为产生两国现代化差异的原因。

那么，两国出现差异的主要（即使不是全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产生两国现代化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形成国内统一市场方面两国情况不同。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速度差异的前提，不仅要考察各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状况，还必须研究这些经济因素的结合达到了何种程度。

十九世纪后半期，日中两国政治形势不同。与日本的一直趋于统一的方向相反，中国始终趋向于分裂。日本在幕藩体制之下，尽管其统治形态分为多种层次，但在幕末已产生了全国统一的趋势，此后基本不存在国家分裂的危险。史称“戊辰战争”的内乱短期内即告结束，“西南战争”等地方军事势力的叛乱很快被平息。在中国，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几乎使清朝统治机构崩溃，随之产生的镇压革命的主要势力湘系、淮系早期军阀加重了分裂的趋向。这种分裂的趋向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存在，形成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直到第一次大战后的北伐战争，才开始趋向统一，终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统一。笔者认为，造成两国不同政治局面的原因，在于是否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众所周知，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大致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并将蝦夷和琉球包括在内。统一市场是形成国民国家、民族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与基础。日本在幕藩体制下虽然统治组织分散，但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经济已纳入统一市场。在这一基础上更趋向于要求统一国家。当时，“尊王论”的内容之所以发生变化，要求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原因就在于此。在这个前提下，日本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族形成，以及国民国家形成方面都先于中国。本文将要论述日本虽然也有买办，但由于上述原

因，却没有象中国那样成为买办资本，占据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以此为背景，“五四运动”最先增强了民族意识，北伐革命使地方军阀趋向没落，进而强烈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1936年的币制改革是全国统一市场建成的一个标志，新中国也建立在全国统一市场成立的基础上。

既然将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日中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归结为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差距，那么，产生这一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受交通工具的制约。日本较之中国，只拥有远为狭小的国土，且四面临海。因此，即使在当时交通工具的水平上，也容易建立统一市场。中国的国土远比日本辽阔，且为大陆国家，依靠当时的交通工具未能建立统一市场。联结南北的大运河和沟通东西的长江等水路运输，虽然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运河的主要作用在于把南方的贡赋（掠夺到的贡米及其它物资）运到首都。江苏和浙江等长江下游地区的制造业，由于大米仰仗湖北和湖南等长江上游地区，为发展长江流域市场带来重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阶段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地方市场，反而成了买办资本和地方军阀政权得以存在的基础。

由于沿海和内河轮船航运及铁路等交通工具的发达，全国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变法派希求强大的中央政府，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开端，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过程终于完成。

第一章　统治体制与人民斗争

1 统治体制

日本幕藩体制建立在战国时代诸侯领国制的基础上。由最大

的诸侯德川氏取代臣丰氏称霸后所建。幕藩体制已经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直接统治农民的制度，采用了多层次的行政方式。土地分封制与统治机构的世袭制，是幕藩体制最大的特点。在幕藩体制下，全国土地基本分为幕府领地和各藩领地（还有皇室、公卿、寺院和神社的领地）。幕府领地再按等级分成幕府直辖地和"旗本"（德川将军家的直属家臣——译者）统治地，藩领地再分为藩直辖领地与家臣俸地。本来，幕府及各藩是战斗集团，是军事结合方式。随着和平时代的长期延续，逐渐行政机构化了。幕藩制社会可谓典型的等级制社会，不仅在统治阶级武士与被统治阶级农、工、商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就连在武士这一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阶层，按血统世袭原则加以维持。因此，各级统治机构也根据世袭原则组织，上自幕府下至各藩，统治机构成员无一不按门第任命。幕藩体制具有相当高的组织水平。幕府用动员军役（以动员军事力量为主）的方式统治诸侯，除了进行强制性的"轮换参觐"（诸侯每年必须离开领地在江户居住3个月，妻子长住江户作人质——译者）、"改易"（处罚手段之一，取消武士身份降为平民——译者）、"转封"（处罚手段之一，调离原来领地，改封边远或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译者）等手段统治以外，幕府对各诸侯并不行使上级征税权，许可各藩存在独自的军事组织和领地统治，使其处于半独立状态。

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推翻明朝以后，1644年割据东北的满族地方政权开始向山海关以南发展，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王朝。因此，它具有许多少数民族王朝的特点。最初，中央的军事和政治大权属于内阁，1732年（雍正10年）军机处成立后，大权移交该处。在加强皇帝独裁制的同时，满族掌握了政权中枢。清朝统治者为了争取汉族统治阶级的合作，形式上又不得不采取满汉并用政策，任命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及户、吏、礼、兵、刑、工各部长官即各部尚书。然而，满族官吏常常掌握实权。地方最高长官总督和巡抚情况相同，普通的州县官职则全由汉人充任。对于汉

族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清朝是安定的势力，他们为了镇压农民造反、重建封建秩序，在明朝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崩溃之际，将满族地方政权迎接入关。因此，满族与汉族相比是极少数，清朝不得已采取满汉并用政策，统治机构和制度具备中国王朝的全部特点。然而，少数民族的统治加剧了国内民族矛盾，亦成为推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朝是中国封建史上空前集中统一的政权。清朝承袭了明朝高度集中的统治方式，各省主要官吏和省以下各级地方长官乃至各县长官，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与封建社会末期现代国家的前提——"绝对主义"国家，必须严格区分开来。"绝对主义"国家产生在国内统一市场的基础上，依靠交通工具发展中央集权化。可是，就当时中国版图的范围来说，是不可能有这种中央集权化的。各级地方官除了征收法定的上缴国家的税款外，还能够加征纳入私囊的一部分，明清两代称之为"火耗"。政府支付给地方官吏的薪俸极为低薄，从这一点考虑，征收"火耗"与其说是渎职，莫如说是地方统治者所拥有的一种下级征税权。康熙皇帝也说过，一两正税外征收一分（百分之一）的"火耗"是合理的。①实际上，"火耗"的征收甚至高达十倍，尽管如此，也被认为是合法范围的征收。因此，可以说，这一制度是根据各阶层的封建统治方式，在一定期限一定范围内配备领主的、某种意义上变相的领主制。清朝统治制度是形式上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前提——统一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尚未提上日程。

变法运动的思想家康有为，1888年著《上清帝第一书》，论述移植现代工业，设立现代学校乃当今之急务。他指出，实现这一目的的障碍是，"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页。

级难通”，①主张效法俄国彼得大帝之改革与日本之明治维新，实行变法。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横滨发行的《清议报》上连载“积弱溯源论”一文，论述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说：“昔日本将构衅于中国。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国之大，疑势力之不敌者。日相伊藤博文曰，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吾何畏焉。乃果也战端既起，而始终以直隶一省敌日本全国以取大败。非伊藤之侥幸而言中也。中国群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于天下矣。又岂惟分为十八国而已。彼各省督抚者，初非能结合其所治之省而为一群也。”②清朝机构的松驰固然是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但它标志着当时的机构本身距离现代中央集权甚远。所以，变法思想首先必须提出统一的主张。鸦片战争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内战中，湘系、淮系割据势力一经结成政治集团，便以此为背景开展了“洋务运动”。直至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完全破产后，才出现了实现中央集权国家的要求。所以，清朝“高度的中央集权化的封建专制政权”，是变相的领主制，是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前身中央集权国家的。③

2 科举制与世袭制

依靠科举制录用官吏是中国变相领主制的支柱。当然，其中有许多徇私的余地，晋升官职多靠婚姻与金钱关系③。虽说如此，统治机构不用血统制和世袭制，而采取考试制度，这是与日本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

② 《清议报全编》第4册，横滨新民社辑印，第14页。

③ 以前认为，变法派与孙文都有资产阶级思想，前者为改良，后者为革命。但是，研究变法派的主张，似可认为他们的目标毋宁说是为了实现以清朝为主体的绝对主义国家。他们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不也是以此为目标吗？当然，变法派也有要求建立议会等超越绝对主义范围的主张，然而就其政治路线来说，可以认为他们的目标是以清朝为主体的绝对主义国家。他们与孙文对立的本质不正在于此吗？

不同的一大特点。

这种统治机构的许多方面不同于日本。首先，不按血统世袭制而采取考试制度，开辟了从全国各阶层集中起用干才的道路。科举考试的被录取者当然不可能出自贫民百姓，但有可能出自拥有一定地产的地主家庭。地主子弟即使家财万贯，若科举考试不合格也只能滞留在“土豪劣绅”的社会地位上，不能成为统治机构成员。相反，即使是家资单薄的地主子弟，凭科举考试的优异成绩也可能成为国家最高官僚。这条靠考试开辟的用人之途，是封建统治制度合理的一面，它使统治机构可能由统治阶级中的干才组成，是有效地维持封建社会的制度。同时，维持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却反而成为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强大障碍。第一，正因为这一制度有其合理的方面，全体封建统治阶级都深深地眷恋这一制度，热衷于维护这一制度。日本的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出身于下级武士，他在回忆幕藩体制所采取的血统制和世袭制时，激烈地批判说：“对于我来说，封建门阀制度是不共戴天的仇敌。”① 清末封建统治者们对于现行制度的眷恋远较日本强烈得多。第二，统治机构录用人材的合理性，阻碍了人才向其它方面发展，使许多有为青年埋头儒教经典和内容贫乏的八股文学习。与此相反，在统治机构血统制、世袭制原则下的日本，研究新兴的学问洋学，是摆脱下层地位最切实的途径，许多有为青年转向洋学研究。由此似能部分地说明，为何日本幕末出现了下级武士的团结，并成为巨大的势力，而中国却未能形成类似的力量。日本在统治机构非合理性构成的前提下，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固定不变，“下级”容易团结起来，对抗“上级”，也容易发生对现行制度的批判。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尊王”论中包括“作为天皇赤子平等”的因素，下级武士也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中国在统治机构合理性构成的前提下，等级不易固定，“下级”上升为“上级”的道路敞开着。在这种制度下，“下级”统治者未能团结起

① 《福泽谕吉自传》。

来，而且，全体封建统治阶级——包括“上级”与“下级”，较之日本，远为强烈地眷恋着现行制度。①日本幕末尽管有幕府统一国家的动向，但倒幕运动终于胜利了。反之，在“易姓革命”的中国，清末的洋务派和变法派却一贯支持清朝继续存在。

3 有“藩”与无“藩”

清朝统治制度下不许存在日本式的“藩”。如前所述，集中制的封建统治制度从统治机构来看，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一旦中央权力衰弱，就难以形成取代旧政权的强大政治力量，也不能在中央政权之先发展或竞争地方产业，培育新技术。日本幕末若干藩先于幕府开发新产业，奖励洋学，并且有许多藩效仿之。明治初期绝对主义政权的原型，即在幕末强藩中形成，新型国家及许多产业，亦由幕末藩政改革的推进者和倡导者运筹，因此，当时“藩”的作用值得肯定。

中国远在明朝受农民斗争打击崩溃时，关内就没有形成取代明朝的强大力量。汉族封建统治者把东北的满族地方政权迎接进关以代替明朝。在清末太平天国农民斗争中，清朝正规军溃灭后，也只能依赖湘军和淮军等私人军队。这些势力虽能称为一种“诸侯”，但湘军和淮军却不具有日本幕末“藩”较为巩固的统治地区和主从关系②。它们寄生于清朝统治机构，依靠外国势力支持，因而不能取代清朝在全国制威定霸，创建新国家。

4 人民斗争

在这一阶段上，农民斗争是两国人民斗争的中心。两国的农民

---

① 胡绳先生说，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虽然深刻，但两者“在基本阶级利益上终究是一致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00页。

② 在现代社会中，不靠主从关系固然可达到巩固的结合，但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思想。太平天国以纲领和部分宗教代之。日本在一定时期内，最初用对藩主的主从关系，后来用对天皇的主从关系意识代替。湘淮军阀没有巩固的结合基础是个薄弱环节。

斗争都在这一时期激化了。始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斗争，席卷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一直持续到1866年，捻军的斗争（亦可视为太平天国斗争的延续）又继续到1868年。日本幕末农民斗争同样激化，尤其在幕府崩溃前夕的庆应2年（1866年）、庆应4年（1868年），全国农民斗争空前高涨，斗争高潮一直持续到废藩置县。

比较两国同时期的农民斗争，必须承认斗争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斗争拥有统一的司令部和军队，日本幕末的农民斗争全然皆无，这是最大的不同点。其原因在于，清朝封建组织集中化，反之日本幕藩体制封建统治组织采取多层次的统治机构。

再看两国农民斗争的相同点：这一阶段的农民斗争都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太平天国革命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虽然由于连续战斗，这一纲领未能充分实行，但纲领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后来，太平天国又提出了"资政新篇"等具体政策。"资政新篇"包括许多内容，中心点是依靠轮船、火车等建立全国交通网，奖励开发产业，设置金融、邮政和报道机关等等。可以断言，它指出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它通过土地革命形式，表明了亚洲近代变革的形态，这是极其珍贵的。①

由于多层次的日本统治机构的缘故，明治维新时期的农民斗争，没有太平天国斗争提出的那种统一的纲领。因此，必须搜集当时各地农民斗争提出的要求，进行全面研究。

庆应4年（1868年）10月15日至月末，从会津藩到越后的蒲原郡，爆发了"改变世道"群众大起义，斗争提出了近乎全面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召开大会，协议提出焚毁封建统治的依据土地帐(地契)，免除租税三年，平分土地，有些

① 关于"天朝田亩制"和"资政新篇"的关系，中国学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前者表明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斗争激化，后者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纲领。

地方还无偿收回了当死的土地。① 此外，在要求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还提出要求商品生产和销售自由，一起改换村吏，进行包括“小前”（贫农——译者）在内的选举等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明治维新时期全国高涨的农民斗争，本质上大都要求“改变世道”。笔者认为，幕末农民斗争的基础是要求土地革命，进而又提出资产阶级的变革要求。当时，日本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在它逐步解体的情况下逐渐向地主土地所有制过度。因此，土地革命要求表现为重新分配土地，拒绝向领主缴纳贡赋和向地主缴纳佃租，以及大幅度地降低贡赋和佃租。此外，还要求自由种植农作物，自由销售农产品，营业自由，乃至废除“庄屋”（村吏——译者）组织等封建统治的基层机构。笔者认为以往史学界中争论的“改变世道”斗争的本质就是土地革命。幕末维新斗争中，从地区性全体农民为主的阶段过渡到以“改变世道”起义为主的阶段，指出这一现象是正确的，然而，应该认识到，这一现象的本质是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革命形势的发展。例如，明治维新时期，信州佐久郡的农民依田铁之助，参加了“草莽”（浪人、志士等身分低下者——译者）领导下以农民为骨干的独立活动的赤报队。赤报队标榜贡赋减半遭到镇压后，依田铁之助又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于明治初年提出了土地国有、平均分配的建议书。②这一事实表明，土地革命是幕末维新时期农民斗争的动力。

鉴于上述各方面，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还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农民斗争，其形态各异，但在通过土地革命形式要求现代变革这点上，却有其共同的本质。亚洲的农民斗争，对于现代变革具有特殊意义。西欧中世纪就发展起城市资产阶级的势力，资产阶级的斗争对于现代化起到决定性作用，表

① 庄司吉之助，《会津改变世道研究》。

② 参见拙文《明治57年的土地国有和平均分配论》载《日本现代国家的成立与革命形势》。

现为“资产阶级革命形态”。①在中国与日本，封建社会的商人即使经济上积累了巨富，但资产阶级的团结独立与思想上的成长相当落后。日本到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力量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在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软弱的资产阶级。两国均在国内资本主义萌芽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被外来压力推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的资产阶级尚未充分发展，无产阶级也没有产生。因此，亚洲的现代变革，以农民的土地革命斗争为基础，②表现为“土地革命形态”。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农民斗争、以及略迟一些的朝鲜甲午农民战争，都属于这一范畴。以上是这一时期变革的底流——人民斗争的本质，它使旧社会摇摇欲坠，各种力量登台活动，适应各自国家的情况，完成了不同的历史进程。

两国本质相同的人民斗争全都失败了。然而，败北之时，中国继续存在着从属于外国势力的旧政权；日本的旧政权垮掉了，代之以以强藩联合为中心成立的统一国家，进而经过自由民权运动，建立了明治立宪制。③总之，人民斗争同样地失败却产生了巨大的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如前所述，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当时欧美的侵略矛头主要指向中国；（2）日本除幕府政权外还存在若干强藩势力，它们联合起来取代幕府，占居统治地位；（3）强藩内部与门阀势力及其顶点幕藩体制抗争的下级武士力量，实现了以藩主为代表的集权体制；（4）日本比中国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早，成立统一国家的要求强，同时也具备了这一条件，等等。

---

① 参见《日本现代国家的成立与革命形势》一书。另外，笔者认为，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形态”的资产阶级变革。

②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及其它论著中谈到，土地革命的要求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措施”。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145页。

③ 笔者下面将要论述明治立宪制的本质是“波拿巴主义”。

第二章　日中两国的思想状况

1　朱子学说世界观的瓦解

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日本思想界中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这时有篷勃兴起的新尊王论、国学、洋学，还有安藤昌益批判封建统治本质的思想等等。中国在同一时代里，虽然在考证学中出现了合理的精神萌芽，产生了承认封建统治崩溃，承认乱世征兆的的思想，却很少有代表新方向的因素。仅仅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中，才能看到展望新社会并指明新方向的思想。太平天国被绞杀后，虽说出现了各种改良要求，但是，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运动”后的时代里，思想界才出现活跃的发展状况。

中国之所以不能较快地摆脱儒教，尤其是朱子学世界观，原因是这种世界观与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也与统治阶级对现行统治制度“合理性”的眷恋结合在一起。在科举制度刚刚成立的唐代，门阀势力尚强，道教崇拜亦盛，到宋代建立了集中的封建统治体制以后，儒教，尤其是朱子学说就在统治阶级中间占据了绝对优势。就是说，对于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绝对信赖，同对于现行制度的信赖相结合了。因此不能轻易摆脱。鲁迅说过，清初的学者自由地论说唐宋，搜寻明代遗闻，文字狱过后，便专就研究误字争论了。①清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几次大搞“文字狱”，实行思想统制。所以，虽然可以承认清代发达的考证学有其近代合理主义的萌芽，但这也不过变成了鲁迅所说的缺乏生气的东西。鸦片战争前夜，预言家龚自珍认识到当时趋向崩溃的社会现状，就步步进逼的统治危机预言道：“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②。他认为当时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农民破

① 参见《鲁迅书信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34页。

② 《尊隐》，《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页。

产与地主极端的土地集中，主张效仿王安石改革。用授田法缓和贫富差别是其方法之一。龚自珍认为，历史在不断进步，一个时代必然为下一个时代所代替，封建社会的崩溃已成现实。他朦胧地意识到，土地问题对于亚洲的现代化有着根本性意义，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位着时代先鞭的思想家，然而他对社会现状绝望已极，逃避现实，后来沉溺于佛学之中。

日本的尊王论

另外，这一阶段两国思想状况中最大的差异是，日本有以尊王论为代表的向往国家统一的强大思想支柱，而中国似乎没有这种思想。日本自古以来就存在“皇统永存”的意识，一到江户时代便与朱子学说的名分论结合起来。前期的尊王论主要通过增加朝廷的尊严，达到为幕府增加权威的目的（因为幕府是由朝廷委托的政权）。但是，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新尊王论抬头，转化为希望“王政复古”的思想。1757年的宝历事件和1767年的明和事件表现出尚未成熟的尊王论思想，在实践方法上多有道德的、唯心的因素，却给幕末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是尊王论变化的根本所在，它希望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把君权神授论作为加强统一王权的理论根据。日本则依靠传统的“皇统永存”思想影响，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权。此外，国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皇统永存”思想。

上述思想在趋向建立统一国家的时代里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十八世纪后半期之所以未能产生这一思想，即是因为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建立，统一国家尚未提上日程。虽然变法运动中首次出现了建立清朝强大的统一国家的思想，标志着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已开端绪，但毕竟失败了。而且，要求清朝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可以认为日本幕末的尊王论在树立统一国家中心这点上起到一定作用，促进了国家统一。然而，正如君权神授论在历史上起到反动作用一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君主神

圣论也产生了极其反动的历史影响。

2　洋学与对外意识

日本洋学

洋学（通过学习、翻译和研究西方书籍等积累起来的西方科学文化——译者）在江户时代后期的学术界中占有特殊地位。鸦片战争前后，欧美对亚洲加强压力之际，日本已有近百年研究兰学（日本在锁国条件下，通过学习、翻译和研究荷兰文书籍等积累起来的荷兰及西方的科学文化——译者）的历史，关于西方科学技术和其它情况已经积累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对于应付欧美各国和开港后发生的近代化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

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盛行洋学有以下三个前提准备：

1.汉学尤其是朱子学说逻辑思维的发展与朱子学说世界观的瓦解；

2.江户时代前期完全接受了明代的科学技术；

3.江户时代前期关于西方的知识。

对兰学发展起到划时代作用的兰学家杉田玄白，指出兰学之迅速发展“实为汉学开化人们见识后所兴之事……”。①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说代替原有的佛教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本来朱子学说的使命是将封建等级秩序正统化。但它主张“穷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成为日本产生现代思想的重要因素。此外，批判朱子学说的阳明学和古学等学说的出现，对于发展思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古学，把朱子学唯心的“理”的概念作为客观规律的“条理”，这一点可以说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早在兰学盛行以前，荻生徂徕就讲过“学问即要广收一切，扩张已之见识”，②这就是抛弃朱子学说学问观的标志。同时它还

① 杉田玄白，《兰学事始》。

② 《辩名》。

表明学术能够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科学技术及其它领域的研究也得以作为“学术”独立存在，这是很有意义的。

江户时代前期，日本各个领域都热诚地接受了明代科学技术。例如，天文学领域在授时历的基础上改历；数学领域学习天元术并发展为和算；农学和农业工程领域研究《农政全书》，出版了《农业全书》等一系列农书；医学领域通过研究《本草纲目》在日本发展起本草学，还有古医方的发展等等，不仅接受了明代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而且使其部分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近年来欧洲的研究成果表明，明代科技水平非常之高，①掌握了它便为学习和发展洋学打下了基础。若无这一前提，就不可能有以西方科技为主的洋学的发展。尤其在医学领域中，否定了以宋学的性理说为根据的、阴阳五行五运五气论的唯心医学，产生了以实证主义为根据的、标榜“亲自实验”的“古医方”。山胁东洋和小杉玄适宝历4年（1754）在京都进行人体解剖，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解体新书》。在此之前，日本虽然也翻译荷兰医书，施行外科手术及使用药品，但《解体新书》的问世对发展日本医学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仅解决了医术问题，还成为基础性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洋学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海外知识，它使人们认识到日本是世界之一国，把西方各国视为夷狄是错误的，认识到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这对于以开国为出发点的日本近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幕末，洋学的影响仍然受到限制。如前所述，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虽然对近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关于西方近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介绍却遭到严加取缔，不得不留待明治以后解决。

洋学从研究科学技术出发，不久便瞩目于西方思想和社会制度。接受洋学思想影响的画家司马江汉，赞同西方自然科学正确，说：“当今西洋之天学，以万物之穷理思之，天地间无一静

① 尼达慕：《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者，日轮、五星、地球、月球皆旋动，一刻不止。”由此他认识到，“彼国之学问，以天学之本，专倡忠孝贞信人伦之道，贵者，天子诸侯，卑者、农夫工商，若依天而定皆同为人”，①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度。兰学家高野长英的《闻见漫录》一书，还论述了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哥白尼和莱布尼兹的欧洲思想史概况，对西欧“五学”即人文科学进行了研究。这一倾向集中地表现为“尚齿会”的活动。朱子学说威信扫地，洋学、国学等蓬勃兴起。但是，“宽政异学之禁”加强了思想统制，进而又发动了“蛮社之狱”镇压“尚齿会”，洋学进一步被限制在技术方面了。因此，兰学家、开国论者佐久间象山才主张“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幕末变革思想的主流较多地受到尊王论和国学方面的影响。关于西洋现代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式介绍不得不留待庆应2年（1866年）《西洋事情》（福泽谕吉纂写的启蒙巨著——译者）的出版和以“明六社”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来解决。（“明六社”成立于明治6年，是由福泽谕吉等著名启蒙学者参加的最早的启蒙团体。——译者）

不同的对外意识

虽然日本现代思想的发展还必须历经许多曲折，洋学毕竟给日本的对外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兰学盛行后不久，统治阶级中出现了若干位“兰癖诸侯”。鸦片战争的消息一经传到日本，佐贺、水户等藩便采用西方技术建立了炼铁厂和武器制造厂。柏利（美国海军提督，迫使日本开国者——译者）叩关后，堀田正睦（“兰癖诸侯”之一，在领地内奖励兰学与英学）即刻被任命为“外国挂老中”（相当于内阁外交部长职——译者），在其指导下岩濑忠震凭藉丰富的外国知识，出色地开展了外交活动，他受益于近百年之兰学研究者甚多。幕末的外国情报大部分依赖上海和香港出版的汉文书籍，正因为有研究洋学的基础，才能够比中国更为有效地运用这些情报。

① 《春波楼笔记》。

柏利叩关之际幕府征询了各藩的意见，其中积极的对外贸易论尚不多见。但到了安政4年（1857年）哈里斯要求缔结日美友好条约时，福井藩主松平庆永采纳亲信、兰学者桥本左内的意见，向幕府建议说：1，方今形势之下已不能锁国，此乃识者明察之事；2，我国亦企望解除海禁并与各洲贸易，在此之际故无拒绝乞者之理，驻公使事宜同上处置；3，富国乃强兵之基础，此后宜理商政，辟贸易之学，通有无，据地利，使皇国成为宇内第一富国。①此外，身为旗本的兰学者胜麟太郎（胜海舟）也主张，取贸易之利装备军舰，待船坚之后再向海外发展贸易。可见统治阶级内部对外认识的一定进步也是以当时洋学的发展为背景的。

中国在洋务运动阶段方才有组织地接受洋学，居日本之后。受太平天国牵连亡命香港近20年、1867至1870年留美的洋务派知识分子王韬，1880年初著《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这样写道："泰西诸国通商中土四十余年，其人士之东来者，类多讲求中国之语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无不于中土之情形瞭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士对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②李鸿章的幕僚、洋务派冯桂芬1861年在《采西学议》一文中指出："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之知算者俱可）。"③论述了有组织地学习西方语言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学的必要性。当然，冯桂芬并非这一主张的首倡者。

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魏源就在《海国图志》的序文中

① 《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之十八，第444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6页。
③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页。

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①魏源的著作对幕末日本影响巨大，安政元年（1854年）佐久间象山因吉田松阴偷渡事件牵连下狱后，在《省谳录》一文中虽然肯定了魏源的著作，但指出“海防之要乃炮与舰，舰最为要。魏氏《海国图志》中虽辑枪炮之论，多系疏漏无稽之谈，等同儿戏。凡事若已不为则不能得其要领。魏氏虽有才识却未察知”。针对魏源“坚壁清野，杜绝岸奸”的海防方法，佐久间象山主张制造军舰防卫于海上。另外，关于欧美武器的知识也有很大差距，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日本研究洋学的成果积累程度与中国的差距。事实上，从这时起，水户、佐贺、萨摩等强藩和幕府着手实行西式炼铁，制造大炮与军舰，不久便取得了成功。

上述史料表明，直到1880年王韬仍在感叹中国不能充分地了解欧美学术，其原因何在？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这样写道：“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②。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外有两点。一是前面提到的中国采用科举录用制度，使许多有作为的青年热衷于科举考试，二是中国的儒教世界观尚未瓦解，又有华夷思想的影响，难以建立儒教经典研究以外的学术。而在日本，研究洋学却是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世袭制度的不合理性，使有为的青年崭露头角的最切实的方法。而且，洋学很早就奠定了它的学术地位。结果，在欧美各国对亚洲加强压力的时候，两国关于欧美的知识就产生了巨大差距。

① 《增广海国图志》原叙，上海书局光绪乙未年石印本。

②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页。

3　攘夷思想与华夷思想

日本的攘夷思想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在对外知识及对外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下面谈谈具体处理对外关系时产生的日本的攘夷思想与中国的华夷思想。

日本幕末的儒学者大桥讷庵说过："今日西洋吞并蚕食各国非同豺狼、乃蓄意觊觎已久之贼。觊觎之贼者国家之大敌也。即令非被戎噬，亦无宥恕之理。何况纯属戎狄。壮者宜久怀敌忾之心，言彼之名亦觉秽口……"①。这一主张当为日本的华夷思想。但是，日本未曾占居册封体制的中心，较之中国华夷思想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而且，由于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发展了洋学，介绍了许多西方学术，较早地认识到日本并非世界之中心而为世界之一国，产生了佐久间象山所主张的合理的国际观念。他认为："今若将朝鲜、琉球称为夷狄，彼等虽乃小国未必甘心受之，何况将东西洋大国贱之为夷狄乎。无异于吾国无礼"②。就连一贯主张攘夷的水户藩的德川齐昭也承认甚至热心采用西方优秀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武器。可见对于西方学术的认识水平之高。除了上述大桥讷庵的封建排外主义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其它的攘夷论的基础。例如神国观念。神国观念早在镰仓时代末期产生，渊源于蒙古攻击日本时遇"神风"而失败的历史。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国学和尊王论进一步加强了神国观念，给幕末攘夷论带来巨大影响。会泽安论述说："赫赫日本自皇祖开国……圣子神孙继世代之明德照临四海……至今未尝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天地之不可易。"③当时的神国观念基于统一国

① 《辟邪小言》，卷一。

② 见佐久间象山文久2年（1862年）向幕府的上书稿。但可看出佐久间象山侵略亚洲各国的思想。

③ 《正名论》。

家的代表君主神圣的思想，对内性强，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欧美的科技。会泽安在《新论》一文中尽管一面大讲“虏乃犬羊之性”，但仍然同意对其要“阖国皆籍为兵”。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有可能较早地抛弃神国观念。

外来危机观念可以说是幕末攘夷论的另一基础。它随着江户中期北边问题的抬头而产生，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柏利甲关并强制日本开国事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时，日本在国内统一市场建立的基础上，民族形成相当迅速。所以，外来危机观念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统治组织多层次的情况下，以此为媒介反而加强了统一国家的民族意识。攘夷与尊王相结合的原因就在于此。幕末尊王攘夷论虽然由华夷思想与神国观念强烈的孝明天皇首倡，起始于反对开国，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也在于此。日本的攘夷思想以一定的对外认识为前提，以学习西方为前提，进而认识到对外贸易是“为攘夷而富国”的根本途径，这样，日本发自仇外心理的攘夷思想就容易地升华为谋求国家统一的思想了。

中国的华夷思想

中国长期以来未能摆脱华夷思想，阻碍了合理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当然，欧美各国强加的国际关系是不平等条约，应负极大的责任，然而必须看到，华夷思想亦是妨碍了国际关系建立的重大因素。

变法运动的领导者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后，1900年撰写了《积弱溯源论》一文，指出：“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① 中国长期以来位于册封体制的中心——这是包摄了大部分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由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成长缓慢，便在模糊的

① 《清议报全编》第4册，横滨新民社辑印，第4页。

“天下”的意识之下，妨碍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认识。这是中国不能轻易摆脱华夷思想的原因。梁启超在上述文中，还列举了中国的病根，“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区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等事实，这些都是由国内统一市场的未形成状态所派生的。

其它方面也有华夷思想的表现。在华夷思想的影响下，存在着“战”与“抚”两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方法。中国是册封体制的中心，这是产生华夷思想的历史前提，至清末为止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如此。当然，也有周围各民族军事力量强盛的时代。即使在这样的时代里，中国仍旧拥有优越的生产力与文化，多数情况下采用了“抚”的方法。这种方法原则上保持了中国的体面，而实际上却以“岁币”、“岁赐”等名义缴纳贡物，建立从属关系。北宋、南宋对辽、金的关系就属此类。鸦片战争以后来自欧美各国的攻击更加强烈，清朝在理念上仍屡屡采取“抚”的方法，①并在这种“抚”的过程中半殖民地化了。日本由于华夷思想的基础薄弱，没有“抚”的方法，只是面临着攘夷乎，全面开港乎的抉择，较早地把与各国的关系变成了国际关系，进而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

第三章　两国现代化的经济过程

前一章已谈到，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与否是两国经济领域中产生差异的根本问题。本章仅就买办和官督商办政策的延续及其废止问题进行阐述。

1　两国的买办问题

在日中两国近代经济史上，有无买办资本问题形成了明显的

① 胡绳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中反对抗战派以主张“抚”而得势。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53～55页。

对比。鸦片战前的“买办”系指广州外国商馆的佣人，然而鸦片战后随着中国市场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敞开，买办就作为外国商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中间业者发展起来了。最初是外国商人给予当地商人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和流通资金。买办最大的收入是从事外国商品居间业务的手续费，是从外国资本利用不平等条约与生产力的差距汲取的庞大超额利润中分得的一份，除了地主以外，他们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富有的阶级。①买办阶级既是这样成为富有阶级的，他们的财源——进出口贸易就完全取决于外国资本，所以他们不可能有独立自主性。他们之中有的人充当了外国人指挥的“洋枪队”的指挥，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也通过他们勾结外国势力镇压革命。而且，买办关于对外业务有着当时中国其他阶层所不具备的知识、经验和方便，因此在对外关系中是不可缺少的。

同一时期，日本虽然存在着相当于买办的人，但没有成为买办资本，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巨大力量。三井洋行创业时期积极活动的益田孝，其历史是买办性的，②但他并未发展为买办资本，而是在三井属下崭露头角。伍丹戈先生这样地论述买办活动的基础：“(1) 外国资本的商品输出是大量的、持续的、范围广阔的”，为此在销售和购买原料方面都需要代理人；(2) “在这种国家里，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它经济上的特色，商品经济还是零星的、分散的”，为此需要当地商人的合作。③

外国商品涌入之际，上述第(1)点现象是共同的，日中两国的不同点可以说主要在于第(2)点现象，具体说，在于是否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中国在没有形成统一市场的状况下被迫开港，

① 1890至1913年的二十四年间，对外贸易总额达一百二十四亿九千一百九十六万九千海关两，严中平先生虽然较低地估计了手续费的数额，但即便按百分之五计算，也至少有六亿二千余万两流入了买办之手。《中国纺织史稿》，摘译《中国近代产生发展史》。

② 《自叙益田孝翁传》。

③ 伍丹戈：《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落后性与反动性》、《光明日报》1954年8月12日。

便于买办资本独自发展，而且，外国资本也能够通过买办资本在中国市场称霸。日本在开港初期存在着“藩”这一较强的经济集团，也拥有对外工作人员，妨碍了买办资本的成长。据《大隈伯昔日谭》一书记载，在长崎“大藩至少有1、2艘轮船，萨摩、佐贺等藩则有5、6艘，往返于江户、横滨和大阪等地”。大隈重信为了筹措佐贺藩购买外国武器和船舶的经费，建议“扩大‘代品方’之规模，在长崎、大阪设商馆，投入三十至四十万元资本，使有才干之官吏与商人担当事务，以开通商贸易之便，一面充实国用，一面据此运动中原”，佐贺藩当局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外，越前藩在安政4年的上书（参见第二章）中，向幕府建议富国之本在于对外贸易。安政6年3月该藩便在长崎设立“藏屋敷”（诸侯为销售领地所产的米谷及物资而设的仓库兼销售事务所——译者），开始销售越前生产的生丝、酱油及其它物资，第一年度销售生丝二十五万元（墨西哥银元——译者），翌年度生丝和酱油合计销售六十万元，第三年（1861年）销售额达三百万两黄金。结果，三年内藩库贮存了五十万两黄金①。各藩之所以能开展此种贸易活动，是因为很早就有在大阪等地设“藏屋敷”，直接或以“御用商人”（藩主指定的商人——译者）为媒介广泛销售领地产品的经验，并且能够筹措资金保障人才。《大隈伯昔日谭》一书提到的佐贺藩的“代品方”，“基本职能是遣往大阪，专门推销藩内物产”、“与贸易官相同”。当时也只有少数大藩能够动用“三十至四十万元资本”，并配备“有才干之官吏与商人”。在此基础上，各藩通过专卖制（江户时代各藩采取的垄断藩内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经济制度——译者）垄断了藩内市场，所以，富商也甘冒被拒绝收回资金的危险协助各藩。这种强大的经济集团参加外贸，仅仅委托买办以有限的业务，造成了阻止买办资本生长的结果，对外国资本还发挥了暂时的防波堤作用。当然，幕末各藩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困难，特别在戊辰战争时期，外债激增，不无藩买办

① 管野和太郎：《诸侯与对外贸易》，日本经济研究所编：《幕末经济史研究》。

化之虞。①但是，通过废藩置县，政府承担了各藩外债，消除了这种危险。在此之际尽管也产生了国家经济的对外从属危险，然而与各藩当时的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2 官督商办问题

开港后，日中两国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一系列移植洋式工业的政策。中国1860年开始搞“洋务运动”，日本的这一运动的主角由幕府和各藩担任，大部分洋式工业被明治政府接收，构成殖产兴业的基础。所不同的是，日本通过这一运动产生了现代产业，而中国却未能由此直接建成现代企业。

中国的洋务运动

清军的核心力量湘军和淮军，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装备洋式武器，是中国洋务运动之始。它首先兴办了官办的军用工厂，接着为了筹措资金又谋求商人资本的合作，在民用领域内兴办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

这些企业中的官办工厂，与幕末幕府及各藩设立的洋式工厂本质相同。张国辉先生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中指出：“不能否认，生产工具的变革对经济关系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生产工具本身并不决定企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决定近代军用工业性质的不是使用怎样的生产工具，而是企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表现的状况”②。张国辉先生还根据下列理由——企业归封建统治者所有；资本来源依靠贡赋，依靠封建权力的强制掠夺；清政府整顿下来的士兵占劳动力的大多数，具有封建统治本质；扩充企业不以生产需要决定，而是根据清政府的财政状况等等——指出，“不能认为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

① 佐贺藩到废藩时为止，所欠外债达四十七万一千九百七十五元，同上书。

②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年，第70页。

是由此而直接发展起来的。”这里所阐述的企业性质，完全适用于幕末日本的幕营和藩营企业。幕营和藩营企业也都为封建统治者所有；其资本亦由封建贡赋转化而来；劳动力则通过役使农民和工匠解决，具有变相的封建劳役性质；企业扩充同样不根据市场要求。

张国辉先生还谈到清朝军用工业中浓厚的半殖民地性。与清政府的对外从属一样，无论购入机械还是经营，几乎全部听任外人与买办。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日本的幕营和藩营企业都没有多少买办性。如前所述，这是因为企业的经营集团对外从属性较少，并能够委派自己的洋学者和经营人才的结果。

此外，洋务派为了筹措官办军用企业的资金，创立了“官督商办”形式的新式企业，后来这些企业便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当时的观察家这样评论官督商办的纺织局：中国的纺织局，官营者，实际上导入了民间资本，民营者，又附着（官之）总办、帮办、提调等名目，难辨何者与何者……。商人投资不但不能参与经营，甚至年终分利也须仰承他人鼻息。且从不与其商量局之经费使用得当与否经营如何……与西方各国股东与经理之关系有着霄壤之别……。商人敏于利，即便无官督也知谋利。一经官督，企业头目皆从官界推荐，私情错误必多。商人熏染了官界风气，官风十足，局之费用过多。①这里无遗地暴露出官督商办企业的本质与实际状态。它实际上阻碍了民间资本的活动，“名为官商提携，实则妨碍之”。②因而，即使是集中了民间资本完全具备经营能力的上海织布局这样的企业，一经导入“官款”，官督商办，也就失去了活动自由。买办出身的洋务派活跃人物郑观应（后来又从事民族资本活动）亦指出：“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③。

---

① 参见吴佐清：纺织篇《皇朝经世文编》卷一〇五。

②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

③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

日本的殖产兴业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殖产兴业活动的初期也采用了建立官营和半官半民工厂的政策。前面讲到，幕末的幕营和藩营工厂与当时中国的官办军工企业性质基本相同。明治初年的官营工厂就是幕营和藩营工厂的继续。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工厂由明治政府接办时，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从藩所有过渡到政府所有已经比较具有了“公”的性质，此外，明治维新政权较之同治中兴政权也远为具有“公”的性质。同治中兴政权是腐朽了的旧政权，它依赖寄生的封建的私人军队，并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明治维新政府之所以不同，因为它是取代了旧政权的大致统一的绝对主义性质的政权。因此，与专为湘淮集团谋私利的洋务运动不同，明治维新政府的政策是为了振兴全国产业。其国营工厂作为“模范工厂”起到培养技术力量和引导商业资本的作用。除了这种较强的“公”的性质外，成为明治维新政府核心的几个强藩，都拥有幕末食利致富的经验，其工厂也具有食利致富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半官半民的因素，输入了民间资本，生产民需品。

但是，日本的官营工厂与半官半民工厂仍然是过渡性的，与中国的官督商办性质相同。当时这种工厂“费用夥多，损益得失不相偿”①。在棉纱聚谈会上，有人严厉地批评一家工厂说：“太平工厂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模范工厂，官设之厂须遵从官衙规定，与我公司办厂比较，人员多冗费多，可谓示范者不过把棉花变成纱而已。”②还有报告说：“其业务常带几分威风，人民惧怕与其接触，且有令人厌恶之倾向。”③这就是说日本也出现了中国官督商办的情形。自由民权派政党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社论主笔田口卯吉指出：“何谓劝业？由政府制造吗？实乃妨碍民间同行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劝业之目的。”④另一民权派的机关报《近

① 《工部省沿革报告》第35页。
② 《棉纱聚谈会记事》第42—43页。
③ 《工部省沿革报告》第35页。
④ 《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4卷第15页，明治十三年四月《经济策》第18章。

事评论》也谈到“如不防御有司干涉，则难以兴办民营企业。”①马克思这样论述绝对主义政权的工业政策：“官僚监护制度对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②直到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一齐拍卖处理以后，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才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在明治14年的政变中，政府为了转移激化的自由民权运动的锋芒，宣告十年后颁布宪法与开设国会。以这一事件为界，官营和半官半民工厂一起拍卖处理，民营工厂成为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内容。笔者认为这一事件对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国家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前夕，经过一系列试行中的错误，政府已经省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承认资本主义发展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就必须向自由民权运动全面投降。这对于明治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于是，剩下的道路就只有靠处理拍卖官营和半官半民工厂，“自上”一举造就出顺从政府的大资产阶级，与地主一同作为自己政权的基础，寄希望于数年后开设国会以便改换为新的统治体制。笔者认为，把民权派立即颁布宪法开设国会的要求留待十年后解决的原因就在于此。

笔者非常重视明治14年政变，因为它由A、革命形势高涨；B、政治上的改革；C、经济上的变革三大重要事实重合而成。笔者认为从明治14年政变开始至颁布明治宪法和开设国会建成的统治体制，本质是波拿巴主义的。恩格斯说过，虽然德意志的资产阶级三月革命失败了，但在它的压力下，普鲁士“在急剧地过度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国”，③“它（普鲁士——笔者）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④此后日本也残存着地主制等半封建因素，上述德意志的状况基本适用于日本。后来自由党之所以分裂瓦解也因为上层的“革命已经结束”，而要进行土地革命的佃农贫

① 《近事评论》第187号。

② 马克思：《孟德斯鸠第五十六》、《马恩全集》第6卷，第228页。

③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520—521页。

④ 恩格斯：《德意志农民战争序言》中《第二版序言的补充》，同上书，第297页。

农阶层顽强地要求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日中两国虽然原则上采用了同样的经济政策，结果日本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建立了现代国家，而中国却全面地失败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已经建立了国内统一市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初步统一的绝对主义国家。在这一前提下，日本又进一步展开了自由民权运动。这些在中国都是后来的事情。日本明治维新后并没有立即出现现代国家，但不能不承认，明治维新对于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前提性作用。

当郑观应为民族资本发出既无商律，又无宪法，专制下各股东何以为之①的无力的叹息时，田口卯吉则以自由民权运动为背景发动论战，经过自由民权运动，日本资产阶级获得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由此看来必须高度评价自由民权运动。

结 束 语

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客观规律。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历史学的目的在于阐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迄今为止，国家与民族是人类最大的社会单位。历史的展开带有以国家与民族为单位的“国民的”特色。历史学的研究亦以国家与民族为基本单位进行。

然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应该具有超越国家和民族范围的普遍性。为了阐明基本规律，有必要通过比较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达到更高的认识水平。这种方法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因为这些地区存在着超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性，容易进行以共同性为前提的研究。

亚洲的情形颇为不同。即使仅以东北亚地区为限，日本、朝鲜和中国各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及其到达各个阶

①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

段的结果，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也不具有西欧程度的共同性。这也许是妨碍了亚洲比较史学发展的原因吧。

为了阐明客观规律，不仅要研究共同性，其不同性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即使不能期待立即见效的结论，在已经明确的一定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经常进行这种研究也是必要的。

译自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丛刊》第16号(1983年6月)，译时略有删节。

李秀石译

秦郁彦

台儿庄战役及其前后的日军战略①

(一)三个新政权的建立

芦沟桥事件后约经半年，战火扩大到全中国，但是，以“陶德曼工作”②为开端的几项和平谈判均无结果，占领南京以后，中国政府也没有表示屈服的意思。

1937年底，日本已把十六个师团（几乎等于平时全部兵力）送到中国大陆，在战术上虽大体不断获胜、而占领区则限于以平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为中心的铁路沿线大城市所连成的一线，而且，这些联络线经常受到中国正规军以及国民政府系统或中共系统游击队的游击战的威胁。

而且，陆军所设定的主要假想敌是苏联，对于这个假想敌的加强战备，因迫于对华作战而难以推进。在满苏国境，以五个师团为骨干的关东军面对着四倍以上兵力优势的苏联远东军。由于这种情况，参谋本部急盼早日解决日中战争，以便把中国派遣军移用于解除北方的威胁。

面对这种僵局，日本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又一直没有

① 此文译自《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41—46页。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1963年，朝日新闻社出版。译文的总标题、小标题的序码及方括号内的文字是译者所加。原注见同书367—368页。译者稍有增注和补注。此文所述可以补充中国史料，有助于理解毛泽东同志当时对日军战处的分析（见《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72—473页）。——译者。

② 陶德曼工作，指1937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所进行的诱降活动。——译者

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战争指导体制，“1.16声明”①正是这种情况下徬徨不定的日本的苦闷状况的集中表现。

现在，任何乐观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即短期决战的希望只不过是幻想，不管是否愿意，战局已向长期持久战过渡。“1.16声明”的指辞虽然出人意外，其现实的含义则表明：日本打算树立一个取代蒋介石政权的新政权，通过它来达到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要求。在此应付新阶段的最高决策尚未决定期间，当地派遣军乘机开展谋略，连续演出了拿手杰作，搞出了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昭和12年即1937年10月27日）、“临时政府”（同年12月14日，北京）、“维新政府”（次年3月28日，南京）三个政权割裂占领区的体制，又反过来把这种既成事实端给中央。在国内也继“军事工业动员法”等战时统制法令（1937年7月）之后，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4月1日公布）、“国家管理电力法”（同年4月）等等，逐渐启动了战时体制的齿轮。

（二）暂停作战方针的决定

然而，总观1938年（昭和13年）上半年的战争指导，从陶德曼工作到“1.16声明”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府与统帅部的尖锐对立仍在继续，国务部门与军事统帅部门②的分裂越来越加深，这是当时的特征。尤其是，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的龃龉已发展到感情用事的程度，甚至有关作战的联络、协议也受到障碍，双方互相攻击，居于中间地位的政府，只能袖手旁观，1月15日以后，联席会议也处于中断状态③。

---

① “1.16声明”：指1938年1月6日，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译者

② 国务部门与军事统率部门：“国务”指内阁；“统率”，指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军令机构。——译者

③ 参阅风见章：《近卫内阁》第91页及其以后。译者补注：联席会议，指日本政府与大本营的联席会议，1937年11月24日首次召开。大本营是战时军事最高统帅机构，由参谋总长（陆军首脑）和军令部长（海军首脑）等组成，1937年11月20日建立政府首相不能参加大本营会议为了协调战略与政略，乃设立此席联会议。

当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在政策上的对立在于是否在中国大陆实行积极作战。

去年（1937年）年底，已经到达黄河一线的华北派遣军和占领南京后停止前进的华中派遣军（2月间改称此名，并以畑俊六大将接任军司令官），都以联系南北占领区为理由，急盼打通津浦线，陆军省也支持这种设想。然而，以多田参谋次长和河边作战课长①为中心的参谋本部，由于具有前文所述的对苏战略观点，加之，为了防止南京大屠杀之类的违背军纪的行为和刷新部队的士气，认为应当对部队兵员实行新陈代谢，从而准备新编六个师团；预定新师团将在7、8月间编成，在此以前，除了一部分侧支作战之外，不进行积极的大规模作战，专心致志在整顿已占领地区的治安和培植新政权。②

参谋本部这种消极持久作战方针对战争指导班当时所研究的长期战争指导计划的设想有重大的影响。堀场一雄少佐③，所起草的宏大计划④把日中战争的未来划分作三期：第一期（1938年）是暂停作战，蓄积国力；第二期（1939—1940年）是展开大规模军事作战，包括挺进汉口，以破坏中国的抗战力；第三期（1941年以后）是完成“昭和军制”、其规模将拥有九十个师团、一万架飞机，足以对苏、中两国作战。

2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大体同意了上述参谋

① 多田，指多田骏。河边，指河边虎四郎。——译者

② 战史室资料。

③ 堀场一雄：陆军士官学校第34期毕业，陆军大学1930年毕业。时任参谋本部部员，战争指导班负责人。战后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信社，1962年。——译者

④ 1月20日制定的《1938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接着，以堀场为中心于2月间起草《昭和军制建设要纲》，至4月底大体完成，并获得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的批准，但却终究是纸上计划。该《要纲》“前言”中说：“基于不战立国之方略而描绘之五十年道义建设，今后将以三十年为目标。”由此可知，其主旨和石原莞尔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的设想是非常类似的（堀场语）。当然，作战当局作为当时兵力扩充计划的方案是要达到平时三十个师团，战时四十个师团（三个单位制）。译者补注：所谓“道义建设”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等为同义语。

本部的设想，当地部队的出击意见和海军请求占领安庆、华南的议论均被否定。①陆军者和海军心里都有不满。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次官指责说："对苏联太担心了，对支那消极，这就违反应把作战力量指向重点的一般原则"、②并且发牢骚说："这两天参谋本部的态度反过来了，相当软弱，与事变之初完全相反。"③海军则怀疑，参谋本部如此叫喊对苏也许确有发动对苏战争的意图，于是就争着宣扬扩张海军以防备英美。在这种情况下，天皇表示："对华长期作战、对苏准备、扩张海军，三者同时并举，能行吗？"④流露出怀疑不解，这也就很自然了。

（三）统帅部转向积极论

如前所述，大本营御前会议在不愉快气氛中决定了暂停作战方针，此方针决定后不到一个月，就从陆军内部乱了起来。河边作战课长带着〔御前会议〕决定的方针到各地说服当地部队，到处叫到的都是司令官们的公开不满，⑤归国后旋即被调出，稻田正纯中佐带着改变前述方针的任务从陆军省进入〔参谋本部〕，代替了他。

新作战课长稻田一上任就起草了以下述内容为主旨的战争指导纲要，并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脑极力鼓吹。这就是：发动徐州役、汉口战役和广州战役，以求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占领抗战根据地，从而使中国丧失抗战意志，同时培植新政权，加强和平工作，双管齐下，以导致事变的早日解决。⑥

① 海军曾陈述：占领安庆及香港附近地区作为轰炸内地的基地。但可以看出，其真实意图在于向自己的势力范围华中、华南进行扩张（外务省资料）。

② 战史室资料。

③ 杉山陆相3月底视察华北时对第一军司令官香月的谈话。

④ 《原田日记》第六卷，第24页。

⑤ 小矶〔国昭〕朝鲜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都大讲徐州作战的必要性，甚至谈及占领汉口。（《河边回忆录》）

⑥ 稻田正纯，《支那事变战争指导的战略观》，《国际政治——日中关系的发展》专辑，1961年。

稻田在芦沟桥事变时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长，其后半年在〔陆军省〕军事课，一直负责调整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的政策。他检讨了1938年初战争指导方针的混乱与停顿，确信：要避免“变成第二个西伯利亚出兵①”的危险，消极持久的方针是不妥当的，只有“乘势反击，积极作战，以求得事变的大体处理为目标”。②这种作战思想的根据，与过去那种单纯的积极＝强硬论相比，接近于把堀场设想的第一期削除，结果则可使当地部队的扩大欲得到满足，用赫赫的军事战果暂时驱散各方面一筹不展压抑郁闷之感，如是而已。

恰当此时，在山东省南部第二军的突出部位，出现了中国政府军的有力反攻，这就具体地提供了时机，御前会议所决定的消极持久方针乃被放弃。

（四）台儿庄的战败

当地部队在攻陷南京后，也以种种理由企图扩大军事作战。华北方面军在占领济南、青岛之后，虽自一月中旬以来停止在济宁—历山③—蒙阴一线，却不断向大本营要求向陇海线前进而南下作战。华中方面军已奉大本营指示，以包括杭州、宁国、芜湖以北在内的长江右岸（指南岸—译者）地区为进出界线却在整顿江岸治安的名义下，逐渐沿津浦线北上，于2月上旬到达淮河之线④

① 西伯利亚出兵：指1918年日本出兵至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结果劳师靡饷，拖延四年多，一无所获，狼狈撤兵。——译者

② 稻田正纯：前引文。

③ 历山：疑为“尼山”，在蒙阴、济宁之间。

④ 华中方面军于1月上旬请求沿长江左岸（指北岸—译者）北作战，被大本营驳回。但是，位于浦口附近的第十三师团与中国军的一部进行了战斗，随即沿津浦线逐渐北上。上海派遣军曾于26日下令向淮阳平原扩张，华中方面军考虑到大本营的作战方针，以战役结束后仍撤回原地为条件，批准北进。于是，第十三师团北上，于2月2日占领凤阳、蚌埠，一部进至淮河北岸，预定的撤回则原地并未实行，就向徐州战役转移。而且，2月间代替松井〔石根〕担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烟俊六，尽管知道“2·16方针”〔指2月16日御前会议决定暂停作战——译者〕，却在3月8日向大本营提出十三师团北进的要求，被驳回。又，海军第三舰队也热衷于打通津浦线的设想，曾向烟俊六建议联名请求进行徐州战役及占领安庆（战史室资料）。

进入3月份，山东省的第二军以确立战略安全线为理由，南下至临城——沂水之线。但是，27日，奉师团命令，更加向南突进至台儿庄（徐州东北约三十公里）的第十师团（姬路师团）濑谷支队①（以步兵四个大队为基干）被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而援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又尚未到达，因此于4月6日起转而退却。

台儿庄位于军部指示的进军线之南，支队并未承担占领该地的任务。然而，中国方面却把此役作为“台儿庄的胜利”、大规模进行宣传。因此之故，陆军乃以此役破坏了日本军队的传统，把濑谷少将编入预备役。②

然而，由于这次战斗，却意外地判明了下述情况，即：以李宗仁为总指挥官，包括中央军十个师在内，大约五十个师、四十万中国军队正在以徐州为中心进行集结并构筑强有力的抵抗阵地。③

于是，陆军各方面都抓住了这个好机会，认为应当使用派遣军的全部力量，与中国野战军的主力求得决战，这种意见十分强烈。④4月7日，大本营下令：发动徐州战役。

（五）被突破的大包围圈〔徐洲战役〕

半年多以来，在陆军主力投入〔中国〕大陆作战期间，多田参谋次长一直在担心能否指望北方背后的安全。他在下达命令之前，先对满苏国境进行了视察，大体获得了安全感，因此才批准

① 支队：临时建制，大体相当于旅。“大队”，相当于“营”。——译者
② 伊藤正德：《军阀兴亡史》第3卷，第78页。
③ 战史室资料。译者按：此处日军估计的数字过高。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31—32页，当时津浦线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兵力除特种部队外，总共二十七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
④ 战史室资料。

战役的实施。①为了避免削弱满洲国的防卫，多田决定，除空军、炮兵一部之外，原则上不把满洲兵力移用于中国，以在中国现有的七个师团实施这一战役。而且，原定的整备关东军计划，照常进行，以防备万一之事态，甚至预计到对苏联和中国同时爆发两个方面的正面战争，准备了兵力调用计划。这就是：建立第三军（1938年1月）、建立第二十三师团、建立第四军（均在7月间）、派出第十一师团（9月）等等。②

徐州战役的目的在于打通以徐州为结节点的津浦路南北线，由此完成华北、华中占领区的联络。但大本营则不仅如此，而且意图抓住这个机会，达到在华北战斗和上海战役中的未能达到的围歼中国野战军主力之目的。③而且，由于这次战役具有继续向汉口战役发展的内容，在占领徐州之后，预定华中派遣军要立刻返回，华北方面的第二军也要南下，均在庐州、六安附近集结，以着手准备下一阶段的作战。为了使并列的两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能够顺利进行，大本营于4月中旬至5月底，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及所属幕僚至当地，以大本营连络班的资格，负责实际上的统一指挥。④

于是，华北方面军自4月下旬起，华中派遣军自5月5日起分别向徐州进行了作战调动，至15日，左右完成了包围圈。

日军打算在这里实现盼望已久的围歼战，中国军队却迅速采取机动退却战术，解散军队的编制，化成小部队各自穿过包围圈空隙而脱出。日军随即发出追击令，但靠五分之一兵力来阻拦是困难的，中国军队大部分未遭歼灭而脱离战场。不管怎么说，5月19日发表战报：完全占领徐州，国内腾起了长时间的胜战氛气

吕万和译

① 稻田正纯：前引文。
② 稻田正纯：前引文。
③ 战史室资料。
④ 战史室资料。不过，由于作战进行顺利，桥本并没有行使临时指挥权的机会，作战指导均受中央部门指示。

《田中奏折》的真伪

宋绍柏

《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常常引起议论。原因是我国论者常常引用其中赤裸裸地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的部分，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类。事实上，从20年代到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一部侵略史，也完全是走的《田中奏折》所规划的道路。而参与侵略战争的一些日本军政要员，矢口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一些研究日本现代史的人员，也在为此论证，认为作为“奏折”、其中存在不少可疑之处。

我国研究日帝侵华史的人，一般都直引《田中奏折》、对其真伪问题，未加理会。据《辞海》“田中奏折”条称：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决定侵略中国的具体方针，“据传曾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搞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加了“据传”二字。

不久前看到1982年日本出版的《昭和之恐慌》（作者中村政则）一书，该书（第96—98页）就《田中奏折》披露于世的经过和其后日本人对此问题的议论作了简略的叙述，兹摘录于下：

……1929年10月28日第三次太平洋调查会①开幕，中国代表陈立廷在会上朗读了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秘密文件的汉语译文。

（1930年）2月，日本外务省曾训令驻中国总领事，要求中国制止该文件的公布并收回报纸的报道。

① 在日本京都举行。参加者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日本的代表。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过问此事日本海军大将冈田启介驻奉天（沈阳）领事森岛守人在法庭上作证时均指为伪件

研究人员中如桥川文三，卫藤沈吉，稻生典太郎，江口圭一等都曾提出过这个问题。综观诸家所论，都认为作为“奏折”来看，这个文件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有不少错误。例如：

一、《奏折》中说到华盛顿《九国公约》成立后，山县有朋曾被大正天皇召去密谋如何解决由于缔结之时》九国公约织日本造成的问题，实则该公约缔结（1292年2月6日）山县已经死去（1922年2月1日）。

二、说当时田中义一被派往欧美，实则访问菲律宾。

三、在上海暗杀田中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人。

四、《奏折》中提到福冈师团，实际上在福冈没有师团。

五、其中使用了不适合奏文的词语，如“十把一束”、“帝国主义”、“四头政治”等。

六、奏折向来不写收件人姓名，而是由宫内大臣转递。此件则写有收件人姓名，并且写的是宫内大臣。

总之没有遵循奏折的惯例。现时日本诸家一致认为其为伪件无疑。团是，此件究属何人所写，过程如何，仍然是个谜。迄今有如下几种猜测：

一、日本人说。虽然不能下断语，但有可能出自关东军司令部中的“大陆派”军官河本大作之手。

二、中国人说。推测出自曾经留学日本的日本通王芸生之手

三、日本人与中国人合作说。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尽管《奏折》是伪件，而其后日本所采取的对华政策与战争政策，与《奏折》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从济南事件到“九.一八”事变，到中日全面战争与太平洋战争，这前后15年的侵略战争历史，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中国的秦德纯将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虽不能证明（《田中奏折》）是真的，但也不能证明不是真的。”

中国对国民党史的研究

——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重新探讨

山田辰雄

一、前言

本文论述的时从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论述国民党史，一般都要谈到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不同于中国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然而，国民党是1919年10月诞生的。从这时起，中华革命党就改组为得到群众拥护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政党，即国民党。而且，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本身，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产生了质的变化。另外，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实际上没有担负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同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有区别。严格地说，现代的中国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研究国民党史的独立的领域。但是，有关国民党的研究不是没有进行，而是作为（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指1905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①这一时期所包括的是，从辛亥革命爆发，经过军阀混战，到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因此，国民党在民国史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这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民国史的地位，孙思白在1979年第三期《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编写〈中华民国史〉工作的进展情况与问题》的论文。文中写道：民国史是“最后的剥削阶级政权的‘断代史’”。这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明确指出国民党政权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政治性的发言。中国历代编写历史

① 李新：《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2页。

都是以“统治阶级”为主体的。然而，编写民国史“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衡量统治阶级的活动”。《民国人物传》一书，关于这一点进一步指出：编写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①从而，在这里肯定了人民的立场与反人民的立场，或者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这可以说，是基本上站在原来的革命史观的延长线上。

那么，国民党在民国史上将占据怎样的位置呢？丁日初的文章②同这个问题有联系。他概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活动。他认为：“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资本家阶级具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性的一面；但是，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由于它在政治上始终动摇不定，它对于民族民主革命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他进而认为：“资本家阶级的内部并不是清一色的。依附国内外反动派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左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者。资本家阶级的大多数人则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这里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两面性，不是新论点，但却可以作为解释国民党中各派多样性的基础。蒋介石政权，一方面立足于封建的、买办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把这样的资产阶级置于其统治之下。

如果以丁日初的上述论点作为前提，资产阶级就不能担当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是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这就是，“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中共为了同资产阶级反动派作斗争，它的政策是，联合资产阶级左翼，争取中间派。

---

① 李新、孙思白：《民国人物传》第1卷，第1页。

② 丁日初：《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51——64页。

以上述对国民党的认识和政策为前提，本文就(一)对孙中山的研究、(二)对蒋介石政权的评价、(三)对反蒋各派的评价这三个主要内容，对最近中国发表的国民党史研究的成果作个介绍，并加以评论。国民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评价国民党成立到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活动变化的性质？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是在孙中山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可以说是中共进行革命的主要斗争目标。而且，反蒋各派，不论是联共派还是反共派，在中共同蒋介石作斗争中，都成为中共要争取的对象。

这些对国民党进行评价的文章、不是同政治无关的。现在中国政权的一个基本方针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事物中寻找真理)。按照这个方针可以断言，不研究国民党史就不可能重新探索中国现代史的演变。而且，第三次国共合作成了今日重大的政治课题，目前中国确切地评价国民党，可以成为理解将来政治形势变化的基础。

通观目前在中国研究国民党史的总的情况，可以知对少道缺于国民党的统治机构和意识形态的真正的分析。研究成果比较多地集中在对人物的评价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对国民党史的研究仅仅是开始。

最后谈一谈本文所引用的资料。如果从《近代史研究》杂志所附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论文及著作的目录看，在中国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史研究的成果。但是，这些著作并不是都能弄到的。因此，我主要利用手头有的专著及《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上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1981年)很有用，看到了我所没有的杂志上的论文。此外，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又是一个研究国民党史的资料宝库。但是，《文史资料》上面的许多文章，不是研究论文而是回忆录。而且，它的数量很大，我手头只有一些。由于以上原因，本文所用的资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对孙中山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表了许多有关孙中山的论文。特别是最近几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与本文有关系的，只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问题。如上所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以及国民党的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孙中山思想的转变，是以这个变化为起因的，同时又是这个变化的结果。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促进思想转变的主要因素，另一个是怎样认识转变后的孙中山思想。以下从许多有关孙中山的论文中，选出两三个有代表性的论文来探讨这两个问题。

首先，关于促进孙中山思想转变的主要因素。马庆忠、林飞鸾、黄永祥合写的论文①，概述了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中几个问题。该文提出有以下五点不同的看法：(一)孙中山的革命斗争实践；(二)孙中山通过主观的努力，认识到革命形势的变化；(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四)十月革命的影响；(五)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上各种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我不赞成只是一种因素决定孙中山思想转变的观点。假如分析孙中山思想转变的具体过程，可以明白各种因素是互相补充而起作用的。

尚明轩也认为，1922年的陈炯明的叛变以及中国共产党、苏联、第三国际给予孙中山思想转变以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尚明轩肯定了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思想移变起了相当的作用，他说："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积极拥护和赞助孙中山的干部，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极少数左派。"②在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思想转变所起的作用上，我同尚明轩是持一个观点

① 马庆忠、林飞鸾、黄永祥：《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概述》，《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尚明轩：《孙中山传》，第133页。

的。但是，有一个疑问。即使在革命形势高涨和孙中山的坚强领导这一前提下，是否国民党的大多数也会要求改组呢？宁可说多数的国民党的领导者会被卷进改组的潮流中去，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汪精卫就是这样的领导人中的一个。①孙中山就是这样领导着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次，探讨一下怎样认识转变后的孙中山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础，并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关于这一点，前面引用过的马庆忠三人合写的论文认为：许多关于研究孙中山的论文，"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对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功绩的评价的精神进行评述的"。②这就意味着，它们都是用三大政策来解释孙中山的思想。但是，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就会忽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所阐述的自己独特的理论。这里包括着对孙中山思想本身的问题和其后国民党所要加以继承的问题。

就这一点来说，值得人们注目的是，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③较过去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张磊在书中从几个方面对三民主义的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从民族主义看，著者认为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族形成的五种自然力，可以归结为三点：血统、文化以及经济生活。但是，孙中山把"血统置于首要地位"，忽略了民族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其结果把传统的家族、宗族直接地同国族即民族联系起来。也可以断言，这种在考察民族时缺乏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会造成轻视在民族中经济上受迫压的人们的立场。

第二，提出以军政、训政到宪政的"革命程序论"，作为民权主义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作为问题，特别提出了训政时期，它是革命爆发后的军事专政时期到民主宪政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

①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第3章。

② 前引马庆忠等的文章。

③ 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第52—54、97—98、146—147页。

在政府的领导下，以县为自治单位，对人民进行民主主义的训练。著者对孙中山把人民摆在这样的地位，提出批评说："不理解人民群众在变革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将改造主观世界。更未认识到挣脱了旧制度枷锁的人民群众必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学会管理国家事务。"从而可以看到，他轻视了人民在政治上的主动性。

第三，关于民生主义。著者指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是土地政策中的两个课题。平均地权没有否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而是要限制对土地的占有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均地权"不是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与此相反，耕者有其田具有可能否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政策。然而，孙中山"不把'耕者有其田'的纲领与农民革命联结起来"，"仍然企图经过国家采取'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意味着平均地权——山田注）……解决这个课题"。这里必须指出，孙中山对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起义所采取的政策是不鲜明的。以上著者所指出的三民主义中的共同的问题在于，轻视群众的作用，以及对群众是基础的认识模糊。下述对国民党左派的评价中，这个问题将再次以变换了的形式出现。

最后想谈一下资料。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基本资料，就是孙中山的著作。而这里所提到的研究论文，主要的都是以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选集》，或者胡汉民编辑的《总理全集》为依据的。然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的《国父全集》①全六册，是孙中山最完整的全集。河田悌一认为，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对这个全集的评价也很高。为了更加系统地研究孙中山，仍然将要使用这个全集提供的资料。在中国大陆也开始出版《孙中山全集》②加上《孙中山年谱》③，可以期待中国今后将更加客观而且系统地对孙中山进行研究。

三、蒋介石政权

关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是否是国民党的正统继承人，特别

① 《国父全集》，台北市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出版。

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大概有很大的疑义。尽管如此，实际上掌握着国民党的主导权的是蒋介石，这也是事实。中共提到国民党时，它的主要对象必定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

然而，在今日的中国还没有看到真正的研究蒋介石政权的成果。本节主要引用的书是何干之遗著、刘炼整理修订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荣孟源的《蒋家王朝》。何干之的著作，本来动笔时是写蒋介石的传记的后来改为现在这本书，于1963年完稿。其后原稿由于文化大革命和1969年著者的去世而搁下来，到了最近经过其夫人刘炼及原来的助手的整理才得以出版。因此，著作是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为中心，并且分析了与其对立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运动。荣孟源的著作是依据“青年同志们在学习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需要了解蒋家王朝的概况”的要求而编写的。它尽可能省略繁杂的注释，大体上属于通俗性的著作。这里以上述两本著作为中心，探讨一下他们对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的主要问题的看法。

第一，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荣孟源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最贪婪、最卖国、最专制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府。①关于这一点，何干之也认为：“蒋介石集团通过对各财团企业的兼并和改组，溶合全国买办资本集团和买办化官僚，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大地主阶级的支持，大力发展官僚资本主义。”这里指出了国民党政权的封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提出这个性质本身不是新的论点。但是，指出国民党不是以自主的民族资本而是以官僚资本为基础，应当承认这是对国民党政权，这个同党内外反蒋各派进行斗争的政权的行动的注释。

然而，追寻国民党政权这种基础的起点，在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中的发迹。若是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0年。
②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
③ 荣孟源：《蒋家王朝》，第1页。

三大政策为特征的孙中山思想这一观点出发，那么蒋介石这一反共措施就是背离孙中山思想。中国的历史学家向来认为，这次反共政变就是背叛革命。很有趣的是，他们举出的实例是，后来形成支持蒋介石基础的势力，竟是支持这次政变的力量。例如，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高涨时期，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在四.一二政变前后两次各向蒋介石垫付三百万元。之后不久，江浙资本家又为蒋介石承担发行三千万元的短期公债。据另一个记载，同一时期在上海，帝国主义和中国银行家、大商人，为了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共出了一千五百万元。①这些势力以后怎样参与国民党的统治机构并影响国民党的方向，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具体的分析将成为今后我们的研究课题。关于这一点，丁日初说："蒋介石集团篡夺了政权以后，曾经把资本家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安插在这个政权的政治经济机构之中，作为对于上层资本家支持反革命的酬劳，但是他们在蒋政权中不起决定作用，不可能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这是以一般的形式来表示蒋介石政权与资本家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1927年7月国共分裂后，在蒋介石领导下大体上统一的国民党，于1928年6月完成了北伐。接着，蒋介石排除了反蒋介石各派的挑战，加强了在党内的独裁地位。何干之关于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内的对立，写道："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实质上是江浙、两广和北方财阀的利益不一致，他们支持不同的军阀政客争夺权益；也反映了英、美、日各帝国主义争夺对中国控制权的斗争。英帝国主义支持两广军阀，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日本帝国主义则操纵北方军阀"，在这样的混战中。"蒋介石掌握全国政权——南京政府，是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援助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的"。②

支持蒋介石加强权力的，不应限于英美两国和江浙财阀。荣

① 前引荣孟源的著作。
② 前引丁日初的论文。

孟源重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组成的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替代江浙财阀所起的作用。特别是把四大家族控制银行，以及通过承揽政府的公债发行使政府与官僚资本日益结合的过程，作为批判的对象。

何干之和荣孟源还指出，特务组织、黄埔系军人和政学系政客是作为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势力发挥作用的。不消说，蓝衣社和CC系是国民党的主要特务组织。但是，也没有从这些组织的内部情况来充分阐明它的性质。国民党特务首领戴笠，曾参与这两个组织，就这一点来说，他的传记是很有意思的。沈醉、文强合写的《戴笠其人》[①]，就是戴笠的传记。此书不是所谓研究著作，因为他们两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戴笠手下工作，所以知道特务组织活动的内幕，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例如，该书揭露了蒋介石通过戴笠与汪精卫的亲日政权进行勾结，从而批判国民政府的消积抗日。

文耀奎关于AB团的论文[②]，论述了过去未弄清楚的这个特务组织的成立和性质。该文认为，所谓AB团，是江西省的国民党党部为了排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根据蒋介石陈果夫的指示，以段锡朋、程天放为头子，于1926年在江西省成立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中国的历史学家调强，在这种势力基础上建立的国民党政权，它的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反人民即反共的性质。例如，荣孟源认为，1933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封建主义的君权、父权，保证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③]还有，何干之认为，1937年开始的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所实行的法币政策其实是“放弃白银本位而改用外汇本位。由于中国外汇必须同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联系，结果，起初是英

①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

② 文耀奎：《AB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③ 前引荣孟源的著作。

国后来是美国把中国货币权拿到手里"。[1]此外，批判国民党对中共采取镇压政策(包括剿共战争)，就不必再举例了。

同蒋介石集中权力互为表里的是执行反共政策，三十年代国民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抗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批判国民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消极抗日，认为事实上是中共的领导和群众性抗日运动的高涨，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这方面的批判没有新的论点，故而本文从略。上面谈到的蒋介石通过戴笠与汪精卫勾结，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的为数很少的论文中，张晔的论文[2]很值得注意。著者肯定了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武汉沦陷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姿态，认为是积极的，并为抗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并指出国民政府采取这种姿态的原因在于，人民的抗日要求和日本占领了英美资本集中的上海，才推动了蒋介石进行抗日，这个看法也没有超出毛泽东、朱德曾经表明过的论断，就这一点说也没有特别的东西。但是，著者虽然一方面认为国民政府在日本进攻下后退了，另一方面却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给予评价，以表明历史的整个面貌，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二十年代后半期到四十年代前半期，国民党面临着反共和抗日的两大课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攻势作斗争，并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和消极抗日政策进行批判。但是，对国民党来说，同时追求反共和抗日两个目标是矛盾的。国民党的这种立场的局限性在于，缺乏群众的支持和因日本侵略而造成民族危机时不能全面地展开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在这种局限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的评价是否没有框框呢？例如，在蓝衣社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中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以及在中日战争前国民党进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中有近代中国

① 前引何干之的著作。

② 张晔，《怎样看待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新时期》，1980年第3期。

领导者(包括中共)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些不会没有看到吧？现代的中国历史学家确实没有超出这个眼界。但是，现在中国已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议题，我们是否看到国共之间有对立性的同时又要看到有怎样的连续性，这将是今后国民党史研究的大课题。

最后，看一下1945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期间的问题。我手头没有研究这一时期关于国民党的专著。何干之认为，战后要讨论的政治体制是1946年1月召开的有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评价这个会议的决议，说它“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否定了封建、买办、法西斯的训政法统”，它的要害是“改组政府的问题”。但是，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公然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宪草的民主原则”。也就是，国民党提出了权能分职论的五权宪法，即“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否定人民管理国家的能力，从而剥夺了人民代表机关(指政治协商会议—山田注)的权力”。①此后，国共间公开的内战爆发了，国民党政权由于内部的分裂和在中国社会中处于孤立而垮台了。

孙代兴的论文②是写这一时期国民党，论述1945年10月发生的蒋介石与云南的实力派龙云的对立。著者不认为两者的对立仅仅是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而认为蒋介石在对龙云的进攻是作为发动内战镇压人民的一环。这是该文的新的提法。

有关这一时期国民党的资料有三种：(一)《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③，收集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国共两方面的文件、第三势力方面的文件，以及美国方面的文件，共二百篇；(二)《重庆谈判资料》④，收集1945年8月至10月有关重庆谈判的文件。特别是王抡檀的回忆：《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写了当时蒋介石对会谈的态度，很有意思。(三)《马歇尔使华》⑤，收集1945年12月至

① 前引何干之的著作。
② 孙代兴：《谈蒋介石解决龙云政权为目的》，《昆明师院学报》，1979年第5期。
③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
④ 四川大学：《重庆谈判资料》。
⑤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马歇尔使华》。

1947年1月马歇尔使华期间的报告和附录文件。原书共两卷，范斯莱克作序，1976年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本包括原书的第一卷及第二卷的一部分。译者认为，在中美关系改善以后，该书作为“历史”文件，仍然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综上所述，尽管蒋介石政权在国民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具研究成果是很少的。这个结论与过去的研究比较起来，没有大的不同。特别何干之的著作是六十年代写的，各章按照毛泽东的论断，并且也是在这样范围内对国民党进行评价。因此，本节在确认过去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评论的同时，弄清动向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四、反蒋各派

同蒋介石政权比较，对反蒋各派的中心人物的研究成果出版的比较多。中共同蒋介石的国民党作斗争时，要争取反蒋派别中的中间派，在一定的条件下同中共保持合作关系。概括地说，反蒋各派又可分为反共派、联共派和中间派。以下按照这种区分，探讨对各个派别的研究。

首先，就反共派人物汪精卫而论，我对所有对他的评论不一定赞同。何干之对汪精卫的评论是，汪在1925年时期已是“假革命”，武汉政府时期表现出反革命两面性，进行反共，向蒋介石靠拢。而且，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组织的亲日政权，更成了人们谴责的对象。在何干之的著作中，值得人们注意的地方在于，对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的汪精卫等结成的改组派活动进行了从未有过的详细分析。何干之认为：“国民党改组运动是汪精卫、陈公博一派进行政治欺骗的手段，拿这些政治幌子来拉拢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失意军人，蒙蔽一些迷失革命方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何干之也谈到汪精卫等在国民党三全大会及1930年反蒋战争时的反蒋活动，

但认为这些始终是反革命内部的对立。

刘建皋关于改组派的论文，①使用了丰富的资料，对改组派的起源、组织、基础、政治主张、活动及性质等问题，都作了论述。其结论是："改组派决不是革命派，而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官僚政客、失意军人，拉拢一部分有民主意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欺骗一些幻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而组成的与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集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著者也对改组派在反蒋战争中削弱蒋介石统治势力的活动作了评价。此外，武灵初的文章②，回忆了山西省改组派的活动，也认为改组派"是由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的、思想比较进步的分子组成的"。

关于另一个反共派人物阎锡山，有《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③和《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④两本书。这两本都不是所谓研究著作，而是资料性的书。众所周知，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省，同中央闹独立，是有其特点的国民党领导人。第一本书收集了档案和对当事人的访问、座谈记录，以阐明山西省银行是官僚资本，是阎锡山统治的财政支柱，具有反人民的性质。第二本书也是根据当时参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人的回忆和记录，以便重新阐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历史过程。

中间派人物中提到最多的是，与五四运动有关的蔡元培。《民国人物传》中的宗志文的文章⑤，对蔡元培的生平作了简要的叙述。这里以这一文章为例，探讨对于蔡元培的评价。众所周知，蔡元培是光复会、同盟会的会员，五四运动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宗志文认为："在'五四'前后的新旧思想斗争中，他（蔡元培）基本上是站在卫护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

① 刘建皋：《改组派初探》，《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② 武灵初：《国民党改组派在山西的活动》，《山西文史资料》1979年第13辑。
③ 近代史研究所等：《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
④ 山西省政协：《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⑤ 李新、孙思白：《民国人物传》第1卷。

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但是，他的政治倾向也有变化，随着1927年的蒋介石反共，他站到了反革命的一边。其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他在1932年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积极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回到革命阵线一边。也就是说，这里是以蔡元培站在中共主张的革命一边或是不站在革命一边的两个时期，分别进行评价的。

朱来常的文章①，叙述了冯玉祥的生平和活动，认为冯玉祥的“国民军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集团”，并指出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著者从反蒋战争中的活动、支持抗日战争以及了解苏联与中共等方面对冯玉祥作了评价，并把批判的重点指向他在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的反共和向蒋介石靠拢。

李宗仁作为国民党内长期同蒋介石对立的桂系领导者，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他去美国，1965年回到中国，1969年故去。写李宗仁晚年的著作，出版了两本。程思远的《李宗仁先生晚年》②，是回忆国共内战后期至逝世这一时期李宗仁的活动。附带说一下，《李宗仁先生晚年》著者程思远与李宗仁在一起、并且参与了他从美国回国的筹划。顾笑言、王士美、汪东林的《李宗仁回国》③，是根据程思远的回忆，叙述了李宗仁回国的经过。其他中间派人物，有杨虎城的传记④。杨虎城同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领导人。

第三，廖仲恺和邓演达是两个联共的左派领导者。写廖仲恺的三篇论文⑤中，余炎光那一篇写得最好。著者认为：“廖仲恺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活动家，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是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代表人物。

① 朱来常：《冯玉祥述略》，《江淮论坛》1981年第1期。
②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
③ 顾笑言、汪士美、汪东林：《李宗仁回国》。
④ 米暂沉：《杨虎城传》。
⑤ 余炎光：《廖仲恺和工农运动》，《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黄海泉：《简论廖仲恺》，《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李益然：《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廖仲恺》，《中国近代史研究论丛》1980年。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廖仲恺为推动我国工农运动的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使他由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成长为工农大众的好朋友。”根据这样总的评价，著者把廖仲恺的理论和实践放在工农阶级这一边。也就是说，“在廖仲恺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中，工农阶级也可以和资产阶阶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廖仲恺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主张国民革命要依靠工人农民，要武装工农。廖仲恺还亲自参与以五卅运动为中心的1924年—25年的工农运动的一系列工作。

但是，著者也指出了廖仲恺的局限性。例如，廖仲恺提出以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三种类型的人，来截然划分领导者和群众。这同廖仲恺对领导群众运动和有关群众运动的方法有关。著者也是这样分析的，尽管廖仲恺实际上参与工农运动，而在现场推动和组织工农的领导人却是许多共产党员。换言之，廖仲恺是依靠中国共产党员来领导工农运动的。在此存在着廖仲恺在组织方面的缺点。

其次，探讨一下张光宇写的关于邓演达的论文①。邓演达在北伐中是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而闻名的，是武汉政府时期活跃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著者详细论述了邓演达在北伐出征时的活动，以及由于武汉政府的成立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过程。著者认为：“反蒋斗争是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斗争”。这里表明了著者的观点，同对待廖仲恺一样，把反对蒋介石推行反共和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作为国民党的正统的革命路线。

著者重视邓演达在武汉政府时期的活动，特别是他对农民问题的意见。邓在武汉政府内讨论组织农民问题的关键时刻，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是农民革命”。而且，也认为“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只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点观

① 张光宇：《评述武汉时期的邓演达》，《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基本上是一致的。事实上正是他同毛泽东等人的合作，在1927年3月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时，起草了《对农民宣言》。

但是，著者也指出了邓演达对农民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其一，邓演达不承认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著者认为，由于有这种偏向，邓演达很快远离中国共产党，并且有可能推进第三党运动。其二，"他在农民运动中的许多活动是停留在上层，没有亲自到农村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著者指出，在当时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共产党员曾帮助邓演达克服这种缺点。因此，尽管邓演达献身于农民运动，却缺乏组织的基础。这一点与廖仲恺同工农运动的关系有共同之处，这也与上面已叙述的孙中山对群众基础认识的模糊有关。

最后，想谈一下武汉政府时期的资料问题。张光宇的论文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报纸、杂志及回忆录，来论述邓演达的活动，但是缺少政府和国民党的文件，这是武汉政府的最基本的资料。国民党把这些文件运到台湾去了。其实，蒋永敬利用了这些文件，他引用1963年台湾出版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在此不得不说，中国大陆研究国民党史时在资料上存在着局限性。此外，在收集武汉政府时期的资料方面上，袁继成、刘继增、毛磊的论文①做了有益的工作。该文引用了许多当时的出版物。例如，论述《汉口民国日报》从国民党的机关报变成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纸的过程，很有意思。

① 袁继成、刘继增、毛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报刊和教育事业》，《历史教学》1981年第2期。

齐福霖译

苏联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尼基福罗夫·

在世界近代史上，即由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到1917年，中国历史的发展确有探讨的必要，这首先是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旧中国有一支力量开始产生并逐渐壮大，这支力量自1917年以来，经过几十年奋斗，终于实行了人民革命。苏联学者也象研究中国历史其他阶段一样，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

本文对苏联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不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史）的著作加以评价。1972年苏联出版了苏联中国学家的集体著作《中国近代史》，故本文就从这一年谈起。①《中国近代史》是由一批学者在齐赫文斯基院士的主持下，经过十几个春秋，集体编写的，该书是前数十年苏联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总结。在这部巨著写成以后，大部分作者已着手其他题目的研究。虽然在1973—1983年苏联出版有关中国近史的著作代数量有所减少（大型综合性著作完成以后往往总是如此），但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研并没有停止。

1973—1982年，苏联共出版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二十四种，其中十三种是六位著名学者撰写的。这此著作可分成四类：

一、解放运动；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 迄至1973年发表的苏联中国学家著作评论，参看《苏联中国学问题》。1971年11月举行的全帝中国学家学术会议报告汇编，莫斯科1973年版。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四、俄国学者①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

中国的解放运动历来是苏联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题目之一。

Н·福米娜详细地研究了中国东南地区、特别是台湾地区的抗清历史（十七世纪），弄清了反清阵营成分的复杂性（封建大官僚、商业手工业界、农民代表）。这位作者认为，在抗清斗争中，抗民光有反抗意识，尔后才有民族意识。②

Б·诺维科夫则对十七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的抗清斗争形式做了研究。③

А·伊帕托娃深入地探讨了十九世纪中国解放运动新阶段的开端，认为：抗击英国的华南平英团是由"先生"的代表人物——地主绅士领导的，而地主绅士的基层组织，则是所谓社学。③

从事中、日历史研究工作多年的Ф·托杰尔撰写了一部专著，论述十九世纪台湾历史。④

Ф·别列柳布斯基长期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一部史料学和思想史的学术著作。据他论证，太平天国首领之一、洪仁玕的纲领断不仅仅维护农民利益，更可贵的是，这位农民领袖摈弃了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的思想，至少在他的纲领中是如此。⑤

В·库泽斯和В·拉林分别撰写了以上海"斗争史及云南，贵

---

① 指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学者。——译者

② Н·N·福米娃：《中国东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十七世纪中叶）》，莫斯科1974年版；《十七世纪中叶中国东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73年。

③ Б·М·诺维科夫：《反清秘密天地会。天地会的起源与活动的开始》（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76年。

④ А·С·伊帕托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华南的爱国运动》，莫斯科1976年版（书评参看：В·尼基福罗夫：《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开端》，载《远东问题》，1976第4期；А·沃洛霍娃的评论，载《近现代史》，1977年第2期）。

⑤ Ф·А·托杰尔：《台湾及其历史（十九世纪）》，莫斯科1978年版。

⑥ Ф·Е·库泽斯别列柳布斯基：《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1859年）〉》（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76年。

州起义始末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并经答辩通过。①

Н·卡柳日娜娅研究义和团反帝起义史料和探讨义和团起义的两部专著，是七十年代苏联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部颇有影响的著作。联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起，便开始研究义和团运动前的历史并发表有关史料，这两部专著的出版使这个题目的学术研究工作告一段落。②

卡柳日娜娅在其1973年出版的专著中指出，七十年来对义和团起义的研究，已从寻求义和团的起源、清政府的政策，义和团起义的性质等若干重要问题的答案，又进一初，开始研究义和团起义的动力，起义者的纲领和口号、起义者的作战史、起义的分期等更加广泛的题目。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史学界把义和团只看作一支反基督教的反动力量的话，那么后来，各国史学界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承认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性质，尽管运动的形式无疑是落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义和团运动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今天，一此资产阶阶历史学家也不能不对这种评价表示赞同。

苏联历史学曾经一度过分强调义和团的革命特点，今天，在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时，则着重强运动的反帝（但不是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当初，中国历史学何尝不是如此（先是

---

② В·С·库泽斯：《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18855年）》（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学1978年；库泽斯：《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55年）》，莫斯科1980年版；В·Л·拉林：《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云南、贵州抗暴运动（主要问题）》（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列宁格勒1981年。

③ Н·М·卡柳日娜娅：《义和团起义（1898—1901年）》（史料研究），莫斯科1973年版（评论参看：Л·Н·博罗赫：史料研究心得》，载《远东问题》，1974年第2期；А．С．科斯佳耶娃的评论，见《亚非人民》，1975年第1期）；科斯佳耶娃：《义和团起义）1898—1901年）》，莫斯科1978版（译论参看：В·А·克里夫佐夫：《一部论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专著》，载《远东问题》，1980年第3期；О·Е·涅波姆宁：《传统的反动势·与反帝运动综合概论。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为Н·卡柳日娜娅的专题著作出版而作）》，载《亚非人民》，1982年第6期）参看Н卡柳日娜娅的早期著作：《义和团运动的产生和发展）1898年4月—1900年4月）》（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64年；《义和团起义》（文献和资料），莫斯科1968年版。

把义和团运动分成“反封建”和排外两个阶段，继而只提“反封建”阶段，但也是闪烁其词。只有在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才一度倒退，按照其官方观点，凭空夸大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性，为其反动特点辩护；近来，有所获敛，不再任意夸耀义和团的作用了）。

卡柳日娜娅在其专著中指出，西方历史学以往的观点是，义和团运动是清政府一手策动的，现在，他们的结论更切合实际了。认为运动是自发的，朝廷只是在其反对洋人的斗争中才利用了它。

现在，历史学家普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大都出身于劳动阶层（以前，欧洲汉学家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是脱离劳动阶阶的分子）。

正如卡柳日娜娅指出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至今仍然攻击义和团当年反对列强，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并片面地指责俄国。

卡柳日娜娅在其后一部专著中总结义和团运动这一题目的研究工作时，实际上对她自己在其前一部专著中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她指出义和团运动并没有单独经历反帝阶段，义和团起义从一开始就是排外的，虽然在起义的过程中不免也暴露过反封建的色彩。卡柳日娜娅认为，起义者的成份较为复杂，其中既有农民、手工业者，又有脱离劳动阶级分子。在卡柳日娜娅看来，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封建思想体系的卫道士鼓动义和团仇视洋人，向义和团灌输蒙昧主义。

尽管义和团具有反动性，但是卡柳日娜娅仍然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广大群众不堪帝国主义压迫、奋起反抗的正义斗争。

卡柳日娜娅确定了义和团运动的始末年代（1998—1900年）及其各个发展时期，考察了“义和团”这个秘密结社的形成历史，证明义和团这个组织起源于反清的“白连教”之说纯属臆断。

卡柳日娜娅考察了清政府地方衙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认为

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在华南、华中和山东）一贯反对义和团；一派（在直隶）主张暂时与义和团结盟；一派（在东北，排外运动"就下层而"比较薄弱的地区）积极反对洋人。显然，清政府的动摇不定，反映了这三派的存在，同时，也说明了三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卡柳日娜娅致力于此项研究长达二十年之久，研究表明：义和团起义绝非如西方学者迄今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两种文明的冲突"，而是被压迫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殖民主义者，只不过是斗争采取了中世纪的，落后的方式罢了

历史学家Г.叶菲莫夫从事"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研究，继继续续已有四十年之久。在本文所涉及的1973到1983年期间，叶菲莫夫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是探讨辛亥革命的；另一部是研究1914—1922年这一时期的，这个时期有一半已跨入现代历史时期①。

叶菲莫夫坚决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辛亥具有"非资产阶级性"和主观臆断的所谓特殊性的概念。他客观地证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在1911年以前，中国革命一先决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革命成功也就无从谈起。叶菲莫夫基于这种认识，对于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也做了评述，他在指出孙中山的种种弱点的志时，着重强调他在唤起民众方面所起外重大作用。

叶菲莫夫的第二部专著是在他死后出版的。他在这部专著中指出，虽然孙中山的党有这观点狭隘、从事密谋等陷，但在辛亥革命（1911－1913）以后，唯有这个党始终与反动派势不两立。叶菲莫夫认为，1916年革命党反袁护国胜利，是与孙中山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

---

① Г.В.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11—1913年）。史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评论参看：齐赫文斯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载《远东问题》，1975年第3期；Е.科瓦廖夫的评论载《历史问题》，1977年第1期）；叶菲莫夫：《孙中山。探索前进的道路（1914—1922年）》，莫斯科1981年版；又见叶菲莫夫的早期论文：《孙中山为实现中国独立而奋斗》，载《历史杂志》，1937年第1期。

叶菲莫夫坚决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辛亥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和主观臆断的所谓特殊性的概念。他客观地论证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在1911年以前，中国革命的先决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革命成功也就无从谈起。叶菲莫夫基于这种认识，对于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也做了评述，他在指出孙中山的种种弱点的同时，着重强调他在唤起民众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叶菲莫夫的第二部专著是在他死后出版的。他在这部专著中指出，虽然孙中山的党有着观点狭隘、从事密谋等缺陷，但在辛亥革命（1911—1913年）以后，唯有这个党始终与反动派势不两立。叶菲莫夫认为，1916年革命党反袁护国胜利，是与孙中山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

叶菲莫夫分析了孙中山于两个时代交替时期所撰述的《建国方略》认为：《建国方略》所设想的中国发展远景是了不起的，是进步的，“方略”提出了国家改良经济、监督外资等项主张；在孙中山看来，吸收外资建设新中国是可能的。

关于辛亥革革以前的革命运动史，尼基福罗夫写成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互为补充，相辅相成。①

1973－1982年间，苏联发表了若干长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这个热门研究题目的兴趣愈来愈浓厚了。其中有三篇是反映反清斗争中的不同英雄人物的；B.谢马诺夫的论文描写了慈禧太后及其宫廷。B.库兹涅佐夫一马当先，他在上述十年间写成并出版有关中国近代史（以及现代史）各种不同题材的著作两部，并发表论文多篇。②

① B.尼基福罗夫：《中国的早期革命家》，莫斯科1880年版（评论参看：Г.Ф.基姆：《中国革命运动的开端》，载《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Ю.В.丘杰耶夫的评论载《历史问题》，1982年第3期），B.尼基福罗夫：《亚洲觉醒时期中的中国》，莫斯科1982年版（评论参看：B.瓦西里耶夫：《亚洲觉醒时期中的中国》，载《远东问题》，1982年第3期）。

② B.C.库兹涅佐夫：《阿穆尔萨娜》，诺沃西比夫斯科1980年10月）》，莫斯科1978年版；Г.С.马特维耶娃：《国父。论孙中山》，莫斯科1975年版；B.N.谢马诺夫：《略论慈禧太后的一生》，莫斯科1979年版。

近一、二十年来，苏联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关系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学者当推O．涅波姆宁，他出版两本书，其学术研究的主导思想同他早在六十年代所发表的论文是一脉相承的。①涅波姆宁的两部著作是苏联近十年来所出版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内容最翔实的学术著作。

《中国经济史》介绍了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这一段历史，即十九世纪下半叶。作者完全着眼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自然地济居统治经位、大地主剥削农民；在土地精耕和劳力过剩的条件下，同封建时代的欧洲相比，起较小作用的超经济强制），认为中国封建主义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便已日趋没落。

作者有一个结论，从方法论上看，颇为重要，即封建的中国虽然走向没落，但与此同时，国内的资本却在不断积累（只是未投资于农农和高利贷等）。该书的另一个结论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官商合办企业的保护下，出现了中国的私人资本，并且正是这种合办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为私人资本开拓了道路。实际上，正是官商合营形式的活动成了中国“自强”方针的基础，因而“自强”方针一破产，这一段历史也就随之而告终。②

涅波姆宁在其第二部专著中论述了1894—1914年这一段历史，他从社会这个角度，对当时中国国内资本积累的过程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无论就深度或广度而言，都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为该书不取《经济史》、而取《社会经济史》这样一个书名，便足以说明问题）。同时，作者按年代上溯得

① 涅波姆宁：《中国经济史(1864—1894年)》，莫斯科1974年版；《中国社会经济史)1894年—1914年)》，莫斯科1980年版（书评参看：A．B．麦利克谢托夫：《中国社会经济史》，载《亚非人民》，1981年第1期）。又见：涅波姆宁的早期著作《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起源》，莫斯科1966年版

② 对涅波姆宁的书评参看：尼基福罗夫：《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载《远东问题》，1975年第3期；B.П.库尔巴托夫：《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写在涅波姆宁的专著出版之前)》，载《第八次〈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会议。提纲和报告》，第二册，莫斯科1977年版；麦利克谢托夫：《论十九世纪下半叶——三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中国资本主义进化的影响》，同上。

很远，以便向读者提供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在几乎整个近代史期间的实际概貌。该书的中心命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两个“分支”即官办企业和商办企业的经济对照与人对照。根据所谓两个“分支”的概念，中国农村中，民族资本主义成份是经过两条途径的：一条是农民逐渐分化为富农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官办部门中）；另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化（在商办部门中）。作者不仅论述了资产阶级形成过程的各种不同形式，而且着重指出新兴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构成的复杂性，即：在资产阶级中，中间阶层表现软弱，而分别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前工场手工业时期经济水平的上流社会和广大的最低阶层却彼此尖锐地对立。

涅波姆宁所做的社会经济分析，使人们有可能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许多特点：如改良派和孙中山派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矛盾、华北与华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中国过渡社会”这一术语着重反映出作者的主要结论，即：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在中国形成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城市的作用得到加强（而在中世纪，一般来说城市往往落后于农村）；上述封建社会的所谓两个“分支”的传统的经济平衡与人口平衡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挥积极的、改良的作用，尽管它的比重与封建关系相比较，还非常有限。但是，“旧”经济的影响依然巨大，致使旧经济自动恢复、停工歇业及资本主义落后方式的泛这种到退倾向时有发生。

涅波姆宁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基础的这种“自发的”向前发展，即主要是“自下而上地”对社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是没有出路的；由于当时有人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自觉地、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推动社会的发展；由于在当时确有可能“人为地”（即主要依靠主观因素、意识形态、国家等等）随时扭转国家的发展方向，所以，造成中国的发展情况复杂多变。

作者所选择的撰述方式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把综合、概

括同恰如其分地引证大量实际材料（其中包括数字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全书共十二章，其中关于1909—1913年经济危机一章（第四编第二章）虽然出自B.Б.缅希科夫手笔，且写作方法与该书其他各章略有不同，但全书仍保持了完整、统一。在这部专著中，经济危机这一章绝非可有可无，它是涅波姆宁总构思的实际例证，也与作者的意图相辅相成。

涅波姆宁的专著以及上述其他著作都是研究中国全国或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的，但也有若干学术著作是专门探讨中国特定地区的。例如，探讨清朝少数民族边区的，就有B.库兹涅佐夫（新疆）、A.马尔蒂诺夫（西藏）、Г.戈罗霍娃、Ш.奇米特多尔日耶夫（蒙古）、霍扎耶夫（新疆）、A.伊达亚托夫等人。①

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研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东北，一度成为苏联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方向。在莫斯科研究生院进修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研究所的人员О·库丘克、Г·苏哈切娃、М·帕特鲁舍娃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问题为内容，分别写出了副博士学位论文。②

① В.С.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莫斯科197年版（该书责任编辑、已故Л.杜曼早期从事学术研究时，也曾经对新疆做过研究。参看他的《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农业政策》，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版。对库兹涅佐夫的书评参看：Е.克恰诺夫：《武力与经济奴役》，载《远东问题》，1974年第3期）；马尔蒂诺夫：《十七——十八世纪西藏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的地位》，莫斯科1978年版（参看А.鲍克夏宁和福米娜的评论，载《亚非人民》，莫斯科，1979年第4期）；Г·戈罗霍娃，《十七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朝统治时期的蒙古史概论》莫斯科1980年版；奇米特多尔日耶夫：《蒙古人民的反清解放斗争（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上半叶和中叶）》，乌兰乌得1974年版；霍扎耶夫，《1864—1878年清政府镇压准噶尔地区和东土耳其斯坦各民族的起义》（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73年；霍扎耶夫：《清帝国、准噶尔与东土耳其斯坦》，莫斯科1979年版；伊达亚托夫：《十九世纪伊犁维吾尔人的民族解放运动》，阿拉木图1979年版（维吾尔文版）。

② О·В·库丘克：《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北满人口定居与经济开发》（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高），莫斯科1979年；Г·А·苏哈切娃：《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东北的手工业和作坊》（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81年；М·А·帕特鲁舍娃：《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中国东北的垦殖与清政府的政策》（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82年。

担任上述研究生导师的，除了莫斯科久已闻名的中国学家杰柳辛等以外，尚有苏联中国历史学家第二梯队代表涅波姆宁及A·霍赫洛夫。

由苏联科学院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为苏联远东地区培养一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年轻学者，显然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将要变成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活跃中心之一。

最后，介绍几本有关汉学史的著作。在1973—1982年，苏联出版了书籍目录和档案问题著名门家П·斯卡奇科夫的大型遗作，这是一部研究革命前俄国汉学家手稿的学术著作。① 该书负责编辑B·米亚斯尼科夫为出版斯卡奇科夫生前未完成的这部著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还出版了论述俄国第一位汉学家、当代杰出的外交家Н·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专著以及介绍伟大的汉学家Н·比丘林的两本著作。值得指出的还有为纪念俄国伟大的汉学家B·瓦西里耶夫而出版的专集（责任编辑Л·瓦西里耶夫）。专集的上集（作者有：Л·瓦西里耶夫、Л西蒙诺夫斯卡娅、А.霍赫洛夫、Г.斯莫林·Н·沙斯季娜·Е·扎瓦茨卡娅、k·哈菲佐娃）肯定了瓦西里耶夫在俄国从事汉学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②

探讨中国近、现代交替时期这段历史的有B·阿列克谢耶夫的《东方学》一书，该书收录了这位俄国汉学泰斗之一的论文与文献。阿列克谢耶夫作为学者成长于近代史的末期；他对法国汉学家Е·沙畹及俄国东方学家特别是С·奥尔登堡的评述，是他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史学论文。该书以大量篇幅介绍了阿列克谢耶夫

① П·Е·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概论》，莫斯科7197年版。

② Д·Т·乌尔苏尔：《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斯帕法里》，莫斯科1980年版；《Н·Я·比丘林及其在俄国东方学中的贡献（诞辰二百周年纪念学术大会文献）》上下集；Н·В·杰尼索夫：《尼基塔·雅克夫列维奇·比丘林（东方学者的生平与活动概论）》，契博克萨雷1977年版；《中国历史与文化》（纪念B·瓦西里耶夫院士专集），莫斯科1974年版。

的求学时代，例如，他的大学言行录、研究生院回忆录，以及出使中国（1906—1909年）的报告。

阿列克谢耶夫就如何培养所需要的合格汉学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告诫人们，作为一个汉学家，不可以孤陋寡闻（死啃中文书本、就事论事、一知半解），也不可以好高骛远，以避免不求甚解。他还告诫人们：那种认为中国"特殊而特殊"的肤浅观点，那种向东方"猎奇"的态度是千万要不得的。他向人们说明：科学与猎奇二者水火不相容。他写道：在汉学这个领域中，"为求一鸣惊人而绞尽脑汁、搜寻奇异事物的大有人在……科学应当从两方面对这种'猎奇'的态度攻而破之，使东方学者与我国学者取得共同的科学语言……这是人类的共同事业，为了这一共同事业，那种'猎奇'的态度必须加以克服"。①

阿列克谢耶夫有一句临终赠言：在我国，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多多益善。他们大有用武之地。"②今天，所有正在学习或有志于学习汉语、所有正在研究或有志于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人，听了这句临终赠言，仍然会感到异常亲切。

译自苏联《远东问题》1983年第3期

曾宪权　译　林荫成　校

① B·M·阿列克谢耶夫：《东方学》，（论文与文献）莫斯科1982年版，第333、334页。

② B·M·阿列克谢耶夫：《东方学》，（论文与文献），莫斯科1982年版，第307页。

香港孔安道纪念图书馆所藏香港史料介绍

杨 国 雄

香港布政司署图书馆、民政署图书馆和市政局公共图书馆等虽藏有政府的出版物和在香港发行（或印刷）的出版物，或这两类出版物之一，但在1970年之前，并未打算建立地方机构以收藏记录和反映香港历史及当前活动的文字和其他资料。上述两个政府部门的图书馆收藏有关香港的资料，但主要供官员使用，就其性质说，是不对外开放的。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藏有在香港印刷或出版的资料，但不一定与香港有关。而且日本占领期间官方档案几乎全部被毁，许多研究人员被迫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寻找有关香港的资料。因此，M·艾贝科威茨和叶灵凤等人都表示应当建立专门机构收藏地方资料，以满足有关香港的研究工作不断增长的需要。

历 史

香港大学于1970年接受“孔安道纪念基金”慷慨捐赠的10万元港币，用于发展、促进、改善和维持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最后，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此款应专供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资料专集之用。1974年，此香港资料专集正式命名为“孔安道纪念图书馆”。

1970年之前，大学图书馆虽无专门收集香港资料的任何选择

条例，但这座有60年历史的校图书馆仅通过积累便必然拥有分散在普通藏书和冯平山图书馆中的许多香港资料，为孔安道纪念图书馆提供了首批收藏品。孔安道基金最初收购的目标是使图书馆收藏的政府出版物、学位论文、期刊文章、公司报告、协会报告和书目上虽有而图书馆尚没有的书籍日臻完备，大部分是照相复制品。基金的主要部分连同1974年5万元港币的捐献都用来购买一部分殖民部档案C.O.129系列的缩微胶卷，这些档案都与香港有关，保存在伦敦国家档案局。1980年初，从孔安道纪念基金又收到为购买已故吴灞陵先生收藏品而提供的一笔二万元港币的赠款。

除了孔安道纪念基金的慷慨捐赠外，图书馆还接受了许多重要出版物的捐赠。第一批捐赠有各种协会发行的340多种出版物，是香港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利用部分暑假假期收集的。各方面私人藏书的捐赠，更使图书馆大为充实起来。姚汉樑先生捐赠20箱剪报，200多册图书和一般人感兴趣的有关香港问题的期刊；已故林友兰先生捐赠100册图书，400期期刊和有关香港史研究的其他项目；陈源碧梅夫人捐赠200多期电影杂志；还有，已故罗香林教授的一部分收藏中有500多项香港资料，包括专题文章、期刊和照片等。此外，图书馆持续不断地收到几种来自政府部门、学会、协会和研究机关的各类出版物。同时还经常接受校内不同来源的捐赠。詹姆斯·海斯博士不断以图书馆的名义收集许多已经绝版的刊物。香港大学图书馆是“图书注册法令”所指定的藏书处之一，所以图书馆能经常从这一渠道获得许多有关香港的有用书刊。最新出版物的经常性采购主要依靠图书目录、报纸上刊登的书讯和访问当地书店。事实证明，图书馆人员访问美国、台湾和日本，对于某些珍贵书刊的复制品的获得是有帮助的。

建馆以来图书馆的收藏迅速增长。1973年的图书和文献估计达一、二千项标题。今年八月，专题论文（包括小册子）的标题计6,074条。目前有1,625种期刊，其中1,141种是仍在继续发行

的。报纸剪贴已有一万个条目。

孔安道纪念图书馆位于主楼东翼的第一层，收藏品占整个特藏区的一千平方英尺。图书馆构成特藏区藏书的一部分，该馆馆长同时是特藏的管理员。

范　围

图书馆的资料范围不受主题的限制。选择的唯一标准是图书或文献必须直接和香港有关或对理解香港有重要意义。因此，图书馆并不保存在香港印刷或出版的一切书籍，除非其主题直接与香港问题有关。但图书馆也收集当地的研究机构和学会出版的一些期刊，因为它们反映当地的兴趣、特定题目在香港的研究动向和香港文化生活的一般状况。

图书馆还收集各种图书馆和展览会的目录，在香港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或会议的记录，但和香港无关的主题除外。至于教育出版物，教育提纲虽属收集范围，而教科书却不在收集之列，除非与香港的经济、公共事务有关的那些题目。以当地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在图书馆占有一席位置。图书馆还准备搜集各种不同版本的书籍，它已发展成一个有关香港问题的英、中、日、德、法、俄等多语种的资料库。当然，大多数资料不是英文的就是中文的。

这个图书馆还保存有一些零星细小项目，如：剧场节目单、说明书、广告、传单、餐馆菜单、中国贺年片和商业目录，还收藏了一小部份解说性的资料。

藏　书

藏书广泛全面，涉及各种主题，内容反映香港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的各个方面。因此，藏书不可避免地偏重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历史。下文简述有关历史、习俗、传记、调查报告和自然历史各方面资料的情况。

在一般历史著作方面，图书馆拥有艾特尔（Eitel）、塞耶（Sayer）、恩达科特（Endacott）和贝尔福（Belfour）等人相当完整的标准著作。贾勒特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旧香港》（Old Hong Kong）一书是藏书中经常有人翻查的一种。赖特（Wright）的《二十世纪的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1908年），费尔德维克（Feldwick）的《今日远东和中国国内外卓越、进步华人》（1917年）和伯戈因（Burgoyne）的《远东的工商业活动》（1924）等三书对本世纪最初三十年的香港有精彩的记述。中国出版物方面，图书馆收有罗香林有关1842年前的香港的几种书籍，还有最早的中文作品陈鏸勋的《香港杂记》，不过它是某一西方佚名作者作品的中译本。存书中历史专著有诺顿—凯舍（Norton-Kyshe）的《香港的法律和法庭史》和刘粤声的《香港基督教会史》。

图书馆还藏有丰富的各种机构如医院、慈善机关、寺庙、报社、百货商店、学校和教堂的开张典礼和周年纪念活动的纪念性小册子。东华医院、乐善堂慈善会（Lok Sin Tong Benevolent Society），《华字日报》（Chinese Mail）、合一教堂（Hop Yat Church）、南北行（Nem Pak Hong）等的纪念品不过是图书馆众多纪念品中的一小部分。

在传记资料方面，图书馆存有不同版本的“香港名人录”和香港人名录。伯特（Burt）的《中国名人传记》（1921）包括了许多香港人物。其他重要著作有邓志清的《港澳名人录》和吴醒濂的《香港中国名人录》。自传和回忆录也包括在这一类中。图书馆还收集多种讣告和寿言录，但使用时应加小心，因为这类文字，总带有恭维性质。家谱对历史研究同样有用。

图书馆不仅收集历史资料，还想方设法获得各种调查报告。通常报告不是正式印刷的，主要是油印或石印的，一旦丢失了，就很难再找到。从1981年9月到1982年8月，大约180份调查报告是通过征集得到的。大部份报告是关于社会问题的，如工人阶

级、青年、住宅、教育、医疗服务和交通等多种多样的问题。这些调查报告，其中一部份虽非系统进行，但仍反映了香港社会状况的某些方面。

图书馆存书虽然多半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但也未忽视搜寻科学史方面的著作。图书馆收有本瑟姆（Betham）、邓恩（Dunn）、克鲁克（Crook）和赫克洛茨（Herklots）等人论述开花植物的稀有版本，还收有关于野生动物如鸟、兽、鱼、蛇和蝴蝶等方面的书籍和市政局最近出版的有关植物方面的著作。

下文简述图书馆所藏不同类型的资料的情况。吴灞陵收藏品的获得是件大事，因此也在此略加介绍。

期　刊

期刊是图书馆藏书中相当可观的一部份，它占的空间为专著所占的四倍。为了便于排列，期刊按官方和非官方两种序列分开。官方期刊这一序列如年度报告和政府公报放在前头，不同部门出版的期刊按照部门的名称上架。非官方期刊依其主题分类。目前，图书馆计有1,625种期刊，其中1,141种是仍在发行的，484种是过去的；1,145种是英文的，480种是中文的。

官方期刊

图书馆藏有相当完整的一套经常需要参考的官方定期出版物，如《年度报告》、《行政的报告》（后改名《行政报告》），政府公报及其增刊，蓝皮书，会议文件，香港立法局议事录（Hong Kong Hansard）和文职人员录，年度报告和政府各部门、各常设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其他定期刊出版物也包括在内。这些刊物不仅提供这些部门行政管理方面的资料，而且提供与这些部门有关的主题的资料。令人遗憾的是，由于1973年的经济限制，大多数政府部门中断了年度报告的出版，其中许多种至今尚未恢复。图书馆共有250种刊物属于这一类情况，其中多半是英文刊物。

非官方期刊

这一类包括由各种机关和学会定期出版的年度报告、手册、历书、机关议事录、业务通讯，从印刷华丽的印刷品到用蜡纸油印的一些传单，各式俱备。这些期刊中，公司、机关、学会出版的年度报告和校刊构成了期刊收藏的最重要部份。1960年之前已有可观的公司年度报告，但图书馆在60年代股票市场开始繁荣之后，收集的名目甚至更多。公司年度报告通过经常更新的"获利咭片"(Wardley Cards) 得到补充。图书馆收集的年度报告，其来源机关和团体是五花八门的，如商会、教堂、医院、慈善机构、体育俱乐部、艺术的、教育的和科学的协会。图书馆保存的最老的学报是中国外科医学会1845—1846年度出版的年度报告。香港总商会的年度报告是图书馆中历史最长的期刊，从1889年持续至1981年最近的一期。校刊方面，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的校刊《黄龙》从1899年创刊至今没有间断。图书馆拥有该刊1899—1901年、1904—1907和1958年以后的各期。

图书馆还在竭力设法收集各式各样的人名指南录和工商行名录。从19世纪以来，图书馆存有1859年《香港指南——附在华外侨人名录》和1884年、1891年、1893年出版的《香港指南——附远东行名录》。《中国工商行名录》（后改名《中日等国指南及大事记》）中有关香港部份可以填补一些空白。图书馆拥有的二十世纪出版物更加齐全。《香港一元行名录》(Hongkong Dollar Directory)在同类指南录中历史最为悠久。中文出版物中，最早的有1915年出版的《香港中华商业交通人名指南录》(Anglo-Chinese Commercial Directory)，但有有长期持续的中文人名指南录。不过，战后这个时期有了几种长期发行的中文年鉴，如《香港年鉴》和《香港经济年鉴》。本图书馆还收藏了其他一些商业性期刊。

由于人员紧张，图书馆仍有许多刊物未能编目。待编的包括同乡会、商业协会、工会和大专学校出版的各种期刊。读者如想

参考这些期刊应在图书馆出纳台查询。

报　纸

当地报纸几乎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最有价值的一个资料来源。由于管理上的原因，所有中文报纸都收存于冯平山图书馆，幸而还留下了一部份很好的中文报纸合订本。总共有42种，其中12种是仍在发行的报纸。最重要的一种是《华字日报》从1895到1940那一时期长达45年之久的旧报。

除了香港报纸，图书馆还有许多中国出版的对香港研究同样有用的报纸。其中如《中外新闻七日录》(Chinese and foreign weekly news)和《述报》(Shu Pao)，甚至远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也能填补十九世纪的一些空白，因为《申报》常刊登有关香港的消息，这也是中国和香港关系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图书馆收集当地的英文报纸就没有这样完全，只有《德臣西报》(China Mail)，《孖剌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德臣香港记事报》(Dixon Hong kong Recorder)，《香港时报每日广告航运录》，(Hong Kong Times daily Advertiser and Shipping gazette) 1842—1876年的《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香港钞报》(Hong Kong Gazette)。图书馆有日本占领时期出版的《香港新闻》(Hong Kong News)的完整合订本。图书馆藏有1956—1959年和1962年各年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1和1982年该报的缩微胶卷也已订购了。图书馆希望能获得更完整的二十世纪出版的英文报纸。

剪　报

图书馆的报纸剪贴涉及与香港有关的各个方面，而且常能为某些题目提供唯一可利用的资料。收集剪贴始于1973年前后。资料主要搜集自《南华早报》、《香港虎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明报》、《文汇报》和《大公报》。到1982年8月底，图书

馆已整理近一万份剪报。其中多半是有关经济、社会和历史等题目。加有标题的剪报陈列在图书馆闭合式的书架里。附加标题的导片都汇拢在香港主题的索引中。一份剪报标题一览表安放在香港卡片索引上面可供读者快速查阅。

除了剪报外，图书馆还收藏一份缩微胶卷的《南华早报》剪报，开始于1961—1962年，结束于1977年，历时达十五、六年之久。材料多半从《南华早报》本身搜罗。此项收藏分两部分：主题类和人物类。主题类的大部份有关香港，小部分有关中国和澳门。人物类从范围说具有国际性，包括香港和海外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图书馆备有《南华早报》主题一览表，供读者利用。

学位论文

总的说来，学位论文是对学术成就作出的重要贡献。图书馆现接收所有得到香港大学承认的程度较高的学位论文。此外，我们正在设法获得送交海外大学的那些论文。

送交香港大学有关香港问题研究的最早论文是写于1959年论述法医学和药厂的。目前，已送交本大学有关香港研究的论文共有164篇。其中40篇是博士论文，124篇是硕士论文，全都用英文写的、题目大多是有关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科学和工程学等方面。还有大约110篇送交大学而未能完全达到“社会工作”硕士①、社会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商业管理硕士和理科硕士学位水平的论文，其中72篇是关于社会工作的。图书馆还存有1966年前送交地理系的大学生论文约260篇。这些论文保留了他们进行研究计划时用的许多材料和数据。

送交海外一所大学有关香港问题的最早一篇论文其时间甚至比送交香港大学的任何一篇都要早。这就是1900年吉本（R.M. Gibbon）送交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论文《香港的脚气病》。我们一共收集了116篇论文，其中28篇是博士论文，34篇是硕士论

① 香港大学设有社工系。——重校者

文。计73篇来自美国，24篇来自英国，其余的来自澳大利亚、泰国、德国、法国和台湾。如果没有版权限制，论文收集的数量将更多。我们发现有八篇论文在台湾完成，但由于版权限制，仅有一篇已复制。送交海外各大学的论文题目种类繁多，多数是用英文写的，少数是用法文、德文写的。

我们还在香港卡片目录中增加了送交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条目。到1976年已增加了143条硕士论文的登录条目。其中多数为商业管理硕士论文，其余的是关于教育、环境研究、地理学和宗教等方面。多半是用英文写的，也有一些是用中文写的。

公文和档案

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未公布的公文和档案资料。图书馆从英国殖民部、外交部和议会获得一批档案，从美国驻香港领事得到一些电文，和其他一些私人文件。

殖民部和外交部档案

最重要的一项是1841至1949年殖民部C.O.129 这宗档案（香港：往来信札原件）。香港档案局的目录编制大大增加了对这宗档案的利用。这份目录只编制到1915年，但图书馆有伦敦档案局编制的1926年到1946年的目录。图书馆还有一部分C.O.882，内容包括有关罢工和联合抵制运动的香港通信（1925—1926）。香港档案局已为殖民部C.O.403（登录本）和C.O.537(通信补编)提供了目录。我们希望殖民部今后能提供他们保存的其它C.O.卷宗的目录。

至于外交部档案，图书馆已得到联合项目2（中国），其中的F.O.17（总务通信，中国）F.O.228（使馆和领事档案、杂项）和F.O.371(总务通信、政治）等类有直至1939年的有关香港的大量材料。有这几类档案的索引可供研究时利用。

议会文件

爱尔兰大学出版社从英国下议院十九世纪的“会议与指令文件”中选编并原样复制成若干种丛书。在中国丛书中有三卷是关于香港的，内容包括通信、电讯、报告、法令、备忘录、统计表、协定以及其它有关1846—1899年期间香港事务的文件。这套中国丛书的其它各卷也有关于香港的重要资料。

总督文件

图书馆拥有南森（Mathew Nathan），骆任廷（Stewart Lockart）爵士、鲁格（F.D.Lugard）等人的若干文件的复本。这些资料是1903至1916年这一时期的。除了通信，文件还包括日记、剪报、这个时期的出版物和一些期刊。在南森的文件中可找到1904至1907年间罕见的几期《黄龙》杂志。

美国领事档案

这些档案是美国国务院在1844至1906年期间收到美国驻香港领事的电讯。除了在执行领事职务的日常工作中收集的资料外，还有些偶然收集的主题广泛内容相当详细的电讯。其中包括美国商船的报告，中国向夏威夷和美国移民的报告，以及中国海上海盗劫掠的报告。

手　稿

图书馆保存有若干当地社会团体的会议记录本：香港医药学会，英国医药协会香港和中国分会1886—1912年的会议记录，香港社会研究所1961—1975年会议记录。我们还有1946—1969年香港、九龙工人子弟学校的档案。最后几项资料不仅对研究社团组织很重要，而且有助于研究战后香港的教育概况。

除了学校机关外，我们还有日本进攻和占领时期布莱克本（Blackburn）、吉姆森（Gimson）、霍华德（Howard）、斯特里克（Sterieker）和波茨（Potts）等人记述个人经历的稿本。还

有O.V.张（O.V.Cheung）有关英国七十年代初某项九龙租约展期的租金问题的一些论文。

吴灏陵藏书

接收已故吴灏陵先生的收藏品使图书馆的收藏量大大扩充了。吴灏陵早在20年代即已开始他的记者生涯直到1976年去世。他是庸社的创办人之一。庸社是一个徒步旅行的团体，至今仍在活动。他收藏和写作了半个世纪，身后遗物在许多方面都对香港研究有巨大贡献。

吴灏陵藏书的第一部分是他的著作集。他是一位涉足许多领域的多产作家，他的写作有时事评论，侦探故事、爱情小说、诗歌，地方掌故和钓鱼记等。图书馆还存有他二十年代直至70年代的日记。还有其它私人遗物如：往来信札、各种组织的证件，还有罕见的短期使用证券如：定量供应卡，电影院和赛马俱乐部的入场券等，以及日本占领时期发行的电车和汽车票。

另一部分是关于香港报学史的资料。他所收集的不限于剪报，还包括期刊文章、通讯、照片、个人笔记和请柬等。资料分成若干卷宗：早期历史、中期历史、新闻检查、中文印刷所、《星岛日报》、《华侨日报》、报纸调查、传记和英文报纸。

为了研究香港报纸，吴灏陵先生收集了许多开业周年纪念品，甚至还收集了20年代以来香港出版的报纸的最后几期。收集还包括表现报纸改变的，如印刷或版面的改变的那几期。而且收集的香港报纸中有的是别具一格的：如1932年1月1日和1940年4月13日的取样报纸，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及日本占领期间出版的取样报纸。

收藏品中还包括在香港出版的杂志的创刊号。日本占领前和占领期间收集了二百多种，战后一千多种。此外有许多期杂志的内容已散佚，仅保存了封面和目录，它对研究香港杂志的历史和文献的鉴定仍有极大用处。还有一些零散期刊足以补齐图书馆期

刊收藏中的空缺。例如：图书馆原收藏有最早的电影杂志《银光》的1926年第一期。吴氏收藏有该刊的第二、三期。这三期可能便凑完这一题目的完整一套。

香港地区的区域研究是吴氏收藏的又一组资料。这些资料分下列几个卷宗：香港岛、九龙、新界、邻近诸岛、地名和野生动物辞典。资料包括报纸杂志剪贴、小册子、通告、照片、请柬、拓本和吴氏的笔记。

另一组资料来自吴氏的徒步旅行，其足迹几遍整个香港。每次徒步旅行的资料都保留在他自制的小册子里，其中有吴氏的笔记和相片，并附有底片。

吴氏藏书中有许多珍贵的项目，《香港杂志》（1894）堪称论述香港问题的最早一部中文专著。还有许多珍贵的专题项目，如：《妹仔》《赛马场失火》和新界一些庙宇的周年纪念小册子。总之藏书内容引人入胜，有关香港的资料美不胜收。

文献目录的服务

图书馆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得尽可能多的有关香港的资料，而且注重提供文献目录的服务，如编制索引和汇编书目，藉以便利研究。

外交部档案

如上文提到，有外交部档案的“联合项目”2（中国）的索引可供利用。为了协助使用者更容易查找有关香港的资料，图书馆已从这些索引中抽出所有关于香港的条目。用这种方法编制的目录在图书馆中可以找到。

外交部总务通信是学术研究最重要无疑也是最经常被参考的资料，但大家感到作为工具书的克劳斯·托马森（Kraus-Thomason）的《外交部通信索引》为香港条目所提供的交叉参考是很不够的。为了对那些可能有的与香港条目有关的标题进行一种滚雪球

式的搜寻，已经编辑了一份香港条目一览表，这样收集的条目比索引中香港部分列举的要多。到目前，1920至1938年的条目已搜寻完毕。

图书馆不掌握外交部总务通信的全部档案，但其中若干香港条目见于“联合项目”2（中国）或C.O.129。

报纸丛编

孔安道纪念图书馆经常把报纸连载栏目中有关香港研究的资料汇编成专辑，现已有《香港之最》，叶灵凤的《香海拾零》，《香港史地》，《香港书录》等专辑，英文项目有《难忘的时刻》（第Ⅰ和Ⅱ辑），《复兴之路》，《新界史话》，《英国人到来之前的香港》，《他们住在政府大厦》，和《这就是香港》。以下各辑正在编辑中：《香港漫步》，《香港今昔》，《回忆录》和《霜红室随笔》。

中文报纸

前已述及，图书馆中香港中文报纸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合订本是不齐全的。在中国出版的某些中文报纸有可能补齐这一空缺。刊载在《中外新闻目录》、《述报》《时务报》上有关香港的条目已复制并将合编成专辑。将中国其它报纸如《解放日报》，（1941—1947）《申报》（1872—1944）等有关香港的条目编成索引和汇编成专辑的工作将在人力条件许可时进行。

利用图书馆的办法

一般说来，大学图书馆只供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使用。但因孔安道纪念图书馆收到的出版物大部分是由团体捐献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使这一收藏对所有各方面名符其实的研究者开放。大部分资料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因此整个收藏不供外借，仅限于在“特藏”区内使用。使用者可以从书架上取用大部分材料，

而对适宜控制管理的资料，如小册子．剪报、珍本书、手稿、短期使用的票证、照片等，借用时须经申请。图书馆装有投入硬币即可复印的机器。图书馆对电话和来信提出的各种询问力求给予解答，但有时限于提出询问的性质和我们收藏的范围，而转交其它有关的地方咨询机构考虑。

香港联合书目

香港联合书目是孔安道纪念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副产品，它为异地读者提供书目情报一览表的作用，使他们能够从香港对一般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中找出可供借阅的有关香港的资料。香港联合书目作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一项规划始创于1972年5月，并由纳菲尔德基金会提供经费，具体工作是由分发到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馆员办理的。除了大学图书馆内中外文藏书外，还可浏览到香港中文大学及其各学院、图书馆、布政司署和民政署、市政局公共图书馆、社会福利署和香港市政事务署的存书内容。到1975年4月30日编辑截至日期，联合书目登录的西文条目计3152条，中文条目1054条，其中包括期刊各种文章和各书籍部分的分析性归类条目。香港联合书目从一开始就被设想成是一项持久性工作。人们希望不久将出版补充目录，提供所有已经参加和新参加联合编目的图书馆新登录的条目。为此目的，本馆已为香港大学图书馆所有新增添的和联合目录范围内的资料制作了附加卡片．并将分别按次序保存。现在收集的条目在数量上几乎已和既有的印就书目相等了。

译自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所印《香港研究资料》
元　明译　杨诗浩校
而　已重校

7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12 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1190·156　定价：2.50元

限国内发行